3 1761 12394242 7

荆冕榮光

香港聖公會荆冕堂五十周年堂史

1965 - 2015

鍾卓芝、邢福增 著

香 港 教 會 系 列 八

HK



鍾卓芝，生於香港，年青基督徒；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哲學碩士（歷史及人類學），嶺南大學歷史（榮譽）文學士，曾任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研究助理；在大專時期受歷史學啟發，以研究中國及香港基督教史為志趣。研究興趣包括近代中國政治文化史及宗教史、政教關係、宗教與現代性。





香港教會系列八

荊冕榮光

香港聖公會荊冕堂五十周年堂史

（1965–2015）

鍾卓芝、邢福增 著

香港
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
2018

香港教會系列八

荊冕榮光
香港聖公會荊冕堂五十周年堂史
（1965–2015）
鍾卓芝、邢福增 著

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
香港沙田崇基學院神學樓
電話 (852) 2770 3310 網址 www.csccrc.org 傳真 (852) 2603 7659

© 香港聖公會荊冕堂，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初版。除法例另有規定外，未經
香港聖公會荊冕堂書面准許，不得複製本書之任何部分。

製作：吳秀麗、李廣平、曾嘉穎
封面設計：Losau
承印、裝釘：瀚林智設計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962-7706-38-0

Studies on Hong Kong Churches 8

The Glory of the Crown of Thorns:
History of Hong Kong Sheng Kung Hui Crown of Thorns Church
(1965–2015)
by CHUNG Cheuk Chi Cecilia & YING Fuk Tsang

Christian Study Centre on Chinese Religion and Culture
Theology Building, Chung Chi College, Shatin, Hong Kong
Tel (852) 2770 3310 Website www.csccrc.org Fax (852) 2603 7659

© Hong Kong Sheng Kung Hui Crown of Thorns Church, 2018

Published November 2018. Subject to statutory exception, no reproduction of any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take place without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Hong Kong Sheng Kung Hui Crown of Thorns Church.

Production: NG Sau Lai, LI Kwong Ping, TSANG Ka Wing
Cover design: Losau
Printing and binding: Wise & Wide Design & Printing Co., Ltd.

利銘澤典宬
RICHARD CHARLES LEE CANADA-HONG KONG LIBRARY
JUN 01 2026

目錄

香港教會系列總序 | 邢福增 xi

鄺序 | 鄺保羅大主教 xiii

陳序 | 陳謳明主教 xv

賀辭 | 郭志丕主教 xvii

鄭序 | 鄭守定牧師 xix

第一章 荃灣的呼聲與荊冕堂（1960–1966） 1

第二章 給我吃，給我住——初期的社區服務（1960–1966） 35

第三章 植根於工業新市鎮的社區教會（1966–1981） 47

第四章 邁向全人關懷的宣教實踐（1981–1997） 89

第五章 迎向新時代的宣教使命（1997–2015） 129

第六章 跨越千禧的的全人關顧（2000–2015） 193

結語 荊冕榮光 215

後記一 | 鍾卓芝 219

後記二 | 邢福增 223

附錄一　聖公會荊冕堂大事回顧　227
附錄二　1965 年何明華會督於建堂奉獻禮上之講辭　231
引用書目　235
聖公會荊冕堂編輯小組　250
聖公會荊冕堂聯絡資料　251

RICHARD CHARLES LEE CANADA-HONG KONG LIBRARY
JUN 01

圖片目錄

扉頁

1. 荊冕堂（1964–1965）[a] i
2. 香港聖公會荊冕堂及聖公會荊冕堂士德幼稚園[b] ii

第一章　荃灣的呼聲與荊冕堂（1960–1966）

3. 荃灣工廠面積及工人數目比例圖（1962）[c] 10
4. 荃荃灣重工業及輕工業活動分佈圖（1962）[c] 11
5. 荃灣土地用途分佈圖（1962）[c] 12
6. 荊冕堂位置（Lot No. 463；約 1962 年）[a] 13
7. 荊冕堂圖則草圖一（約 1962 年）[a] 14
8. 荊冕堂圖則草圖二（約 1962 年）[a] 15
9. 荃灣農地漸漸改為建築用地（約 1964 年）[c] 18
10. 鍾仁立法政牧師為荊冕堂奠基[d] 20
11. 龍韶基會吏[d] 21
12. 現今荃灣大涌道以西一帶的工業區（約 1964 年）[c] 22
13. 荃灣的水稻田和農村，水稻田圍繞著農村開墾（相片前方；約 1964 年）[c] 22

14. 在荃灣填海所得之地興建馬路及現代化建築物（約 1964 年）[c] 23
15. 荊冕堂落成前的禮堂內貌（1964–1965）[a] 24
16. 荊冕堂落成前的聖堂外貌（1964–1965）[a] 24
17. 荊冕堂落成（未拆竹棚；1964–1965）[a] 25
18. 荊冕堂落成，外牆掛有荊棘冠冕，荊冕內有一苦杯，杯內有十架，寓意那榮耀冠冕的本質，就是受苦（1964–1965）[a] 25
19. 荊棘冠冕草圖一，由龍韶基會吏設計[a] 27
20. 荊棘冠冕草圖二，由龍韶基會吏設計[a] 27
21. 荊棘冠冕草圖三，由龍韶基會吏設計[a] 27
22. 鄺廣傑會吏[d] 28

第三章　植根於工業新市鎮的社區教會（1966–1981）

23. 白約翰會督[d] 58
24. 梁熾靈牧師[d] 59
25. 廖翼顯牧師[d] 59
26. 班佐時會吏[d] 60
27. 晚堂詩班（約 1970 年）[d] 60
28. 詩班聖誕獻唱（約 1970 年）[d] 61
29. 《教聲》報導荊冕堂成立牧區，選出第一屆牧區議員（1972）[e] 66
30. 堂務促進委員會（約 1970 年）[d] 66
31. 主日學學生旅行（約 1970 年）[d] 67
32. 主日學學生復活節郊外慶祝會（約 1970 年）[d] 67
33. 青年部郊遊（約 1970 年）[d] 68
34. 青年部歡迎部友赴美（約 1970 年）[d] 68
35. 青年部討論會（約 1970 年）[d] 69
36. 幼稚園敲擊樂表演（約 1970 年）[d] 76
37. 荊冕堂按手禮，白會督與接受按手者合照之一（1968 年 4 月 24 日）[d] 87
38. 荊冕堂按手禮，白會督與接受按手者合照之二（1968 年 4 月 24 日）[d] 87
39. 洗禮者合照（約 1970 年）[d] 88
40. 《教聲》第 270 期介紹荊冕堂的歷史和近況（節錄；1976）[e] 88

第四章　邁向全人關懷的宣教實踐（1981–1997）

41. 詩班員合照（1990 年 9 月 2 日）[f] 105

第五章　迎向新時代的宣教使命（1997–2015）

42. 青少年部在副堂舉辦過不少活動，眾人都留下深刻的回憶[d] 140
43. 1999 年搬遷前最後一次的牧區議會[d] 140
44. 拆卸前的聖堂內部[d] 141
45. 新堂未建成前，教友在麥理浩夫人中心進行崇拜[d] 143
46. 詩班員後方的摺疊木板後面，就是他們更換詩袍的地點[d] 143
47. 2000 年 6 月 25 日，奠基禮留影[d] 144
48. 2002 年 6 月新堂落成，舉行祝聖奉獻禮[d] 144
49. 新堂外貌（約 2002 年）[g] 152
50. 陽光下的新堂長樓梯（約 2002 年）[g] 152
51. 新堂長樓梯（約 2002 年）[g] 153
52. 新堂彩色大玻璃窗（約 2002 年）[g] 153
53. 新堂洗禮盆（約 2002 年）[g] 154
54. 扇型的聖堂（約 2002 年）[g] 154
55. 荊冕堂歡送池嘉邦牧師（2010 年 2 月 21 日）[d] 154
56. 荊冕堂盼教區議會能申請另一校址，作荊冕堂幼稚園寶石大廈分校搬遷發展之用（1990 年 4 月 11 日）[d] 172
57. 基督顯現堂堂徽[h] 178
58. 馬偉利牧師去信港澳教區常備委員會，建議在麥理浩夫人中心成立新傳道區（信函頁一；1996 年 6 月 11 日）[d] 180
59. 馬偉利牧師去信港澳教區常備委員會，建議在麥理浩夫人中心成立新傳道區（信函頁二；1996 年 6 月 11 日）[d] 180
60. 舊堂拆卸前，馬偉利牧師和同工合照（1999 年 7 月）[d] 182
61. 四十周年堂慶，全體聖品人、詩班及會眾合照留念（2005）[d] 184

第六章　跨越千禧的的全人關顧（2000–2015）

62. 郭志芊牧師與荊冕堂青少年人合影（2014）[d] 210

注：

[a] 香港聖公會檔案館藏（共 10 幅），承蒙允許轉載，謹此致謝。

[b] 聖公會荊冕堂士德幼稚園所藏圖片（共 1 幅），承蒙允許轉載，謹此致謝。

[c] Images (7 in total)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Geographical Review*. Used by permission of The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d] 香港聖公會荊冕堂所藏圖片（共 33 幅），承蒙允許轉載，謹此致謝。

[e] 香港聖公會《教聲》所藏圖片（共 2 幅），承蒙允許轉載，謹此致謝。

[f] 香港聖公會荊冕堂黃沛宜弟兄所藏圖片（共 1 幅），承蒙允許轉載，謹此致謝。

[g] 創智建築師有限公司所藏圖片（共 6 幅），承蒙允許轉載，謹此致謝。

[h] 香港聖公會基督顯現堂所藏圖片（共 1 幅），承蒙允許轉載，謹此致謝。

香港教會系列總序

近年間，香港基督教在本土研究的不同課題中，開始較前受到更多的重視。這種改變，既是出於對香港研究深化的回應，也反映出香港基督教對歷史身分的重視。

回顧香港開埠以來的歷史，先是經歷了一百六十多年的英國殖民統治（期間尚有三年零八個月日本佔領的淪陷時期），復又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下的特別行政區。從殖民地到後殖民地的嬗變，本身已有許多值得研究的課題。在全面檢視香港社會的發展時，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在其中到底扮演怎樣的角色？宗教發展跟政治、社會、教育、文化各方面的互動如何，確是饒具意義的課題。不跨張地說，在整理香港社會發展時，如果缺少了對基督教角色的認識，所重構的歷史圖像肯定是不完整的。

同時，近十年間，也出現了愈來愈多針對本地基督教歷史的個案研究。當然，與擁有一百六十多年歷史的香港基督教相比，現有的研究成果仍是鳳毛麟角，但這種轉變，最少說明，本地基督教界對重構自身歷史的意識，已較前為強。

我們深信，本地基督教界在重構自身的歷史，以及從不同角度檢視其時代使命與角色方面，是責無旁貸的。當然，相關研究必須以嚴謹的學術方法進行，這樣，才能對更廣泛的本土研究，作出貢獻。

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成立於一九五七年，長期以來肩負關注基督教與中國宗教及文化的對話，及中國基督教發展的使命。作為在香港社會及教會默默耕耘超過半世紀的基督教學術機構，在推動香港基督教研究方面，也不遺餘力。早於二○○二年，在前任社長盧龍光牧師的支持下，成立了「香港教會系列」，至今已出版了六冊的研究成果，從專題論文到研究專論，涉及了人物、基督教與社會、機構及堂會史等不同範疇，為香港教會研究擬訂了關注的重點與方向。誠然，在整個香港教會研究的領域，尚有許多課題有待開展，我們期望本系列可以積累更多研究成果，不論對香港教會本身，以至對更大範圍的本土研究，均能作出貢獻。

邢福增

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社長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

鄺序

香港聖公會荊冕堂為紀錄其過往五十多年的發展，特地編印這部堂史。我對此深表支持，並期待這個堂史的編整不單能將先賢的努力及付出一一紀錄下來，更能鼓勵現有及將來的教友把這份聖工發展的精神傳承下去，成為荊冕堂獨特的文化，同時也成為荊冕堂未來發展的基礎和資源。

香港聖公會的成長與香港整體發展是不可能分割。在上世紀 60 年代隨着香港步入輕工業為主的高速發展，新市鎮建成，香港聖公會開拓了幾個新牧區，包括荃灣的荊冕堂。隨着香港由製造業轉型成為世界前列的金融及航運中心後，荊冕堂在地區的服事，亦不單限於敬拜上帝及牧養人靈，反而即時回應了牧區在社會轉變中的需要，將牧養與聖公會教育及社會服務單位結合在一起，顧及牧區人口「全人」的身、心、靈需要及照顧。

我相信在過往的半個多世紀，荊冕堂肯定有說不完的故事，許多令人緬懷的人物，更有數不盡來自上帝的種種恩典，但歷史是不斷地前進，因為上帝的恩典和愛是不斷地賜予我們。故此，我寄望荊冕堂在編整堂史之際，亦趁機回顧自己過去五十多年的恩典、恩

賜及使命，從祈禱中分辨將來的發展方向及使命，並且能夠慷慨及勇敢地回應上帝藉着時代徵兆而顯現的召喚。

願全能的上帝繼續祝福及使用荊冕堂教友，藉以榮耀祂的聖名！

鄺保羅

香港聖公會大主教

陳序

從前曾戴羞辱荊冕，現今已戴榮光。——《主戴榮光歌》

昔日何明華會督為「荊冕堂」的命名，正好表達基督的光榮，就在他受苦的荊棘冠冕上綻放出來。而荊冕堂過去五十年的歲月，也使我們從教會的艱辛勞苦之中看到上主的光榮。

很感謝為我們作了不少資料蒐集與研究的學者為我們寫了這一本「荊冕堂堂史」，讓我們從中看到上帝奇妙的大能及引領。

荊冕堂可以說是與荃灣葵涌這個區域一同成長。在過去五十年間，她不斷回應社區的需要，在福傳、牧民、教育、社服、醫療，甚至教會合一的工作上盡心竭力為主作工。但五十年間遇到大大小小的困難及挑戰卻是數不勝數：有外在的，例如聖堂火災、水災、盜竊，又因配合周邊道路發展而需要拆堂又重建聖堂。內在的，又曾有傳道同工對我們教會的誤解而帶領一大批青年教友離開這屬靈的家……

但是上帝的恩典始終夠用！荊冕堂的牧者及教友過去多年都堅守使命，沒有比這些困難及挑戰所嚇怕，反而更有信心、愛心及盼

望，在自己不足之餘仍向所有有需要的居民伸出援手，又實踐城市宣教理念，配合教育及社會服務，與教堂的牧養及宣教工作連成一體。二十多年前又以植堂模式建立了青衣「基督顯現堂」及葵涌「主愛堂」（而基督顯現堂今天已成為了另一所牧區）。而今天的荊冕堂事工更為蓬勃，使兒童、青少年、家庭、婦女、長者等等都得到關顧，使牧區成為眾人屬靈的家，而基督的光榮也在這裏得到彰顯。

從前曾戴羞辱荊冕，現今已戴榮光。

主戴榮光歌的歌詞正好鼓舞着荊冕堂，以致教會全體信徒向前邁進，無論受盡困難、旁人嘲笑、內爭紛裂，只要我們持守信仰，一切羞辱都要成為榮光。

陳謳明

香港聖公會西九龍教區主教

香港聖公會荊冕堂五十周年誌慶

荊冕表彰救世恩
慈悲大愛世代存
齊心事奉五十載
順服虔誠敬聖尊

香港聖公會東九龍教區主教

郭志丕敬賀

鄭序

>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導他們遵守。看哪，我天天與你們同在，直到世代的終結。——馬太福音 28: 19–20

荊冕堂五十年的歷史，是一部香港戰後新發展區的宣教史。上世紀五十年代荃灣區由鄉郊轉變為工業衛星城市。當年何明華會督高瞻遠矚，以基督所戴受苦羞辱荊冕為標記，以道成肉身的精神，「受苦的愛」為力量，以「學校社服」全人關懷，向荃灣這新發展區傳揚福音。

回應這五十年的歷史中，我們要學習當年的初心，被戴荊冕基督的愛所激勵，以受苦的愛的心志，將主愛人的福音努力傳揚。

> 於是王要向他右邊的說：「你們這蒙我父賜福的，可來承受那創世以來為你們所預備的國。因為我餓了，你們給我吃；渴了，你們給我喝；我流浪在外，你們留我住；我赤身露體，你們給我穿；我病了，你們看顧我；我在監獄裏，你們來看我。」——馬太福音 25: 34–36

當年教會一開始就藉教育與社會服務回應人的需要。興建一所有規模的教會去回應人的心靈需要，去牧養羣羊；設立幼兒學校、小學、中學、裁剪班及英專等， 給與青少年身心的成長；設立以牧區為本的社會服務，童膳會去餵養飢餓的兒童，工人宿舍容納無根的青年，及至牙科療所，回應社會的全人關顧。

最難得的是在這五十年的歷史中，是主教、歷任不同崗位的牧者，不同身份地位的信徒，都同心全情投入的愛與關心四周的鄰舍。五十年後的今天，荃灣已變天：新型公共屋邨及新發展住宅林立，但人身心最深處還是飢餓漂泊無根，我們今應繼往開，給予適時的回應。

> 有了我的命令而又遵守的人，就是愛我的；愛我的人，我父要愛他，我也要愛他，並且要親自向他顯現。——約翰福音 14: 21

荊冕堂走過五十年的歷史是不容易的。六七年荃灣是暴動的中心，六七十年代香港工業起飛荃灣亦是工廠區重鎮，八十年代經濟結構轉變與九零年代回歸祖國，種種步伐也與荃灣及荊冕堂環環緊扣。

荊冕堂九十年代也經歷大少不同的天災：水災、火災與人禍、盜竊。但在多災多難之中，荊冕堂如鳳凰火裏重生：新聖堂於 2002 年 6 月 30 日祝聖奉獻。這標誌着荊冕堂新的一頁。建築物是寬大了，人數也倍增了。但要續寫五十年後的荊冕堂歷史，就要以禱告之心府問天父：荊冕堂有否傾力遵守主命、愛主愛人，力求上進。我們若能如此，主必力上加力、恩上加恩，向我們顯現。

鄭守定

香港聖公會荊冕堂主任牧師

第一章

荃灣的呼聲與荊冕堂（1960–1966）

一・戰後荃灣：由鄉郊至工業衛星市鎮

自 1965 年至今，聖公會荊冕堂五十年來屹立於荃灣德士古道，與荃灣社區一同成長，經歷及見證着整個社區物換星移的變遷。荊冕堂建堂廿五年之際，仁立小學首任校長及荊冕堂弟兄何祥麟如此感嘆：[1]

> 我是在 1970 年調職仁立小學，加入荊冕堂，轉瞬已是二十年了。1965 年，當我在錦田工作時，便都每天乘巴士往返，也必經過荃灣，望出車窗，還依稀記得廿五年前的荃灣，真可用「荒涼」兩字去形容。今天人口密集的葵芳和葵興邨，不過是一片草叢，仁立小學和主恩小學的現址，當年不過是個山頭。荊冕

[1] 何祥麟:〈荊冕堂二十五年回顧與前瞻〉，載《聖公會荊冕堂銀禧堂慶特刊，1965–1990》（香港：聖公會荊冕堂，1990），63。

堂附近，祇有可數得出的幾幢大廈，現在教堂對面幢幢的高樓大廈，誰想到那時不過像現在的荔園一樣，是個娛樂場；更遑論有那條公路支線了。荃灣還沒有發展為衛星城市前，是個郊區，也是一個工業區，多的是工廠。人走在路上，全無擠迫感，近年荃灣變化之大、之速，真使人有滄海桑田之感。

在 1930 年至 1941 年，荃灣還是個鄉村小市集，以農業發展為主，[2] 村民種田捕魚自給自足。戰後，荃灣逐漸步向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道路，開始有巨型工廠的建立。[3] 最早期設立的工廠，有美亞織造廠、[4] 南華鐵工廠、德士古油廠及其油庫——德士古灣[5] 及德士古道因而得名。

戰後香港重光，1946 年，人口達 160 萬。[6] 十年後，1956 年，人口突破 250 萬，估計當中的 100 萬是來自中國內地為逃避國共內戰及中共建國的難民。[7] 香港島與九龍的人口越見稠密，同時遷移至荃灣的人口不斷急升。當時荃灣舊城區和城郊鄉村因大量難民湧入，已有人滿之患，木棉下村的登記人口為 5,380 人，海壩村為 4,250 人，而難民安置區一共有 1,131 人。[8] 於 1954 年人口約 40,000 萬，佔整個新界人口的七分之一。[9] 荃灣成為了一個龐大的木屋區，火

---

2 十九世紀初，西班牙人將菠蘿由熱帶美州傳入菲律賓，再從菲律賓傳入福建、台灣和廣東等地。荃灣居民從城門至荃灣海（Tsuen Wan Bay，或稱荃灣灣）對面的青衣島山坡上，幾乎全種植菠蘿。見饒玖才：《香港的地方與地方歷史（下冊）——新界》（香港：天地圖書，1992），232–233。

3 邱東：《新界風物與民情》，古今香港系列（香港：三聯書店，1992），77。

4 亦有說法為美亞綢廠或美亞絲綢廠。

5 德士古灣經 1954 年以後，因政府多次於荃灣海及醉海灣大規模填海，它與醉海灣一起在現今香港地圖上銷聲匿跡。

6 *Hong Kong Annual Report 1947*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1948), 9.

7 "A Problem of People," in *Hong Kong Annual Report 1956*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1957), 2.

8 許舒（James Hayes）：《滄海桑田話荃灣》，嘉熙語文翻譯中心譯（香港：滄海桑田話荃灣出版委員會，1999），80。

9 荃灣區議會編：《荃灣二百年——歷史文化今昔》（香港：荃灣區議會，1991），4。

災頻生。徙置事務署署長在 1956 至 1957 年的年度報告中，提出去年共有火災 40 宗，災民約 14,300 人，而荃灣海邊約有 150 間房屋被燒毀，有 1,030 人無家可歸。[10] 而且，舊城區的街道高低不一，常因雨成災。[11]

隨着中國大陸政權轉易，韓戰爆發，大批內地移民由北方湧入香港，尤其是上海紡織業和搪瓷業的鉅子，帶着豐厚的資金和現代化的機器來到荃灣重展拳腳。[12] 荃灣的地理位置優越，位於西九龍連接新界的要衝，水陸交通便利，地價較低，[13] 所以他們選擇荃灣為發展基地，買地建廠，[14] 招聘大量內地難民為工人。在 1950 年代後的數年間，荃灣變成了附屬於九龍市區的工業區，亦一躍成為香港的紡織業中心。[15] 南海紗廠、東南紡織廠、南豐紗廠，更是有名。[16] 因應荃灣的工業發展，其商業發展也漸漸崛起，新界影業鉅子邱德根就在荃灣開辦遠東銀行——新界史上第一家銀行。[17]

由於人口迅速增加，每月須額外增加 2,000 個職位空缺，始能應付求職者的需求。[18] 因此，建立及發展具規模的衛星城市，藉此容納大量人口，開闢更多工業用地，為政府整體發展規劃的重點。

---

10 許舒：《滄海桑田話荃灣》，81。

11 同上，80。

12 荃灣區議會：《荃灣二百年》，8。

13 1950 年代香港島和九龍半島的土地供應較為緊張，地價高昂，故市場的投資轉移至新界。見何佩然：《地換山移——香港海港及土地發展一百六十年》（香港：商務印書館，2004），148。

14 當中較大規模的是南海紗廠。五十年代，南海紗廠是紡織染工會的根據點，而荃灣的工廠大多都是右派工會勢力所在地。見〈右派工會及香港紡織業發展（一）〉。取自香港記憶計劃口述歷史訪談網頁，http://www.hkmemory.hk/collections/oral_history/All_Items_OH/oha_24/records/index_cht.html#p45256，2016 年 7 月 8 日。

15 劉潤和：《新界簡史》（香港：三聯書店，1999），154；荃灣區議會：《荃灣二百年》，8。

16 蔡思行：《戰後新界發展史》（香港：中華書局，2016），111–112。

17 同上，114。

18 David Lam, "The New Territories Story," *The China Mail*, February 3, 1960, 6.

如當時新界民政專員何禮文（David Ronald Holmes）指出，「我們必須預期新界有無可避免的發展。我們將有工業提供就業機會以及衛星城市提供居所。」[19] 他認為新工廠應建在交通便利的地點，[20] 荃灣既擁有地理上的優勢，自然成為政府發展的目標。

早在 1959 年，政府已批准興建荃灣新市鎮，計劃將荃灣打造成可容納 120 萬人口的新市鎮。[21] 1964 年，政府決定將荃灣闢為新界第一個工業衛星城市，期望與觀塘一起發展為大型工業區。[22] 六、七年間，區內大大小小的工廠，達三百多家。沿德士古道北段至海濱碼頭一帶，是荃灣區內第一工業地段。[23] 最著名的莫過於源豐紡織、益豐搪瓷廠、金錢牌熱水瓶廠和立興機器廠等等。[24] 隨着工業的發展蓬勃，1961 至 1962 年，在荃灣就業的工人，佔全港工人人口約 20%，[25] 而居住人口由 1961 年的 84,000 人，急速增長至 1966 年的 205,700。[26] 荃灣的發展，有一日千里之象，故政府對此衛星城市甚為重視。

戰後英國殖民地政府圖穩定人心和提高政權的正當性，改變其殖民政策，大量增加公共服務開支。尤其在 1953 年石硤尾六村大火後，政府積極改變公共房屋政策，馬上推行首個大規模公共房屋建設計劃，興建各大型徙置大廈。[27] 在荃灣區，政府銳意拆卸在官地僭建的木屋，不少宗教團體如天主福利會和衛理公會等等，協助建

---

19 同上。

20 同上。

21 劉潤和：《新界簡史》，150。

22 當年葵涌和青衣亦納入為荃灣區。直至 1986 年，荃灣和葵青分為兩個獨立行政區。參荃灣區議會：《荃灣二百年》，4。

23 同上，9。

24 同上。

25 何佩然：《地換山移》，150。

26 荃灣區議會：《荃灣二百年》，4。

27 薛求理：《城境——香港建築，1946–2011》（香港：商務印書館，2014），42。

立居民徙置區，也捐建學校提供各種社會服務。[28] 有些居民獲批准設立臨時房屋區，如大窩口臨屋區。[29] 六十年代，不少鄉民及漁民在政府安排下，紛紛搬遷到大型公共屋邨，如位於大窩口石頭街的大窩口邨。

大窩口邨建於 1961 年，共有 20 座徙置大廈。其中除了一座屬第四型大廈外，其餘的全屬第二型，設計呈「日」字型。[30] 這種第二型徙置大廈，七層高，沒有電梯，每層有 88 個單位，以大廈走廊貫穿所有單位。[31] 這些走廊，成為居民的活動空間。地下層或作商鋪，天臺作學校，孩子上學都不用乘坐交通工具。[32] 大廈提供了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猶如一小社區，可是社區設施十分簡陋。1961 年創校的聖公會主恩學校（現稱為主恩小學[33]），便座落在大窩口邨第十一座，二樓至七樓是居民住所，地面層和八樓天臺是學校範圍。[34]

荊冕堂的梁婉玲姊妹，是主恩學校的第一屆畢業生。小學時期她在葵涌石圍角居住，周圍是農田和小石屋，生活艱苦：[35]

> 早期的大窩口邨……居住環境很差很差，但那時候一家數口有這樣的房子居住，走到走廊那兒就是廚房，已經感到很開心……我們曾經歷的那些日子，真的沒有食物吃，要去捉田鼠吃，捉

---

28 許舒：《滄海桑田話荃灣》，85。

29 同上。

30 陳翠兒、蔡宏興編：《空間之旅——香港建築百年》（香港：三聯書店，2005），80；〈吸取安居計劃經驗，大窩口邨重建順利〉，《華僑日報》，1978 年 5 月 29 日，18。

31 同上。

32 陳翠兒、蔡宏興：《空間之旅》，72、78。

33 見〈主恩小學〉，《港澳教聲》期 272（1976 年 5 月 30 日）：3。

34 林湘雲：〈一起走過的日子——共沐主恩〉，載《聖公會主恩小學金禧紀念特刊》（香港：聖公會主恩小學，2012），27。葵涌崇真堂亦於大窩口邨第 1 座開辦崇真學校，見〈葵涌崇真堂徙置新址〉，《基督教週報》期 3（1964 年 9 月 30 日）：4。

35 同上。

> 田鼠的時候還要弄斷牠的腳。[有時候] 甚至田鼠也沒有，要吃蟑螂。一間唐屋，七十二家房客，四日一次水……大窩口可在荃灣這衛星城市裏發展，已是十分好的了。[36]

她的父親當時在荃灣沙咀道的一幢工業大廈租了一個單位，做輕工業產品的加工工作：[37]

> 就是做些什麼呢？那時候坐私家車，有些或者不會有皮革座位，坐在上面會很熱。那麼我們就把彈弓裝嵌到椅墊裏賣錢……我們上學下課後，因我們只唸上午校，下午就回家做工了。做了製成品，我們就到九龍塘，那裏有很多學車的師傅。那麼我們就去賣這些產品維生。[38]

她的生活情境，相信象徵了不少當年荃灣大窩口居民和荊冕堂教友其真實、深刻的人生經歷。

二・何明華會督的宣教理念

在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香港的基督教仍處於「中國—華南—香港」的格局，各主要宗派均在華南教區的脈絡下發展。[39] 1949 年後，因不同的政治因素，各宗派教會脫離原有的「華南格局」獨立發展，漸漸建立其植根香港的身分，並積極回應難民潮帶來的各種社會問題，在公共領域參與大大小小的事務。戰後聖公會的發展軌跡，亦是如此。

---

36 〈梁婉玲訪問紀錄〉，香港聖公會荊冕堂金禧紀念特刊編輯委員會整理。

37 同上。

38 同上。

39 邢福增：〈一九四九年前香港基督教的發展——宏觀歷史的考察（1842–1949）〉，參氏著：《香港基督教史研究導論》（香港：建道神學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4），7–30。

1951 年 7 月，在香港的聖公會礙於政治形勢，正式脫離中華聖公會華南教區，以港澳教區的身分獨立運作。當時，聖公會共有 10 個牧區，包括英語牧區及華人牧區（參表一）。五十至六十年代，聖公會的牧區數目及教友人數均有穩健增長（參表二）。

	英語牧區	華人牧區
香港島	聖約翰座堂	聖士提反堂、聖保羅堂、聖馬利亞堂
九龍半島	聖安德烈堂、基督堂	聖三一堂、諸聖堂
新界		青山聖彼德堂、聖馬提亞堂

表一：1951 年香港聖公會牧區

	年份	牧區數目	教友人數	牧區增長	教友增長
香港島	1955	6	4,860	/	/
	1958	7	5,291	7%	9%
	1962	9	8,971	29%	70%
九龍半島	1955	6	2,350	/	/
	1958	7	3,960	17%	69%
	1962	11	4,501	57%	14%
新界	1955	3	857	/	/
	1958	3	809	0%	–6%
	1962	3	225	0%	–72%
合共	1955	15	8,097	/	/
	1958	17	10,060	13%	24%
	1962	23	13,697	35%	36%

表二：1955 年、1958 年及 1962 年香港聖公會的發展[40]

40 綜合自 Earl H. Cressy, *City Churches in Hong Kong: With a Supplementary Survey of All Churches in the Colony* (Hong Kong: the Author, 1956), Earl H. Cressy and Loren E. Noren, *Urban Church Growth in Hong Kong 1955–1958, Second Hong Kong Study* (Hong Kong: the Author, 1960), Loren E. Noren, *Urban Church Growth in Hong Kong 1958–1962, Third Hong Kong Study* (Hong Kong: the Author, 1964).

何明華會督（Bishop Ronald Owen Hall）早於 1932 年獲委任為中華聖公會港粵教區會督（主教），至 1966 年離任。在其任內，在香港的聖公會經歷了從粵港教區到港澳教區的轉型，並積極回應香港社會的需要，取得長遠的發展。

何會督的成長和事奉的背景，奠定其社會行動和福利工作的神學基礎。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正是何會督成長的年代，他受到英國聖公會神學家莫里斯（F. D. Maurice, 1805–1872）的基督教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41] 後者在一部分青年和大學生信徒中發揮相當大的影響力。何會督更在牛津大學成立了基督徒學生運動（Student Christian Movement）的學院支部。[42] 1927 年，他擔任紐卡素市（Newcastle）聖路加堂（St. Luke's Church）的主任牧師，而紐卡素本身就是個工業城市，是 19 世紀前英國的煤礦出產中心，在 20 世紀初主要發展重工業。[43] 何會督那時候發起了「紐卡素房屋改善信託基金」，為工人和失業人士提供合理租金的居所，更為貧苦人設立免費膳堂和失業者中心。[44]

這份關懷社會的信念，深深影響着何會督對戰後香港社會問題的回應。[45] 他十分關注香港市民生活的種種需要。1953 年石峽尾大火後，何會督倡導香港房屋委員會及香港房屋協會的成立。他看見許多漁民的子女住在船上無法上學，他展開漁民子弟學校的工作。[46]

---

41 關於何明華與莫里斯的神學，參吳青：《何明華與中國關係之研究，1922–1966》（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7），155–163。

42 宗教教育中心：《步武基督——香港聖公會的社會服務，1849–2013》（香港：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2014），33。

43 同上，34。

44 同上。

45 曾國華：〈何明華會督（1895–1975）對香港之社會及教育之貢獻〉（碩士論文，香港大學，1993）。另 Moira M. W. Chan-Yeung, *The Practical Prophet: Bishop Ronald O. Hall of Hong Kong and His Legacie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5).

46 余妙雲 ：〈從貧說起——何明華會督〉，《基督教週報》期 2633（2015 年 2 月 8 日）。

面對勞工子弟、難民和孤兒的需要，他協助成立了勞工子弟學校和職業訓練學校，又建立了聖基道兒童院和聖雅各福群會等等，帶動其他宗教或志願團體推動教育及社會服務事業。[47] 他主張牧區必須走進社區和人群之中，才能對應社會和當地居民的關注，才能建立愛。[48] 因此，他先後建立多所社區牧區，在不同的徙置區興建教堂，荊冕堂就是其中之一。[49]

三・荊冕堂創堂與拓荒

五十年代，何會督高瞻遠矚，得悉政府將發展荃灣大窩口，故與荃灣理民府[50] 接洽買地，預備於大窩口道與德士古道交界，即大窩口徙置區和主恩學校旁邊興建荊冕堂。[51] 建堂的一部分費用由美國聖公會、牛津救濟委員會、呂明才基金、卡文特利座堂及眾熱心人士捐獻。[52] 他計劃將荊冕堂的牧養、宣教、教育和社會服務作整合發展，並以聖雅各堂的發展模式為範本。[53] 早於六十年代初，主恩學校已聚集不少會眾，當荊冕堂成立後，主恩學校的會眾亦轉至荊冕堂崇拜。可以說，荊冕堂其實早已在主恩學校撒種與開基，兩者的歷史淵源可謂十分深厚。

我們從荊冕堂同期建立的聖十架堂及聖巴拿巴堂，也可見到類似的宣教模式，即同樣位於九龍和新界的工業衛星城市，與鄰近聖

---

47 同上。

48 同上。

49 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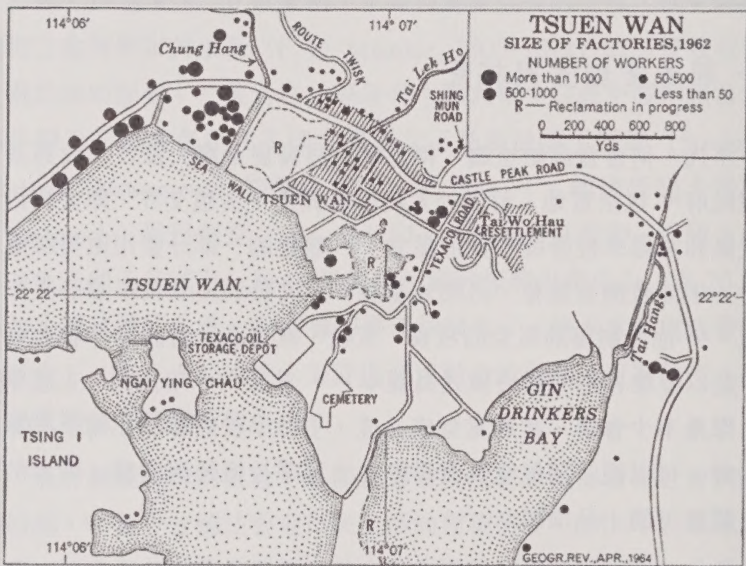
50 荃灣的行政制度始於 1957 年，當時荃灣、葵涌和青衣屬南約理民府管轄。1960 年，荃灣理民府正式成立。見〈區議會選區〉，載《荃灣區議會工作報告 1985–1988》（香港：荃灣區議會，1988），64。

51〈荊冕堂簡介〉，《港澳教聲》期 270（1976 年 3 月 28 日）：3。

52 同上。

53 鄺廣傑：〈荊冕堂廿五年週年紀念〉，載《聖公會荊冕堂銀禧堂慶特刊，1965–1990》（香港：聖公會荊冕堂，1990），2。

公會學校關係甚深。位於黃大仙的聖十架堂在 1964 年正式成立以先，已在基信小學開基。[54] 而位於觀塘的聖巴拿巴堂，亦早在徙置區中的聖巴拿巴小學開基，其後在 1965 年落成啟用。[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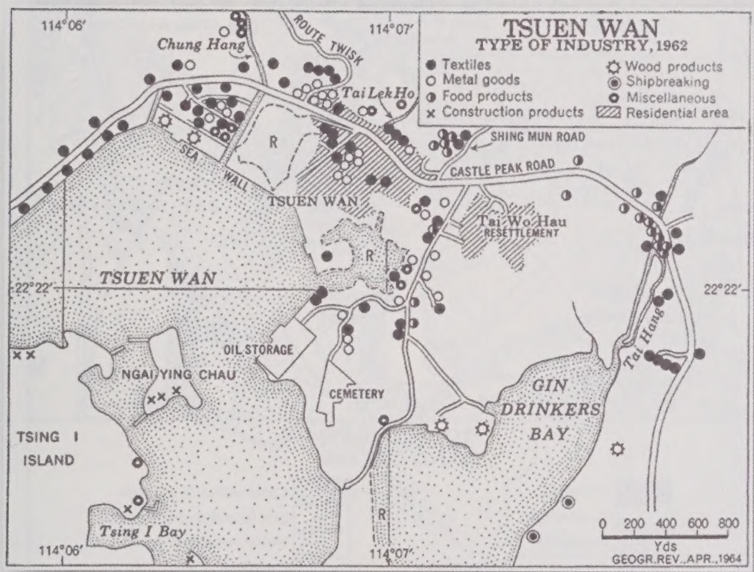


荃灣工廠面積及工人數目比例圖（1962）[56]

54〈堂史〉，香港聖公會聖十架堂網頁，http://church.skhcalvary.hk/Home/about-us/history，2016 年 6 月 22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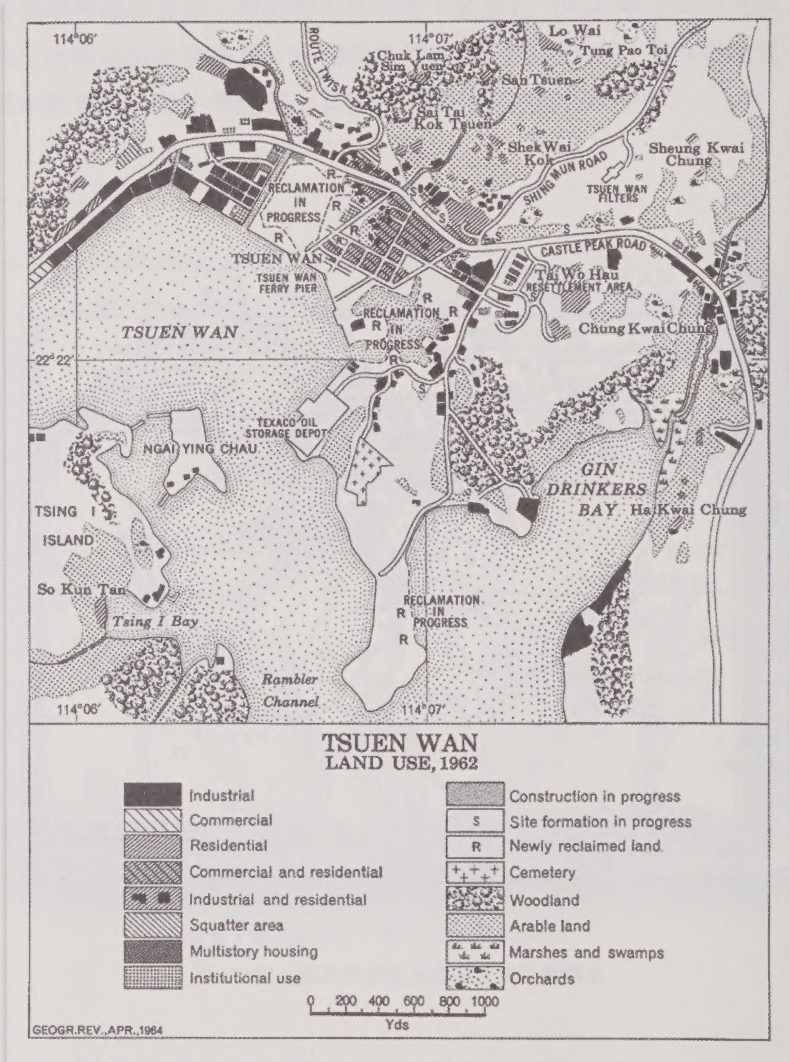
55〈聖巴拿巴堂開堂簡史〉，《港澳教聲》期 146（1965 年 3 月 28 日）：2。

56 David C. Y. Lai, and D. J. Dwyer, "Tsuen Wan: A New Industrial Town in Hong Kong," *Geographical Review* 54, no. 2 (April 1964): 1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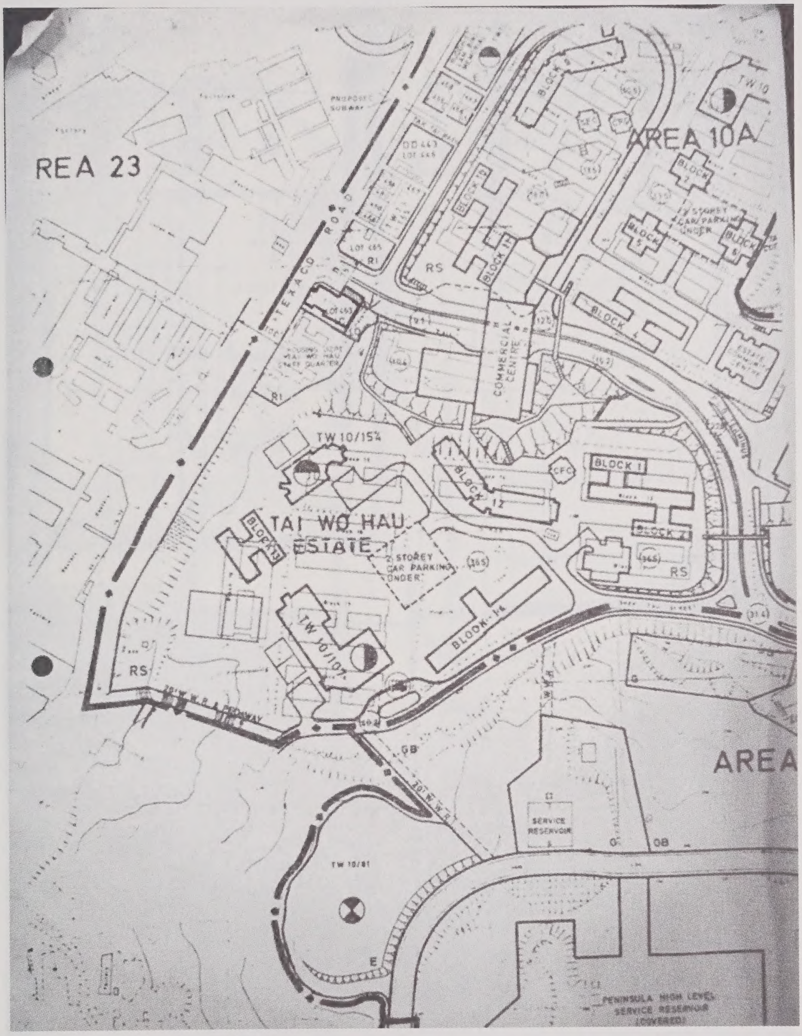
荃灣重工業及輕工業活動分佈圖（1962）[57]

57 同上。



荃灣土地用途分佈圖（1962）[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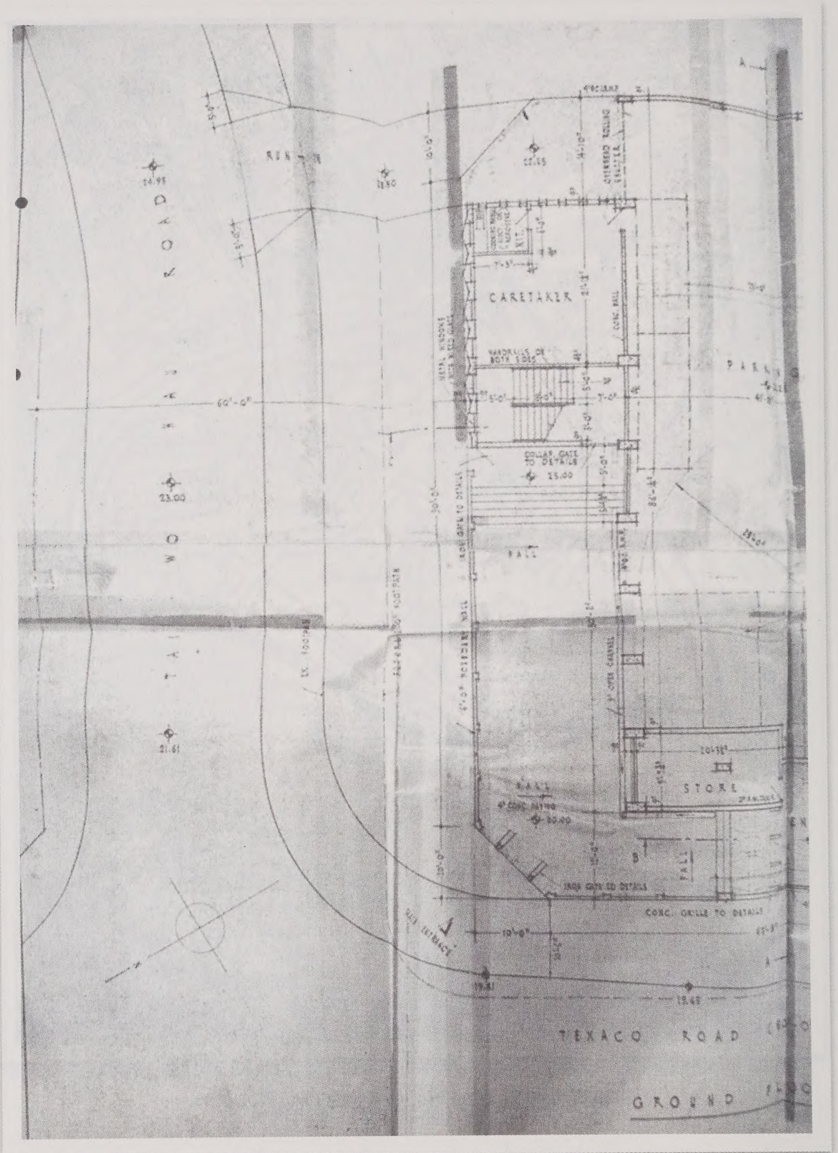
[58] 同上，167。



荊冕堂位置（Lot No. 463；約 1962 年）[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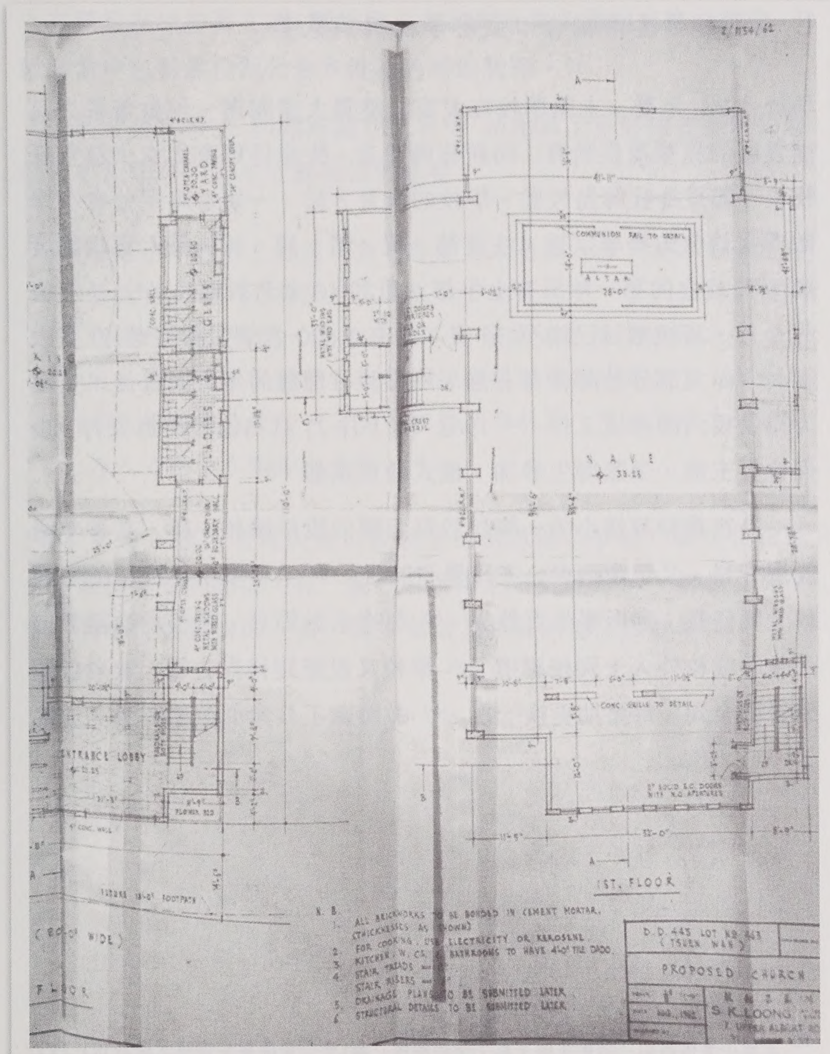
---

59 [1962?], Diocese of West Kowloon, Crown of Thorns' Church (CT)(1), Bishop's House Archives, Hong Kong.



荊冕堂圖則草圖一（約 1962 年）[60]

60 同上。



荊冕堂圖則草圖二（約 1962 年）[61]

61 同上。

1. 向新邨學生傳福音：主恩學校與荊冕堂

早於 1961 年夏，主恩學校在大窩口徙置大廈開辦，何會督着力為徙置區的兒童提供教育，向新邨傳福音，故委任鄧葆真女士為首任校長，郭熹良牧師為校監。學校的教育方針，一如當時聖公會小學監理委員會的辦學宗旨，注重德、智、體、群、美、靈六育均衡發展。[62] 成立的第一年只有上午部 6 班和 10 多名教職員。[63] 一年後的 9 月，班級數目已增至 36 班，約有 1,600 名學生和超過 40 名教職員，而大部分教師皆為有志、熱心和有理想的年青基督徒，並極力協助校內的佈道工作。[64] 1962 年 11 月 27 日為獻校感恩崇拜，由何會督主禮，全體師生參加，儀式隆重肅穆。[65]

為牧養和栽培小羊，學校於每天課前設早禱和午禱，在各年級設聖經科，又舉辦週會、主日學和詩班。[66] 主日學由富經驗的聖經科老師任教，參與學生百餘人。[67] 每逢宗教節日，學校均邀請教區的牧師或校外人士到校講道。[68] 學校又設聖經科佈告箱，陳列各聖經掛圖金句，每星期更換一次。[69] 教師除了日常的教學以外，於晚

---

62 主恩小學撰寫組:〈荊冕堂與主恩小學的關係〉,載《聖公會荊冕堂銀禧堂慶特刊》,75。

63 同上。

64 鄭偉健：〈荊冕堂與主恩小學〉，載《聖公會荊冕堂銀禧堂慶特刊》，66。

65 同上。

66 主恩小學撰寫組：〈荊冕堂與主恩小學的關係〉，75；〈教育委員會報告——各校宗教教育概況列表〉,《聖公會港澳教區第廿六屆教區議會議程附第廿五屆教區議會議案及報告》，1964 年 3 月 2 日至 6 日。

67 〈教育委員會報告——各校宗教教育概況列表〉。

68 同上。

69 同上。

上亦開設夜校和英文班，讓工廠工友和鄰近青年得到進修的機會。[70] 教師當中包括多位聖公會本港及海外的牧師。[71]

何會督在第 26 屆教區議會報告中，指出為了更好地牧養聖公會學校校內信徒，有成立新牧區的必要：

> 本港小學教育之發展，急不容緩，余祈禱上帝，使本教區之發展教育工作，乃為配合本港在此方面之需要。吾人亦計劃在新校附近建立聖堂，使其成為基督徒愛心服務及崇拜之中心場所。余曾盼望從海外各地獲得經濟援助建築此等聖堂，但此工作只是部份地成功。日後余雖離開本教區，但余將竭力呼籲海外人士協助本教區之工作。[72]

1964 年春，聖公會在大窩口設教堂的消息傳至學校，師生雀躍萬分，期待聖殿的建成，有一個專為崇拜上帝的地方。[73] 鄧校長亦受委任為籌建委員會的一員，師生動員為牧區的建立做好準備。

70《聖公會主恩小學三十五周年紀念特刊，1961–1996》（香港：聖公會主恩小學，1996），23。

71 同上。

72〈會督報告〉，《聖公會港澳教區第廿七屆教區議會議程附第廿六屆教區議會議案及報告》，1966 年 1 月 4 日至 6 日及 1966 年 3 月 15 日至 16 日，47。

73 同上。



荃灣農地漸漸改為建築用地（約 1964 年）[74]

[74] Lai and Dwyer, "Tsuen Wan," 158.

2. 荊冕堂建成

1964 年 6 月 21 日，荊冕堂舉行奠基禮，由鍾仁立法政牧師奠石，區炳南牧師主禮，黃蒲霖牧師、周夢秋牧師、高兆雄牧師及主恩學校首任校長鄧葆真女士襄禮，主恩學校的詩班及童軍協助工作。[75] 當日參與此盛事的，還有其他聖公會聖品和教友、主恩學校師生近千名、政府人士，以及天主教、中華基督教會及救世軍等友好團體。[76]《華僑日報》於 6 月 22 日除了報導奠基禮的盛況外，也展望荊冕堂的落成——「屆時荃灣地區可多一所聖堂及福利中心，服務當地人士靈性及身體之需要云。」[77]

荊冕堂興建期間，主恩學校每主日會在學校天台舉行晚禱崇拜，由聖公會各堂牧師主持和講道，包括龍韶基會吏、龍幹牧師和周夢秋牧師等等。[78] 凡蒞臨之員生，皆誠心禱告，願聖殿早早落成。[79] 當聖堂快將落成之際，鄧校長於校內設立主日學，委派張仲磐老師和梁燕文老師為主日學老師，希望為聖公會在該區的根基做好預備，讓學生和鄰居的兒童能早日認識主道、同沐主恩。[80] 因反應十分熱烈，參加者眾，於是學校設立了五星期的暑假主日學導師訓練班，並呼召較高年級的學生參加事奉，地點在鄧校長府中，由基督徒老師培訓學生，成為新堂的精兵小先鋒。[81] 負責培訓的老師和小先鋒的教與學充滿熱誠、勤奮，最後小先鋒亦獲得主日學教

---

75 〈荃灣荊冕堂舉行奠基禮〉，《港澳教聲》期 130（1964 年 6 月 30 日）：3；《聖公會主恩學校——創校五週年紀念專刊，1961–1966》（香港：聖公會主恩學校，1966），9；〈聖公會荊冕堂舉行新堂奠基〉，《華僑日報》，1964 年 6 月 22 日，10；〈聖公會荃灣荊冕堂後天舉行奠基典禮〉，《工商日報》，1964 年 6 月 19 日，5。

76 〈荃灣荊冕堂舉行奠基禮〉，3。

77 〈聖公會荊冕堂舉行新堂奠基〉，10。

78 主恩小學撰寫組：〈荊冕堂與主恩小學的關係〉，75。

79 同上。

80 同上。

81 同上。

員文憑。[82] 他們在主日學教導幼兒認字、讀金句、玩遊戲、唱聖詩及認識聖經故事，令負責培訓的老師感慨萬分。[83]

歷時八個月的建築工程過後，一座現代設計的大樓終落成，其圖則由龍韶基會吏繪製，他本為一名建築師。[84] 大樓樓高五層，地下副堂為童膳中心，供學生廉價營養午餐，二樓為可容納六百多人的聖堂，三樓為牧師辦公室，四樓和五樓為會議室和牧師樓。[85]



鍾仁立法政牧師為荊冕堂奠基[86]

---

82 同上。

83 同上。

84 〈荃灣荊冕堂舉行奠基禮〉，3；〈荊冕堂簡介〉，《港澳教聲》期 270（1976 年 3 月 28 日）：3；〈荃灣荊冕堂已祝聖啟用〉，《港澳教聲》期 141（1965 年 5 月 31 日）：1；主恩小學撰寫組：〈荊冕堂與主恩小學的關係〉，75。不少聖公會教堂是由龍韶基會吏設計的，除了荊冕堂外，還有紅磡聖匠堂、觀塘聖巴拿巴堂、竹園聖十架堂等等。奠基石中文碑文多是由龍幹法政牧師書寫的。見〈第一所聖殿的建成〉，《教聲》期 1717（2009 年 2 月 1 日）：3。

85 〈荊冕堂簡介〉，3；〈聖公會荊冕堂舉行新堂奠基〉，《華僑日報》，1964 年 6 月 22 日，10；〈聖公會荊冕堂後天舉行奠基典禮〉，《華僑日報》，1964 年 6 月 19 日，5。

86 鍾仁立：〈教會今日的重大使命〉，載《聖公會荊冕堂五周年堂慶特刊，1970》（香港：聖公會荊冕堂，1970），11。

3. 荊冕堂初期發展及命名

1965 年，新堂落成後，何會督委任六位熱心基督徒組成荊冕堂臨時委員會（Provisional Committee for Crown of Thorns Church），於 2 月 6 日舉行第一次會議，處理荊冕堂的行政如開設銀行戶口等事務。[87] 臨時委員會以拔萃男書院前校長郭慎墀為主席，葉禮先生為司庫，龍韶基會吏為書記，伊雅各牧師、鄧葆真校長及屈德恩女士為委員。[88] 龍韶基會吏為一註冊建築師，亦為聖公會的義務聖品，暫時主理一切荊冕堂的堂務。[89] 當時何會督已預備同年將會有另一聖品，全職主理堂務。[90]



龍韶基會吏[9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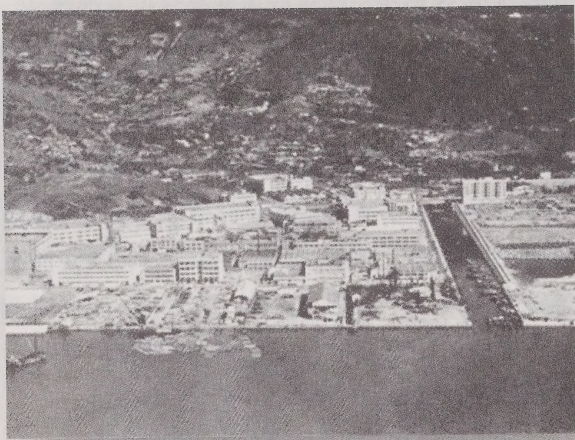
87 同上；"Minutes of the First Meeting of the Crown of Thorns Church Provisional Committee," February 6, 1965, Diocese of West Kowloon, Crown of Thorns' Church (CT)(1), Bishop's House Archives, Hong Kong.

88 同上。

89 〈荃灣荊冕堂已祝聖啟用〉，《港澳教聲》期 141（1965 年 5 月 31 日）：1。

90 同上。

91 〈本堂歷任聖品〉，載《聖公會荊冕堂五周年堂慶特刊》，5。



現今荃灣大涌道以西一帶的工業區（約 1964 年）



荃灣的水稻田和農村，水稻田圍繞著農村開墾（相片前方；約 1964 年）[92]

92 Lai and Dwyer, "Tsuen Wan," 159, 164.



在荃灣填海所得之地興建馬路及現代化建築物（約 1964 年）[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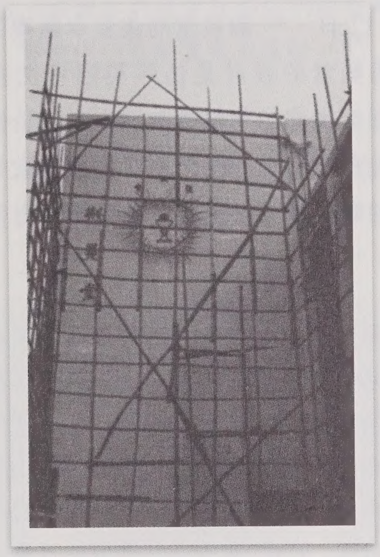
93 Ibid., 164.





荊冕堂落成前的禮堂內貌（上圖）及聖堂外貌（下圖）（1964–1965）[94]

[94] Crown of Thorns' Church (CT)(1), Bishop's House Archives, Hong Kong.





荊冕堂落成，外牆掛有荊棘冠冕，荊冕內有一苦杯，杯內有十架，
寓意那榮耀冠冕的本質，就是受苦（1964–1965）[95]

[95] Crown of Thorns' Church (CT) (1), Bishop's House Archives, Hong Kong.

1965年4月12日，[96] 荊冕堂的建堂奉獻禮由何會督主持和講道。[97] 他說道荊冕堂的設計是仿照英國考文垂座堂（Coventry Cathedral）的，而這座堂像荊冕堂一樣，坐落於偌大的工業區的中央。[98] 關於荊冕堂的命名，他引用一首古舊詩歌的首數句歌詞——「以前曾戴荊棘的頭，現今已戴榮光；大能大力得勝君王，頭上冠冕輝煌」作引子：[99]

> 一百年前，編寫此詩、深愛此詩的基督徒，是富裕的中產階層人士。他們活在勞動階級的供應中，同時活在對貧窮問題的完全無知中。他們頗為不知曉自已其實是多麼的自私自利。難怪當他們想起基督時，認為基督跟他們一樣，活在安舒的天堂裏，可與混沌的世界中抽離並毫不相干。但我們清楚事情不是這樣的——我們明白「荊棘」就是那「尊貴的冠冕」。上主除了那「荊棘」外，並無其他冠冕。道成肉身的人子的寶座，就是在那被釘的十架上的，除此之外，並無其他寶座。如果你想為世上的痛苦、傷害和苦難尋找一個答案，荊棘冠冕就是我的回答。生活中的罪、痛苦、混沌的殘害，是人類對上主的叛亂。更甚的是，人類的叛亂為耶穌——他們的創造主——編織了荊棘冠冕。願上主對我們說話。荊棘冠冕為我們展示了上主是至有永有地統領世界，並以祂的慈愛和寬恕戰勝、洗淨我們的罪。如耶穌所說：[願這個聖餐]，提醒你們我是什麼，提醒你們我永

96 奉獻禮的日期於何會督講章、《港澳教聲》中的〈荊冕堂簡介〉、《聖公會主恩學校——創校五週年紀念專刊，1961–1966》，9；主恩小學撰寫組所寫的〈荊冕堂與主恩小學的關係〉一文的記載有出入。專刊所寫的是4月10日（星期六），但〈荊冕堂與主恩小學的關係〉一文所標明的日期是4月11日（星期日），而講章和〈荊冕堂簡介〉的是4月12日（星期一）。因何會督的講章應是他親自編寫，且為第一手資料，而他亦是奉獻禮的主持、祝聖人，故他的個人紀錄理應較為可信。

97 《聖公會主恩學校——創校五週年紀念專刊，1961–1966》，9。

98 "Dedication of Crown of Thorns," 1965, Diocese of West Kowloon, Crown of Thorns' Church (CT)(1), Bishop's House Archives, Hong Kong.

99 同上。此詩歌譯文來自〈主戴榮光歌〉，《普天頌讚》（香港：基督教文藝，2008），201。

遠與你們同在，提醒你們我會分擔你們的生命，以我「受苦的愛」為力量，幫助你們戰勝魔鬼的權能。[100]

荊冕堂由此命名，可見何會督寄望荊冕堂，在荃灣這個正在急速發展的工業市鎮中，與周邊社會的弱勢連結，像耶穌一樣以「受苦的愛」分擔別人的生命和苦難——那榮耀冠冕的本質，就是受苦。



荊棘冠冕草圖，由龍韶基會吏設計[101]

4 月，新堂舉行第一次復活節感恩崇拜和復活節後第一次感恩崇拜，主恩學校學生均有參與。[102] 6 月中旬，新堂的晚堂崇拜人數達約 150 至 200 位成人和兒童，而主日學約有 200 至 300 位兒童。[103] 7 月 7 日，主恩學校的第一和第二屆畢業典禮於新堂舉行。[104]

7 月中旬，何會督所委任的鄺廣傑會吏[105] 從美國回港，接任龍會吏的工作，正式成為荊冕堂第一任聖品，主理牧區會務。鄺會吏

100 同上。

101 Crown of Thorns' Church (CT) (1), Bishop's House Archives,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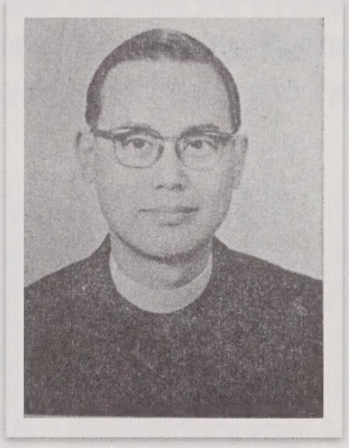
102 主恩小學撰寫組：〈荊冕堂與主恩小學的關係〉，載《聖公會荊冕堂銀禧堂慶特刊》，75；《聖公會主恩學校——創校五週年紀念專刊，1961–1966》，9。

103 "Crown of Thorns Church—Tsun Wan," June 15, 1965, Diocese of West Kowloon, Crown of Thorns' Church (CT) (1), Bishop's House Archives, Hong Kong.

104 《聖公會主恩學校——創校五週年紀念專刊，1961–1966》（香港：聖公會主恩學校，1966），10。

105 現為香港聖公會教省榮休大主教。

任職於荊冕堂雖只有約一年的時間（至 1966 年 7 月），但其拓荒之旅實不容易。



鄺廣傑會吏[106]

4. 開堂的拓荒之旅

成立初期，鄺會吏主要面對的問題，是教堂的人手及財政需要。財政方面，因教友的薪水微薄，家境也不富裕，故沒有收取獻金，只在聖堂入口處放置獻金箱，教友按感動奉獻。人手方面，當年荊冕堂只有十多位教友，有兩位對牧區十分熱心、投入的，本身也是聖公會的資深教友，就是三姑和美徒姑。[107] 但她們當年已是古稀之年，而其餘教友都是主恩學校的小學生，不能幫忙太多。[108] 多位聖保羅堂的青年包括龐得餘、龐得玲、馮燕珍、陳寶玉和梁玉玲，亦到來幫助荊冕堂發展青年工作。[109]

106〈本堂歷任聖品〉，載《聖公會荊冕堂五周年堂慶特刊》，5。

107《聖公會主恩學校——創校五週年紀念專刊，1961–1966》，10。

108 同上。

109〈鄺廣傑主教訪問紀錄〉，香港聖公會荊冕堂金禧紀念特刊編輯委員會、聖公會林護中

基本上，牧區全職同工一開始只有鄺廣傑一人，人手極為短缺。除了清潔以外，牧區所有大大小小的事務都由他一人管理辦妥。同時，他亦須分飾多個角色，崇拜同時兼任主禮、講道、司禱、司琴及詩班，印製週刊時負責寫蠟紙、油印，平日亦擔任牧區文書和信差，負責簽收文件和寄信。[110] 有些主恩學校的老師亦會擔任崇拜司琴之職，當中以張仲磐老師至為熱心。因他是第一位到來幫忙，且歷年來風雨無間樂意服務，是事奉人員的典範。[111] 有時張老師因事未能前來，鄺會吏便要頂上司琴之職。鄺感嘆道：「自己對彈琴一竅不通，當知道受委派到荊冕堂時，離上任的日子尚有半年時間，我便立即學琴。幸好荊冕堂那部琴是電風琴，輕輕一彈聲量已頗大，不然的話就糟糕了。」[112] 主恩學校的工友亦曾有一段時間，於每週末為荊冕堂服務，因此工友們也成為了教友。[113] 雖然當年創堂過程艱難，但鄺會吏認為一切總算順利，而且教友和主恩學校的老師也很投入、合作，很開心，時間也不知不覺過去了。[114]

為解決人手問題，1966 年，鄧校長將主恩學校的工友黃德財（財叔）轉職至荊冕堂，負責教堂的清潔打掃，[115] 教堂的全職同工增至兩人，共同擔起教堂拓荒的工作。財叔是老工友，由建堂第二年至 2002 年退休服侍牧區共 36 年，[116] 是眾人公認的好管家、好工

學園契學生訪問及整理，2015 年 5 月 2 日；鄺廣傑：〈荊冕堂廿五年週年紀念〉，載《聖公會荊冕堂銀禧堂慶特刊》，2。

110 〈鄺廣傑主教訪問紀錄〉。

111 鄺廣傑：〈荊冕堂廿五年週年紀念〉，2。

112 同上；〈牧區開荒，廣傳恩光——鄺廣傑榮休大主教〉《香港聖公會荊冕堂金禧紀念特刊》，12。

113 梁熾靈：〈堂史〉，載《聖公會荊冕堂五周年堂慶特刊》，14–15。

114 〈鄺廣傑主教訪問紀錄〉。

115 同上。

116 李廣平，〈黃德財〉，《荊情集——早晨！我們的長輩！》期 12（香港：聖公會荊冕堂，2001 年 6 月），8。

友。[117] 曾跟他一同工作的水愛琴幹事，形容財叔工作的辛勤、忠心，認為「我們堂有這樣的財叔，這是主耶穌給我們堂的恩典，也是我們大家的福氣，他不但是神的好兒女，也是神的榮耀」：

> 我是最多機會和他一起工作，有時我想找幾年前的資料作參考或想找教堂的一些東西時，我一問他，他就會〔很〕快給我找出來，使我在工作上得到很大的幫助和方便。很多時候我忙得團團轉時，他會義不容辭地主動幫我的忙，他從不會閒着袖手旁觀。人人一說起財叔都會說：「財叔是一流的。」他……任勞任怨，從不計較個人得失，從不跟人爭論，勤勤懇懇，最難得是廿二年如一日……他熱愛教堂，把教堂當作第二個家。記得前年他因雙腿風濕難行，牧師見他還回來上班，也很關心的勸他回家休息，但他仍堅持一拐一拐的回堂工作，真使我感動。他還主動逢星期四晚代替休班看更，留下來當值。在財叔嘴上從不會說個「不」字，只要是工作，他就毫無條件的做，曾經好多次我在釘裝一千多份崇拜程式表時，我做不完，碰上他當值，他就利用晚上幫我釘好。總之說起財叔沒有一個人不誇口，都說他好……[118]

廖翼顯牧師由 1968 年 8 月被委派到為荊冕堂義務聖品，至今仍對財叔有極高的評價，「教會對他甚為倚重，荊冕堂不能沒有財叔」。[119] 在 2001 年「教友最喜愛的教友」選舉中，財叔大受教友歡迎，更得到了最高的票數——「他默默工作，對上帝忠心，對歷任牧師忠心，記憶力又強，大小物件正確位置，盡在腦中。對上帝，對教堂，永不偷懶，永沒怨言。」「我媽媽和他家人有一段時間不

---

117 鄭偉健：〈荊冕堂與主恩小學〉，載《聖公會荊冕堂銀禧堂慶特刊》，66。

118 水愛琴：〈財叔〉，載《聖公會荊冕堂銀禧堂慶特刊》，62。

119〈廖翼顯牧師訪問紀錄〉，鍾卓芝整理，2016 年 7 月 8 日。

太咬弦，但他一向都對我們一家人和藹可親的……」[120]「享受過財叔的雷達式尋物服務的弟兄姊妹，無不嘖嘖稱奇。」[121]

隨着青年慢慢聚集起來，教堂於 1965 年 12 月 4 日設立了少年部，以容納 16 歲以下的少年。[122] 至 12 月第一次的聖誕慶祝，以表隆重其事，老師自費縫製詩班袍，與學生組成了百人詩班參加，最後還將詩班袍送贈牧區。[123] 1966 年 1 月 9 日，荊冕堂舉行第一屆堅信禮，由何會督主持和宣道，接受堅信禮者共 13 位，包括李克明、吳其華、梁燦華、陳森橋、劉愛萍、陳長娣、謝桂芬和羅寬等。[124] 而 1 月 23 日是第一屆聖洗禮，在晚禱崇拜中舉辦，受洗者有吳立仁、李蝶香、梁玉玲、伍惠英、潘連旺、梁冠成、梁丹茹和梁婉玲。[125] 1966 年 3 月進一步組織青年部，開展青年牧養。少年部設立僅數個月，已有部友 40 餘人，曾舉辦的活動則有晨光會。[126]

梁婉玲姊妹是主恩學校的第一批畢業生，也是學校的第一屆詩班班員、荊冕堂的第一屆洗禮的受洗者。[127] 她在主恩學校唸書的時候來荊冕堂事奉，就是這樣開始接觸牧區和荊冕堂。她小學四年級時，已經 12 歲了，是超齡學童。[128]

> 記得當時很多事情，主恩小學和荊冕堂也是一起參與的，並不會明確分開這件事是屬於主恩小學，還是荊冕堂。教會有什麼活動我們都會參與……當荊冕堂成立不久之時，我在各方面也

---

120 〈36 週年堂慶教友感想〉，《荊情集》期 3（香港：聖公會荊冕堂，2001），12。

121 李廣平：〈「荊」人發現〉，《荊情集——早晨！我們的長輩！》期 12（香港：聖公會荊冕堂，2004），8。

122 〈荃灣大窩口荊冕堂〉，《港澳教聲》期 150（1965 年 3 月 31 日）：3。

123 主恩小學撰寫組：〈荊冕堂與主恩小學的關係〉，75。

124 同上。

125 同上；〈鄺廣傑主教訪問紀錄〉。

126 〈荃灣大窩口荊冕堂〉，《港澳教聲》期 150（1965 年 3 月 31 日）：3。

127 〈梁婉玲訪問紀錄〉。

128 同上。

參與不少，如教會的詩班、暑假的夏令營等等。這些活動令我學習很多。小時候就是喜歡這樣的生活。[129]

對外方面，當年市政局銳意經營荃灣，故不少社會福利機構亦紛紛設會所或辦事處，方便聯絡和幫助居民的生活，並不時合作舉辦活動。[130] 如 1966 年 2 月 12 日的「丙午年荃灣新春同樂大會」，有 25 個機構參加，荊冕堂以「荊冕堂供膳中心」的名義參與此盛事，且當選為大會司庫。[131] 而且，牧區亦跟社會福利署、浸信會、五旬節聖潔會和衛理公會的亞斯理堂有合作和聯繫。[132] 同年，牧區與聖多馬堂和聖馬提亞堂合作，舉辦了青、少年部春令會，讓各堂青年肢體可領略彼此一家，互相提攜之訊息。[133]

另外，鄺會吏在任時亦曾向政府申請設立荊冕堂幼稚園，後因轉職關係，幼稚園沒有在他的任期內正式開展工作。[134]

四・小結

六十年代，何明華會督的建堂策略與政府所制定的城市規劃及社區發展，實在息息相關。荊冕堂選址於荃灣大窩口，正正是何會督瞄準這個地區的發展潛力，又看中牧區背後的大窩口徙置區，牧區——就是立足於弱勢社群所在之地，為他們受苦，謙卑服侍。如何會督在建堂奉獻禮，談及荊冕堂的命名所說：

---

129 同上。

130 〈荃灣大窩口荊冕堂〉，3。

131 同上。

132 〈鄺廣傑主教訪問紀錄〉。

133 〈荃灣大窩口荊冕堂〉，3。

134 〈鄺廣傑主教訪問紀錄〉。

> 「羞辱荊冕」就是那「尊貴的冠冕」。上主除了那「羞辱荊冕」外，並無其他冠冕。道成肉身的人子的寶座，就是在那被釘的十架上的，除此之外，並無其他寶座。[135]

荊冕堂與主恩學校之間的深厚關係，早在建堂前已深深奠基。學校一眾師生為傳道牧養大發熱心，對荊冕堂的初期發展舉足輕重。少年部和青年部的成立，以及牧養區內一切大小事務，有賴師生、鄺會吏、財叔和聖保羅堂的青年群策群力，才得以開展。雖然鄺會吏擔任荊冕堂的牧者只有短短一年的時間，但他卻不辭勞苦，全力推動牧區發展。財叔雖只負責清潔等雜務，職位看似卑微，他的忠心服侍卻贏得眾教友及牧者的尊重和愛戴，貢獻甚大。每一位同工、教友按自己所得的為主擺上，在祂的眼中同樣彌足珍貴。

荊冕堂和主恩學校在荃灣大窩口社區作好見證，正好反映聖公會堂校之間的協作精神，不分彼此，互相建立，為社區教會模式，樹下了佳美典範。

135 "Dedication of Crown of Thorns," 1965, Diocese of West Kowloon, Crown of Thorns' Church (CT) (1), Bishop's House Archives, Hong Kong.

第二章

給我吃，給我住
——初期的社區服務
（1960–1966）

五、六十年代，何會督及基督教會重視社區的需要，不單設立教堂、學校，更投放大量資源於香港的社會福利發展，提供各式各樣的社會服務，照顧貧苦者的不同需要。在這個處境下，荊冕堂亦為荃灣大窩口區的居民服務，成立供膳中心及青年工友宿舍。

一．戰後基督教與社會服務

隨着難民湧至，四十至五十年代，香港人口十年內急增 100 萬，《香港年報 1956》（*Hong Kong Annual Report*, 1956）的一篇主題文章〈一個人口的問題〉（A Problem of People），總結了香港戰後的社會情況：

> 回顧這段日子，我們可以說，如果沒有這個問題，我們所作的大部分事情都會不同。財政、教育、醫療及衛生服務、社會福利、監獄、公安、工業、商業、勞資關係、土地政策、房屋、漁農業、政治關係——甚至法律本身——全都因這單一問題明顯受到拖累（在某些情況下，拖累更是摧毀性的）。這就是大量移民入境的問題……[1]

中國大陸局勢至五六十年代仍然未見明朗，移居台灣和外地亦絕非易事。所以，大部分難民由當初在港只作短暫滯留的心態，轉為不情願地、被動接受居留香港的客觀現實。雖香港自身為「移民城市」，但大批難民短時間內湧入，激發了房屋、教育、治安和公共衛生等等的潛在問題。[2] 社會學者指出，難民留港，「將本來以為是一個流動人口的問題，變成了實質上對社會構成壓力的社會問題。」[3]

1956 年 10 月 10 日發生的九龍及荃灣暴動，政府其後發表的報告書，指出其暴動與社會矛盾有莫大關係。港督葛亮洪（Alexander Grantham），強調參與暴動的民眾，「大多數在本港皆無根基」，「若輩由家鄉逃出……致孕育失望與淒苦之感，自屬常事」。[4] 難民對現況的不滿，成為是次暴動的根源。葛亮洪表示，政府雖已盡力改善他們的困境，但「無多大之移民去處以減少其人數，又無外來援助以補充香港之收容難民力量，其改善工作遲緩又困難」。[5] 社會的騷動不安，皆由深刻的社會矛盾未有妥善處理而引爆。

---

1 *Hong Kong Annual Report 1956*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1957), 2.

2 難民及人口問題對香港社會的衝擊，參邢福增：《願祢的國降臨——戰後香港「基督教新村」的個案研究》（香港：建道神學院，2002），第 2 章。

3 呂大樂：《唔該埋單—— 一個社會學家的香港筆記》（香港：閒人行，1997），83。

4 葛亮洪（Alexander Grantham）：《九龍及荃灣暴動報告書》（香港：政府印務局，1956），i。

5 同上，iii。

研究香港、中國和東亞地區社會福利事業發展的學者鄧廣良指出，1952 年前，香港的福利政策是「殘餘的社會政策」，政府採取不干預的政策。[6] 而政府亦承認，一直以來沒有直接推行社會福利的工作。[7] 香港政府最早在華民政教司署下設立社會福利辦事處（Social Welfare Office），是在 1948 年。[8] 到十年後（1958 年）始設立社會福利署為市民福祉服務。[9] 1953 年石硤尾六村大火發生後，政府才開始發展徙置寮屋區居民的工作，步入「局部的社會政策」（partial social policy）時期。[10] 可見，香港政府面對難民問題和人口問題令社會產生的壓力，一直是被動、消極地回應。社會政策的調整，往往是因為社會怨氣和不滿累積至臨界點，直至問題爆發成騷動、災難始有所改變。

在民間方面，面對社會救濟工作刻不容緩的訴求，不同類型的志願和宗教團體紛紛成立。單單在 1951 年，在港開辦的志願團體已達 78 個，大部分依靠龐大的國際救援網絡，承擔了大量社會服務工作。[11] 當中，以基督教世界服務委員會（Church World Service）香港分會和香港基督教福利與救濟協會（Hong Kong Christian Welfare & Relief Council）等國際基督教社福組織貢獻最大。不少歐美的差會和本地教會，也從不同程度和方面——醫療、教育、衛生、居住、青年、幼兒、公共衛生等等——積極承擔社會福利工作，大大紓緩了政府的財政負擔。[12] 政府在《香港年報一九五六》，充分肯定志

6 Tang Kwong-leung, *Colonial State and Social Policy: Social Welfare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1842–1997*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8), 45–59.

7 *Hong Kong Annual Report 1956*, 162.

8 同上。

9 *Hong Kong Annual Report 1958*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1959), 180.

10 Tang, *Colonial State and Social Policy*, 45–59.

11 編輯部：〈貧困待緩的戰後香港〉，《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四十周年紀念特刊，1947–1987》（香港：香港社會服務聯會，1987），16；Tang, *Colonial State and Social Policy*, 45–49.

12 邢福增：〈延續與斷裂——基督教在五十年代的香港〉，載氏著：《香港基督教史研究導論》（香港：建道神學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4），139–63。關於住屋方

願和宗教團體對社會的貢獻，甚至形容，香港的「幸運」在於有這些團體，願意主動滿足社會的種種需要。[13] 誠如香港社會服務聯會（Hong Kong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總幹事華元博（Paul R. Webb）牧師所說，五、六十年代是香港社會福利服務的黃金時期（golden decade）。[14]

香港著名社會福利界學者周永新也指出，1965 年是香港戰後社會福利發展的分水嶺：

> 嚴格來說，香港的社會福利政策，是 1965 年第一部社會福利白皮書發表後才開始的。在 1965 年以前，香港不是沒有福利服務，但大部分由志願機構提供，個別機構有它們的宗旨和目的，整體性的政策卻是 1965 年才初次訂定。[15]

1965 年，香港政府第一次推出一份較詳盡的社會福利政策白皮書，名為「香港社會福利工作之目標與政策」。政府在文件中一方面解釋未有全面推行福利政策的原因。[16] 同時，又充分肯定志願機構的社會服務，認為它們乃「創辦各種社會服務事業之先驅」，「志願機構之工作不但與政府舉辦之社會事業相輔相成，而且常為政府尚未舉辦者」，又「導引世人之慈善心懷向社會需要之方面發展，同

面，參邢福增：《願祢的國降臨——戰後香港「基督教新村」的個案研究》（香港：建道神學院，2002）。

13 *Hong Kong Annual Report 1956*, 162.

14 華元博指出，戰後香港志願社會福利的發展，可分為三個時期：一，從戰後至五十年代末的緊急時期（emergency period）；二，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的黃金時期（golden decade）；三，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的轉型時期（changing period）。見 Paul R. Webb, "Voluntary Social Welfare Services"，載《廿五年來之香港（1951–1976）——崇基學院廿五周年校慶紀念學術講座演講錄》（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1977），133。

15 周永新：《香港社會福利發展與政策》（香港：大學生出版印務，1980），29。

16 原因有二，第一為社會因素，指中國人以家庭為主要的社會單位，關於社會福利的所有事宜一般由家庭或家族負責，政府只是負責從旁協助；第二為財政因素，在龐大的人口增加的壓力下，政府在房屋、醫療、教育等財政負擔已經太重，故社會福利工作的發展「未臻完善」。見《香港社會福利工作之目標與政策》，修正本（香港：政府印務局，1965），4–5。

時並可以開辦新資源以顯著減少公款支出」，因此對它們「自應竭誠歡迎」。[17] 從有關政策文件可見，政府對全盤社會福利計劃的態度，可謂極其保守，對市民福祉之承擔極低，悉以節省公共開支為重。[18]

1966 年發生的九龍騷動，即令政府的福利政策一改其保守常態。騷動調查委員會認為參與騷動的青年並無確實的政治動機。委員會當時聽取了社會工作者的意見：

> 接見者覺得許多男童受雇的工作，不能使他們將來生活安定和獲得進展，加上不適當的漫長工作時間，以及他們的微薄收入，造成他們的毫無目的，和苦悶無聊的感覺，這些都是使他們捲入暴動漩渦的部份動機。因為工作的需求，他們沒有機會作十幾歲少年的正常娛樂，所以利用暴動作為這種需求的宣洩……要防止再有騷動事件發生，便要採取嚴厲措施來克服目前社會結構上的瑕疵……[19]

措施包括「提供較佳的受教育和就業機會，改善居住環境，增加青年福利和康樂設施，以及讓青年參與社會事務而培養成一種有所歸屬的感覺……我們贊成需要擴充目前的社區服務中心，在裏面進行各種活動，以及鼓勵大家參加當地的事情。」[20] 此調查報告直接影響後來社會福利服務白皮書的政策，尤其是七十年代以後的社區發展和青年工作。[21]

---

17 《香港社會福利工作之目標與政策》，修正本，2–11。

18 可參照周永新：《香港社會福利發展與政策》，32–35。

19 香港政府：《一九六六年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報告書》（香港：政府印務局，1967），47、104。

20 同上，104、100。

21 陳慎慶：〈香港基督教社會福利事業的發展〉，《中國神學研究所期刊》期 25（1998 年 7 月）：71–72。

世界信義宗社會服務處（Lutheran World Service）的主任施同福（L. Stumpf）牧師，與何會督一樣，是香港基督教社會服務工作的先驅者。[22] 他於 1965 年指出，很多在西方被視為基本和理所當然的社會保障制度和福利服務，香港政府甚少談及和考慮推出：

> 香港並沒有免費和強迫的教育制度，沒有通盤性的公共社會服務（這類服務甚至對於屬於特殊類型者如老年人和永久殘廢者也付闕如），沒有職業介紹服務，沒有通盤的衛生服務等等。[23]

而且，他提出志願團體對社會福利的理解，突破單一的物質救濟，轉向集中與受助者建立關係，瞭解他們的背景和全面的需要，尋求根治的方法解決問題。[24] 在整個社會福利的概念上，經歷了範式轉移。[25]

六十年代中期，也是香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分水嶺，志願機構的資金來源亦有轉變。[26] 香港經濟持續穩步發展，以勞動密集形式的輕工業出口為主。社會當中有一群在經濟發展中向上流動，找到創業和業務發展的雄厚機會，或就業穩定，財富累積，成為較富裕的社會階層。[27] 同時，因難民問題逐漸穩定，海外捐款的支持亦持續減少。六十年代中期，志願團體的海外捐款佔所有基金約五成九，但到了 1969 至 1970 年度，海金捐款減至三成八，跌幅近一半。[28] 故

---

22 參陳慎慶：〈香港基督教社會福利事業的發展〉，72–74。

23 施同福：〈香港社會的現況和問題〉，《社聯季刊》期 13（1965 年春）：8。

24 L. Stumpf, "A Changing Philosophy," *LWF Hong Kong Quarterly Report* (Hong Kong: LWF/DWS, 1968), 1968:1, 1.

25 同上。

26 呂大樂：《山上之城——香港紅十字會的故事，1950–2000》（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00），33。

27 呂大樂、王志錚：《香港中產階級處境觀察》（香港：三聯書店，2003），37。

28 華元博（Paul R. Webb）：〈海外基金來源之目前與未來趨勢〉，《社聯季刊》期 45（1973 年夏）：23。

此，大部分志願機構和宗教團體對政府的津貼和公益金日漸依賴，本地資助因而取代了海外基金的主導地位。[29]

二・聖公會以牧區為本的社會福利事業

早於十九世紀，聖公會的牧養已緊貼社會需要，開展救濟貧苦大眾和孤寡老弱的工作。及至二十世紀，又有一些在港的聖公會領袖，向香港殖民地政府爭取立法廢除蓄婢制度，並發動保護童工運動。隨着社會的發展，聖公會的社會服務，再進一步從個別救濟演變到涉及社會福利政策的倡議，這軌跡貫徹於後來聖公會整個社會福利事業的方針和發展。[30]

二十世紀中葉，聖公會脫離華南教區，港澳教區成立，其宣教與牧養邁向本土化，不少牧區亦相繼成立。聖公會的社會服務，在何明華會督和白約翰（Gibert Baker）會督的帶領下，積極回應本港的社會需要，參與救濟、教育和社福工作。尤其透過牧區內聖堂的建立加以拓展，關顧和牧養各自牧區內的民眾。五六十年代的新建聖堂包括堅尼地城的聖路加堂（1951 年）、深水埗的聖多馬堂（1953 年）、土瓜灣的牧愛堂（1955 年）、紅磡的聖匠堂（1954 年）、元朗的聖馬提亞堂（1955 年）、何文田的聖馬可堂（1961 年）、筲箕灣的主誕堂（1961 年）、北角的聖彼得堂（1962 年）、黃大仙的聖十架堂（1962 年）、李鄭屋的基愛堂（1963 年）、觀塘的聖巴拿巴堂（1964 年）、荃灣大窩口的荊冕堂（1965 年）等等。[31] 這些聖堂的主理牧師和熱心信徒，紛紛舉辦切合牧區需要的教育和社福服

---

29 同上。公益金在 1968 年開始運作，另一主要的資金來源是政府於 1965 年成立的政府獎券基金（Lotteries Fund）。

30 宗教教育中心：《步武基督——香港聖公會的社會服務，1849–2013》（香港：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2014），28–29。

31 同上，49。

務，當中對象的範疇甚廣，例如勞工、兒童、釋囚、老人及病患人士等。

三·荊冕堂的社會服務——服侍飢餓漂泊

1. 荊冕堂童膳中心

童膳會於1960年由聖公會創立，當年何會督出席李鄭屋基愛學校的畢業典禮時，看見有一學童因營養不良而暈倒，才知道有學生原來仍沒有進食早餐。其愛護兒童之心促使他成立童膳會，讓營養不良的學童每天能享受一頓營養充足的熱飯。[32] 當時的會務，由童膳會主席張奧偉律師主理，張培揚牧師為監督。[33] 會內亦有不同的功能小組，負責討論和決策相關事宜。此救濟計劃得到美國、英國、荷蘭及加拿大的教會和社團的資助，並由政府免費撥地和賽馬會資助於紅磡興建廚房。[34]

童膳會主要根據香港大學在1961年的一項調查來釐定受助標準，凡低於香港中產家庭兒童的平均身高和體重值，則不論其宗教信仰或任何背景，皆合資格申請進食營養餐。[35] 申請者每天只須付一角錢，便可享用熱騰騰的飯餐，食物包括飯或麵條，配有肉類、魚類、蔬菜和豆類等等。[36] 工作人員會將食物放進可保熱6小時的耐熱筒內，由貨車運送到港九新界各學校和供膳中心，其後牧區、

---

32 同上，44；張奧偉：〈童膳會簡介〉，《社聯季刊》期21（1967年春）：11–12。

33 宗教教育中心：《步武基督》，44。

34 同上；張奧偉：〈童膳會簡介〉，11。

35 宗教教育中心：《步武基督》，44；〈日供童膳萬餘份，荊冕堂福蔭學生〉，《華僑日報》，1965年11月27日，13。

36 宗教教育中心：《步武基督》，44–45；〈日供童膳萬餘份，荊冕堂福蔭學生〉，13。

小學及社服機構協作分發。[37] 1967 年初，每天為學童供應約 14,500 份營養餐。[38]

童膳會為擴展其服侍區域，並善用原有器材、人手和食物供應，故一併接納了新建的荊冕堂、聖十架堂及聖巴拿巴堂的申請，參與童膳會的救濟行動。[39] 1965 年，當荊冕堂建成時，何會督設計其地下副堂為童膳中心，隨即成為童膳會其中一個供膳地點。荊冕堂的童膳計劃及其中心，由牛津饑荒救治委員會（Oxford Committee for Famine Relief）資助。[40] 與荊冕堂同於六十年代中葉落成的聖十架堂和聖巴拿巴堂，三者的副堂偌大，而且附近有不少學校，所以同樣設立供膳中心，協助派發廉價營養餐給予鄰近的學童。[41]

荊冕堂的童膳中心，由 1965 年 6 月開始運作，設有一廚房，炒「大鑊飯」，聘有兩位駐堂同工專門負責童膳中心的運作和清潔，另有財叔幫忙搬運桌椅。[42] 當年來到童膳中心吃飯的，有來自十數間不同學校的學生，共三四千人。[43] 學生每天只到來吃一頓飯，所以每天須繳付一毫二仙予荊冕堂或主恩學校，其後才將錢轉交童膳

---

37 宗教教育中心：《步武基督》，45；張奧偉：〈童膳會簡介〉，12。

38 張奧偉：〈童膳會簡介〉，11。

39 "Reference minutes No.5(b) of 28th Meeting of the Council," February 19, 1965, Children's Meal—Minutes (C20), Bishop's House Archives, Hong Kong; "Minutes of the 31st meeting of the Council of The Children's Meals Society," September 6, 1965, Children's Meal—Minutes (C20), Bishop's House Archives, Hong Kong.

40 "Reference minutes No.5(b) of 28th Meeting of the Council"; 牛津饑荒救治委員會（Oxford Committee for Famine Relief）為樂施會（Oxfam）的前身，在 1942 年於英國牛津成立，見樂施會官方網頁，https://www.oxfam.org/en/countries/history-oxfam-international。

41 同上。

42〈梁婉玲訪問紀錄〉；"Peter Kwong's letter to the Rt. Revd. R. O. Hall," September 9, 1965, Diocese of West Kowloon, Crown of Thorns' Church (CT)(1), Bishop's House Archives, Hong Kong.

43 "Crown of Thorns Church—Tsun Wan," June 15, 1965, Diocese of West Kowloon, Crown of Thorns' Church (CT)(1), Bishop's House Archives, Hong Kong.

會。[44] 一毫二仙，大約是當時一頓童膳餐五分之一的成本。[45] 有一部分營養餐是由荊冕堂童膳中心的廚房烹調，其餘的由童膳會位於紅磡的廚房送來。[46]

1965 年 11 月 27 日，荊冕堂堂主任鄺廣傑到荃灣扶輪社演講，簡介荊冕堂童膳中心。[47]《華僑日報》的報導以「日供童膳萬餘份，荊冕堂福蔭學生」為標題。[48] 鄺會吏稱，荊冕堂童膳餐的菜色常保持一定水準，例如經常從丹麥和荷蘭等地輸入大批雞隻。[49]「安得廣廈千萬間，盡庇天下寒士皆歡顏」。報導文章以「荊冕堂造福人羣，實在令人欽敬」作結，大力肯定荊冕堂對社區的重大貢獻。[50]

其實，早在 1962 年 4 月，主恩學校已於校內開設童膳餐，在何會督的策劃下為學生提供午膳。[51] 後來 1967 年鄭偉健先生擔任校長後，深感於學校天臺進食營養餐的環境欠佳，徵得當時荊冕堂主任牧師梁熾靈牧師的同意後，改為於荊冕堂的童膳中心進餐。[52] 那時期，童膳中心的供膳分上午和下午兩個時段，上午十一時三十分的時候，主恩學校的學生來到，約有 150 人，而下午一時，會有主恩學校另一班級的學生和其他學生到來，約 80 至 100 人。[53]

---

44 "R. O. Hall's letter to the Revd. J.D. Swanson," December 9, 1965, Diocese of West Kowloon, Crown of Thorns' Church (CT)(1), Bishop's House Archives, Hong Kong.

45 同上；〈日供童膳萬餘份，荊冕堂福蔭學生〉，《華僑日報》，1965 年 11 月 27 日，13。

46 〈梁婉玲訪問紀錄〉。

47 〈日供童膳萬餘份，荊冕堂福蔭學生〉，13。

48 同上。

49 同上。

50 同上。

51 《聖公會主恩學校——創校五週年紀念專刊，1961–1966》（香港：聖公會主恩學校，1966），7。

52 主恩小學撰寫組：〈荊冕堂與主恩小學的關係〉，載《聖公會荊冕堂銀禧堂慶特刊，1965–1990》（香港：聖公會荊冕堂，1990），75。

53 〈梁熾靈牧師訪問紀錄〉，香港聖公會荊冕堂金禧紀念特刊編輯委員會、聖公會林護中學團契學生訪問及整理（下稱金禧編委會、林護中學團契學生），2015 年 4 月 25 日；〈梁

隨着政府對荊冕堂供膳中心的十年資助計劃完結，且香港工業發展式微，居民生活水準及收入上升，對廉價營養餐的需求不大，其童膳中心便在 1974 年關閉，完成其歷史使命。

2. 青年工人宿舍

1964 至 1966 年間，荊冕堂又開設了青年工人宿舍的服務。工人宿舍最多可提供 28 個宿位，平均每月有 30 人入住，月租 17 元，主要服侍年青工人。根據統計，住客的工資為大約每月 230 元。[54]

六十年代，因荃灣是香港的其中一大工廠區，也是紡織業中心，在工友宿舍居住的，大多都是於荃灣上班的工人。1965 年 3 月，工友宿舍的報告書記錄了 5 位新入住者的背景、生活和財政需要。[55] 他們五人是位於觀塘徙置區聖巴拿巴小學的畢業生，有一位是建築師傅的學徒、有的在染廠、塑膠廠等工作，須輪夜更。[56] 住在工作的區域，可方便他們的生活，畢竟當時荃灣與九龍和港島市區的交通仍然不便利。同時，在治安不良的社區裏工作，工人宿舍可保障他們的人身和財物安全。另外，除了接收聖巴拿巴小學的畢業生外，還有聖基道兒童院的少年。[57] 為了可進一步照顧青年工友的需要，荊冕堂還會通過教區向他們提供額外生活費的資助。[58]

織靈牧師訪問紀錄〉，鍾卓芝整理，2018 年 7 月 8 日。

54 "Crown of Thorns Hostel Receipts and Expenditure for the Year Ending," March 31, 1965, Diocese of West Kowloon, Crown of Thorns' Church (CT)(1), Bishop's House Archives, Hong Kong.

55 同上。

56 同上。

57 同上。

58 同上。

第三章

植根於工業新市鎮的社區教會（1966–1981）

一・急劇變遷的香港社會與荃灣

五、六十年代，香港社會確實累積了不少矛盾以致發生駭人的動盪。1956 年九龍雙十暴動及 1967 年六七暴動的發生，正好反映有關問題所在，而六七暴動更為社會秩序帶來了最嚴重的衝擊。

當初政府興建平房區和徙置大廈，並不代表政府願意為這些居民投入大量資源，且在福利政策上作重大承擔或修改。誠如上一章所言，政府對社會福利工作的承擔，是被動且消極的。在《徙置事務處年報一九五五》，提及：

> 安置木屋區居民並非因為他們需要……或是配得衛生與防火的房屋，他們被安置是因為社區不能再承受木屋區所代表的火災

> 風險、健康風險，及其對公共秩序與尊嚴的威脅。同時，社區本身亦需要那些被非法佔用的土地。[1]

> 必須強調，徙置木屋區居民並非福利工作（welfare operation）。這只是除掉嚴重火災的風險，健康的風險及其對公共秩序威脅。這是在整體社區利益的前提下進行的。[2]

由此可見，政府徙置政策的目的，只是希望解決火災問題，從寮屋居民取回官地，並非為低下階層解決住屋需要。於 1962 年至 1966 年在徙置事務處工作的許舒（James Hayes）在其回憶錄指出，當海外訪客大力讚賞政府的徙置政策如何完善，他心裏感到難過——展開徙置工作的緣由，只是為了清理那些阻礙社區發展的居民，無意為他們改善生活質素。[3] 政府的徙置工作，實在與福利工作無關。此外，政府的市區和社區規劃倉卒，無長遠視野，故各徙置區附近缺乏基本的交通配套、教育和社區設施，如學校、診所及市場等。[4]

另一方面，六七暴動的爆發，也跟中國大陸的政局有密切關係。1966 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受極「左」思潮影響，本港左派陣營也策動反英反殖行動的政治鬥爭。[5] 罷工、罷市、「真假菠蘿陣」，民眾惶恐不敢外出，幾乎令社會癱瘓。[6]

---

1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 Commissioner for Resettlement, 1954–1955*, 46.

2 同上，39。

3 James Hayes, *Friends and Teachers: Hong Kong and Its People, 1953–1987*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6), 62.

4 盧秉信：〈居住環境與人口問題〉，《社聯季刊》期 53（1975 年夏）：4。

5 張家偉：《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2），187。另程翔：《香港六七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8），13–38。

6 同上。

六七暴動成為政府與民眾關係的分水嶺。[7] 為恢復民眾對政府管治的信心，政府積極在新建的居民區（如徙置區）建立各種街坊組織和社團聯會，荃灣理民府亦特別重視與這些民間團體保持密切聯絡。[8] 荃灣理民府於十個市鎮設立市鎮主任和市鎮專員制度，其辦事處設於當地市中心。[9] 而且，政府也成立了民政事務署，管理基層事務。[10] 上述這些措施有助政府進一步聯絡民眾，向民眾解釋政策，同時向上級報告有關的輿論。[11] 六、七十年代社區中心和鄰舍中心的推行，也與此社會政治氣候有關。

六十年代至中葉以降，荃灣也經歷了急劇的變遷。其時，香港的工業和商業發展繼續繁榮發展。據 1968 年統計，香港有 11,793 間工廠和 490,239 名工人。[12] 1969 年，香港對外貿易輸出額已升至全球第八位。[13] 踏入七十年代，荃灣的輕工業發展依然蓬勃，輕工業產品五色紛陳，主要工業投資包括塑膠、成衣、紡織、五金和電子。[14] 其熱水瓶工業、塑膠花工業和搪瓷工業，已在國際市場佔重要一席位。南美夾板廠、民生膠廠、大行膠廠、南華鐵工廠及金門鋼窗製造廠等等，亦在荃灣大放異彩。[15] 1976 年，荃灣有超過大大小小超過一千家工廠，共聘用近十萬人，當中七成在紗廠

---

7 許舒（James Hayes）：《滄海桑田話荃灣》，嘉熙語文翻譯中心譯（香港：滄海桑田話荃灣出版委員會，1999），173。

8 同上，174–175。

9 同上，174。

10 同上。

11 同上。

12 龐德明：〈港澳教區發展委員會五年計劃書（續）：第五章　教會與工業〉，廖翼顯譯，《港澳教聲》期 206（1970 年 11 月 30 日）：6。

13 同上。

14 何佩然：《地換山移——香港海港及土地發展一百六十年》（香港：商務印書館，2004），150。

15 荃灣區議會編：《荃灣二百年——歷史文化今昔》（香港：荃灣區議會，1991），10–11。

工作。[16] 荃灣的工業發展，堪稱新界眾多衛星城市之冠。當時的荃灣，更有「東方曼徹斯特」的美譽。[17]

1966 年至 1981 年，荃灣區人口由 205,000 人增長至 606,864 人，增幅達三倍。[18] 1972 年，行政局通過政府的 10 年建屋計劃，目標是在 1983 年，香港可增加 180 萬個住宅單位，計劃新市鎮可容納其中 130 萬個單位。[19] 此時，政府亦發展沙田和屯門，它們與荃灣合稱為「第一代新市鎮」，以應付工業及住宅用地的龐大需求。因而，整個七十年代中，區內的鄉村和農地被政府大規模徵收和遷拆，[20] 荃灣的地區面貌轉變得天翻地覆：

> 葵涌某村村民出外多年，歸來竟無法辨認。醉海灣已填海造地，公共屋村林立。到處高樓大廈，貨櫃碼頭日夜繁忙……荃灣以西，公路以北，為現代化紡織區。青山道旁，高樓林立，雖仍有小量待遷拆的舊村莊和棚屋區，但已面目一新，與往昔不可同日而語矣。[21]

---

16 蔡思行：《戰後新界發展史》（香港：中華書局，2016），115。

17 同上。

18 荃灣區議會：《荃灣二百年》，4。

19 Victor F. S. Sit, "Hong Kong's New Towns Programme and Its Regional Implications," in *Hong Kong: Dilemmas of Growth*, ed. Leung Chi-keung, J. W. Cushman, and Wang Gungwu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80), 402; J. M. Wigglesworth, "The Development of New Towns," in *Asian Urbanization: A Hong Kong Case Book*, ed. D. J. Dwyer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1), 49.

20 七十年代，遭遷拆的鄉村如有象山村、古坑村及海壩村等，又有葵涌和深井一帶，雖一部分村民願意與政府合作，但因遷拆而令村民怨聲載道，對許舒來說不絕於耳。許舒：「三十多年來，荃灣不斷徵地遷拆，但官方資料如徙置事務處以及後來房屋署的年報，甚少提及七十年代中後期的荃灣大規模徵地遷拆。然而，探索荃灣的開發史，卻必須從這個時期回顧。」見許舒：《滄海桑田話荃灣》，112。而且，「1978 至 1980 年進行的地鐵延伸有關工程，牽涉土地以百萬方呎計，遷移 26,905 人，拆遷 1,116 間工廠、工場和店舖，確是開埠以來規模最大的工程。」見許舒：《滄海桑田話荃灣》，115、133。

21 許舒：《滄海桑田話荃灣》，134。

1971 至 1976 年間，荃灣新市鎮增加了約 25,000 戶家庭，是遷移至所有新市鎮總戶數的 82%。[22] 大量廉租屋邨在荃灣落成，同時，大窩口和葵涌的徙置區相繼清拆。荃灣開始由一個低收入、基層的工業城鎮，轉變為中產階級持續擴展的現代化市區。

二・六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基督教的教育工作和社會服務

自六十年代起，香港經濟日趨繁榮。可是，經濟進步為大眾帶來整體的福祉，改善貧富差距，完全是大眾的錯誤幻想。社會的自滿，為志願團體的工作製造了很大的阻力。[23] 施同福牧師道出香港的社會實況：

> 我們志願團體所談的是真正的香港，換言之，話題不是少數人的高水準生活，而是大多數人僅謀溫飽的情況。不是巍峨璀璨的酒店和公寓，而是山邊和市區的 445,000 的木屋居民，露宿街頭或樓梯底的 135,000 人，棲身於破船和天臺者，蝸居於日漸擠迫的徙置區中的 50 萬人，人數不明的生活於破舊樓宇中者。我們所談的是已在醫院登記等候診治而入院無期的大群人，他們所患的不是急性疾病，但他們需要留醫，而醫院卻沒有空病床。我們也談那些排長龍的門診病人，他們要一小時又一小時地等候會見當值醫生，而工作繁重的門診醫生平均只能為一個病人花三分半鐘的時間；要確定病情，三分半鐘的時間實在太短了。我們關懷流浪街頭的兒童，他們之中有許多（只有九龍方面就有 1,200 名）是居無定所的，他們在停泊着的貨車上歇宿，或睡於樓梯間和天臺。如果沒有人救助他們，他們就參加三合會和歹徒集團。在香港，大部分人居住得不好、喫

---

22 荃灣區議會：《荃灣二百年》，4。

23 L. Stumpf and Carl F. Nielsen, "Facing a Dilemma," *LWF/DWS Bi-Annual Report January-June 1970* (Hong Kong: LWF/DWS, 1970), 1.

得不好、教育不好、薪金微薄，而在許多方面來說，是自生自滅，缺乏照料。[24]

香港華麗的表象，並不代表低下階層可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

七十年代，教會和政府建立了「夥伴」關係。1973 年，政府發表第二份社會福利政策文件，正式提出了社會福利署和志願機構之間的「夥伴」（partnership）關係，清晰地區分兩者工作的界限，確認向志願團體提供補助的方向，應允承擔大部分的福利開支。[25] 同時，面對海外經濟補貼的減少，政府的新政策對志願團體而言，實是佳音。1979 年，政府再推出《進入八十年代的社會福利》白皮書，把大部分的志願團體納入官方的福利體制內，由志願團體提供服務，政府提供資助。[26] 自此，政府在社會福利方面越見承擔，但無減志願和宗教團體的重要性。與此同時，教會也藉着承擔教育和社會服務工作之便，開展福傳工作。同年，聖公會和天主教教區主教、基督教協進會總幹事，會見布政司姬達（Jack Cater），並達成協議。該協議在 1981 年 5 月經行政局通過：「當教會為了發展社會服務而向政府申請用地時，教會可以以該建築物的一層樓作『聖堂』和不過 100 平方米作傳道人宿舍之用，兩者均不需補地價」。[27] 而且，「在不妨礙學校或社區中心正常的運作下，教會可以使用該等設施作為教會其他用途，例如主日聚會、團契、主日學等。」[28]

---

[24] 施同福：〈香港社會的現況和問題〉，8、13。

[25] 周永新：《香港社會福利發展與政策》（香港：大學生出版印務，1980），36–37。

[26] 何輝維：〈七十年代本港社會福利發展之回顧〉，《社聯季刊》期 74（1980 年秋）：4–7；周永新：〈志願機構的角色與貢獻〉，《社聯季刊》期 100（1987 年春）：20–22。

[27] 〈港府正式通知基督教協進會，通過教會及牧師住宅用地新政策〉，《基督教週報》期 889（1981 年 9 月 6 日）。

[28] 同上。

三．聖公會的本地化發展：白約翰會督的城市宣教理念

1966 年，白約翰（Gibert Baker）會督接任成為港澳教區主教。繼承何會督的聖工和社會服務的根基，白會督同樣重視信仰與生活、社會以及整個世界各方面的關係，以回應香港的處境和時代的需要。他在主教陞座講辭中，說道：

> 然而我們的眼睛不只要省察自己與同道的關係，也要展望我們與世界的關係。香港的群眾，不管他們是在工廠，在商店，在徙置區或在新界，並不關切教會……他們沒有機會聆聽福音。我想我們的救藥，不是在向他們大聲疾呼，而是在會同宗主的同道——牧者與信眾——設法到民間去，以表彰基督的愛，及實踐非役於人，乃役於人的寶訓。
>
> ……〔香港的〕自由的持繼，卻有待於人與人，人與社會，與工業，與教育的正確關係。我們需要盈百盈千的人摒除自私，只要施與而不計收穫，不但顧念自己家庭的幸福，更關懷清貧者的需求。
>
> 教會的任務不在宣揚自己，表彰自己，而在引領人仰望基督。我們自己不過是奉主名而服侍而已。[29]

他亦講及信徒和教會應承擔對人的尊嚴的追求，有其義務建立一個更有內涵的香港：

> 我曾說及做一個與眾隔絕的基督徒的危險性，同樣，對我們作為香港市民的一份子也是適合的。由於我們過份專心於自己的事情，因而忽畧了我們也在亞洲是一個重要的貿易地方。我們是一個國際性城市內的居民，是有我們的責任與義務的……假若一個大城市開始退化時，是很難挽回它的趨向。

29〈白約翰會督陞座講辭〉，《港澳教聲》期 159（1966 年 12 月 31 日）：2。

香港目前所需要的不單衹是美麗的外表而已，然而在一個城市內，那裏是要有眾人的公義，自由與生活的尊嚴的。[30]

白會督對社會、對人之為人的深切關懷——不是只從街頭把人帶到聖堂崇拜，也要把教會的信息帶到十字街頭，以慈愛和公義關顧民眾的切身需要。

為計劃和協調教區內的工業工作，教區於 1968 年設立了工業委員會。[31] 教區認為教會對於近代世界的主要貢獻很可能是在工業關係中，因而委員會提出以下三點：

甲、學習以基督教的方式接觸工業界與及應用基督教的原理去解決工業的問題。

乙、加強教區工業委員會的組織，使它在經濟預算中能舉辦新計劃後安排會議；與及促進基督徒對工業界傳福音的關懷。

丙、訓練服務於工業界的聖職人員及平信徒。[32]

為了更適切地回應香港工業社會的急速轉變，委員會與香港基督教協進會的工業委員會（簡稱工委會）又有緊密合作。[33] 1974 年，工委會在參與工人運動的過程中，對社會與福音、勞資糾紛、權勢的運用及工人佈道等議題加以反思，繼而決定出版《福音與勞工》雙月刊，將組織的經驗和對不同議題的分析公諸信徒。對此，《港澳教聲》亦予以推廣。[34] 1976 年 5 月，在白會督領導下，教區工業委員會主席湯顯森牧師和委員鍾士良先生，探訪不同工廠，關懷

---

[30]〈會督文告〉，《港澳教聲》期 220（1972 年 1 月 31 日）：1。

[31] 龐德明：〈港澳教區發展委員會五年計劃書（續）：第五章　教會與工業〉，6。

[32] 同上。

[33] 同上。

[34]〈基督教工業委員會〉，《港澳教聲》期 250（1974 年 7 月 31 日）：1。

勞工福利。[35] 1976 年，委員會協助籌備成立聖公會工友團契，團契最終在 1977 年 2 月成立，讓各牧區的工友可加強聯絡，在工作上見證基督。[36] 工友團契的活動包括退修會、福音營、勞工法例班、專題座談會、探訪青年中心及郊遊等等。[37]

白會督又將關心工人的異象，植入神學教育之中。為實踐向低下階層和工人佈道，聖公會支持的香港協和神學院的神學生，也會到工廠實習，培訓他們成為 worker priest，體驗勞動階層的辛勞和做牧靈工作。[38] 同時，這又可幫助一些神學生畢業後除了在主日擔任牧職以外，平日可在其他行業謀生。[39] 梁熾靈牧師於 1963 年至 1966 年在協和神學院就讀時，也曾經和鮑彼得牧師到荃灣中國染廠[40] 實習，還在工廠居住大約三星期，學習成為

---

35 〈教區工業委員會暑假將舉辦多項活動〉，《港澳教聲》期 273（1976 年 6 月 27 日）：1。

36 同上；〈聖公會工友成立團契〉，《港澳教聲》期 281（1977 年 2 月 28 日）：2。

37 見〈工友團契聚會〉，《港澳教聲》期 278（1976 年 11 月 30 日）：2；〈工友團契聚會〉，《港澳教聲》期 282（1977 年 3 月 31 日）：1；〈聖公會工友團契端午節戶外福音營〉，《港澳教聲》期 284（1977 年 5 月 31 日）：2；歐陽衛強：〈我所認識的聖公會工友團契〉，《港澳教聲》期 284（1977 年 5 月 31 日）：4；〈聖公會工友團契舉辦工友勞工法例班〉，《港澳教聲》期 288（1977 年 9 月 30 日）：4；〈聖公會工友團契舉辦專題性座談會〉，《港澳教聲》期 290（1977 年 11 月 30 日）：4；歐陽衛強：〈從工作中去見證基督的福音〉，《港澳教聲》期 288（1978 年 3 月 26 日）：4；〈聖公會工友團契舉辦工友郊遊日〉，《港澳教聲》期 289（1978 年 7 月 30 日）：4；〈聖公會工友團契週年報告〉，《港澳教聲》期 304（1979 年 1 月 28 日）：4；〈工友團契秋令會〉，《港澳教聲》期 312（1979 年 9 月 30 日）：4；〈聖公會工友團契週年報告〉，《港澳教聲》期 318（1980 年 3 月 2 日）：4。

38 〈梁熾靈牧師訪問紀錄〉，鍾卓芝整理；〈悼鮑彼得牧師〉，《教聲》期 2023（2014 年 12 月 14 日）：4。香港協和神學院由聖公會與衛理公會合辦，設於香港大學聖約翰書院內。

39 〈梁熾靈牧師訪問紀錄〉，鍾卓芝整理。

40 中國染廠的歷史、廠房環境和規模，見香港記憶計劃口述歷史訪談網頁，http://www.hkmemory.hk/collections/postwar_industries/all_items/audio/201308/t20130827_64411_cht.html?f=classinfo&cp=%E7%B4%A1%E7%B9%94%E6%A5%AD&ep=Textiles&path=/collections/postwar_industries/all_items/8916/9062/9071/index_cht.html, 2016 年 11 月 2 日。

worker priest。[41] 1979 年，聖公會明華學院的秋季課程中，亦設有「今日教會之工業使命」一課，探討香港教會在工業和勞工界的使命，幫助學員瞭解協助教會推行工業福音工作的責任。[42]

1970 年前，為訓練熟練和半熟練技工，聖雅各福群會、聖匠職業訓練學校、聖巴西流及聖本德實用中學相繼成立。[43] 聖匠堂和聖十架堂的青年工友宿舍，亦為工友提供價錢廉宜的住宿和膳食、社交及文娛活動。[44] 而且，1973 年，因葵涌將急速發展為新工業區，應麥理浩爵士夫人的邀請和白會督的提倡，麥理浩夫人中心成立，旨為服侍生活困苦的工友及木屋區居民。[45] 中心初成立之時，由廖翼顯牧師出任管理委員會主席。[46]

在白會督的帶領下，港澳教區發展委員會在 1970 年發表了五年計劃書（1970–1975），指香港的社會經歷都市化、工業化和世俗化的急速蛻變，教會須深入思考、更新其建立教會的策略，方可在七十年代的首個十年邁進。[47] 此外，教會亦嘗試為新開闢的工

---

41 同上。

42 〈明華學院秋季課程簡介〉，《港澳教聲》期 311（1979 年 8 月 26 日）：4。

43 龐德明：〈港澳教區發展委員會五年計劃書（續）：第五章　教會與工業〉，6。

44 同上。

45 關恒生：〈從香港社區中心歷史發展看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的成長〉，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社耕拾穗」編輯小組：《社耕拾穗——社區中心的過去、現在、未來》（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1995），7–8；〈主教話〉，《靈西集——香港聖公會西九龍教區》期 43（2010 年 12 月）：1。參〈村民多大陸新移民，學歷低收入不理想〉，《荃灣報》期 91（1984 年 6 月 1 日）：5。另外，八十年代中期起，荃灣區轉型，中心致力為每一年齡階層的葵涌荃灣區居民，注重提供多元化服務，以增強社區和區內人士在個人、道德、精神和社會意識等方面的成長和發展。其後，當工廠北移內地，中心協助大批失業工人再培訓和就業；屋邨林立時，便發展社區聯繫和幼兒教育；隨着更多內地人移居香港，更開展新移民事工和醫療健康計劃；看到少數族裔的需要，開辦了翻譯服務和社康活動。見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社耕拾穗」編輯小組：《社耕拾穗》，序，3–13；〈麥理浩夫人中心歷史簡介〉，《教聲》期 319（1980 年 4 月 6 日）：4；；〈主教話〉，1。

46 關恒生：〈從香港社區中心歷史發展看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的成長〉，8。

47 龐德明：〈港澳教區發展委員會五年計劃書〉，廖翼顯譯，《港澳教聲》期 201（1970 年 6 月 30 日）：6。

業區、人口稠密的徙置區和市區內的市民服務，並在植堂、教育、社會福利及工業關係方面，回應香港的需要。[48] 興建荊冕堂牧區內的林護中學，是首個五年計劃的一部分，也是聖公會第一所在新界開辦的中學。[49]

1976 年，白會督委任專人組成的教區發展事工委員會，發表另一份五年計劃書（1976–1980），更重視人才培養，繼續在新界的新市鎮內建立牧區、傳道區及學校，興起更多領袖為主使用。[50]

1974 年正好是香港聖公會成立 125 周年的紀念。從 1951 年到 1974 年，香港聖公會的教堂數目由 10 所增至 28 所，增幅約 1.8 倍。[51] 全港的 28 所教堂中，香港島佔 10 所、九龍半島 14 所和新界 4 所。[52] 七十年代後，香港聖公會的發展漸趨放緩，至 1984 年，十年間只增加了一所教堂。[53] 同時，聖公會的教育和社會福利工作亦具備規模。聖公會在香港一共建立了 46 所小學（當中的 40 所為政府津貼小學），就讀學生有 57,803 人；另辦 22 所中學（當中 10 所為政府津貼中學，7 所為政府補助學校），學生人

---

48 見龐德明在《港澳教聲》四篇同一章題的文章：龐德明：〈港澳教區發展委員會五年計劃書（續）〉，廖翼顯譯，《港澳教聲》期 202（1970 年 7 月 31 日）：6；《港澳教聲》期 204（1970 年 9 月 30 日）：6；《港澳教聲》期 205（1970 年 10 月 31 日）：6；《港澳教聲》期 206（1970 年 11 月 30 日）：6。

49 〈一九七〇至一九八五年大事紀要〉，載《庭碩》（香港：聖公會林護中學，1986），16；〈前瞻一九七十年〉，《港澳教聲》期 195（1969 年 12 月 25 日）：1。

50 〈踏入一百二十六週年——教區進行釐定五年工作方針〉，《港澳教聲》期 268（1976 年 1 月 31 日）：1；〈教區特別議會月底舉行——五年計劃意見書為討論重點〉，《港澳教聲》期 282（1977 年 3 月 31 日）：1；〈教區擴展募捐出發，白會督訓詞——感謝與服務〉，《港澳教聲》期 283（1977 年 4 月 30 日）：1。

51 *The Diocese of Hong Kong and Macao 1849–1974: A Brief History and the 1974 List of Churches,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Social Welfare Centres* (Hong Kong: Diocese of Hong Kong and Macao, 1974), 11–15.

52 同上。

53 《聖公會港澳教區一百三十五周年紀念特刊》（香港：聖公會一三五周年慶典中央籌備委員會，1984），25。

數達 19,103 人。[54] 社會福利方面，教區屬下共有 14 個服務單位，尤其以於 1966 年設立的教區福利協會（Diocesan Welfare Council）為聖公會社會服務的標記。



白約翰會督[55]

四・荊冕堂的傳道工作

1966 年至 1981 年間的荊冕堂，先後由多位牧者主理。1966 年 7 月，鄺廣傑會吏因身體不適離開荊冕堂，堂務於同年 9 月轉交聖安德烈堂梅志仁牧師署理，鄧葆真校長負責牧區的日常事務，鍾仁立牧師及陳錫輝牧師不時蒞臨證道。由於缺乏主任牧師，早堂崇拜因此取消，晚堂崇拜則由教區派聖品前來協助，詩班及青年部活動亦先後停辦。[56]

---

54 同上，12。

55 〈本堂歷任聖品〉，載《聖公會荊冕堂五周年堂慶特刊，1970》（香港：聖公會荊冕堂，1970），5。

56 梁熾靈：〈堂史〉，載《聖公會荊冕堂五周年堂慶特刊》，14–15。

及至 1967 年 4 月，教區始正式派梁熾靈牧師為第一任主任牧師，另教區委派主恩小學校監班佐時（Joyce M. Bennett）會吏為義務聖品（至 1968 年 11 月），而香港協和神學院神學生馮家亮先生亦前來協助青少年工作，又有王芷芳小姐協助訓練詩班。主日學、詩班及青年部活動得以恢復。[57] 1968 年 7 月下旬，廖翼顯牧師返港，8 月受委派至葵涌石梨新區的主愛小學擔任校長，9 月間成為荊冕堂義務聖品輔助梁牧師，與梁牧師和班會吏三人同工，因此得「三劍俠」之稱。[58] 1972 年 9 月 1 日，梁牧師離任赴美進修，堂主任由鮑彼得牧師接職直至 1983 年 8 月，一個月後奉調北角聖彼得堂堂主任。[59]



梁熾靈牧師[60]



廖翼顯牧師[61]

[57] 同上，15。另梁熾靈：〈我與荊冕堂一起成長〉，載《聖公會荊冕堂銀禧堂慶特刊，1965–1990》（香港：聖公會荊冕堂，1990），7。

[58] 同上；〈廖翼顯牧師返港，派長葵涌主愛小學，將兼助荃灣荊冕堂〉，《港澳教聲》期 179（1968 年 8 月 25 日）：1；〈梁婉玲訪問紀錄〉。

[59] 〈二十五年大事記〉，載《聖公會荊冕堂銀禧堂慶特刊》，16；〈83 年教區大事回顧〉，《港澳教聲》期 408（1984 年 1 月 1 日）：1。

[60] 〈本堂歷任聖品〉，載《聖公會荊冕堂五周年堂慶特刊》，5。

[61] 同上。



班佐時會吏[62]



晚堂詩班（約 1970 年）[63]

---

62 同上。

63〈詩班簡介〉，載《聖公會荊冕堂五周年堂慶特刊》，25。



詩班聖誕獻唱（約 1970 年）[64]

1. 牧區的挑戰

1966 年 4 月，因天星小輪加價引發暴動，局勢稍定後，梅牧師和鄧葆真校長即於 1966 年 9 月策劃創設托兒所和幼稚園的工作。幼稚園為註冊學校，宗旨為對日間外出工作和兒女眾多的家庭提供服務。[65] 當時牧區亦開設少年康樂中心，為年青人提供餘暇活動。[66]

1967 年 4 月，梁熾靈牧師到任不久，即要面對六七暴動的衝擊。7 月 15 日，左派人士在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鬥委會）的號召和帶領下，不斷將行動升級，集結在荃灣眾安街和大河街一帶，向政府防暴隊投擲魚炮和鏹水瓶。[67] 當時荊冕堂附近不時出現炸彈爆炸事件。鬥委會如此描述其工作：

---

64 同上。

65〈二十五年大事記〉，14；單芷筠：〈幼稚園今昔〉，載《聖公會荊冕堂銀禧堂慶特刊》，54。

66 梁熾靈：〈我與荊冕堂一起成長〉，載《聖公會荊冕堂銀禧堂慶特刊》，7。

67 張家偉：《六七暴動》，126。

我各路抗暴大軍，各出奇謀，互相呼應，困擾疲敵。除了集會、遊行、街頭宣傳演出、發傳單、掛標語、插紅旗、放汽球等「文鬥」之外，港島西區、灣仔和九龍的深水涉、九龍城、荃灣等地區，群眾也紛紛出擊，繼續打「街頭遊擊戰」，有時一夜就有六、七處「戰場」，燃燒着抗暴的烈火……[68]

當年香港和荃灣社區內的混亂情況，可想而知。從現存荊冕堂的統計可見，1967 年並沒有孩童及成人受洗的記錄，相信是受六七暴動的波及。

新成立的荊冕堂牧區面對的另一個重大考驗，是財政壓力。為解決開支問題，教堂於 1967 年 6 月起設立了月捐、感恩捐、獻花和獻刊等捐獻，也鼓勵教友自由奉獻。另有童膳會和外國教會的捐款，並教區的借款應付財赤。[69] 此外，教區多個牧區，包括聖安德烈堂、聖三一堂及諸聖堂，每月多收一次奉獻予荊冕堂為經費，令荊冕堂可勉強維持所有開支。[70] 其中聖保羅堂青年部更為支持荊冕堂的聖工而演劇籌款。[71] 此一劇目為「天倫夢迴」，主要講述天下母子之愛和男女之情。[72] 這劇於 8 月 26 日及 27 日聖保羅堂副堂一連兩晚公演，但因六七暴亂時局不穩之故，延遲至 12 月 16 日及 17 日演出。[73] 門票分為五元以上的名譽券、三元和二元的，在聖保羅堂交際室 8 月 1 日起售票，各堂青年部亦代為發

---

68 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編：《香港風暴》（香港：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1968），載張家偉：《六七暴動》，133。

69 梁熾靈：〈堂史〉，載《聖公會荊冕堂五周年堂慶特刊》，15；〈梁熾靈牧師訪問紀錄〉，金禧編委會、林護中學團契學生訪問及整理。當時荊冕堂堂役的工資，也是由教區資助的。〈義務聖品廖翼顯牧師的話〉，《教聲》期 879（1992 年 11 月 8 日）：5。

70 〈梁熾靈牧師訪問紀錄〉，金禧編委會、林護中學團契學生訪問及整理。

71 〈聖保羅堂青年部為荊冕堂演劇籌款〉，《港澳教聲》期 166（1967 年 7 月 25 日）：2。

72 同上；〈聖保羅堂青年部為荊冕堂演劇籌款〉，《港澳教聲》期 170（1967 年 11 月 25 日）：2；〈聖保羅堂青年部演出「天倫夢迴」〉，《華僑日報》，1967 年 12 月 17 日，12。

73 〈聖保羅堂青年部為荊冕堂演劇籌款〉，《港澳教聲》期 170（1967 年 11 月 25 日）：2。

售。[74] 最後公演共籌得港幣約 2,000 元，由聖保羅堂司庫直接轉達梁牧師，而演劇的支出全由聖保羅堂青年部奉獻。[75] 聖保羅堂對荊冕堂的支持，將肢體合一的精神充分體現。[76]

當時，主恩學校校長兼荊冕堂教友鄭偉健弟兄，商借荊冕堂的禮拜堂，並安排高年級的學生義務為成績較落後的學生補習。[77] 學生也自動為荊冕堂奉獻小量金錢，以應付教堂的水電等日常雜費。[78] 1968 年和 1969 年暑假又有聖多馬堂青年部友擔任小學補習班導師，一連五星期的星期一至五，早上 6 時 30 分開始至 10 時 30 分。[79] 補習班學生達 200 人。[80] 1969 年暑假，教區的青年在荊冕堂舉行工作營，為荊冕堂的副堂粉飾一番。[81]

梁熾靈牧師其後發展托兒所和幼稚園，減輕了教堂不少的財政負擔。至 1972 年，鮑彼得牧師決定接收位於荃灣寶石大廈的聖尼哥拉幼兒學校，作為荊冕堂幼稚園的分校，擴充其規模。[82] 短時間內，荊冕堂的財政已由入不敷支轉變為略有盈餘。[83]

---

74 〈聖保羅堂青年部為荊冕堂演劇籌款〉，《港澳教聲》期 166（1967 年 7 月 25 日）：2。

75 〈聖保羅堂（二）青年部為荊冕堂籌欵達港幣二千餘元〉，《港澳教聲》期 172（1968 年 1 月 25 日）：3。

76 〈聖保羅堂青年部為荊冕堂演劇籌款〉，《港澳教聲》，166: 2。

77 鄭偉健：〈荊冕堂與主恩小學〉，載《聖公會荊冕堂銀禧堂慶特刊》，66；主恩小學撰寫組：〈荊冕堂與主恩小學的關係〉，載《聖公會荊冕堂銀禧堂慶特刊》，75。

78 同上。

79 梁熾靈：〈我與荊冕堂一起成長〉，載《聖公會荊冕堂銀禧堂慶特刊》，7；"Portrait of a Parish—Crown of Thorns," *Diocesan Echo* 17 (October 1968): 4.

80 同上。

81 梁熾靈：〈我與荊冕堂一起成長〉，載《聖公會荊冕堂銀禧堂慶特刊》，7。

82 〈義務聖品廖翼顯牧師的話〉，《教聲》期 870（1992 年 11 月 8 日）：5；"Peter Pau's letter to the Rt. Rev. G. Baker," November 8, 1976, Diocese of West Kowloon, Crown of Thorns' Church (CT)(3), Bishop's House Archives, Hong Kong; "Phoebe Tsui's letter to Hong Kong Housing Society," January 19, 1977, Diocese of West Kowloon, Crown of Thorns' Church (CT)(3), Bishop's House Archives, Hong Kong; "Peter Pau's letter to Bishop," March 7, 1977, Diocese of West Kowloon, Crown of Thorns' Church (CT)(3), Bishop's House Archives, Hong Kong; "Gilbert Baker's letter to Miss Sersale,"

2. 牧區的建立

1967 年 9 月，荊冕堂漸次回復正常運作。[84] 除了原有的晚堂崇拜（晚上八時）外，再增加了早堂崇拜（早上九時），以適應不同教友的需要和時間。[85] 早堂崇拜主要由主恩學校的師生參與並協助工作，人數較多，而工人和荊冕堂英文專修學校的學生則參加晚堂崇拜，約有六、七十人。[86] 聖餐崇拜定於每月第一主日的晚堂崇拜進行。[87] 湯顯森牧師、區炳南牧師和班佐時會吏等，不時協助主禮。[88] 自 1973 年 1 月，荊冕堂取消晚堂崇拜，早堂則改為早上十時，同時開始每月出版堂刊一份。[89] 1974 年，教堂為照顧葵芳老人宿舍老教友的靈性生活，逢第一主日的聖餐崇拜，也會派專車接送老年教友往返共用靈糧。[90]

March 11, 1977, Diocese of West Kowloon, Crown of Thorns' Church (CT)(3), Bishop's House Archives, Hong Kong; "Mrs. B. Cheung's letter to Bishop Baker," March 16, 1977, Diocese of West Kowloon, Crown of Thorns' Church (CT)(3), Bishop's House Archives, Hong Kong; "P. L. Lam's letter to Bishop Baker," May 30, 1977, Diocese of West Kowloon, Crown of Thorns' Church (CT)(3), Bishop's House Archives, Hong Kong.

83 〈義務聖品廖翼顯牧師的話〉，《教聲》期 870（1992 年 11 月 8 日）：5。

84 梁熾靈：〈我與荊冕堂一起成長〉，載《聖公會荊冕堂銀禧堂慶特刊》，7。

85 〈荃灣荊冕堂〉，《港澳教聲》期 166（1967 年 7 月 25 日）：3；梁熾靈牧師訪問紀錄，金禧編委會、林護中學團契學生訪問及整理；〈本堂常務〉，載《聖公會荊冕堂七周年堂慶暨牧區成立，1972》（香港：聖公會荊冕堂，1972），6。

86 〈梁熾靈牧師訪問紀錄〉，鍾卓芝整理；〈梁熾靈牧師訪問紀錄〉，金禧編委會、林護中學團契學生訪問及整理；鄭偉健：〈荊冕堂與主恩小學〉，載《聖公會荊冕堂銀禧堂慶特刊》，66。

87 〈荃灣荊冕堂〉，《港澳教聲》期 166（1967 年 7 月 25 日）：3。

88 〈勇闖新天地之梁熾靈牧師〉，《聖公會荊冕堂四十周年堂慶紀念特刊》（香港：聖公會荊冕堂，2005），13。

89 〈二十五年大事記〉，14。

90 〈牧區消息〉，《聖公會荊冕堂堂刊》卷 11 期 4（1976 年 4 月 1 日）：1。

此外，荊冕堂又組織堂務促進委員會，並陸續成立不同部門推動聖工，包括音樂部、主日學部、培育部、探訪部、青年部、少年部、婦女部和成年部。[91]

1971 年 10 月，華人基督教聯會接納荊冕堂為會員堂，而荊冕堂亦派出一位代表出席聯會會議。[92] 同年，因教友人數日增，且事奉和牧養部門日趨成熟，荊冕堂經教區常備委員會接納於 12 月正式成立牧區，成為教區在荃灣唯一設立的牧區。[93] 同月，牧區召開全體教友大會，並選出 12 位牧區議員，取代了堂務促進委員會的工作。[94] 其後牧區召開教友週年大會，舉行第一屆牧區議員就職禮。[95] 第一屆的牧區議員，有 3 位委選議員，包括梁玉玲（青年部部長）、黃沛宜（音樂部部長〔晚堂〕）、何祥麟（主日學部部長），4 位互選議員包括周以梅（成人部部長）、周吳玉如（婦女部部長）、鄭偉健（少年部部長）、張仲磐（音樂部部長〔早堂〕）、周正持（書記）、廖梁佩瑤（司庫）、梁黃景雲（交際），及 2 位議員李國華、梁婉玲。[96] 1972 年 2 月，牧區議員舉行退修會，在青山黃永善會計師別墅舉行。[97] 4 月，梁熾靈牧師就任為主任牧師。[98]

---

91 同上。

92 〈本堂一九七零年六月以來大事記，一九七〇年〉，載《聖公會荊冕堂七周年堂慶暨牧區成立，1972》，5；〈聖公會荊冕堂一九七九年第四次牧區議會記錄〉，1979 年 10 月 7 日，荊冕堂文件。

93 〈二十五年大事記〉，14。

94 〈本堂一九七零年六月以來大事記，一九七〇年〉，5。

95 同上。

96 〈聖公會荊冕堂歷年牧區議員姓名〉，載《聖公會荊冕堂銀禧堂慶特刊》，11；〈二十五年大事記〉，14。

97 〈本堂一九七零年六月以來大事記，一九七〇年〉，5。

98 同上。



荊冕堂成立牧區
選出第一屆牧區議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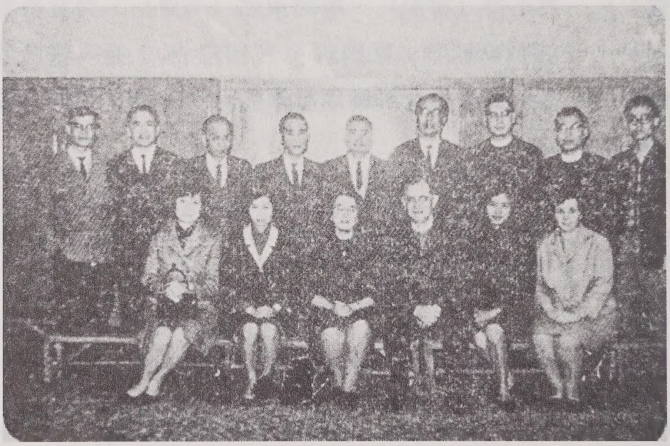
荃灣荊冕堂創建於一九六五年四月，至本年四月即已逹七週年，該堂現任主任梁熾靈牧師，於一九六七年四月到任以來，對會務推進不遺餘力，教友人數日漸增多，註冊領聖餐之教友人數已符合憲章要求，乃於一九七一年十二月正式申請教區常備委員會核允，得常備委員會於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三日開會通過，准予成立牧區。該堂現已選出一九七二年度第一屆牧區議員十二位，担任推選本年度各項堂務工作。又該堂將於本年四月間舉行七週年堂慶云。第一屆牧區議員芳名：

（筆劃序）

吳玉如女士　梁玉玲小姐　黃景雲女士
何祥麟校長　梁婉玲小姐　黃沛宜先生
李耀華先生　梁佩瑤女士　張仲磐先生
周以梅先生　周正持小姐　鄭偉健校長

荊冕堂第一屆牧區議員合照

《教聲》報導荊冕堂成立牧區，選出第一屆牧區議員（1972）[99]



堂務促進委員會（約 1970 年）[100]

[99] 〈荊冕堂成立牧區，選出第一屆牧區議員〉，《教聲》期 220（1972 年 1 月 31 日）：4。
[100] 梁熾靈：〈堂史〉，載《聖公會荊冕堂五周年堂慶特刊》，17。



主日學學生旅行（約 1970 年）[1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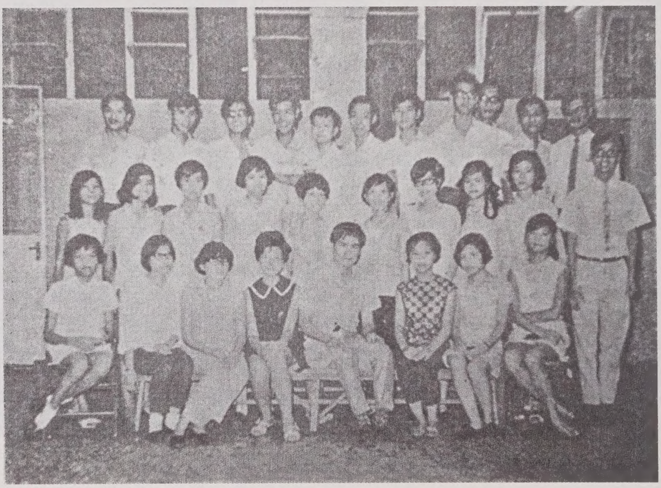
主日學學生復活節郊外慶祝會（約 1970 年）[102]

101 同上，25。

102 〈主日學部〉，載《聖公會荊冕堂五周年堂慶特刊》，25。



青年部郊遊（約 1970 年）[103]



青年部歡迎部友赴美（約 1970 年）[104]

103〈青年部〉，載《聖公會荊冕堂五周年堂慶特刊》，19。

104 同上。



青年部討論會（約 1970 年）[105]

3. 堂校關係

六、七十年代，聖公會在荃灣和葵涌區內先後增辦了主愛小學（1968）、仁立小學（1970）、林護紀念中學（1970）及思晃小學（1974），加上原來的主恩小學，不僅成為荊冕堂牧區的資源，也是其服事的對象。1975 年 9 月，聖公會小學監理委員會實施分區監管制度，主恩、主愛、仁立及思晃四校，並劃為市郊區，由李冬青牧師為區監。荊冕堂主任牧師鮑彼得亦以校董身分參與，期望在知識傳授以外，亦不忘宗教之薰陶。[106]

荊冕堂與牧區內的聖公會學校、社區和教區有不少合作。因主恩小學位於大窩口山上，荊冕堂位於山下，所以主恩小學不時向教會借用地方，由此可見兩者之間的通力合作，互相服侍。[107]

---

105 同上，21。

106 郭諾：〈校史簡報〉，《聖公會主恩小學二十周年校慶特刊，1961–1981》，封面內頁。

107 梁熾靈：〈堂史〉，載《聖公會荊冕堂五周年堂慶特刊》，17。

自 1967 年 9 月至 1969 年 7 月，除暑假以外，主愛小學每週一至週五借用荊冕堂副堂、二樓及三樓，共 5 個課室供學生補習和活動之用，學生每天也在荊冕堂的童膳中心午膳。[108]

牧區亦為有需要的學生或家庭提供適切援助。例如 1968 年 6 月 14 日的早上，主恩學校的一名學生家長陳麗千女士向鄭偉健校長求助。陳女士的丈夫楊昌先生，原是一位五金業技師，因他目睹朋友被匪徒搶劫，義憤窮追，可惜被匪徒刺傷，最後送院不治，遺下陳女士和 6 名子女，當中 4 名更是主恩學校的學生。兒女中最大的只得 12 歲，幼女仍在繈褓之中。[109]

> 面對着寡婦孤兒，任是鐵石心腸，亦不能無動於衷！我得悉變故的真相以後，深感唯一要做的是，就是為死者遺屬盡力安排一家今後的生活如何呼籲緊急救濟。感謝我校中全體同事的同情與熱心，頃刻之間，我們在牧師和學生的努力下，籌得了將近八百元的現欵贈予陳女士，以便一家稍紓困厄……[110]

鄭校長隨即向社會福利署、荃灣辦事處和主恩學校的福利部商討救濟事宜，還向各大報館呼籲社會人士加以援助。[111] 出人意料的是，最終律政司羅弼時在立法局會議中，動議撥款 36,000 元給予陳女士，作為楊先生因盡道義和法律責任而受傷喪命的撫恤。[112] 堂校之間對弱勢的愛心幫助，為有需要的學生和家長多走一里路，在此表露無遺。此外，牧區學校的畢業禮也常在荊冕堂舉行，各友校校長、牧師、畢業生及家長合共數百或千人聚集聖

---

108 同上。

109 同上。

110 同上。

111 同上。

112 同上。

堂，由牧師傳達從上帝而來的祝福。[113] 1973 年，主恩、主愛及仁立三校更舉行聯合畢業禮。[114] 荊冕堂的青年部更於 6 月設崇拜及交誼晚會，邀請三校小學應屆畢業生參加。[115]

五 · 荊冕堂的教育與社會服務

1. 服侍幼小：荊冕堂托兒所和幼稚園

六十年代，隨着政府不斷開闢和發展新市鎮，興建人口密度甚高的徙置大廈，以廉租甚至免租，鼓勵志願團體包括教會和熱心人士，申請徙置大廈的天台或樓下，辦福利工作或幼兒教育服務，盡用徙置大廈的空間提供社區設施。[116] 因此，當時有些幼稚園和小學，有「天台幼稚園」和「天台學校」之名。1962 至 1963 年，徙置事務署的年報報告，在所有徙置大廈的天台，一共有 203 所學校、63 所兒童中心、13 所職業訓練中心和 3 所康樂中心。[117]

香港社會福利署亦鼎力協助大量托兒所的設立，而且工作成績良好的團體，可申請政府的補助金。[118] 雖然學齡前兒童已進入幼稚園和托兒所的人數頗多，但幼兒教育仍未全面普及。[119] 許多海外團體和本地社團深感幼兒教育和兒童福利工作的急切需要。直

---

113 參〈荃灣主恩小學畢業典禮誌盛〉，《港澳教聲》期 170（1967 年 11 月 25 日）：2。

114《聖公會主恩小學金禧校慶特刊，1961–2011》，69。

115〈二十五年大事記〉，14。

116 Hayes, *Friends and Teachers*, 61；陸趙鈞鴻：〈幼兒教育在香港的重要〉，《社聯季刊》期 30（1969 年秋）：5。

117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 Commissioner for Resettlement, 1962–1963*, para. 68, in Hayes, *Friends and Teachers*, 61.

118 簡陸景衛：〈戰後香港的托兒所工作〉，《社聯季刊》期 30（1969 年秋）：7。

119 陸趙鈞鴻：〈幼兒教育在香港的重要〉，5。

至1969年3月，在社會福利署登記註冊的託兒所，一共有65間，其中接受政府補助的有34間，學額為約7500名學生。[120]

荊冕堂托兒所於1966年10月由鄧葆真校長創設，以副堂前座為托兒間，初期有30多人，全日收費為30元。[121] 梁熾靈牧師在1967年就任時，荊冕堂托兒所逐步擴展，[122] 而托兒所也是教區福利協會的會員機構之一。[123] 當鄰近的女工在早上出外工作前，便會把幼兒送到托兒所讓人照顧。當時托兒所分為「全日托」和「半日托」——「全日托」指一整天的托兒服務，而「半日托」指半天托兒，半天幼兒到幼稚園上課。[124] 托兒所初時一共有大約10至20名幼兒，3位職員和2位助手。[125] 後來，幼兒人數增至30至40名，鼎盛時曾達約80名。[126] 有時候，有些父母於早上七時便將孩子送來托兒所，因時間尚早同工還未上班，梁牧師便要親自接待孩童，有些只有兩歲的小孩還會將梁牧師誤認為父親，大叫：「爸爸！爸爸！」[127] 1973年4月，為加強托兒所的管理，管理委員會正式設立，成員包括廖牧師、鄭偉健、梁婉玲和周正持四人。1972年，鮑彼得牧師到任荊冕堂後，考慮到托兒所每月虧損7000多元的情況，[128] 乃與廖翼顯牧師商討，並決定在1975年12月31日結束托兒所，把地方擴充為幼稚園課室，減低財政負擔。[129]

---

120 簡陸景衛：〈戰後香港的托兒所工作〉，7。

121 〈托兒所簡介〉，載《聖公會荊冕堂五周年堂慶特刊》，27。

122 〈梁熾靈牧師訪問紀錄〉，鍾卓芝整理；〈二十五年大事記〉，15。

123 〈教區福利協會會員機構簡介〉，《港澳教聲》期237（1973年6月30日）：2。

124 〈梁熾靈牧師訪問紀錄〉，鍾卓芝整理。

125 〈梁熾靈牧師訪問紀錄〉，金禧編委會、林護中學團契學生訪問及整理。

126 〈梁熾靈牧師訪問紀錄〉，鍾卓芝整理。

127 〈勇闖新天地之梁熾靈牧師〉，13。

128 〈悼鮑彼得牧師〉，《教聲》期2023（2014年12月14日）：4。

129 同上；〈二十五年大事記〉，14–15。

荊冕堂幼稚園早於鄺會吏時期向政府申請開辦，於 1966 年 9 月創辦，後因鄺會吏離開，幼稚園乏人領導，學生減至 10 數人。[130] 及至梁熾靈牧師到任時，幼稚園招生的工作困難重重。第一，因聖尼哥拉護幼園（其後易名為聖尼哥拉幼兒學校）和主恩學校已成立，並設有認養計劃，認養者可認捐學生的學費和校內的飲食，大受家長歡迎。但荊冕堂幼稚園沒有開辦認養計劃。[131] 第二，當時大窩口幼稚園的開辦已達飽和。[132] 第三，教堂四周皆為空地和工廠區，住宅較少。[133] 面對競爭，幼稚園收生人數甚少，當時只得 21 人。[134]

人手方面，因經費不足，不少由主恩學校的老師免費義務幫忙任教，當中包括熱心的張仲磐先生、梁燕文先生，還有主愛小學和仁立小學的老師、林護中學校長兼仁立小學校監李冬青牧師。其中一些老師如梁婉玲姊妹和梁玉玲姊妹等，是主恩學校的畢業生和荊冕堂教友。[135] 老師須任教上下午班，講課教導毫不容易。[136]

隨着葵涌、葵芳和葵盛一帶（包括石梨貝新區）因發展而人口漸增，大量新居民入住，為幼稚園發展提供生機。[137] 1967 年 8 月，學生人數增至 82 人。[138] 1968 年暑假，梁牧師借用位於葵涌石梨貝主愛小學的地方，為幼稚園招生。[139] 不過，由於兩地點相距頗遠，如何將幼稚園學生由石梨貝送到大窩口荊冕堂，確是一大

---

130 〈幼稚園簡介〉，載《聖公會荊冕堂五周年堂慶特刊》，26。

131 〈梁婉玲訪問紀錄〉，金禧編委會整理。

132 同上。

133 同上。

134 梁熾靈：〈我與荊冕堂一起成長〉，載《聖公會荊冕堂銀禧堂慶特刊》，7。

135 〈梁婉玲訪問紀錄〉，金禧編委會整理。

136 同上。

137 同上；〈梁熾靈牧師訪問紀錄〉，鍾卓芝整理。

138 〈幼稚園簡介〉，26。

139 〈梁熾靈牧師訪問紀錄〉，金禧編委會、林護中學團契學生訪問及整理。

難題。[140] 其後，幸得梁牧師有在中華染布廠工作的司機友人，雖不是基督徒，但仍願意仗義相助配合教會。[141] 司機以聖公會荊冕堂的名義出車，由幼稚園老師相伴載送小朋友上學，與其他上班的工人一起乘車。[142] 由於幼稚園於下午一時正上課，所以旅遊車司機每天中午十二時三十分開車。每次出車四五輛，解決了學生的交通問題，成為了「荃灣區用大型旅遊車作校車之先河」。[143] 因旅遊車須接送紗廠的工人，所以每天須在新界大埔和上水等地到處遊走，猶如一「流動廣告」，所以惹來不少羨慕——一間幼稚園竟可擁有如此龐大的旅遊車，又有「年青貌美」的女教師隨車照顧學生。[144] 因車上標誌着「聖公會荊冕堂」六字，而不少人也許不懂「荊冕」二字，所以每次看見旅遊車，只會嚷着「聖公會聖公會！」。[145]

1970 年，仁立小學成立，給幼稚園的招生工作帶來方便，學生來源廣佈石梨、石蔭、葵涌、荃灣等區，人數高達 600 多人。[146] 及梁燉靈牧師於 1972 年離任時，幼稚園約有 700 多名學生。[147] 而且，凡在幼稚園畢業且成績良好的學生，可得獲推薦升讀主恩小學、主愛小學或仁立小學。[148] 幼稚園有如此驕人的收生成績，其

---

140 同上。

141 同上；〈梁婉玲訪問紀錄〉，金禧編委會整理。

142 同上。

143 〈梁熾靈牧師訪問紀錄〉，鍾卓芝整理；梁熾靈：〈我與荊冕堂一起成長〉，載《聖公會荊冕堂銀禧堂慶特刊》，7。

144 〈勇闖新天地之梁熾靈牧師〉，13；〈梁熾靈牧師訪問紀錄〉，金禧編委會整理。

145 同上。

146 同上；梁熾靈：〈我與荊冕堂一起成長〉，載《聖公會荊冕堂銀禧堂慶特刊》，7。

147 〈梁熾靈牧師訪問紀錄〉，金禧編委會整理。

148 〈荊冕堂幼稚園招生〉，《港澳教聲》期 213（1971 年 6 月 30 日）：5。

中一位老師梁婉玲姊妹認為原因是因為老師們的質素甚高，實在是以愛心教導小孩之故，吸引更多人報讀。[149]

幼稚園老師們和梁牧師的關係，可謂深厚非常。梁婉玲姊妹是第三屆的幼稚園老師，憶述她與梁牧師之間的一份情：

> 至今我們還是很珍惜彼此的關係。甚至到了現在，1970 年代的幼兒園老師都還會有見面。每一年都會相約梁牧師吃飯數次，談話的內容，總是一件又一件的往事。那時候，就是我們這些幼稚園老師輪着做一道菜帶回學校，午飯時我們一起分享着吃。吃飯後，梁牧師會給我們一個小休時間，我們會在梁牧師準備的尼龍床上睡午覺。我們就像是一家人，不會令我們覺得只是在「打工」的感覺。梁牧師就像我們的父母一樣，帶領着我們這群大姐姐教小朋友。我們真的很享受當時的生活。在這樣的幼稚園教育下一代，真的很好。[150]

1972 年 3 月，梁姊妹和荊冕堂教友孔繁政弟兄於荊冕堂舉行婚禮。他們是第一對教友在荊冕堂舉行婚禮，也是第一對新人在荊冕堂結婚時配有紅地毯的。[151] 那紅地毯，還要是梁牧師為這對新婚之人所精心預備的。那一頓午飯，那張尼龍床——回憶中的一絲一毫，仍在梁姊妹和梁牧師的心坎中。雙方的情誼，時至今天，並未受時日之洗刷剝落而褪色。

據鮑牧師憶述，有一次幼稚園學生以「小蜜蜂」參加舞蹈公開比賽獲得冠軍，還在電視上公開演出。[152] 荊冕堂幼稚園聲名大噪，一週內共吸引了約 300 名新生報讀！[153] 幼稚園的經濟也因此

149〈梁婉玲訪問紀錄〉，金禧編委會整理。

150 同上。

151 同上；〈本堂一九七零年六月以來大事記，一九七〇年〉，5；〈二十五年大事記〉，14。

152〈悼鮑彼得牧師〉，《教聲》期 2023（2014 年 12 月 14 日）：4。

153 同上。

漸漸轉虧為盈。[154] 白會督打趣地問他：「你是否魔術師？」[155] 幼稚園每每在困乏之時，恩典和供應充足有餘。

1972 年，為擴充荊冕堂幼稚園的規模，鮑彼得牧師接收聖尼哥拉幼兒學校，作為荊冕堂幼稚園的分校。[156] 1981 年，幼兒學校遷至大窩口社區中心頂層六樓。[157]



幼稚園敲擊樂表演（約 1970 年）[158]

2. 服侍工人：荊冕堂英文專修學校、裁剪班

成長於六、七十年代的香港女性，受中國傳統思想影響，女性的家庭和社會地位較為次等。女性為了減輕家庭經濟負擔，並把升學機會留給家中的男性，因此無法繼續升讀日校中學。[159] 尤其在香港

---

154 同上。

155 同上。

156 〈義務聖品廖翼顯牧師的話〉，《教聲》期 870（1992 年 11 月 8 日）：5。

157 〈聖尼哥拉幼兒學校扎根大窩口五十年〉，《教聲》期 2096（2016 年 5 月 8 日）：6。

158 〈幼稚園簡介〉，載《聖公會荊冕堂五周年堂慶特刊》，26。

159 蔡寶瓊統籌：《晚晚 6 點半——七十年代上夜校的女工》（香港：進一步多媒體，1998），49；參 Janet W. Salaff, *Working Daughters of Hong Kong: Filial Piety or Power*

工業最為興旺之時，大批未及法定勞工年齡的女孩成為非法童工，其中一部分還會「借用」別人的身份證到工廠打工，正是所謂「借證做廠」的故事所在。[160] 十多歲便輟學做工的女孩子，她們很多不甘心就此放棄學業，或希望增進知識由藍領轉為白領。因此，夜校和英文專業學校（或稱為英專）便應運而生。[161] 七十年代中期至晚期，夜校的學生人數達至約五萬人之高峰，更佔日校學生人數約八分之一，而女生人數比男生較多。[162]

荊冕堂英文專修學校，於 1967 年 9 月開辦，設有拼音班至中三級課程，是梁牧師任期內其中一個重要工作。[163] 當時的構想，是教會可藉此服侍牧區內的工人，領人信主。教友黃杏萍姊妹憶述：

> 追溯當年，寄居在好友梁煥甜家中，每日同一時間路過荊冕堂，內心有份特別的奇妙感覺，總是探頭張望，可惜門與閘都關上，不得其門而進，一天路過，一張英文班招生的海報影〔映〕入眼廉〔簾〕，使我們可置身其內，再不是一個路過的張望客。[164]

當時政府對夜校的規管較寬鬆，為荊冕堂夜校提供了空間。[165] 老師包括曾繼才牧師、馮家亮牧師、蒙貴良先生、梁黃景雲師母、其他教友如李蝶香姊妹、梁婉玲姊妹，及鄰近徙置區房屋署職員宿舍的「區長」，課程由他們籌劃和任教。[166] 所教導的科目有中文、

---

in the Famil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160 蔡寶瓊：《晚晚 6 點半》，10。

161 同上，10、49。

162 同上，10。

163 〈夜校報導〉，《聖公會荊冕堂五周年堂慶特刊》，27。

164 黃杏萍：〈我在荊冕的日子〉，《荊情集——荊冕與我》，期 3（香港：聖公會荊冕堂，2001 年 8 月），20。

165 〈梁熾靈牧師訪問紀錄〉，鍾卓芝整理。

166 同上；〈勇闖新天地之梁熾靈牧師〉，14。

英文、常識、數學（珠算）和應用科學。[167] 夜校學生皆來自葵涌和大窩口的工人，學生人數約 140 人。[168]

夜校的上課時間，為每星期一至五晚上 7 時 30 分至 10 時 30 分，而學費約 10 至 20 元。[169] 上課時間中有一長時間的小休，梁黃景雲師母還會一邊彈琴，一邊帶領和教導學生一起唱聖詩。[170] 黃杏萍姊妹表示，她起初到夜校上課，沒有很大的學習動機，只希望打發一下時間。[171]

> 兩堂過後，疲態畢露，無法集中，落堂小息成為小睡片時的最佳享受，誰知這份享受被叮叮噹噹之聲騷擾，查看之下，一位女士十指在琴鍵上跳躍，彈出美妙音樂，同學們心怡〔儀〕這些音樂，既美妙又動聽，這些音樂成為我們再上課時候的提神劑，偶然聽不到琴聲，我們便沒精打采，像雲遊太虛，有一晚提早返學，又聽見琴聲，我與好友歡喜若狂，坐在她背後的遠處仔細欣賞，不料她停下來招呼我們，把我們嚇了一跳，不懂回答，她和謁〔藹〕可親，輕頻〔顰〕淺笑，柔聲細語的態度把我們吸引，她教我們唱詩，邀請我們參加詩班，從此小息片時化作歡樂時光。提早回校變作學習前的催化劑……本是一個沉夕枯乾的生命竟可因着詩歌被提升……

一年後，她受洗成為荊冕堂的一分子。[172]

> 加入荊冕堂是我人生的轉捩點，我的信仰不再像小舟漂泊於汪洋中無所依附，生命變得充實積極，星期一至五的英文班，喚

---

167 〈梁熾靈牧師訪問紀錄〉，鍾卓芝整理。

168 同上。

169 〈梁熾靈牧師訪問紀錄〉，鍾卓芝整理。

170 同上；〈梁熾靈牧師訪問紀錄〉，金禧編委會、林護中學團契學生訪問及整理。

171 黃杏萍：〈我在荊冕的日子〉，20。

172 同上。

醒我要重拾書本的志願，週末團契；令本來是沉默寡言性格的我稍為開朗，主日唱詩敬拜；使煩躁心靈得安靜，每日黃昏時段成為我生命的契機。[173]

荊冕堂就是這樣與她結緣，成為撫育她成人的教會。

梁師母多謝妳，妳是我信仰路上的啟蒙導師，上帝藉着妳使我生命不至沉淪，妳也成為我屬靈生命的母親。[174]

當時，不少學生每天上課後，星期六日回到教堂參加青少年主日學、青年部詩班訓練和主日的獻詩。[175] 學校成立的五年間，有大約 45 位青年工人受洗和受堅振禮，成為牧區青年部的一分子。[176] 當中有一位梁氏姊妹，最後還成為了傳道人。[177] 另外，梁牧師憶述：

當時有一些很頑皮的男孩子。有一個姓陳的男孩，他曾爬進紗廠偷竊，但後來變得乖巧，他的家人也說他的性格改變了很多。其實，他的本性不壞，只是頑皮。我們只是幫助他改變自己。[178]

1968 年 6 月，由於中三級同學轉換工作時間（由中更轉夜更），退學者眾，故中三級亦不得不停辦。1969 年 3 月，由於同學程度參差，拼音班亦須結束。當時只餘下小四至中二五班，合共學生 70 餘人。[179] 1972 年，英文專修夜校正式結束。[180]

---

173 同上，21。

174 同上，20–21。

175 〈梁熾靈牧師訪問紀錄〉，金禧編委會、林護中學團契學生訪問及整理。

176 〈勇闖新天地之梁熾靈牧師〉，14。

177 〈梁熾靈牧師訪問紀錄〉，金禧編委會、林護中學團契學生訪問及整理。

178 同上。

179 〈夜校報導〉，《聖公會荊冕堂五周年堂慶特刊》，27。

為期兩年的免費裁剪班，也是梁牧師為服侍工友而開辦的，讓他們學習縫紉技巧，日後可到製衣廠上班。梁師母當時被調派到荃灣市中心雅麗珊社區中心四樓的女青年會工作，專門負責婦女工作包括工廠婦女，不限年齡，為她們開設三個月車縫速成班。[181] 婦女在中心用踏縫車製成衣服的一部分，便可拿回家繼續縫製，這樣，婦女便可留在家中工作，又可照顧小朋友。[182] 社區中心會舉辦公開時裝表演比賽，每間女青年會也會派人出賽，展示婦女們的縫紉班製成品。[183] 而荊冕堂內也有數位教友的專長是車縫，或是從青年會和女青年會學懂縫紉，因而在荊冕堂開設裁剪班，運作跟社區中心的相似，但參加人數較少。[184] 參加者有年輕女孩、女教友和工廠婦女，分為初班和中班，每班約 10 人。[185] 教堂內也有 3 台衣車可供婦女上課使用。[186]

1970 年，荊冕堂青年部中，百分之七十為工友，[187] 可見工友事工的果效。

3. 荃灣社區的合一服侍

二十世紀以降，普世教會合一運動的出現，旨在加強不同宗派間的聯繫和合作。[188] 合一運動催生了不少新組織，如普世教會協會

180〈梁熾靈牧師訪問紀錄〉，鍾卓芝整理。

181 同上。

182 同上。

183 同上。

184〈梁熾靈牧師訪問紀錄〉，鍾卓芝整理。

185 同上。

186 同上。

187 李國華：〈青年部〉，《聖公會荊冕堂五周年堂慶特刊》，19。

188 陸漢思：〈何以六教會建立荃灣合一社會服務中心？〉，李美賢譯，載《尋索基層組織路》（香港：荃灣合一社會服務中心，1994），235。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亞洲基督徒會議（Hong Kong Chris-Christian Council）等。[189]「合一」在希臘文的原意為「地上的整全」（the whole inhabited earths），因此合一運動旨在將人類聯合於公義與和平，關注的是整個世界和人道問題，激發教會締造更公義、更和平的社會。[190] 普世教會協會，也支援一些先驅教會的合一行動，而「荃灣大窩口、葵涌社區發展計劃」（1980 年易名「荃灣合一社會服務中心」），就是協會所資助的對象之一。[191]

查香港政府在六十年代建設荃灣社區時，由於忽略了居民的生活需要，結果導致區內的青少年嚴重缺乏文娛設施和場所，社區的犯罪與毒品問題亦趨嚴重。社區中心的設立，無疑為搬進徙置區的居民建立了支援性的社區關係網絡，未嘗不是一種穩定社會的機制。[192] 1965 年政府的社會福利白皮書中，說明社區服務的宗旨：

> 協助團體及社區，使其中個人及家庭互不相干之關係中聯系〔繫〕起來。居住在新城市及徙置大廈的居民，缺乏自然聚結力，所以極應啟發於同一個社區之感覺，使在新環境中感到安適，而逐漸成為安定之單位。新城市與正在萌芽發展中之社區……一經成立，即應開始建立社區之工作。從而防避破壞性影響及傷風敗俗之侵入，以達到政府施政之目的，使新遷入者與當地人民融和相處，而使人數眾多之新社區趨於穩定。[193]

當時已有人形容葵涌區為「帝國紅番區」，因區內黑社會分子各佔一方，而居民生活環境極差，終日為口奔馳，無力無法參與區

---

[189] 同上，235–236。

[190] 同上，236。

[191] 同上。

[192] 梁祖斌，〈社區中心所肩負使命的轉變〉，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社耕拾穗」編輯小組，《社耕拾穗》，15。

[193] 同上。

內事務，也不懂如何爭取居民權益。[194] 故此，社會急須改善青年和居民的福利與康樂措施，培養青年參與社會事務，從不同管道培育對社會的責任感和歸屬感。基督教社會服務機構，在七十年代其中一項重要發展，是部分機構嘗試以社會行動開展社區工作。[195]

早於六十年代末，荊冕堂青年部業已聯同中華基督教會全完堂及荃灣天主堂青年團契成立了「荃灣區合一運動委員會」，並已策劃了兩次三堂合辦的聯誼會。[196] 此舉不僅開創了荃灣區基督教與天主教合一運動的先河，也為日後在區內建立更廣泛的合一事工奠下基礎。

1973 年，聖公會荊冕堂、中華基督教會全完堂、衛理公會亞斯理堂、救世軍大窩口隊、基督教信義會天恩堂及羅馬天主教會葛達二聖堂聯合推行一項社區發展（Community Development）計劃，名為「荃灣大窩口、葵涌社區發展計劃」，在大窩口邨第 9 座進行社區發展工作。[197] 首位獲聘的主任為白文麗小姐（Ms Mary Beyns），並設有執行委員會（下稱「執委會」），由六間發起教會的牧者（主要為主任牧師）、信徒代表、街坊組織代表和社會服務界的專業人士所組成。[198]

成立初期的工作重點，主要是在大窩口邨第五座逐戶家訪，收集居民對區內生活的意見，並為他們舉辦「居民聯歡會」，從中物色一些對社區事務有興趣的居民，以便協助「合一」以後的宣傳和

---

194 〈區志和訪問紀錄〉，余恩明整理，轉引自余恩明：〈合一見證的殞落——地區教會合辦社會服務的個案研究〉（神道學碩士論文，香港中文大學，2006），55。

195 陳慎慶：〈香港基督教社會福利事業的發展〉，76–78。

196 李國華：〈青年部〉，《聖公會瓶冕堂五周年堂慶特刊，1970》，20。

197 〈全完堂百年歷史年表〉，《中華基督教會全完堂百週年紀念特刊，1905–2005》（香港：中華基督教會全完堂，2005），12。

198 余恩明：〈合一見證的殞落〉，42。

組織活動。[199] 聯歡會由上述六間教會的信徒負責。同時，為了鼓勵各創辦教會的教友認識社區發展的概念，一方面，執委會邀請教會教友列席執委會會議，籌辦每年一度的「合一主日」，又為牧區舉辦退修營、研討會等；[200] 另一方面，「計劃」的員工，明白執委會的用意，故此亦視培訓信徒為社區工作領袖，為工作內容之一。[201] 後來，「計劃」在社區的形象慢慢建立起來，而工作以提供服務和形形式式的社區活動為主，居民亦學習瞭解更多自己的權益，為自己的社區服務。

1976 年，執委會要求各合作教會選派一名教友代表，和邀請三名居民聯會代表，出席執委會會議。[202]

除了加強原有的區內工作，「計劃」的服務亦擴展至輔導、老人、治安、房屋政策的改善等，進一步確定「計劃」的主要工作方針為培養區內居民的社區意識。[203] 1979 年初，「計劃」更介入「協助艇戶要求上岸」的請願行動。[204] 可以說，七十年代，「計劃」的工作方向，較為注重職員自身和與居民之間的關係建立，凝聚居民一同監察政府公共政策的決策和推行，站在受助者的一方，奮勇向政府表達居民的生活需要。[205]

---

199 1973 年 8 月 22 日至 11 月 6 日職員會會議紀錄，轉引同上，6–7。

200 1974 年 1 月 22、12 月 4 日、1975 年 4 月 24 日執行委員會會議紀錄，轉引余恩明：〈合一見證的殞落〉，8。

201 1974 年 2 月 5 日職員會會議紀錄，轉引余恩明：〈合一見證的殞落〉，8。

202 1976 年 2 月 19 日、4 月 22 日執行委員會會議紀錄，轉引余恩明：〈合一見證的殞落〉，11。

203 1977 年 5 月 4 日執行委員會會議紀錄，轉引余恩明：〈合一見證的殞落〉，12。

204 1979 年 2 月 12 日、3 月 6 日至 7 月 6 日職員會會議紀錄，轉引余恩明：〈合一見證的殞落〉，13。

205 陳月娥：〈跨越九七的實踐方向〉，載《尋索基層組織路》，2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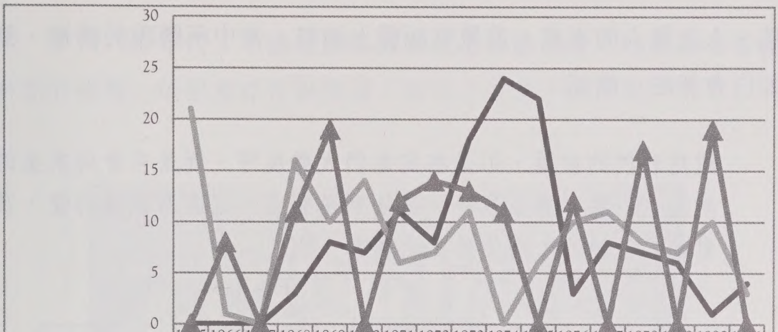
七・小結

荊冕堂自 1965 年在荃灣區創立，雖然成立之初即遇上 1966 及 1967 年兩次暴動，但在教牧同工及信徒齊心協力，加上教區及其他牧區的支持下，終於克服困難，並在 1971 年成立牧區。

從上文可見，荊冕堂從籌辦到的建立，正好見證了港澳教區由何明華會督到白約翰會督的領導，既上承了何會督關懷社會的精神，也下啟了白會督建立牧區的使命。可以說，一個以荊冕堂為中心，結合教育（托兒所〔1967–1975〕、幼稚園〔1966–〕、主恩小學〔1961–〕）及社會福利（童膳中心〔1965–1974〕、工友宿舍〔1964–1966〕、英文專修夜校〔1968–1972〕），並植根於荃灣這個新興的工業新市鎮的牧區由是建立。抑有進者，荊冕堂又與區內其他宗派共同參與社區建設的合一工作（合一社會服務中心〔1973–1997〕），為荊冕堂的歷史寫下了極為亮麗的一章。

表三整理了荊冕堂自 1965 至 1981 年間的領洗及堅信人數。在兒童洗禮方面，可見六十年代後期至七十年代中，有較顯著的增長。這相信跟其在教育方面的參與（特別是托兒所、幼稚園及小學）有關。值得留意的是，1976 年開始兒童洗禮的數目的下降，未嘗不是跟 1975 年托兒所的結束有關。至於成人洗禮及堅振禮方面，正如前述，英文專科夜校的工友，亦佔了重要的比例。隨着夜校關閉，荊冕堂的晚堂崇拜也於 1973 年停止。

另方面，綜合港澳教區議會的統計可見，主日崇拜的出席人數自七十年代起亦有較平穩的增長。打從牧區建立以降，從 1972 年的 50 人，至 1980 年的 82 人，增長率達 64%。這相信與牧區成立前後，教會業已建立了穩健的事工及牧養有關。



	1965	1966	1967	1968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1977	1978	1979	1980	1981
孩童洗禮	0	0	0	3	8	7	11	8	18	24	22	3	8	7	6	1	4
成人洗禮	21	1	0	16	10	14	6	7	11	0	6	10	11	8	7	10	3
堅信禮	0	8	0	11	19	0	12	14	13	11	0	12	0	17	0	19	0

表三：荊冕堂洗禮及堅信禮人數（1965–1981）[206]

作為一個植根社區的牧區，荊冕堂與荃灣和葵涌的社區互為緊靠。教會一直致力探索如何回應社區的需要，藉教育與社會服務以服事社區不同階層，特別是回應社區和貧苦基層的各種需要。同時，教會也因應社會的變化及自身的資源，適時檢討事工的適切，作出調整，或是結束某些服務（如託兒所、英文專科夜校），或是開展新的服務（如合一社會服務計劃）。這種回應，是基於教會看到人的需要，看到社會中有人的尊嚴和權益被剝奪，關注上帝的創

206 見荊冕堂文件：〈聖公會荊冕堂教友名冊 1–630〉；〈聖公會荊冕堂教友總名冊〉；〈聖公會荊冕堂堅振禮紀錄冊〉。〈聖公會港澳教區各堂教務統計表（1965–1966）〉，《聖公會港澳教區第廿七屆教區議會議程》，1966 年 3 月 15 日，香港聖公會檔案館；〈聖公會港澳教區各堂教務統計表（1967–1968）〉，《聖公會港澳教區第廿九屆教區議會議程》，1969 年 11 月 18 日，香港聖公會檔案館；〈聖公會港澳教區各堂教務統計表（1969–1970）〉，《聖公會港澳教區第三十屆教區議會議程》，1972 年 11 月 15 日，香港聖公會檔案館；〈聖公會港澳教區各堂教務統計（1971–1972）〉，《聖公會港澳教區第卅一屆教區議會議程》，1973 年 11 月 12 日，香港聖公會檔案館；〈聖公會港澳教區各堂教務統計表（1973–1974）〉，《聖公會港澳教區第卅二屆教區議會議程》，1975 年 11 月 3 日，香港聖公會檔案館；〈堂務統計表（1975–1976）〉，《聖公會港澳教區第卅三屆教區議會議程》，1977 年 11 月 14 日，香港聖公會檔案館；〈堂務統計表（1977–1978）〉，《聖公會港澳教區第卅四屆教區議會議程》，1979 年 10 月 28 日，香港聖公會檔案館；〈堂務統計表（1979–80）〉，《聖公會港澳教區第卅五屆教區議會議程》，1981 年 11 月 2 日，香港聖公會檔案館。

造、人之為人的本意。荊冕堂所獻上的祭，當中所體現的精神，猶如白會督的一席話：

> 我想我們的救藥，不是在向他們大聲疾呼，而是在會同宗主的同道——牧者與信眾——設法到民間去，以表彰基督的愛，及實踐非役於人，乃役於人的寶訓。[207]

	主日崇拜（人）	增長率（%）	領聖餐（人）			
			復活節	增長率（%）	聖誕節	增長率（%）
1965			0		21	
1966						
1967			0		30	+42.86%
1968			58		35	+16.67%
1969			82	+41.38%	52	+48.57%
1970			51	–37.80%	59	+13.46%
1971						
1972	50		50	–1.96%	60	+1.69%
1973						
1974	60	+20.00%	61	+22.00%	84	+40.00%
1975						
1976	68	+13.33%	73	+19.67%	82	–2.38%
1977						
1978	80	+17.65%	66	–9.59%	98	+19.51%
1979						
1980	82	+2.50%	86	+30.30%	102	+4.08%

表四：荊冕堂出席主日崇拜及領聖餐人數（1965–1980）[2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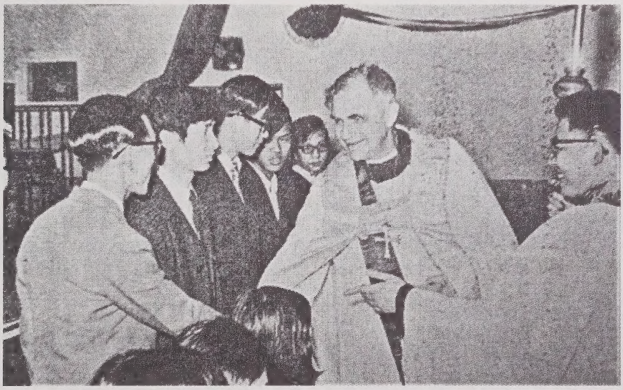
207〈白約翰會督陞座講辭〉，2。

208〈聖公會港澳教區各堂教務統計表（1965–1966）〉，《聖公會港澳教區第廿七屆教區議會議程》，1966 年 3 月 15 日，香港聖公會檔案館；〈聖公會港澳教區各堂教務統計表（1967–1968）〉，《聖公會港澳教區第廿九屆教區議會議程》，1969 年 11 月 18 日，香港聖公會檔案館；〈聖公會港澳教區各堂教務統計表（1969–1970）〉，《聖公會港澳教區第三十屆教區議會議程》，1972 年 11 月 15 日，香港聖公會檔案館；〈聖公會港澳教區各堂教務統計（1971–1972）〉，《聖公會港澳教區第卌一屆教區議會議程》，1973 年 11 月 12 日，香港聖公會檔案館；〈聖公會港澳教區各堂教務統計表（1973–1974）〉，《聖公會港澳教區第卌二屆教區議會議程》，1975 年 11 月 3 日，香

步入八十年代，不論是港澳教區或是香港社會，均面對着各種嶄新的挑戰。荊冕堂亦作好預備，迎向上主交予的使命。



上、下圖：荊冕堂按手禮，白會督與接受按手者合照（1968 年 4 月 24 日）[209]



港聖公會檔案館；〈堂務統計表（1975–1976）〉，《聖公會港澳教區第卌三屆教區議會議程》，1977 年 11 月 14 日，香港聖公會檔案館；〈堂務統計表（1977–1978）〉，《聖公會港澳教區第卌四屆教區議會議程》，1979 年 10 月 28 日，香港聖公會檔案館；〈堂務統計表（1979–80）〉，《聖公會港澳教區第卌五屆教區議會議程》，1981 年 11 月 2 日，香港聖公會檔案館。

209 梁熾靈，〈堂史〉，載《聖公會荊冕堂五周年堂慶特刊》，14。



洗禮者合照（約 1970 年）[210]



港澳教聲　　主曆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荊冕堂簡介

一九五〇年後期，香港政府為要減輕市區人口之稠密，計劃於郊區闢衞星城市，聖公會亦準備採取配合行動。何明華會督聞得大窩口徙置區之建設，於是與荃灣理民府接洽，擬於大窩口道與德士古道交界興建一教堂，而美國聖公會，牛津救濟委員會，呂明才基金及卡文特利座堂，暨衆愛主人士熱心捐助建堂費用。自一九六四年六月廿一日由鍾仁立法政牧師奠基後，經八個多月之建造工程，樓高五層之荊冕堂終於落成，當時樓下副堂為童膳中心，供應學生廉價午餐，二樓為聖堂，三樓為牧師辦公室，四，五樓則為會議室及牧師樓。

新堂於一九六五年五月落成後，何明華會督委任六位熱心教友為聖工籌備委員：鄭價華校長為主席，葉禮先生為司庫，甄韶基會吏為書記，伊雅各牧師，鄭裕國校長及屈德惠女士為委員。一九六五年二月廿一日舉行新堂第一次主日崇拜，同年四月十二日由何明華會督主持祝聖典禮。

一九六五年夏，鄺廣傑牧師被何會督委任主持該堂事務，開展艱苦之開荒工作。一九六六年暑期，鄺牧師因健康欠佳而離任，堂務改由梅志仁牧師署理，主恩學校校長及各老師亦鼎力支持，同時又得一群青年教友襄助，堂務得以順利進行。

一九六七年四月，白約翰會督委梁熾靈牧師為堂主任，班佐時會吏為義務聖品，馮家亮先生與王正芳小姐分別主持青少年部及班詩之訓練工作。在梁牧師領導與各教友齊心協力下，荊冕堂之堂務獲得平衡發展，成績斐然。一九六八年，主愛小學於石籬邨落成，校長譚翼輝牧師即積極參加與該堂事工。一九七〇年，仁立小學與林護中學在葵涌正式啓用，李冬青牧師亦經常協助荊冕堂之堂務。梁熾靈牧師在任五

荊冕堂

《教聲》第 270 期介紹荊冕堂的歷史和近況（節錄；1976）[211]

---

210 同上。

211 “Portrait of a Parish Crown of Thorns,” *Diocesan Echo* 17 (October 1968): 1.

第四章

邁向全人關懷的宣教實踐（1981–1997）

一・挑戰與衝擊：香港前途問題與教會

1982 至 1984 年間，中英兩國為香港前途問題展開多輪談判，最後於 1984 年 9 月 26 日，雙方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聲明中，列明中國政府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並規定英國政府須交還香港給中國，而中國政府於 1997 年 7 月 1 日對香港恢復行使宗主權。基本法的諮詢和起草亦在 1985 年展開，根據「一國兩制」，香港將成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訂明和承諾 1997 年後，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及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1984 年至 1997 年，香港踏入 15 年的回歸過渡期。

自中英談判以來，港人陷入「信心危機」，憂慮「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只屬虛言，對香港的前途失去信心。更有不少悲觀者，甚至視「九七」為香港的「大限」。聯合聲明簽署三年後，申請良

民證者多至約 50,000 人。[1] 1989 年八九民運，以及隨後的六四武力清場，令不少香港人的信心陷入前所未有的低谷。移民潮因而進一步加劇。據香港政府估計，1989 年的移民人數達 42,000 人，為歷年之冠。[2] 1984 年至 2001 年底，共 500,000 市民移民另覓安居。[3]

基本法在 1990 年正式頒布，1997 年生效，標誌着過渡期的結束，香港正式回歸中國，步入其歷史轉捩點。[4] 期間，中英政府就香港的民主化步伐和政策發展爭持不斷，加上社會中泛民主派對中國國內局勢的不滿情緒強烈，更令中英雙方的關係陷入僵局。[5] 政治及社會的動盪，也激發港人和新生代的政治意識。這與昔日港人傳統的政治冷感及難民寄居者心態，大相逕庭。[6] 雖然香港教會亦深受移民潮衝擊，但仍然積極反思及更新使命。1990 年，基督教協進會召開了「九十年代香港教會使命諮詢會議」，其使命宣言表示「香港教會……須在艱困和疑慮中堅定貫徹歷久不變的使命，忠於上帝所託、回應時代挑戰，使危機化為轉機」。[7]

---

1 詹德隆：〈「移民問題籠罩香港——不自由、毋寧走？」〉，《信報財經月刊》期 136（1988 年 7 月）：14–15。參徐珍妮：《回應九七——基督徒群體的見證》（香港：香港基督徒學會，1992），16–17。

2 陳昕等編：《香港全紀錄》，卷 2（香港：中華書局，1998），368。

3 梁家麟：〈「九七應變」——香港教會的社會及神學討論（1982–1997）〉，氏著：《少數派與少數主義——中港教會評論集（二）》（香港：建道神學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2），67–68。

4 參陳昕：《香港全紀錄》，2:381。

5 Steve Tsang, *A Modern Histor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237.

6 Christine Loh, *Underground Fron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9), 143; Ming K. Chan, "The Politics of Hong Kong's Imperfect Transition," in *The Challenge of Hong Kong's Reintegration with China*, ed. Ming K. Cha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7), 19.

7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編：《合一承擔牧萬民——九十年代香港教會使命諮詢會議》（香港：香港基督教協進會，1990），29。

八十年代香港聖公會也經歷了重大的轉變。1981 年，鄺廣傑當選為港澳教區首位華人主教。為回應時代挑戰，1982 年 10 月，聖公會第 36 屆教區議會首次以主題形式出現，題目為「教會增長」。[8] 鄺廣傑主教闡釋教會增長應是質量並重，唯有質的改善才能帶來量的增加。[9] 他又強調在物質和科技極度發展的現代社會，教會必須領導人們追求屬靈上、精神上的長進。[10] 如何改變人心、在社會服務上更為擴展，是教區當前關注的重點。[11] 聖公會繼續在社服和辦學中，反思當中福傳的理念和策略。

社會服務方面，1984 年 10 月，教區福利協會舉行同工進修營，探討福傳與社服的關係。[12] 而且，協會執行委員會會議中，通過了「牧養計劃」（Chaplaincy），將提供固定、有神學訓練的牧者或資深平信徒予服務機構，拉近牧區與機構的關係。[13] 福利協會福利幹事劉惠靈小姐，承認協會沒有一套完備、深思熟慮的福傳方針，繼而未能全面規劃機構的發展和資源運用。[14] 她指出：

> 服務的增多，組織的龐大，政府政策的限制，津貼條例的更改，我們漸漸失去方向。我們的敏銳力減低……漸漸地我們忘掉教會辦服務的目的與功能，雖然我們沒有因社會變遷，環境改變

---

[8] 〈83 年教區大事回顧〉，《港澳教聲》期 408（1984 年 1 月 1 日）：1；〈第三十六屆教區議會，將以教會增長為主題〉，《教聲》期 399（1982 年 10 月 30 日）：1。

[9] 〈第三十六屆教區議會，將以教會增長為主題〉，《教聲》期 399（1982 年 10 月 30 日）：1。

[10] 同上。

[11] 同上。

[12] 〈福利協會同工進修會重視傳福音與社會服務〉，《教聲》期 449（1984 年 10 月 14 日）：1。

[13] 同上。

[14] 劉惠靈：〈教區社會福利服務回顧與前瞻〉，《教聲》期 463（1985 年 1 月 20 日）：3。

去檢討及重估我們的服務，界定服務範圍去改善服務的質素，這些都是我們不願接納的實況。[15]

辦學方面，鄺主教指出現今香港的教育淪為「一種職業的訓練」，將人栽培為「一種專業的工具」，忽視培育學生自身的品格與生命。[16] 雖然聖公會已有百多年辦學的歷史，但只是「為辦學而辦學」，「未能真真正正的透過主耶穌基督的真道，去將人培育成為祂心目中的公民。」[17] 即使設有宗教科的學校，只不過將基督宗教作為學術課程，並非着重讓學生明白、體會上帝的真理，將真理化作自己生命的一部分。[18] 而且，很多聖公會學校的同工認為以辦學傳福音就是「逼人加入教會」，他指出「這手段是要不得」的。[19]

1988 年，教區總幹事徐贊生指出，教區未來的方向，「應加強傳道的擴展工作，使傳道的使命能與教育及社會福利的擴展並駕齊驅。」[20] 為加強同一社區內的牧區、傳道區、學校和社區中心的聯繫互助，推廣教會使命，協調資源運用，鄺主教認為必須將教區分區化，且設立分區會吏長。[21] 因此，自 1988 年 10 月，教區開始分為 6 區，包括香港西區、香港東區、九龍西區、九龍東區、新界西區及新界東區。[22]

1989 年 5 月，北京學運的局勢急轉直下，聖公會港澳教區於 5 月 11 日舉行中國前途及中華民族整體幸福祈禱會，鄺廣傑主教認為

---

15 同上。

16 〈從教育的失敗談聖公會學校〉，《教聲》期 497（1985 年 9 月 15 日）：6。

17 同上。

18 同上。

19 同上。

20 〈教區發展動向〉，《教聲》期 646（1988 年 7 月 24 日）：1。

21 〈秉乘傳統及配合及發展，教區派立分區會吏長〉，《教聲》期 666（1988 年 12 月 11 日）：1。

22 同上。

「中國學生能針對時弊，發出正義的呼聲是愛國愛民的行動」，亦祈求「上主賜中國的領導人有智慧、忍耐及克制」。[23] 全體出席的牧師和教友一致通過並隨即發出聲明，向中國政府發出三項呼籲——「絕對不可使用武力處理學運事件」、「從速尋求和平解決之途徑」、「立即恢復新聞開放」。與此同時，鄺主教由 5 月 21 日起辭去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及諮詢委員會的有關職務。[24] 5 月 28 日，港澳教區牧師於港九新界及澳門，舉辦主愛中華禁食祈禱會。[25] 當「六四」事件發生後，港澳教區發「沉痛哀悼」聲明——「近日北京當局以暴力鎮壓學生運動，濫殺同胞，同人等為此極感悲憤。」[26] 鄺主教在全港基督徒為中國民主運動死難同胞哀悼大會講道時指出，「當吾人看見一小撮人大權在握，操生殺大權，而十一億同胞竟無能為力的情況」，更令他明白唯有上主才能眷顧人們。[27] 對於死難者，鄺主教加以表揚，表示「人為朋友捨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更大的」。[28] 教區各堂於 6 月 7 日中午 12 時正，為死難學生和市民鳴鐘一分鐘以表哀悼。[29] 6 月 25 日荊冕堂的牧區會議，對於是否加入全港基督徒聲援中國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牧區議員決定教會不以整體參加，但鼓勵信徒以個人身分參加。[30]

同年 10 月，鄺主教在教區九龍東分區議會上樂觀展望教區未來，勉勵教友無須過份憂慮移民潮對社會所帶來的影響，因香港的

23〈聖公會牧師教友發表正義聲明〉，《教聲》期 690（1989 年 5 月 28 日）：1。

24〈鄺廣傑主教自上週一起呈辭基本法諮委及草委〉，《教聲》期 690（1989 年 5 月 28 日）：1。

25〈主愛中華禁食祈禱會〉，《教聲》期 690（1989 年 5 月 28 日）：1。

26〈沉痛哀悼〉，《教聲》期 692（1989 年 6 月 11 日）：1。

27〈主教在基督教哀悼大會，呼籲停止血腥暴行，傳福音奠民主基礎〉，《教聲》期 692（1989 年 6 月 11 日）：1。

28 同上。

29〈禮拜堂鳴鐘一分鐘，追悼學運犧牲同胞〉，《教聲》期 692（1989 年 6 月 11 日）：1。

30〈聖公會荊冕堂十九八九年第四次牧區會議紀錄〉，1989 年 6 月 25 日。荊冕堂文件。

經濟基礎仍然穩健。[31] 雖然移民潮為教會帶來隱憂，相當一部分的教友、牧者和同工離開，奉獻數字下降，他更指出教會應藉此機會向神悔改。[32] 這是因為，「在香港經濟蓬勃、教會人手充足的時候，我們的教友人數及奉獻並沒有因此大增；反之，我們往往流於因循，在得享安逸生活、分享到香港的繁榮及物質社會的同時，並未有把握機會，積極地發展我們的教會。」[33] 所以，他期望教區不應再倚賴過去已成長的牧區，應配合社會的發展，將牧區的範圍分佈至新界各部，同時在各屋邨建立傳道區，平日作幼稚園或社會服務，主日作崇拜，在未來的日子積極通力合作，擴展事工。[34]

12 月，在第 39 屆教區議會中，鄺主教表示早一年的蘭柏會議定下往後十年為聖公會的宣教時期，確定十年傳道計劃，故呼籲教區「務要傳道」。[35] 他又認為信徒的屬靈生命須具備深度，方能深入體會上帝的救恩而作出回應。[36] 1990 年 3 月，教區九龍東區教友座談會中，鄺主教指出聖公會已建立超過 100 間學校，30 多間福利中心，但牧區的發展緩慢，二十年來教友人數停留在二萬人，而實際上只有一萬多人。[37] 因此，他認為聖公會的發展重心「本末倒置」——「在福利工作上發展得太大太快，在牧區的發展卻太小太慢」。[38]

可是現在我們學校的學生團契找不到聖公會教友作主席，校方找不到聖公會教友為老師；甚至最近請校長時也可能出現要聘

---

[31]〈鄺主教展望本教區之未來發展，須設教省成為聖公宗自主成員〉，《教聲》期 712（1989 年 10 月 29 日）：1。

[32] 同上。

[33] 同上。

[34] 同上。

[35]〈我們務要傳道〉，《教聲》期 717（1989 年 12 月 3 日）：1。

[36] 同上。

[37]〈教會端賴整體教友積極事奉，信徒要主動尋找教會的使命〉，《教聲》期 732（1990 年 3 月 18 日）：1。

[38] 同上。

用非聖公會、非基督徒作校長的危機。為甚麼我們在社會前線的事工，沒有後勤的人力資源支持呢？如果這一切事工完全假託專業人士，那麼我們怎樣藉着教育及福利工作令人看見上帝的福音呢？[39]

他又提到，除了在香港社會爭取公義和民主外，改善社區居民人際關係，令香港人對生命價值的思考更豐富，也是牧區牧養的責任。[40] 此外，鄺主教強調，九十年代的重點工作以宣教為主，計劃在新發展區發展新堂。[41] 於 1991 年的第 40 屆教區議會，他又重申教區的宣教使命，「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42]

1996 年，聖公會在香港的教堂達 42 所，包括 26 個牧區和 16 個傳道區，[43] 較 1984 年增加 13 所。[44] 同年，教區共有 33 所中學、48 所小學及 45 所幼稚園，較 1984 年增幅平緩（32 所中學、40 所小學）。[45] 而福利機構達 58 間，包括 18 間老人服務中心、40 間社會服務中心，與 1984 年的 29 間相比增幅達一倍。[46]

---

39 同上。

40 同上。

41〈九十年代重點工作宣教為主〉，《教聲》期 745（1990 年 6 月 17 日）：1。

42 鄺廣傑：〈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教聲》期 823（1991 年 12 月 15 日）：1。

43 傳道區包括聖提摩太堂（呂明才中學內）、聖恩堂（聖彼得堂幼稚園赤柱分校內）、愉景灣景風堂（偉倫小學內）、愉景灣英語傳道區（偉倫小學內）、聖道堂（基孝中學內）、聖智堂（陳融中學內、聖腓力堂、西貢復活堂（三育中學內）、沙田堂（曾肇添中學內）、主愛堂（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內）、聖提多堂、靈風堂（主風小學內）、救主堂、以馬內利堂（心光學校內）、赤柱聖士提反提、屯門英語傳道區（蒙恩小學內）。參〈聖公會之港澳教區之教傳道區〉，《教聲》期 1062（1996 年 7 月 14 日）：6。

44〈港澳教區有廿六個牧區〉，《教聲》期 1061（1996 年 7 月 7 日）：1。

45 同上。

46 同上。

二・荃灣的轉型：由工業新市鎮至住宅新市鎮

七十年代晚期，中國政府實施改革開放，成立深圳和珠海經濟特區，吸引港商和境外投資。因廣東的地價、原材料和人手成本較低，且勞工充裕，香港製造業（包括不少荃灣的工廠）北遷。[47] 踏入八十年代以後，香港再次適應另一次轉型——由工業城市轉為以金融和服務業為主的都市。

荃灣和葵涌亦逐漸脱離其工業市鎮的身分，發展為以住宅為主的綜合多功能都市。[48] 鄰近荃灣地鐵站一帶的舊城區，轉為新興的商業區市中心，服務業興旺，假日時人潮湧至娛樂購物。昔日「湫隘塵囂，不可以居」的中海壩村，已成一休憩公園，其古屋群（三棟屋村）已為香港法定古蹟。[49] 1978 年，香港房屋委員會的「居者有其屋」計劃，以低於市場的價格售樓給公屋租戶和基層家庭，同時又積極興建更多屋邨，提供質素更佳的居住環境。八十年代，不少地產發展商在原工業區建造大量設計新穎的私人屋邨，如荃威花園、綠楊新邨和海濱花園等。其中，海濱花園此華美私樓，規模宏大，落成於荃灣西的紡織廠舊址，位於荃灣的最南端，即戰前德士古石油公司油庫的所在地。[50] 海濱花園的落成，象徵着荃灣已進入都市化另一轉型階段，向小康和中產的社區進發。

1985 年，新市鎮的興建轉移至新界東部和北部，開發大埔、上水及元朗為「第二代新市鎮」，「第三代新市鎮」——將軍澳、天水圍和東涌——亦相繼於 1987 年和 1991 年後動工。因此，達入八十年代，荃灣的人口增長開始顯著放緩。

---

47 可見許舒（James Hayes）：《滄海桑田話荃灣》，嘉熙語文翻譯中心譯（香港：滄海桑田話荃灣出版委員會，1999），252–253。

48 八十年代以後荃灣的發展，詳見蔡思行：《戰後新界發展史》（香港：中華書局，2016），117–121。

49 許舒：《滄海桑田話荃灣》，250。

50 同上，249。

三·荊冕堂的傳道工作

鮑彼得牧師於 1972 年 9 月 1 日起擔任荊冕堂的主任牧師，直至 1983 年 8 月，奉調到北角聖彼得堂。[51] 其後堂主任一職由林彼得牧師接任，至 1989 年 3 月林牧師離職，赴美深造。[52] 期間，廖翼顯牧師於 1985 年 7 月暫停在荊冕堂的事奉。[53] 林牧師離任後，堂務暫由蘇以葆會吏長攝理，並主持牧區會議，財政則由新成立的財務小組監管。[54] 5 月，彭榮昌會吏長通知荊冕堂，9 月起馬偉利牧師將調任堂主任，又委派茹季坤牧師為義務聖品。[55]

1. 向外傳道，教會增長

踏入八十年代，與教區重視福傳和教會增長的發展方針相呼應，荊冕堂在不同的年份設定奮興年題。例如 1988 年，牧區設定這一年為「教友增長年」，一切堂區活動均循此目標共同策進。[56] 為增加教友出席主日崇拜比率，牧區議會實施以下措施：議員以身作則勤到崇拜、多加關心教友、可用電話聯絡邀約、增強探訪、舉行分區家庭聚會崇拜。[57] 同年 11 月 26 日，荊冕堂舉行全堂佈道大會，由何世明法政牧師宣道，對象為中小學生家長、幼稚園家長、教友家屬、

---

51 〈二十五年大事記〉，載《聖公會荊冕堂銀禧堂慶特刊，1965–1990》（香港：聖公會荊冕堂，1990），14、16。

52 同上，17。

53 同上，16。

54 同上，17；〈聖公會荊冕堂一九八九年第二次牧區會議紀錄〉，1989 年 3 月 5 日，荊冕堂文件。

55 同上。

56 〈聖公會荊冕堂一九八八年第一次牧區會議紀錄〉，1988 年 1 月 3 日，荊冕堂文件。

57 〈聖公會荊冕堂一九八八年第三次牧區會議紀錄〉，1988 年 3 月 6 日，荊冕堂文件。

社區及屋邨居民等。[58] 當天參加者踴躍，慕道者 32 人，將受洗者 8 人。[59]

1991 年，荊冕堂設定全年奮興主題為「研求真理，廣傳福音」。[60] 1995 年，荊冕堂的年度策略及事工，除了設床邊佈道訓練外，以開辦 6 次信仰專題講座為主，加深教友對信仰思考的深度。[61] 1993 年，全堂的奮興主題為「紮根基督，服侍友鄰」，以全人關顧的理念服侍鄰舍。[62] 同年 6 月，荊冕堂舉行東南亞宣教學習體驗團，透過認識當地不同的地理及文化背景，讓教友學習城市及山區部落的宣教工作。[63]

荊冕堂主要以兩大重點工作達致教會增長和牧區發展。第一項是強化教友的靈性和團契生活，第二項為向外傳道。[64]

強化教友的靈性和團契生活方面，筆者稍後會在本章下一部分解說。向外傳道方面，荊冕堂積極向學生、青年、長者及病患者傳道。

向學生、青年傳福音

荊冕堂向學生傳福音，當然先向牧區學校着手。1984 年，李炳中學於梨木樹落成，使荊冕堂牧區內的中學增至兩所。九十年代，荊冕堂以兩所中學（林護中學和李炳中學）的學生為福傳的重點。首先

---

58 見荊冕堂文件：〈聖公會荊冕堂一九八八年第六次牧區會議紀錄〉，1988 年 9 月 4 日；〈聖公會荊冕堂一九八八年第八次牧區會議紀錄〉，1988 年 12 月 4 日。

59 〈聖公會荊冕堂一九八八年第八次牧區會議紀錄〉。

60 〈聖公會荊冕堂一九九一年第二次牧區會議紀錄〉，1991 年 2 月 3 日，荊冕堂文件。

61 〈聖公會荊冕堂一九九五年度牧區議會第二次會議〉，1995 年 1 月 15 日，荊冕堂文件。

62 同上。

63 見荊冕堂文件：〈聖公會荊冕堂一九九三年度牧區議會第三次會議〉，1993 年 3 月 14 日；〈聖公會荊冕堂一九九三年度牧區議會第六次會議〉，1993 年 9 月 12 日。

64 〈馬偉利牧師談及現狀及遠象〉，《教聲》期 870（1992 年 11 月 8 日）：5。

做好青年的佈道，在這方面有增長後，荊冕堂才更有實力發展小學生、幼稚園學生及家長的佈道工作。[65]

八、九十年代，荊冕堂的牧者和資深教友積極參與牧區學校的福傳工作。1985 年起，荊冕堂的資深教友黃沛宜，同時是林護中學的老師，擔任校牧一職，負責統籌學校的宗教活動，包括早禱、初級及高級基督徒團契、福音月（或福音雙周）、福音營等等。[66] 1988 年至 1991 年，林彼得牧師及馬偉利牧師在林護中學的畢業典禮領禱，也負責早會及福音月活動等。[67] 1988 年，林護中學的福音月活動中，有兩位慕道學生參加了荊冕堂青年團契。[68] 其後，林護中學有 66 人參加了荊冕堂所舉辦的三個福音營，又與李炳中學基督徒團契互訪。[69]

1984 年 3 月起，林護中學的基督少年軍參加荊冕堂主日學，作為宗教教育一級的獎章課程，為期一年。[70] 一年後，為吸引更多學生參與主日學，牧區議會於牧區內的兩所中學和四所小學多加推廣主日學活動，主日學及青年部人數繼而日漸增加。[71]

---

65 同上。

66 〈宗教〉，載《庭碩》，44；〈黃沛宜訪問紀錄〉，鍾卓芝整理。

67 〈程序表〉，載《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第十六屆畢業典禮》（香港：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1988）；〈程序表〉，載《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第十九屆畢業典禮》（香港：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1991）。

68 〈福音月〉，載《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第十六屆畢業典禮》（香港：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1988）。

69 〈宗教、德育及公民教育〉，載《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第十九屆畢業典禮》（香港：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1991）。

70 〈聖公會荊冕堂一九八四年第六次牧區會議紀錄〉，1984 年 12 月 2 日，荊冕堂文件。

71 見荊冕堂文件：〈聖公會荊冕堂一九八八年第五次牧區會議紀錄〉，1988 年 7 月 3 日；〈聖公會荊冕堂一九八九年第三次牧區會議紀錄〉，1989 年 5 月 7 日；〈聖公會荊冕堂一九八九年第四次牧區會議紀錄〉，1989 年 6 月 25 日。

1992 年，為加強福傳果效，馬偉利牧師特禮聘諸聖堂教友羅國基先生為宗教教育幹事，為期一年。[72]

1993 年 9 月，為增強堂校間的聯繫，李志剛傳道逢星期一、三、五早上於李炳中學與學生有查經活動，逢週四早上和週一下午在林護中學接觸更多學生，領同學回教堂。[73] 同時，教堂錄製初信栽培錄音帶，又新增一條電話線作「信仰熱線」之用，以電話交流增加培育學生的機會。[74] 1994 年，李主任的工作方向及重點，為「建立導師全人質素（以別於技巧），強化他（她）們的信仰生命及牧養能力」、「修補漁網：減低因人為疏忽導致的夭折、開溜、發育遲緩/不育病症」、「認定長遠培植接捧人的需要，逐步給予有系統的裝備和建立」。[75] 因此，他逐步安排林護中學及李炳中學的早晨靈修小組，成為更獨立的靈修群體，也加強靈修的深度，在小組內訓練接班人。[76] 他鼓勵更多信徒老師肩負校方的宗教活動，替兩校信徒同學安排教會生活。他也每季一次到牧區學校和友堂證道。[77]

九十年代起，牧區各學校的教職員會參加荊冕堂每年 9 月舉辦的教育主日崇拜及差遣禮，立志為主所用教育學生。[78]

為鼓勵牧區內 6 所學校宗教科名次第一的學生，荊冕堂自 1996 年起設宗教獎，向各學校捐獻，由學校頒發禮物和獎狀給該名學

---

72 見《荊冕堂堂刊》卷 27 期 16（1992 年 4 月 19 日）。

73 〈聖公會荊冕堂一九九三年度牧區議會第六次會議〉，1993 年 9 月 12 日，荊冕堂文件。

74 同上；〈聖公會荊冕堂一九九三年度牧區議會第三次會議〉，1993 年 3 月 14 日，荊冕堂文件。

75 同上。

76 同上。

77 同上。

78 黃沛宜，〈宗教〉，載《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銀禧校慶特刊》（香港：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1996），70；〈聖靈降臨後第十六主日（教育主日）聖餐崇拜程序及聖工輪值〉，《荊冕堂堂刊》，1993 年 9 月 19 日，1。

生。[79] 宗教獎設立以後，各校反應良好。[80] 1997 年，於西九龍分區少年福音營，林護中學及李炳中學共 30 多人參加，而其中一些營會導師為荊冕堂幹事和資深教友，包括李轉珍、王中鳳及黃沛宜。[81]

向長者、病患者傳福音

二戰以後逃難至香港的內地移民，他們不少親人仍身在內地，導致他們晚年生活缺乏家人照顧，孤苦無依。[82] 教區看到他們的需要，便展開了安老服務。[83] 安老服務是以「社區照顧」為宗旨，讓老人可留在所屬的社區內生活，參與區內活動，建立或維持已有的社區網絡。[84]

身為牧區聖堂，荊冕堂亦為教區的社服提供牧靈和關愛，展開一連串的長者福音工作。1992 年，荊冕堂與葵涌麥理浩夫人中心的佳音服務部合作，一同推動關顧心靈健康，一同舉辦耆樂團契。[85] 一年後，黃杏萍幹事負責外展耆老傳道事工，也承接了青衣長發安老院的恩光團契。[86] 此外，荊冕堂耆老部和婦女部每月亦定期探訪不

79 〈聖公會荊冕堂一九九六年度牧區議會第二次會議〉，1996 年 1 月 20 日，荊冕堂文件。

80 〈聖公會荊冕堂一九九六年度牧區議會第三次會議〉，1996 年 3 月 17 日，荊冕堂文件。

81 〈聖公會荊冕堂一九九七年度牧區議會第四次會議〉，1997 年 6 月 1 日，荊冕堂文件。

82 〈聖公會安老服務之起源〉，《教聲》期 873（1992 年 11 月 29 日）：6。

83 同上。

84 同上。

85 〈各項團契事工〉，《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 2013–14 年報》（香港：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2014），61；〈馬偉利牧師談現狀及遠象〉，《教聲》期 870（1992 年 11 月 8 日）：5；〈耆樂團契消息〉，《荊冕堂堂刊》，1993 年 9 月 5 日，2。

86 〈荊冕堂傳道部 1993 年度上半年事工報告〉，荊冕堂文件；〈馬偉利牧師談及現狀及遠象〉，5；〈耆樂事工〉，《荊冕堂堂刊》，1993 年 5 月 9 日，2。

同的長者中心，帶動教友關注和尊敬年老的一群。以上的外展長者事工牧區也鼓勵教友一起參與，達致群體牧職。[87]

因有些長者在交通上須有特別安排才可回荊冕堂崇拜聚會，1994年9月，一批年青教友每主日親自接送北葵涌多位老人到荊冕堂，令長者可安全回到聖堂聚會。[88] 荊冕堂也鼓勵有車的教友作同樣的服侍，而牧師、司庫及耆老部也商討訂定汽油津貼。[89] 看到耆樂團契、林護長者老人之家和葵涌區居民的靈性需要，在1996年，荊冕堂聯同其他聖公會同工於麥理浩夫人中心植堂，成立了傳道區，即今天的主愛堂（詳參下章）。

荊冕堂也關懷病患者的靈性需要。1993年12月，荊冕堂青樺團在葵涌醫院主持病人團契活動。[90] 為支持對地區院牧事工的發展，荊冕堂自1994年起，每年於牧區議會選出仁濟、瑪葵院牧牧區代表，擔任牧區與院牧部之間的橋樑，也代表牧區出席醫院的院牧事工會議。[91] 1995年，荊冕堂的年度策略及事工，除了開辦信仰專題講座，也舉行了仁濟醫院床邊佈道訓練，向青年人和有心志事奉的教友提供傳福音的訓練和實踐。[92] 1998年起，荊冕堂每月捐助仁濟醫院院牧部和瑪嘉烈醫院暨葵涌醫院院牧部，一同與聯會承擔院牧事工的異象和需要。[93]

---

87 〈馬偉利牧師談及現狀及遠象〉，5。

88 〈聖公會荊冕堂一九九四年度牧區議會第八次會議〉，1994年9月11日，荊冕堂文件。

89 同上。

90 〈葵涌醫院揚佳訊〉，《荊冕堂堂刊》，1993年11月28日，2。

91 見荊冕堂文件：〈聖公會荊冕堂一九九四年度牧區議會首次會議紀錄〉，1994年12月5日；〈聖公會荊冕堂各職位職責範圍釐訂〉，1997年12月；〈聖公會荊冕堂各職位職責範圍釐訂〉，1999年11月。

92 〈聖公會荊冕堂一九九五年度牧區議會第二次會議〉，1995年1月15日，荊冕堂文件。

93 〈聖公會荊冕堂一九九九年度牧區議會第一次會議紀錄〉，1998年12月6日，荊冕堂文件。

2. 事奉部門

傳道部、培育部

1990年，傳道部成立，由各部部長或副部長組成，讓傳道事工更容易推廣。[94] 因這一年亦是荊冕堂銀禧之年，牧區訂立此年為全堂奮興年，並以「互為肢體，彼此憑藉」為主題。[95] 1991年，荊冕堂以分區分家研經關懷小組，加強教友的凝聚力和培靈工作。[96] 同年，為栽培初信者成長，培育部及傳道部亦加快將初信者撥入慕道班。[97] 1993年，傳道部簡化其組織，由正傳道部部長、副傳道部部長、培育部部長、青少年部部長、主任牧師及傳道主任組成「核心策劃小組」。[98] 同年，傳道部舉辦復活節青年福音營「青蛙王子？灰姑娘！」，共有李炳中學及林護中學共61位同學參加，鼓勵他們活出真我。[99] 其後主要由青苗團及青穗團跟進栽培，而逢週二早上也會在林護中學開設跟進小組。[100]

培育部的工作目的，就是在教友於量的增長以外，加強其質的提升。培育部的工作主要是舉辦研經班、退修會、增購屬靈書籍、《教聲》、《基督教週報》等。[101] 在1990年，研經班研讀哥林多前書，也採用巴克萊所著的釋經書。[102] 每月兩次，每次約6至10位參加。培育部的書櫃，內有錄音帶（聖詩及培靈講道各半）、少

---

94 〈聖公會荊冕堂一九八九年第五次牧區會議紀錄〉，1989年9月10日，荊冕堂文件；參黃沛宜：〈推動堂務的支柱——傳道部〉，載《聖公會荊冕堂銀禧堂慶特刊，1965–1990》，28。

95 〈聖公會荊冕堂一九九一年第一次牧區會議紀錄〉，1990年12月17日，荊冕堂文件。

96 〈聖公會荊冕堂一九九〇年第六次牧區會議紀錄〉，1990年10月7日，荊冕堂文件。

97 同上。

98 〈荊冕堂傳道部1993年度上半年事工報告〉，荊冕堂文件。

99 同上；〈復活期福音營〉，《荊冕堂堂刊》，1993年3月28日，2。

100 同上。

101 孔慶雲：〈培育部匯報〉，載《聖公會荊冕堂銀禧堂慶特刊》，41。

102 同上。

量研經靈修書籍。[103] 訂閱《教聲》和《基督教週報》，可讓教友了解其他牧區的最新動態、其他牧者及弟兄姊妹的證道和見證，增長靈程。[104]

主日學部

1984 年年初，主日學學生共分為高低 2 班，高班導師 2 名，低班導師 4 名，輪流授課。[105] 至年底，學生轉分為 6 班，各有固定導師 1 名。[106] 青年主日學小組，由阮綺娜部長負責統籌。[107] 主日學學生平均出席人數為 30 至 40 人，暑假高峰期達至 50 人。[108] 同年 6 月至 9 月，主日學部試辦幼兒主日學。學生年齡由 4 歲至 19 歲不等，其中以 10 歲至 13 歲的最少。[109] 導師每季最少有一次事務會議，每月也有靈修分享的時間，彼此交流分享事奉的體驗。[110] 至 1988 年，主日學工作穩步向前，參加人數達 80 人，小組由 2 組增至 6 組不等。[111]

除了每個星期的主日學外，主日學部還會舉辦其他活動，豐富學生的學習，聯繫師生和學生之間的關係。[112] 1984 年，主日學部曾舉辦兩次影音活動、2 次旅行、3 次生日會、1 次書展、1 次競技同樂日、1 次宿營和 1 次訓練課程，[113] 活動有動有靜。此外，主日

---

103 同上。

104 同上。

105〈聖公會荊冕堂一九八四年第六次牧區會議紀錄〉，1984 年 12 月 24 日，荊冕堂文件。

106 同上。

107 同上。

108 同上。

109 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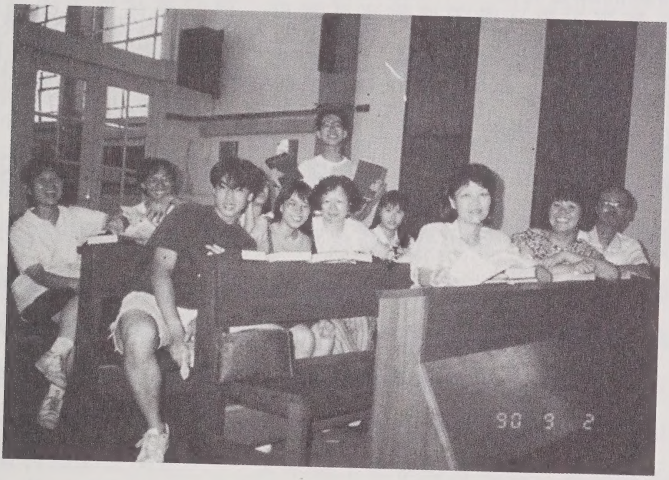
110 同上。

111 呂沛松：〈我愛主日學大家庭〉，載《聖公會荊冕堂堂慶特刊》。

112〈聖公會荊冕堂一九八四年第六次牧區會議紀錄〉，1984 年 12 月 24 日，荊冕堂文件。

113 同上。

學部也鼓勵學生參與教區的夏令會慕道營。[114] 暑假時，主日學部亦設暑期兒童聖經班，由另一籌委會在暑期內一連數天舉辦，人數由 60 至 100 人不等，對象為教友子弟和幼稚園畢業生。[115] 如過往未曾參加兒童主日學的，須收費 15 元。[116] 1992 年，主任牧師聘羅國基先生擔任宗教教育幹事，負責發展主日學。



詩班員合照（1990 年 9 月 2 日）[117]

聖樂部

聖樂部的工作主要是成人詩班和兒童詩班。

成人詩班在 1988 年時只有兩段的練詩時間：一在崇拜前一小時，主要練聲和練習當日所選唱的詩歌；二在崇拜後，除了練習下

---

114 同上。

115 林盧偉玲：〈幼兒部在主日崇拜中的活動〉，載《聖公會荊冕堂堂慶特刊》（香港：聖公會荊冕堂，1988）；〈聖公會荊冕堂一九八八年第四次牧區會議紀錄〉，1988 年 5 月 1 日，荊冕堂文件。

116 〈聖公會荊冕堂一九八八年第四次牧區會議紀錄〉，1988 年 5 月 1 日，荊冕堂文件。

117 香港聖公會荊冕堂黃沛宜弟兄所藏圖片。

主日所唱的詩歌和每月首主日的獻詩外，也有讀譜、視唱、樂理上的訓練，檢討獻唱水準，提高音樂班員的音樂水準。[118] 三年後，詩班練習轉為每週三次，包括每主日崇拜前半小時、崇拜後一小時，和每週五晚一個半小時。[119] 當時詩班員共有約 15 位，當中有林護中學和李炳中學的畢業生，其他則為成年教友。[120]

詩班的練習時間，「相信嚇怕了不少想加入詩班的主內兄姊，因為我曾聽過他們說：『唔、我很想加入詩班，但我沒有那麼多的時間去練詩啊！』試問一個沒有經過操練的士兵，怎能上戰場呢？一個沒有航海知識的人，又怎可以去掌舵呢？要做一個忠心的管家，就必須裝備好自己。」[121] 聖樂部部長蕭麗金姊妹如此說。關於詩班在崇拜中的角色，她認為：

> 詩班在崇拜聚會中擔任了兩個工作：一個是代表會眾獻上音樂的祭，另一個是幫助會眾，並和他們一同以音樂敬拜神。詩班既擔當了先知的責任，藉詩歌傳達神的訓示與慰勉，同時又有祭司的職分，以詩歌傳達神的祝福。[122]

為了鼓勵班員在音樂方面求進，詩班訂下資助計劃，資助班員出外進修。[123] 另外，詩班也有負責康樂活動的班員，為班員安排不同的音樂會、營會和戶外活動，在事奉外營造快樂的團契生活。[124]

兒童詩班於 1988 年 4 月 14 日成立，初時有 7 位成員，年齡在 7 歲至 11 歲之間。[125] 練習時間共一小時，為每週四的晚上 7 時 30

---

118 蕭麗金：〈聖樂部簡報〉，載《聖公會荊冕堂堂慶特刊》。

119 蕭麗金：〈詩班與我〉，載《聖公會荊冕堂銀禧堂慶特刊》， 33。

120 同上。

121 同上。

122 同上。

123 蕭麗金：〈聖樂部簡報〉，載《聖公會荊冕堂堂慶特刊》。

124 同上。

分至 8 時 30 分。[126] 兒童詩班的宗旨，是希望兒童能藉着詩歌認識主，以音樂訓練培養兒童有良好的嗜好和情操，帶領他們從小愛主事主。[127]

慈惠部

慈惠部的前身為福利部，負責為有需要的教友提供經濟上的支援。1992 年，牧區議會成立福利小組，成員包括司庫、財政部部長、福利部部長、正堂議長、副堂議長、主任牧師、義務聖品及杜悦顏八人，負責制定章則、複查歷年福利部所累積的金額和獨立撥作慈善用途的金額。[128] 同年，福利部成立福利基金，用作慈善福利用途，例如資助貧窮學生讀書、緊急醫療費用等。[129] 基金的資金來源，為每聖餐主日的慈善捐全數、對牧區指定的慈善捐、經牧區議會同意的特別撥款。[130] 基金的管理委員，包括主任牧師、福利部部長、正堂議長、副堂議長及正財政部長。[131] 如須動用基金，港幣$1,000 內的資助由堂主任一人決定，而港幣$1,000 以上的由堂主任及福利部部長決定。[132] 如果遇上恆常按月支出、款項過大，或堂主任及福利部部長認為有個別需要，金額可經牧區議會通過。[133]

---

125 同上。

126 同上。

127 同上。

128 〈聖公會莿冕堂一九九三年度牧區議會首次會議〉，1992 年 12 月 6 日，莿冕堂文件。

129 見莿冕堂文件：〈聖公會莿冕堂福利基金〉，1993 年 1 月 10 日；〈聖公會莿冕堂一九九三年度牧區議會第二次會議〉，1993 年 1 月 10 日。

130 同上。

131 同上。

132 同上。

133 同上。

基金賬目會在教堂會計部設一分類賬處理，年結時交由會計師審核，而基金情況必須出現於核數師報告書內。[134]

1993 年福利部曾處理幼稚園學生的求助。[135] 1994 年，福利部也資助兩位年青人一學年的費用，包括每月的補習費、交通費及日常開支，令他們可專心學業。[136]

探訪部

探訪部於 1990 年由馬牧師成立。[137] 先前荊冕堂已有不少探訪活動，但較為欠缺組織。[138] 探訪部的成立，是藉以前累積的經驗，加以組織和計劃，發揮探訪部的功能。[139] 成立首年，有 8 位姊妹加入，一起藉着探訪，使已離開或站在離開邊緣的教友重回羊欄。[140] 1994 年 9 月，教堂面臨清拆，新堂建成前教友將暫時在新地點聚會，故必須加緊教友間的聯繫網，尤其是居住於其他地區的教友。[141] 藉着牧區議會選舉及聖誕節的來臨，荊冕堂將教友的住址分組組成關懷聯絡網，或以牧區議會為首與同區教友組成聯絡網，緊密地照顧新加入的教友、恆常聚會而需關顧者、少聚會而恐將流失者和久未聚會者。[142] 聖誕探訪小組由馬牧師、李志剛傳道、黃杏萍、蘇蘊明、劉卓余和麥慕

---

134 同上。

135 〈聖公會荊冕堂一九九三年度牧區議會第四次會議〉，1993 年 5 月 16 日，荊冕堂文件。

136 〈聖公會荊冕堂一九九四年度牧區議會第八次會議〉，1994 年 9 月 11 日，荊冕堂文件。

137 劉兆華：〈今日的探訪部〉，載《聖公會荊冕堂堂慶特刊》。

138 同上。

139 同上。

140 同上。

141 〈聖公會荊冕堂一九九四年度牧區議會第八次會議〉，1994 年 9 月 11 日，荊冕堂文件。

142 同上。

思組成，探訪各區各組教友。[143] 同時，牧區議員也呼籲各部部長亦要加強部員的關懷網絡。[144]

聯誼部

聯誼部的工作，主要是藉着不同活動聯絡教友，讓不同部門的教友可緊密聯繫合作，教友可達至互為肢體、彼此憑藉的精神。[145] 聯誼部的活動較為活潑，多在戶外舉行，例如郊遊、參觀、探訪、燒烤、乒乓球比賽及聖詩卡啦 OK 比賽等。[146] 另外又有復活節、聖誕節、父親節及母親節活動。[147] 每次活動均有專車接送，適合一家大少男女老少參加，因此每次活動的參加人數十分鼎盛。[148]

3. 關顧牧養

幼兒部

幼兒部於 1986 年 6 月成立，而幼兒部的聚會時間為主日崇拜的時段。[149] 因不少教友帶同年幼子女一起參加主日崇拜時，子女不容易適應崇拜程式和環境，而且為了讓小孩子有適合的活動和學習，荊冕堂便設立了幼兒部。[150] 初期幼兒部只有 6 位導師，兩年後增至 12 位，每星期有兩位導師當值。[151] 小孩子的年紀在兩歲至八歲

---

143 同上。

144 同上。

145 張達和：〈以「動」為主的聯誼部〉，載《聖公會荊冕堂銀禧堂慶特刊》，43。

146 同上；〈聖公會荊冕堂一九九七年度牧區議會第二次會議〉，1997 年 2 月 2 日，荊冕堂文件。

147 〈聖公會荊冕堂一九九七年度牧區議會第二次會議〉。

148 張達和：〈以「動」為主的聯誼部〉，載《聖公會荊冕堂銀禧堂慶特刊》，43。

149 林盧偉玲：〈幼兒部在主日崇拜中的活動〉，載《聖公會荊冕堂堂慶特刊》。

150 同上。

151 同上。

之間，平均每星期約有20多人出席。[152] 幼兒部活動的內容主要以遊戲、繪畫、做手工、唱歌、看電影等視聽教材為主。[153] 幼兒部每星期也會講述聖經故事，包括各聖經人物和有關比喻，如耶穌、馬利亞、大衛、好撒瑪利亞人等，以深入淺出的方式，令小孩子認識信仰。[154] 除了上述活動外，每逢聖餐崇拜，小孩子在導師帶領下，進入聖堂在聖壇前接受牧師祝福。[155]

關於活動內容和教材的編排，每半個月一次的導師會議，每次會釐定雙月的教學主題和活動細節，也會交流事奉心得和事奉中的困難，彼此分擔。[156] 因每星期只有兩位導師輪值，因此導師之間的默契和聯繫十分重要。所以，為加強溝通，導師會的舉行次數也較為頻密。在林盧偉玲姊妹的帶領下，幼兒部不時舉行導師進修班。[157] 當導師不足時，部長多於婦女部物色同工以分擔工作。[158]

此外，部分導師的身分也是家長，讓家長可參與幼兒部的工作，加上幼兒部不時舉辦家庭活動，讓家長可在信仰中與小孩子一同成長，因幼兒培育工作中家長的參與至關重要。[159] 而家長導師大約每月只需出席一次，以免家長導師未能參與主日崇拜。

---

152 同上。

153 同上。

154 同上。

155 同上。

156 〈聖公會荊冕堂一九八八年第四次牧區會議紀錄〉，1988年5月1日，荊冕堂文件。

157 同上；見荊冕堂文件：〈聖公會荊冕堂一九八八年第六次牧區會議紀錄〉，1988年9月4日；〈聖公會荊冕堂一九八八年第八次牧區會議紀錄〉，1988年12月4日。

158 〈聖公會荊冕堂一九九〇年第一次牧區會議紀錄〉，1990年12月17日，荊冕堂文件。

159 黎慧明：〈婦女部概況〉，載《聖公會荊冕堂銀禧堂慶特刊》，3；〈聖公會荊冕堂一九八八年第四次牧區會議紀錄〉，1988年5月1日，荊冕堂文件。

青年部、少年部

1989 年之先，荊冕堂的青少年尚未有一牧養組織，負責統籌青年工作。青年教友只參與其他部門的活動，如主日學部及聖樂部，或參加全堂活動彼此認識。自 1987 至 1989 年，青年部及少年部重新定立工作方向，增強青年的凝聚力和對教會的歸屬感。1989 年 8 月，面對加強青少年事工發展的逼切需要，青少年團契正式成立。成立初期，青少年團契只有雙週會。至 1990 年，團契改為每週進行，形式多元化，以查經分享為主，其次包括文章閱讀、詩歌分享、角色扮演、遊戲等等。其後，團員共 20 人，恆常出席者共 10 多人，由初中生至在職青年不等。1990 年的週會主題如下：

月份	週會主題	週會內容
1 月	團契生活	/
2 月–4 月	認識我主	基督的神蹟、比喻、受難與復活
5 月–7 月	信望愛	認識信仰的真諦和青年信徒的使命

此外，青年部及少年部亦鼓勵部員參加教區的青年活動，強化牧區與教區的聯繫。1992 年，6 月，青穗團辦了宿營活動，地點在粉嶺宣道園，參加者都感到受益；[160] 1995 年，兩部舉辦了兩次懇親活動，讓青年教友的家長互相認識，瞭解子女在教會的生活。[161] 1995 年，兩部還舉行了暑假讀經營、訪宣、聯合戶外活動及聯合導師導向營等。[162]

其後，青年團契開始按齡分團，慢慢發展為青檸團、青豆團、青椒團、青穗團、青葡萄團及青葦團。1993 年，青蔥團成立，成員

---

160 Jeff：〈聖公會荊冕堂青少年部通訊〉，《心窗》卷 2 期 6（1972 年 7 月）。

161 〈聖公會荊冕堂一九九五年度牧區議會第四次會議〉，1995 年 5 月 21 日，荊冕堂文件。

162 同上。

為中七至大專以上，首次聚會為 9 月 11 日。[163] 同年，青樺團成立，由青葦團及職青合併而成，首次聚會為 9 月 19 日。[164] 1996 年，青蔥團及青葡萄團改以小組形成進行。[165] 可是，青苗團因導師問題，於 1994 年 7 月停止運作。[166]

成年部

八十年代，婦女部的人數並不穩定，有些部員已移民離開，有些是新搬進荃灣區的，有些是失去聯絡的。[167] 多年來，婦女部在鮑牧師、林牧師、鮑師母、林師母、廖師母和周吳玉如等顧問的領導下，團契生活多姿多采，活動包括家庭祈禱會、美容示範及探訪老人院等等。[168] 婦女部注重：

一、多作聚會，多作溝通：如探訪和電話問候

二、靈性栽培：舉辦家庭祈禱會，鼓勵婦女多研讀宗教書籍、相約參加退修會及佈道大會

三、舉辦專題講座，讓婦女可進修獲益

四、鼓勵婦女的子女或親友加入教會[169]

至 1997 年，成年部成立，屬下的組織有先前早已成立的婦女部、伉儷團及各小組。[170]

163〈聖公會荊冕堂一九九三年度牧區議會第六次會議〉，1993 年 9 月 12 日，荊冕堂文件。

164 同上。

165〈聖公會荊冕堂一九九六年度牧區議會第六次會議〉，1996 年 9 月 22 日，荊冕堂文件。

166〈聖公會荊冕堂一九九四年度牧區議會第六次會議〉，1994 年 7 月 17 日，荊冕堂文件。

167 黎慧明：〈婦女部概況〉，載《聖公會荊冕堂銀禧堂慶特刊》，3。

168 同上。

169 同上。

170〈聖公會荊冕堂一九九七年度牧區議會第一次會議〉，1996 年 12 月 15 日，荊冕堂文件。

1989 年前，伉儷團的工作，主要是聯絡教會內的新婚夫婦，互相探訪聯絡，舉辦小組活動。[171] 自 1989 年馬牧師成為堂主任後，十分關注伉儷團的組織和工作目標。[172] 1990 年，伉儷團的宗旨，包括讓夫婦分享家庭面對的問題與壓力、互相學習教導子女、以信仰建立美好的婚姻生活等。[173]

耆老部

耆老部在 1988 年由林彼得牧師成立。成立首年，已有 32 名會員。[174] 耆老部每月會舉行例會一次，每季舉行一次生日會。[175] 耆老部也會巡迴探訪部員，了解他們的日常生活。[176] 牧區設有敬老主日，耆老部不時在敬老主日舉行探訪老人院活動，如牧愛老人之家。[177] 耆老部每月也有一至兩次在葵芳宿舍與住宿的教友一起靈修，也有短講、祈禱、唱詩等活動。[178] 1992 年，耆老部和麥理浩夫人中心耆樂團契的團友，聯同探訪大埔恩慈老人之家。[179] 當日，荊冕堂的青少年也將禮物送到各住院長者的房間表達敬意，關懷他們的生活。[180]

---

171 霍耀全、霍周正持：〈伉儷團〉，載《聖公會荊冕堂銀禧堂慶特刊》，47。

172 同上。

173 同上。

174 王載明：〈耆老部簡報〉，載《聖公會荊冕堂堂慶特刊》。

175 路得：〈《荊》「王」之作〉，《荊情集——早晨！我們的長輩！》，期 12（香港：聖公會荊冕堂，2004 年 6 月），15。

176 同上。

177 〈聖公會荊冕堂一九九〇年第四次牧區會議紀錄〉，1990 年 6 月 3 日，荊冕堂文件。

178 王載明：〈耆老部簡報〉，載《聖公會荊冕堂堂慶特刊》。

179 〈荊冕堂耆老部主辦大埔敬老大行動〉，《教聲》期 864（1992 年 9 月 27 日）：6；〈耆老事工〉，《荊冕堂堂刊》，1992 年 6 月 14 日，4。

180 同上。

牧區議會

1995 年，為集中人力發展和關懷教會事工，牧區議會決定簡化牧區議會的組織架構，將工作內容相近的部門合併，減少對外而欠實質工作的部門。[181] 聯誼部和接待部將合併為聯誼接待部。[182] 傳道部和培育部將取消，由各部負起傳道、培育、關懷的使命。[183] 如有特殊需要，可由牧區議會推選組成臨時小組，負責策劃和籌備活動。[184] 青年部、少年部、主日學部、聯誼接待部均以召集人之名代替部長一職。[185] 崇拜事工部的工作中，新增崇拜更新的研究和訓練。[186] 此外，1995 年，牧區暫停委派代表出席合一中心及瑪嘉烈醫院暨葵涌醫院牧事工。[187]

四 · 荊冕堂的社會服務

1. 荃灣合一社會服務中心

踏入八九十年代，是香港社會福利發展的高峰期，荃灣合一社會服務中心（簡稱「合一」）獲得更多政府資助，社會也變得更開放、富裕。這驅使「合一」反思各項工作的優次和服務本身的目的和意義。

1980 年，「荃灣大窩口、葵涌社區發展計劃」正名為「荃灣合一社會服務中心」(Tsuen Wan Ecumenical Social Service Centre）。[188]

---

181 〈聖公會荊冕堂一九九五年度牧區議會首次會議〉，1994 年 12 月 18 日，荊冕堂文件。

182 同上。

183 同上。

184 同上。

185 同上。

186 同上。

187 同上。

188 1980 年 1 月 8 日執行委員會會議紀錄，轉引余恩明：〈合一見證的殞落〉，14。

「合一」的服務亦繼續拓展至老人中心、自負盈虧的牙科診所等等。它其中一重要的變革，為第一次申請政府資助而運作的「鄰舍層面社區發展計劃」（Neighborhood Level Community Development Project），進行臨時房屋區（安置區）社區發展計劃，其後進一步增加政府資助的項目。[189]

九十年代起，「合一」的發展方向有所轉變。在總幹事、執委會和員工的商議下，機構更着力於社區教育和培育社區領袖，提升勞工階層監察議會的能力。[190] 同時，「合一」又將「社區組織服務部」和「社區教育中心」合併，成立「基層發展中心」（Grassroot Development Centre），擴展服務至青年住屋、都市貧窮及在職婦女等。[191] 於 1993 至 1994 年度的工作報告，總幹事報告在「合一」以「關注民生問題為主，處理社區問題為輔」，這種「質變」顯示「合一」的發展路向由社區發展轉為民生改善。[192] 而且，機構亦鼓勵跨區合作和居民親身參與不同的爭取行動，[193]「合一」社會行動的定位更趨前線、外向。

隨着「合一」員工更積極地參與社會行動，也引起更多的爭論。當中以「天台屋事件」至為顯著。1994 年，「合一」的「舊區天台居民關注組」，由員工和數名居民組成，為幫忙荃灣區天台屋業主向政府爭取停止清拆天台屋，攔截港督投訴，聯同居民留守待封屋

---

189 1979 年 12 月 6 日、1980 年 7 月 15 日職員會會議紀錄，及 1979 年 10 月 16 日、1986 年 3 月 19 日執行委員會會議紀錄，轉引余恩明：〈合一見證的殞落〉，16。七、八十年代，社區中心為發展主流漸由自 1978 年開始出現的鄰舍層面發展工作計劃所代替。兩者相比，社區中心偏向與坊方勢力合作和在地區政治上保持中立，而鄰舍層面發展工作計劃，普遍採用一些較為「激進」的壓力團體抗議手法，為居民爭取權益。見梁祖斌：〈社區中心所肩負使命的轉變〉，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社耕拾穗」編輯小組：《社耕拾穗——社區中心的過去、現在、未來》，16–18。

190 陳月娥：〈跨越九七的實踐方向〉，載《尋索基層組織路》，239。

191 余恩明：〈合一見證的殞落〉，22–23。

192 1994 年 10 月 19 日第二十一屆週年會員大會總幹事週年年度報告，轉引同上，24。

193 同上。

宇。[194] 同年10月，關注組又進入中環美利大廈大堂抗議，封閉升降機大堂，最後得屋宇署署長答允給予居民兩個月寬限期。12月，數十名天台屋居民，連同數名「合一」員工，因強烈不滿天台屋被拆，於繁忙時間，帶同傢俱和空石油氣罐臥於中區花園道，要求直接跟屋宇署署長對話，最後警方拘捕和起訴22人。[195]

1996年7月，執委會草擬〈三條守則〉，要求員工參與社會行動時須恪守。[196] 此舉引發員工與執委間的矛盾，認為守則乃由上而下的壓制，執委與員工間失去信任。[197] 未幾，執委會解聘了6名職員，其他員工亦按章工作表示不滿。1996年，荊冕堂牧區議會一致通過退出「合一」。[198] 及至1997年1月12日，執委會宣佈解散「合一」，即時遣散大部分職員和停止所有服務，「合一」亦在此時完結它24年來的歷史使命。[199]

2. 區務促進中心

荊冕堂區務促進中心與一般社區中心的工作相若，旨在向區內居民提供文娛康樂活動，讓居民有不同層面的學習，同時鞏固區內居民的人際網絡，達至互相守望，互助互愛，改善社區氣氛。

---

194 參1997年7月8日「合一基督教發展中心舊區天臺居民關注組致立法局房屋事務委員會信函」，轉引余恩明：〈合一見證的殞落〉，27；1994年10月19日執行委員會會議文件，轉引余恩明：〈合一見證的殞落〉，28。

195 〈從合一到解散合一〉，《時代論壇週報》期498（1997年3月）。

196 內容為：（一）員工在工作時間以外，用私人時間參與社會行動，必須獲得有關機構之正式邀請及事前取得總幹事之同意，若然員工屢犯，將被解僱；（二）「合一」不贊成員工以違法手法行動，亦不會承擔法律責任及訴訟費用；（三）禁止員工採取暴力行動或言語。《三條守則》，1996年7月26日，轉引余恩明：〈合一見證的殞落〉，35。

197 1996年10月15日〈就十月二日執委會及職員交流會之同工聲明書〉，轉引余恩明：〈合一見證的殞落〉，36。

198 〈聖公會荊冕堂1996年度牧區議會第一次會議〉，1995年11月19日，荊冕堂文件。

199 同上；〈大事年表〉，《解散之後——荃灣合一社會服務中心解散事件回顧》，轉引余恩明：〈合一見證的殞落〉，37。

1987 年 2 月，牧區議會正式通過成立區務促進中心，讓牧區信徒與各社區人士有一平臺共謀社區發展，保持關係緊密。[200] 成立初期，由區務促進中心委員孔慶雲弟兄負責基本行政和招聘工作，又得麥理浩夫人中心林盧偉玲主任為中心的成立和發展中心提供意見。[201] 其後，中心由義務主任陳志滔先生處理開班計劃，又聘用任李泉珍小姐加入工作。[202] 展望未來，牧區議會希望中心的財政能自給自足。當中心的興趣班的出席人數較為穩定時，同工能領人歸主，認識信仰。[203]

區務促進中心設有一系列不同種類的興趣班，讓居民閒暇時能充實自己。興趣班包括兒童美術班、初級和高級廣告美術設計班、古箏班、空手道班、編織班、婦女健體班、美容班、童軍團、電子琴班等等。[204] 興趣班的老師全為專業人士，以合約的方式聘用。[205] 有些荊冕堂的教友也成為興趣班的老師，學習參與社區服務，將其所學用於社會。成立初期，反應踴躍，深得街坊支持。[206]

1990 年，牧區議會同意加強中心的運作，另設立以做人處事為要旨的課程，配合廣傳福音的方向，滲透信仰資訊。[207] 荊冕堂於 1991 年同意正式重組基督少年軍第廿二分隊，由區務促進中心轄辦，開辦費由牧區基金撥款。[208]

---

200 〈聖公會荊冕堂一九八七年第二次牧區議會紀錄〉，1987 年 2 月 15 日，荊冕堂文件。

201 〈聖公會荊冕堂一九八七年第三次牧區議會紀錄〉，1987 年 4 月 5 日，荊冕堂文件。

202 〈聖公會荊冕堂一九八七年第四次牧區議會紀錄〉，1987 年 6 月 7 日，荊冕堂文件。

203 同上。

204 〈聖公會荊冕堂一九八七年第三次牧區議會紀錄〉，1987 年 4 月 5 日，荊冕堂文件；關承基：〈區務促進中心簡報〉，載《聖公會荊冕堂銀禧堂慶特刊》，53。

205 〈聖公會荊冕堂一九八七年第四次牧區會議紀錄〉，1987 年 6 月 7 日，荊冕堂文件。

206 關承基：〈區務促進中心簡報〉，載《聖公會荊冕堂銀禧堂慶特刊》，53。

207 〈聖公會荊冕堂一九九〇年第四次牧區會議紀錄〉，1990 年 6 月 30 日，荊冕堂文件。

208 〈聖公會荊冕堂一九九一年第五次牧區會議紀錄〉，1991 年 8 月 1 日，荊冕堂文件。

1990 年，於荊冕堂銀禧堂慶特刊中，關承基弟兄表示中心的發展遇上各內部問題，如導師流失、財政拮据及管理缺乏經驗等，令各活動的推動上亦見困難，部分興趣小組因而暫停舉辦。[209] 有見及此，馬牧師與各牧區議員力求在有限資源內重張旗鼓，計劃設立獨立部門，聘請職員負責推動，繼續為區內居民服務。1992 年，牧區議會議決，於適合時機結束區務促進中心。[210]

3. 聖公會荊冕堂傑德牙科醫務所

荊冕堂牙科醫務所擬在 1985 年成立，但早於 1975 年鮑彼得牧師任職堂主任期間已有類似構想。當時鮑牧師和牧區議會看見區內缺乏醫療服務的需要，曾不斷考量牧區的人才、物資及財政等各方面，是否能籌辦一間非牟利，只求收支平衡的醫務所，如內科、兒科、牙科或中醫等。[211] 可是，討論多時，牧區初步構思牙科醫務所較為適合，但由於未能徵聘牙科醫生，最後暫時擱置計劃。[212]

1985 年，荊冕堂決定重新實行牙科醫務所計劃，由主任牧師林彼得牧師監督改建施工，興建醫務所。[213] 開辦首年，雖然就診人數不多，但其服務備受就診人士讚賞。[214]

由於牙科醫務所的優質服務，求診人士日益增多，包括來自港、九、新界不同地區的「求診者」。[215] 從表五可見，從 1986 年至 1994 年，到牙科中心求診人數節節上升，1994 年，累積的求診人數共 8,400

209 關承基：〈區務促進中心簡報〉，載《聖公會荊冕堂銀禧堂慶特刊》，53。

210 〈聖公會荊冕堂一九九二年第五次牧區會議紀錄〉，1992 年 8 月 16 日，荊冕堂文件。

211 周韶，〈牙科醫務所歷程〉，載《聖公會荊冕堂銀禧堂慶特刊》，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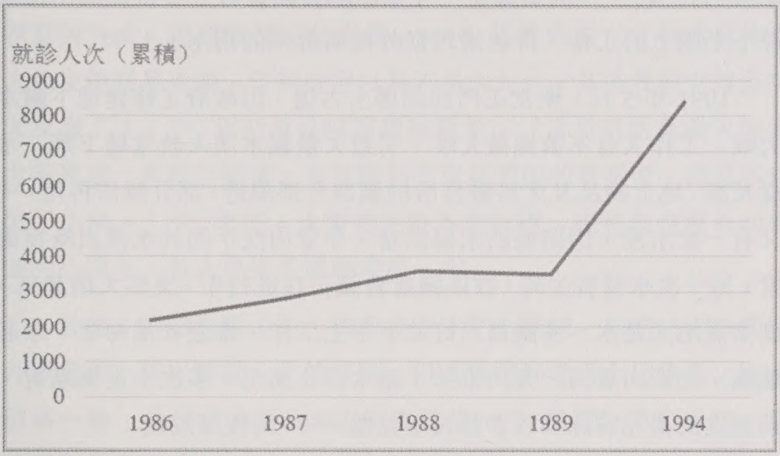
212 同上。

213 同上。

214 見荊冕堂文件：〈聖公會荊冕堂一九八六年第二次牧區會議記錄〉，1986 年 2 月 2 日；〈聖公會荊冕堂一九八六年第三次牧區會議記錄〉，1986 年 4 月 6 日。

215 〈荊冕堂牙科醫務所患者地區分佈圖〉，載《聖公會荊冕堂銀禧堂慶特刊》，52。

多人。[216] 1994年1月至8月，每天平均有10人就診，而中心也達到收支平衡。[217]



表五：荊冕堂牙科醫務所累積就診人次（1986–1994）[218]

五·「荊冕之災」：水災、火災、盜竊

「十五年來，荊冕堂歷盡了水災、火災、竊賊之災、分裂之困惑，也離不開遷拆的命運。」[219] 荊冕堂「災情」之深刻，成為馬偉利牧師即將調任到基督顯現堂和主愛堂的感言的重要一部分。

因荊冕堂附近一帶從前是大水坑，天雨來襲，雨水便迅速湧至教堂旁大窩口道的水渠。[220] 如雨水疏導不及，或渠有淤塞，便容

216〈聖公會荊冕堂一九九四年度牧區議會第八次會議〉，1994年9月11日，荊冕堂文件。

217 同上。

218〈荊冕堂牙科醫務所診治人次統計圖〉，載《聖公會荊冕堂銀禧堂慶特刊》，51；〈聖公會荊冕堂一九九四年度牧區議會第八次會議〉，1994年9月11日，荊冕堂文件。

219 馬偉利：〈荊冕情深十五載〉，《荊情集——給您的紀念冊》期11，（香港：聖公會荊冕堂，2004），21。

220〈馬偉利訪問紀錄〉，金禧編委會、林護中學團契學生訪問及整理，2015年7月6日。

易從渠內四處溢出釀成水災。[221] 幼稚園、牧師辦公室及副堂等等地方無一倖免。[222] 直至聖堂重建前，教堂水浸不下 30 次，水災已是司空見慣。[223] 周韶憶述：「牧區議會開會時，常常因為水浸而停下手頭上的工作，群起清理從外面衝進來的雨水。」[224]

1991 年 5 月，聖堂正門前的德士古道，因政府正修建地下鹹水大喉，工作人員不慎掘破大喉，引致大量鹹水湧入教堂樓下層，水深及膝，地上物品及牙科醫務所的儀器全部濕透，部分無法再用。[225] 又有一次水浸，因路底的水渠淤塞，令堂內洗手間的水湧出淹沒副堂。另一次水浸發生時，牧區議會會議正在進行中，突然大雨起來，副堂滿地又是水。各議員只好放下手上工作，捲起衣袖褲管，拿起地拖，立即向着同一方向推抹，讓水停止湧至。多次水災與應對，荊冕堂的弟兄姊妹和牧者都司空見慣。[226] 馬牧師說道：

> 不過，以上的其實還不算嚴重。最深刻的一次，大窩口道和德士古道交界鹹水管爆裂，噴出兩米高的水柱，整個禮拜堂都被波及，許多東西都被浸濕了。那次嚴重得連報紙也報導了，內容是什麼「主任牧師望見教堂浸沒，黯然神傷」。當然那絕非屬實。大家認識我也知道我很難黯然神傷，更不會為了身外物而這樣……那些水災的日子反而令弟兄姊妹更團結，大家更愛教會。[227]

---

221 同上。

222 周韶：〈男兒淚〉，《荊情集——給您的紀念冊》，期 11（香港：聖公會荊冕堂，2004），3。

223 同上。

224 同上。

225 〈聖公會荊冕堂一九九一年度第四次牧區議會紀錄〉，1991 年 6 月 2 日，荊冕堂文件。

226 馬偉利：〈荊冕情深十五載〉，21；〈馬偉利訪問紀錄〉，金禧編委會、林護中學團契學生訪問及整理。

227 〈馬偉利訪問紀錄〉，金禧編委會、林護中學團契學生訪問及整理。

荊冕堂發生火災，也絕不止一次。最嚴重的一次，是在 1992 年 10 月 19 日（星期一）晚上。周韶弟兄突然收到馬師母的來電，希望大家為教會祈禱，並向他報平安。[228] 當時教堂側兩個幼稚園課室內失火，而馬牧師正住在樓上。[229] 馬牧師說：「雖然我身處之地也能看見火頭，但初時我以為不是太大火，其後我便立即急叫大家撤了！」[230] 周韶弟兄隨即趕回教堂，「看見消防員救火的水由荊冕堂一直湧出街道。馬牧師和我望着濕透的荊冕堂，都忍不住哭了出來。」[231] 幸好，火警發生時不是深夜，課室內也沒有幼稚園的小朋友，各人也平安逃離現場。[232]

最後，消防員用了約一個多小時才把火撲滅。如果只從教堂的外觀看來，難以察覺火災的痕跡，但其實禮拜堂內全已焦黑，物品散落一地，幾乎堂內所有地方須要重修。[233] 霍耀全弟兄回憶，當他趕到教堂時：

> 過了約一小時，我們獲准進入火場。在消防員的協助下，我們拾級而上，大量污水卻彷如瀑布沿樓梯滾滾而下，地下大堂和副堂也成了澤國；矚目之處，一片混亂；講台側的兩個課室被嚴重焚毀，鄰近的木椅多張被燒成木炭……我的心在絞痛，莊嚴的聖殿，竟成了頹垣敗瓦。

當幼稚園學生得知學校被燒，也紛紛哭了。幼稚園停課雖為家長帶來不便，但沒有半點怨言，只有體諒和安慰。[234]

---

228 周韶：〈男兒淚〉，3。

229 同上；〈聖公會荊冕堂一九九二年度牧區議緊急特別會議紀錄〉，1992 年 10 月 25 日，荊冕堂文件。

230 〈馬偉利訪問紀錄〉，金禧編委會、林護中學團契學生訪問及整理。

231 周韶：〈男兒淚〉，3。

232 〈荊冕堂失火了……〉，《教聲》期 868（1992 年 10 月 25 日）：4。

233 同上。

234 同上。

當各教友知道教堂失火的消息，人人強忍淚水回到教堂，默默地在教堂各地方通宵達旦收拾打掃，又晾乾聖經、詩集、點算物品、佈置副堂。[235] 龍韶基師母得聞荊冕堂的情況，亦前來幫助修補聖經詩集。[236]「上下同心，無分你我」。[237] 馬牧師回想：

> 我們當時火災後已經很快計劃好，將副堂臨時弄得很像聖公會屬下的地方般，用絨紙佈置得很漂亮。然後有位讀中大藝術系的姊妹設計了一個標誌，上面有個十字架，又有一隻大手被火包圍着，但仍捧着一大群人，令大家都很感動。鄺大主教在火災後的那個週末，來到參加崇拜時也很感動——弟兄姊姊真的很合作，不單單是臨時放數張椅子來崇拜，而是完全符合聖公會規格的崇拜儀式和裝飾都做好。[238]

幾天內，教友轉在副堂舉行崇拜，場面感人，氣氛莊嚴。[239] 聖堂經兩個多月裝修工程後，重新啟用。[240]

> 弟兄姊妹又很快將恩賜集合，看看裝修方面有什麼需要再處理的，找來幾個判頭，一起報價。報價後就馬上開工，電光火石之間就搞好了。所以當中很多弟兄姊妹都出了不少力，默默、合一地為同一件事努力⋯⋯此外，很快還有一對夫婦（張家寶姊妹和劉卓余弟兄）在重新裝修的禮拜堂讓他們結婚。他們多慘呀！定了婚期，禮拜堂卻燒了，但很快有新裝修的禮拜堂給

---

235 馬偉利：〈荊冕情深十五載〉，21。

236〈鳴謝〉，《荊冕堂堂刊》，1992 年 11 月 8 日，3。

237〈荊冕堂失火了⋯⋯〉，《教聲》期 868（1992 年 10 月 25 日）：4。

238〈馬偉利訪問紀錄〉，金禧編委會、林護中學團契學生訪問及整理。

239 馬偉利：〈荊冕情深十五載〉，21。

240 同上；火災後第二期工程的初步計劃案，參〈聖公會荊冕堂一九九三年度牧區議會第三次會議〉，1993 年 3 月 14 日，荊冕堂文件。

他們結婚！不過這是很感動的，只是在短短兩三個月內發生的事。[241]

1993年7月，教堂遭小偷盜竊，小偷在女洗手間側鐵閘上的空隙溜進，可幸損失不大，也沒有造成大破壞。[242] 警民關係科建議教堂可加強保安措施，如在看更室內增設無線電話、對看更給予更多指導、出入通道加以管制、在物品上寫上教堂名稱等。[243] 之後，荊冕堂成立保安小組討論和跟進此事，成員為周韶弟兄、孔慶雲弟兄及馬偉利牧師。[244] 1997年7月，教堂再次發生爆竊事件，不同部門的經費和教堂一部分流動資金等遭偷去。[245] 牧區議會其後議決購買夾萬，安裝有鈎鐵絲網加強保安。[246]

「荊冕堂真是一間多災多難的教堂！為什麼？」這句說話，是筆者與教友談起荊冕堂的歷史時，最常聽見的。1992年那次火災發生後，眾弟兄姊妹問馬牧師可以為教會做些什麼，他簡單、直接地回答：

> 建築物不要緊，我們才真正是神的殿，我們是教會，是上帝的居所，只要我們更在主裏同心，更合一愛主，更努力傳福音，弟兄姊妹更彼此相愛，在困難中互相遷就體諒，這次意外未必是個損失，反是教會奮興的機會。[247]

---

241 〈馬偉利訪問紀錄〉，金禧編委會、林護中學團契學生訪問及整理。

242 〈聖公會荊冕堂一九九三年度牧區議會第五次會議〉，1993年7月11日，荊冕堂文件。

243 同上。

244 同上。

245 〈聖公會荊冕堂一九九七年度牧區議會第五次會議紀錄〉，1997年8月3日，荊冕堂文件。

246 同上。

247 〈荊冕堂失火了……〉，《教聲》期868（1992年10月25日）：4；〈誰能叫我們與主愛隔絕？火災也不能！〉，《荊冕堂堂刊》，1992年10月25日，2。

「翌晨，我重返災場。在一片灰燼中，我跟太太目睹一個奇跡：在接近起火點的講台上，仍端坐着本聖經，除卻封面的水漬，它仍完好無缺。是的，在災難中，上帝一直與我們同在！」[248] 對，在災難中，上帝一直與我們同在！

六・小結

今我謝主賜福「荊冕」廿七載，
荃灣，葵青：福音遠象漸清！
求賜信心：天天委身大使命：
宣講並栽培，關顧與服務！
懇求救主領教會面對挑戰，
靈裏合一深盼主賜復興！[249]

八、九十年代，荊冕堂在這個時期所經歷的水災、火災和盜竊之災，確實為牧者和教友留下難忘的一頁。即或面對挑戰，荊冕堂仍然積極回應教區的發展方針，探索及實踐如何將宣教牧養與社會服務整合。馬牧師這樣形容眾弟兄姊妹的事奉和成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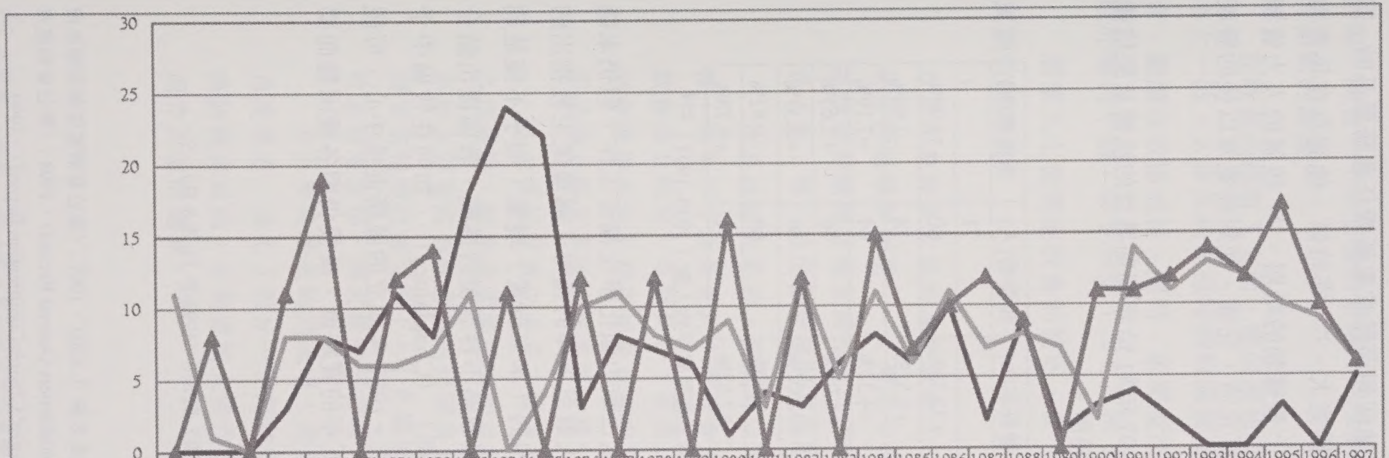
> 很欣賞該堂兄姊一起參予〔與〕事奉，而且彼此的愛心亦有所增長，尤其近幾年更感受到教會的溫情。在關懷上近來已有進步，但各教友仍須努力，因為唯有愛的教會才能增長。崇拜方面，以往較為冷淡，現今已很有敬拜氣氛，參予〔與〕及投入感加強。此外各弟兄姊妹很重視追求靈性成長及裝備自己，這點十分重要，若全體教友一起有遠象及使命感，教會才會有所增長。[250]

---

248 〈你與我們同在〉，《荊冕堂堂刊》，1992 年 10 月 25 日，2。

249 荊冕堂建堂 27 週年（成立牧區 20 週年）堂慶詩節錄，孔繁漢詞。〈荊冕堂建堂 27 週年（成立牧區 20 週年）堂慶詩〉，《荊冕堂堂刊》，1992 年 5 月 17 日，3。

250 〈馬偉利牧師談及現狀及遠象〉，5。



	1965	1966	1967	1968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1977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孩童洗禮	0	0	0	3	8	7	11	8	18	24	22	3	8	7	6	1	4	3	6	8	6	10	2	9	1	3	4	2	0	0	3	0	5
成人洗禮	11	1	0	8	8	6	6	7	11	0	4	10	11	8	7	9	3	12	5	11	6	11	7	8	7	2	14	11	13	12	10	9	6
堅信禮	0	8	0	11	19	0	12	14	0	11	0	12	0	12	0	16	0	12	0	15	7	10	12	9	0	11	11	12	14	12	17	10	6

表六：荊晃堂洗禮及堅信禮人數（1965–1997）

在 1992 年，廖翼顯牧師回想他回到荊冕堂重新擔任義務聖品時，認為馬牧師在現有的基礎上發揚光大。[251] 那時候，他認為在年青教友人力方面，是荊冕堂歷史上最蓬勃的時期。[252] 牧區的人力資源和組織，也較以往任何時期更充沛、完備。他對荊冕堂以後的發展甚為樂觀。[253]

表六整理了 1965 年至 1997 年約 30 年間荊冕堂的洗禮及堅信禮人數，有助我們了解牧區的發展。

	主日崇拜(人)	增長率(%)	領聖餐(人)	增長率(%)
1990	82	/	71	/
1991	108	+32.38%	80	+13.97%
1992	118	+8.52%	78	–2.98%
1993	113	–4.32%	84	+7.19%
1994	115	+1.98%	86	+2.63%
1995	129	+12.02%	89	+3.37%
1996	121	–5.90%	88	–0.82%
1997	124	+2.82%	94	+6.78%

表七：荊冕堂出席主日崇拜及領聖餐平均人數（1990–1997）[254]

從表七可見，雖然荊冕堂已致力強化學生福音工作，但仍未能扭轉七十年代中葉孩童領洗人數呈下降的趨勢。鄺廣傑主教指出的教區與教育及福利工作上出現的「本末倒置」現象，似乎不僅是荊冕堂要面對的困難，也是港澳教區不容忽視的挑戰。教區提出結合福傳與社會服務的「牧養計劃」（Chaplaincy），如何在牧區中予以落實，仍須荊冕堂實切探索。1987 年成立的區務促進中心，可說是牧區的重要嘗試，但經過五年的實踐後，最後仍因各種困難而要

251 〈義務聖品廖翼顯牧師的話〉，《教聲》期 870（1992 年 11 月 8 日）：5。

252 同上。

253 同上。

254 見荊冕堂文件：〈聖公會荊冕堂教友名冊 1–630〉，1965；〈聖公會荊冕堂教友總名冊 S.K.H. Crown of Thorns' Church Parishioners General Record〉，1998；〈聖公會荊冕堂堅振禮紀錄冊 S.K.H. Crown of Thorns' Church Confirmation Record〉，1999。

結束。而合一中心引發的爭議，也反映出牧區在社會行動的路線方面面對的困擾。

在牧區內部事工方面，堅信禮和成人洗禮的人數相若，趨勢基本上一致，大多反映在這時期牧區接受洗禮的成人，得到不錯的培育，繼續在牧區成長。同時，荊冕堂出席主日崇拜及領聖餐平均人數亦維持平穩，似乎未受「九七」和「六四」因素影響。

展望九七後香港教會的發展，在《荊冕堂銀禧堂慶特刊》，廖翼顯牧師寫道：

> 百多年來許多宗派的基督教會〔，〕先後在香港分別憑着不同背景的組織和制度〔，〕建立了福音的基地，在九七年後這些基地若要繼續發揚宣講福音的使命〔，〕和扮演時代的先知角式〔色〕時，恐怕都會遭到某些阻力和困擾……
>
> 作為特區的香港，雖然可以享有宗教自由，教會日後的運作，也免不了逐漸受到中國教會的影响〔，〕而最終要與中國教會結合起來。這種契合，若是上帝旨意，將會是大勢所趨，教會若要存在，都得接受這個事實，正如當年大陸的教會不可能逃避十年文革的火煉事實一樣……
>
> 九七後的荃灣仍將是工業重鎮，荊冕堂仍會提供社區內的各項服務，特別是蜚聲區內的幼稚園和醫療工作，今天的青少年部友將會成為教會內的棟樑肩負各項聖工，昔日曾經積極發揮管家精神的值理們〔，〕更繼續忠心耿耿的支持和協作〔助〕牧者發展堂務，接受嚴峻的考驗，克勝各種挑戰和試探……
>
> 廿五年在歷史的洪流中，是微不足道的一剎那，但在人的角度來看，活上了四分一世紀的青年，無論心理生理狀態，都應該穩重成熟，在動盪的大時代裏，對生命的取向應有所認識而作正當的選擇。[255]

---

255 廖翼顯：〈展望〉，載《聖公會荊冕堂銀禧堂慶特刊》，10。

邁向九七，荊冕堂和教區要走的路仍是荊棘滿途的。在危機和挑戰中求變，發展堂、校、社會服務協作的新方向，是荊冕堂和教區在千禧年代的任務。

第五章

迎向新時代的宣教使命

（1997–2015）

一・「九七」回歸後的香港與教會

1.「九七」後的危機與香港教會

後「九七」的香港，政府經歷了一波又一波的管治危機。回歸以後，社會矛盾越趨激烈，貧富懸殊加劇，經濟發展模式持續單一，均反映政府的管治及施政失誤。持續升溫的中港矛盾，增添港人恐懼，並憂慮一國兩制是否早已名存實亡。

先是 2002 年，政府展開《基本法》第 23 條立法程序及諮詢，引起社會極大爭議，近 50 萬市民於 2003 年 7 月 1 日上街遊行，強烈反對惡法通過。2009 年的反高鐵運動，令不少香港青年覺醒，參與社會運動。2013 年的葵青貨櫃碼頭工運中，工人罷工 40 日，更為香港戰後時間最長的罷工運動。2014 年 8 月 31 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為 2017 年香港特首普選方法設下框架，加上「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的宣傳效應，引發 9 月 26 日至 12 月 15

日的佔領運動。佔領運動更成為香港史上最大規模的公民抗命運動，市民佔領中環、旺角及銅鑼灣的中心地帶，要求撤回「八三一決定」，爭取無篩選的真普選。一連串的社會運動令不少港人覺醒，開始反思更多本土議題。及至 2016 年 8 月，政府統計處公佈，年中共有 18,900 名香港居民移居外地，與 2015 年同期比較增加約 18 倍。[1] 移民顧問公司指，所辦理的移民個案多以中年、中產及有孩子的家庭為主。[2]

「九七」後，香港教會仍享有宗教和集會自由，但教會的「負增長」現象為教會的發展響起了警號。香港教會更新運動公佈調查結果，指出 1989 年至 1999 年，香港華語堂會的數目由 872 間增加至 1,129 間，增幅為 29.5%。[3] 至 2014 年，堂會數目為 1,287 間，較 1999 年增幅為 14.0%，增長速度放緩。[4] 值得注意的是，整體會眾和崇拜平均出席人數，與 10 年前相比只有輕微增長。1994 年至 1999 年，各項會眾人數甚至下跌，如 1999 年的崇拜人數為 175,571 人，較 1994 年下跌 9.7%。[5] 報告指出，「教會必須正視信徒流失的現象及反省現今牧養信徒的問題」。[6] 普查運動主席陸輝牧師，不諱言這個現象反映「教會失卻發展方向（亦可說教會正在尋找新的方向）的結果」。[7] 2009 年至 2014 年間，崇拜人數每年平均增

---

1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府統計處：〈二零一六年年中人口數字〉，2016 年 8 月 11 日，https://www.censtatd.gov.hk/press_release/pressReleaseDetail.jsp?charsetID=2&pressRID=3867。

2 〈人心思離，移民外地數字攀升〉，《東方日報》，2018 年 10 月 1 日，https://hk.news.yahoo.com/人心思離-移民外地數字攀升-024148201.html；〈港人移民加國 10 年增 88%，多青年專業人才，二次回流，加國受益，香港面臨人才流失〉，《明報》，2018 年 8 月 19 日，http://www.mingpaocanada.com/tor/htm/News/20180819/taa1_r.htm。

3 胡志偉、劉梓濠編：《2014 香港教會普查簡報》（香港：香港教會更新運動，2015），11。

4 同上。

5 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編：《廿一世紀教會牧養與挑戰——九九香港教會普查報告及回應》（香港：香港教會更新運動，2002），9。

6 香港教會更新運動：《廿一世紀教會牧養與挑戰》，13。

7 同上。

長 0.9%，增長輕微。[8] 而且，25 歲至 44 歲的會眾總人數，由 2009 年的 102,500 人減少至 84,974，而 45 歲或以上的會眾總人數持續增加，反映教會的老齡化現象加增。[9]

聖公會港澳教區在九十年代以後，積極推動植堂，成立新傳道區，增快宣教工作的步伐。自 1999 年教省成立後，促進同一牧區內教堂、學校與社會服務單位之間的合作聯繫，讓三者之間協作發展，在社區中做好見證。2006 年 12 月底，鄺廣傑大主教榮休。鄺保羅牧師於 2007 年 1 月獲選香港島教區第二任主教，其後再當選為香港教省主教長。[10] 總括來說，自 1997 年，香港聖公會的工作，主要是成立教省，並檢討宣教策略和方向。

2. 從教區到教省

普世聖公宗的體制中，教省為一獨立自治單位，而教省須由多個教區組成，各教區按照其憲章運作。1989 年初，港澳教區信眾認為有必要向成立教省的方向邁進。因自從 1959 年 7 月港澳教區成立，教區並不隸屬教省，而是由坎特伯里大主教以全世界聖公會主席的職權，為教區的轄治權人。1962 年，東南亞各教區組成東南亞地區議會，港澳教區是成員之一。其後，自 1990 年，東南亞地區議會的成員包括菲律賓、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等，紛紛成立教省，台灣亦可透過美國聖公會參與普世聖公宗的活動。因此，港澳教區的處境變得「孤立」，須思考前路如何。[11] 不同路向的發展如下：

---

[8] 胡志偉、劉梓濠：《2014 香港教會普查簡報》，25。

[9] 同上，28–29。

[10] 〈香港島區第二任主教陞座禮崇拜〉，《教聲》期 1610（2007 年 1 月 14 日）：1；〈鄺保羅大主教當選後致辭〉，《教聲》期 1614（1995 年 2 月 11 日）：1。

[11] 〈鄺主教展望本教區之未來發展〉，《教聲》期 712（1989 年 10 月 29 日）：1。

一、組織教省；

二、要求坎特伯里大主教管理教區，但卻有違「九七」後香港回歸中國的方向；

三、加入其他教省，但因語言、文化、政治及經濟上的差距，有許多不便；

四、與香港其他宗派合併，有關建議以往曾作嘗試，最後胎死腹中；

五、參加中國大陸的教會；

六、自行獨立，不屬於任何組織。

當中以組織教省，最為可行和合理。[12] 1991 年，第 40 屆教區議會議決將港澳教區擴展為教省，而教省將為普世聖公宗群體內自治的一員。1993 年，教省委員會公佈報告書初稿，提議教省下轄香港島、東九龍及西九龍教區。[13] 這議案其後於同年 12 月的第 41 屆教區議會通過。[14] 1995 年 7 月，立法局通過〈香港聖公會條例〉、〈香港聖公會基金條例〉及〈香港聖公會管業委員會條例〉。[15] 10 月，蘇以葆和徐贊生分別當選為西九龍和東九龍分區主教。[16] 11 月 30 日，鄺主教為兩位新主教主持分區主教祝聖禮。[17] 1998 年 4 月，鄺廣傑當選為香港聖公會教省大主教。[18]

12〈鄺主教在九龍東教友交流會致詞〉，《教聲》期 712（1990 年 3 月 18 日）：1。

13〈教省委員會諮詢牧區檔（一）〉，《教聲》期 896（1993 年 5 月 9 日）：4。

14〈第四十屆教區議會已順利完成〉，《教聲》期 926（1993 年 12 月 5 日）：1。

15〈立法局三讀通過教省條例草案完成立法程式〉，《教聲》期 1013（1995 年 8 月 6 日）：1。

16〈教區特別議會已順利選出分區主教〉，《教聲》期 1021（1995 年 10 月 1 日）：1。

17〈鄺主教主持分區主教祝聖禮講道〉，《教聲》期 1031（1995 年 12 月 10 日）：1。

18〈要將大主教的使命和職份做好〉，《教聲》期 1614（2007 年 2 月 11 日）：1。

同年 10 月 5 日，香港聖公會教省正式成立，以「宣教服務弘主道，同步邁向新世紀」為口號。[19] 成立之時，教省有 45 所聖堂，當中包括 26 個牧區和 19 個傳道區。[20] 教育方面，教省屬下有 40 多間幼稚園、48 間全日制及半日制的津貼小學、33 間中學。[21] 社會服務方面，教省有超過 180 個服務單位，其宣教事工朝向多元化發展。[22]

新教省成立後，教省隨即探討未來 5 年的發展計劃，於 1999 年 8 月展開諮詢。2000 年初，教省推出《香港聖公會廿一世紀遠象——五年計劃政策文件》，確立香港聖公會的使命——「植根香港，面向祖國」、「弘揚主道，牧養群羊」、「全人教育，培養人才」、「社會服務、全面照顧」，也勾劃未來 5 年的發展藍圖。[23] 五年計劃提及香港聖公會此時只有 28,000 名教友，教會應更努力播種和收割，重整傳道的目標和策略，動用所有資源領人歸主。[24] 教會亦計劃提供以人為本和創新性的社會服務，推動社區照顧，並探討發展醫療事工和環保事工的可能和計劃。[25]

2008 年，教省成立十周年，當時正值金融海嘯。十周年感恩崇拜中，鄺保羅大主教強調教省的使命，就是將福音和主耶穌的愛傳開，使人不但能看見眼前變幻無定之物，更有遠象認識和信靠那賜永恆食物的主。[26]

19〈宣教服務弘主道，同步邁向新世紀〉，《教聲》期 1181（1998 年 10 月 25 日）：3–4。

20 同上。

21 同上。

22 同上。

23〈香港聖公會廿一世紀遠象——五年計劃諮詢文件〉，《教聲》期 1225（1999 年 8 月 29 日）：2。參《香港聖公會廿一世紀遠象五年計劃政策文件——邁進千禧，榮主牧民》（香港：香港聖公會，2000）。

24〈香港聖公會廿一世紀遠象〉，2。

25 同上。

26〈教省成立十周年，實踐遠象，宏揚福音傳愛心〉，《教聲》期 1704（2008 年 11 月 2 日）：1。

3. 西九龍教區成立

1991 至 1998 年 7 年間，港澳教區積極籌備重組，並分為香港島教區、東九龍教區、西九龍教區及澳門傳道地區。1998 年首 6 個月為三教區成立的過渡期。[27] 3 月，西九龍臨時教區議會舉行首次會議，議決和訂定 1998 年 10 月 18 日為西九龍教區成立日。[28] 各教區和傳道地區有其詳細分界，而西九龍教區包括元朗區、屯門區、荃灣北、葵涌區、深水埗區及油尖旺區。[29] 教區將荃灣區分為荃灣北和荃灣南兩區，荃灣北是指由荃灣北面至荃灣市中心，屬西九龍教區；荃灣南是指大嶼山北部及馬灣，屬香港島教區。[30]

西九龍教區成立崇拜中，蘇主教以「勇敢前行，愛主事主」為講題。[31] 他說到西九龍教區在聖路加日成立，別具意義。[32] 路加所宣稱的耶穌，是救主、統治者，有憐憫公義，打破藩籬，接納邊緣人。[33] 他也是保羅的親密戰友，不辭勞苦，甘苦與共。[34] 上帝命信徒將福音傳開，關心、服務所有人，特別對弱小加以個別關懷、全面照顧。[35] 西九龍教區應以已有的牧區、傳道區、學校及社服機構，使地區居民感受到上帝的愛，支援社會的需要。[36] 蘇主教於 2012

27〈教區歷史〉，香港聖公會西九龍教區網頁，2016 年 10 月 13 日瀏覽，http://dwk.hkskh.org/aboutus.aspx?id=107&lang=2。

28 同上。

29《聖公會西九龍教區憲章及規例》，荊冕堂文件，1998 年 11 月 1 日，46。

30 同上。

31〈勇敢前行，愛主事主〉，《教聲》期 1181（1998 年 10 月 25 日）：6。

32 同上。

33 同上。

34 同上。

35 同上。

36 同上。

年 1 月 1 日榮休，陳謳明法政牧師於同年 3 月接任西九龍教區主教一職。[37]

2014 年 11 月，西九龍教區召開第 9 屆教區議會會議，商討教區如何協調教省實踐《香港聖公會教省教育政策文件》和《教省社會服務政策文件》。[38] 陳謳明主教認為重視牧養和支持屬下學校及社會服務機構，是牧區和所有教友的責任。[39] 他再次強調「牧區」的精神：

> 一個「牧區」、「傳道區」並不是單指一間禮拜堂，而是指禮拜堂所座落的整個地區！關心所在區域是每間禮拜堂的責任，禮拜堂所在區域的聖公會學校和社服單位的關係，並不是「主」和「客」，而是禮拜堂的一部分，彼此是一家人，禮拜堂牧養關懷的對象，不單是禮拜堂四堵牆之內的教友，也包括這些學校和社服單位的持分者、服務使用者。[40]

堂、校、社服三頭馬車，應互相啟發，從中尋找創新的發展方向。[41]

4. 宣教、教育與社會服務

2002 年 9 月，在聖公宗諮詢議會第 12 屆會議，鄺主教提及香港聖公會面對的挑戰。[42] 教會運作上，香港聖公會已發展一套完整的運作架構，亦致力將教會事工配合社會發展的轉變。[43] 他認為香港聖

---

37 〈通告——蘇主教榮休後安排〉，《靈西集——香港聖公會西九龍教區》期 46（2012 年 2 月）：1；〈陳謳明法政牧師膺第二任主教〉，《教聲》期 1843（2011 年 7 月 3 日）：1。

38 〈西九龍教區議會會議探討堂校社服協作路向〉，《教聲》期 2019（2014 年 11 月 16 日）：1。

39 同上。

40 同上。

41 同上。

42 〈香港聖公會面對的挑戰〉，《教聲》期 1386（2002 年 9 月 29 日）：8。

43 同上。

公會在宣教以外的地方發展很好，尤其是在教育和社會服務方面，承擔了原是屬於政府的工作，似乎有所失衡。[44] 有見及此，聖公會於九十年代強化傳道宣教的工作。

1997 年後，特區政府多次推行教育改革，又改變社會福利資助政策。雖然基督教會和天主教會是政府長期以來的協作夥伴，但其辦學團體及社會服務單位仍一次又一次深受衝擊。[45] 當中教育制度翻天覆地的改變，亦引起激烈的爭議。這個情況，促使教會重新思考其辦學及提供社會服務的理念和使命。[46]

於 2003 年和 2004 年，聖公會教育幹事夏永豪及聖公會管業委員會，就教育改革發表意見，不滿新教育條例推行草率，語文政策混亂，破壞教會與政府的夥伴關係。[47] 夏永豪更指出其夥伴關係正面臨崩潰：

> 在九七以前，作為辦學夥伴，教會的聲音是被尊重的……不過這幾年的經驗顯示，政府不但對教會刻意冷落，把教會邊緣化，甚至拉攏其他團體打擊教會。在這樣的環境下，一些教會人士便重新思想教會辦學的角色，是「進」，是「退」，還是「守」呢？[48]

2006 年 6 月，鄺廣傑大主教在聖公會小學監理會暨校長會周年聚餐致辭，批評新條例限制辦學團體（即教會）直接管理學校，大小事必須由法團校董會通過，「無權管理學校，卻要負法律責

---

[44] 同上。

[45]〈教會對香港發展承先啟後的貢獻——我們當走的路〉，《教聲》期 1646（2007 年 9 月 23 日）：6。

[46] 同上。

[47]〈「聖公會應繼續辦學嗎？」（上）〉，《教聲》期 1438（2003 年 9 月 28 日）：3；〈香港聖公會管業委員會對教育修訂條例發表意見〉，《教聲》期 1472（2004 年 5 月 23 日）：1。

[48]〈「聖公會應繼續辦學嗎？」（上）〉，3。

任」。[49] 2007 年 4 月，鄺保羅大主教於聖公會小學第 130 周年感恩崇拜中講道，談論聖公會小學存在的目的和意義：

> 不論學校數目是增或減，都不能失卻聖公會小學的質素——生命的質素。辦學的目標乃是要幫助青少年人在學習、工作、生命中尋找真正的意義，故教學不是為了生存而生存，而是提供屬靈生命的培育。[50]

2010 年 11 月，聖公會中學宗教教育研討會上，聖公宗（香港）中學委員會主席梁貫成承認外間感到聖公會學校宗教氣氛平淡，不同學校的宗教氣氛差異很大，這是因為教會從沒向學校管理層表達對宗教教育的期望。[51] 鄺保羅大主教表示，教省希望未來在每間學校設校牧，聆聽學生及教職員的心聲，而教省總議會將會深入研究聖公會的教育政策。[52]

除了教育政策外，教省亦調整教堂與社會服務單位的關係。2004 年 3 月，教省舉辦了「堂與社服宣教模式研討會」。[53] 研討會的演講嘉賓，為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系主任阮曾媛琪博士，她指出聖公會是全港三大服務機構之一。[54] 教省福利協會擁有 200 個以上的服務單位、1,500 名員工，服務人次達 100 萬以上。[55] 但是，教堂與服務單位「明顯分割，各自為政」。[56] 她建議教省應將兩者整合，以基督為主帥，以同一異象，接觸生命，加強彼此的夥伴關

---

49 〈聖公會小學周年聚餐會鄺廣傑大主教致訓辭〉，《教聲》期 1583（2006 年 7 月 9 日）：1。

50 〈聖公會小學特色是提供優良宗教教育〉，《教聲》期 1621（2007 年 4 月 1 日）：1。

51 〈教省重視學校宗教教育，總議會將重點討論辦學策略〉，《教聲》期 1769（2010 年 1 月 31 日）：6。

52 同上。

53 〈探討教會與社會服務的關係〉，《教聲》期 1464（2004 年 3 月 28 日）：1。

54 同上。

55 同上。

56 同上。

係。[57] 2007年，聖公會教省社會服務專責委員會和聖公會福利協會合辦「關懷的教會」先導計劃。[58] 計劃的目標，是在牧區和傳道區組織社會關懷隊，推動教友在所屬的牧區進一步關懷弱勢社群，加強牧區或傳道區與社會服務機構的聯繫，使地方教會成為真正的「牧區」。[59] 教省社會服務專責委員會主席徐贊生主教指出，當政府資助的社會服務，未能及時和適切地回應社會的急劇轉變時，教會可以自身的資源，協助教會的社會服務機構，從事實驗性的社會服務工作。[60]

二·「荊冕之災」：聖堂重建

跨過九七後，荊冕堂首先面對的挑戰，是聖堂的重建。在《聖公會荊冕堂聖堂重建特刊》內，提及了是次重建的背景：

> 大家還記得我們為什麼要清拆重建嗎？政府因要改善德士古道交通，向我們收回三分之一土地，令我們被迫清拆重建。我們縱使萬分的不捨得，當我們考慮我們的重建有助於大窩口的發展及荃灣交通的改善時，只好盡量配合政府的安排。但是，當我們展開清拆工作後，政府突然改變主意並擱置原本改善德士古道交通的計劃。換句話說，我們本可以不用拆堂和重建。

---

57 同上。

58 〈「關懷的教會」計劃〉，《教聲》期1617（2007年3月4日）：2。

59 同上。

60 同上。

「真是一個『笑話』！」吳永順（則師）苦笑說。

「是一個笑不出來的『笑話』！」郭家俊（則師）無奈地說。

的確如此，真的笑不出來，相信大家望着經已被拆毀的教堂，除了嘆一聲奈何外，可以做的似乎只是硬着頭皮去完成的重建工作。[61]

1999 年 7 月 25 日，荊冕堂於舊堂址舉行了搬遷前的感恩崇拜，恭請蘇以葆主教主禮聖餐。[62] 同年 8 月至 2002 年 6 月，荊冕堂進行原址重建工程，期間轉至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為日常辦公的地方，該中心的林護堂為主日崇拜的地點。[63]

荊冕堂的弟兄姊妹，就在中心如常舉行各部的聚會，也渡過了荊冕堂 35 周年堂慶的大日子。[64] 主日崇拜前，彼此同心協力擺放坐椅和禮文書，在患難中團結起來。[65] 2000 年 6 月 25 日，是新堂奠基禮之日，由鄺廣傑大主教及蘇以葆主教奠基。[66] 荊冕堂的重建過程，的確迂迴曲折、困難重重，可謂一「災」。

---

61 李廣平：〈困難重重〉，載《聖公會荊冕堂聖堂重建特刊》（香港：聖公會荊冕堂，2002），18。

62 〈荊冕堂重建籌款演藝晚會，九月十一日荃灣會堂舉行〉，《教聲》期 1226（1999 年 9 月 5 日）：1。

63 〈在麥理浩的日子〉，載《聖公會荊冕堂四十周年堂慶紀念特刊》（香港：聖公會荊冕堂，2005），57。

64 同上，58。

65 同上，57。

66 〈莊嚴優美的教堂〉，載《聖公會荊冕堂四十周年堂慶紀念特刊》，60；〈荊冕堂重建聖堂奠基，重建後將服務荃葵青區居民〉，《基督教週報》期 1875（2000 年 7 月 30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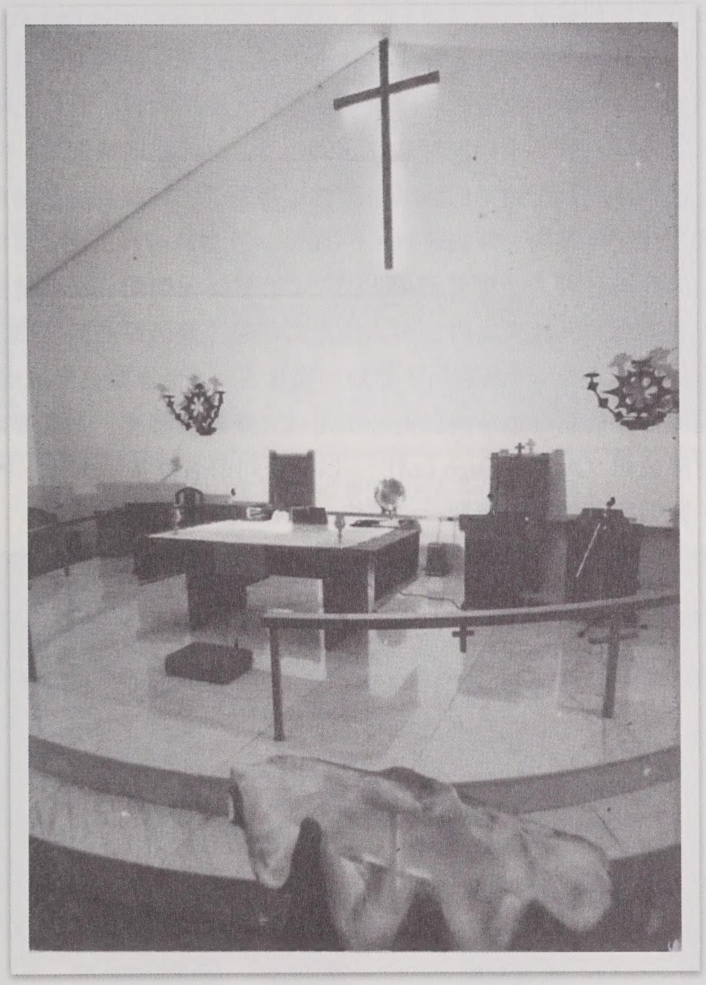


青少年部在副堂舉辦過不少活動，眾人都留下深刻的回憶



1999 年搬遷前最後一次的牧區議會[67]

67 以上兩幅均為香港聖公會荊冕堂所藏圖片。



拆卸前的聖堂內部[68]

68 香港聖公會荊冕堂所藏圖片。

1. 重建之旅困難重重

當政府告知荊冕堂須重建後，荊冕堂自 1982 年與政府磋商、討價還價，過程磨人。最後，荊冕堂仍難逃重建的命運。豈料當重建工作剛開始，負責教堂重建工程的關永康建築師樓遭清盤。[69] 該公司負責此重建項目的吳永順則師和郭家俊則師，也因此即時失業。[70] 同時，因新堂設計圖圖則的版權只屬於建築師樓，而圖則還被清盤官扣押在建築師樓內，無法取回。[71] 而且，教堂的清拆工程，可能會因由非持牌授權人士監管而停工。[72]「面對公司倒閉，是荊冕堂這個工程推動我站起來重組公司；失去工作後，我最擔心的反而是荊冕堂的重建工程，因為絕對不能對大家食言！」吳永順弟兄説道。[73] 為避免停工問題發生，兩位則師決定成立新建築師樓——創智建築師有限公司（AGC Design Ltd），以新公司的名義接手工程。[74] 其後，圖則和其他問題順利一一解決，工程得以重新開始。

---

69 李廣平：〈困難重重〉，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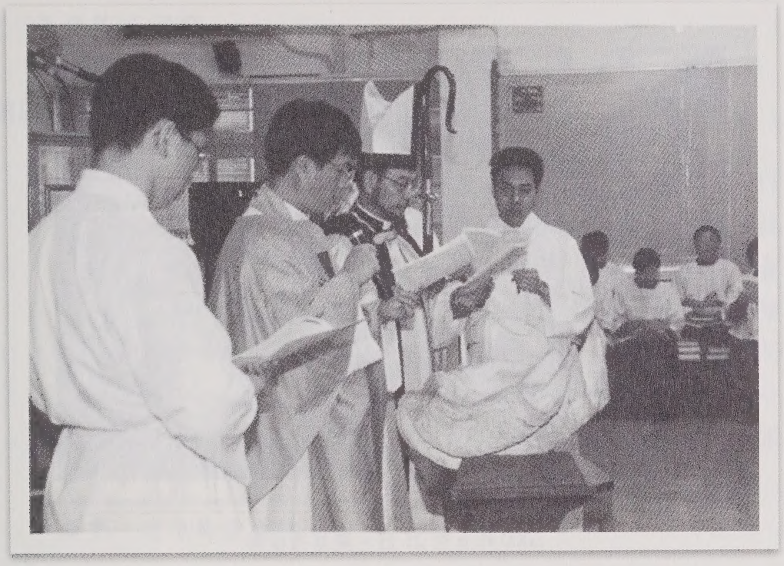
70 同上。

71 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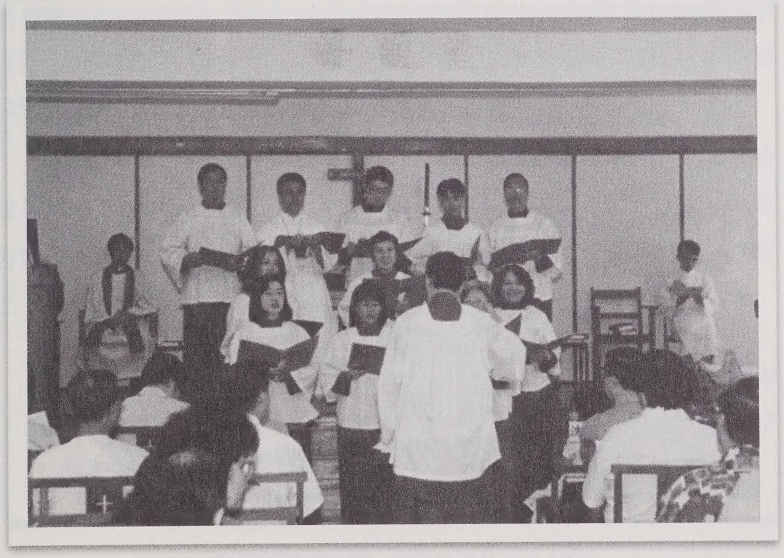
72 同上。

73 同上，19。

74 同上；參〈馬偉利訪問紀錄〉，金禧編委會、林護中學團契學生訪問及整理。



新堂未建成前，教友在麥理浩夫人中心進行崇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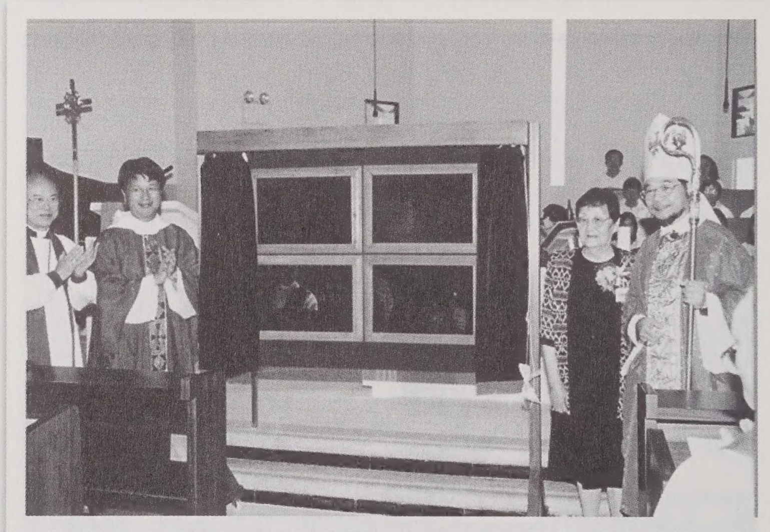


詩班員後方的摺疊木板後面，就是他們更換詩袍的地點[75]

75 以上兩幅均為香港聖公會荊冕堂所藏圖片。



2000 年 6 月 25 日，奠基禮留影



2002 年 6 月新堂落成，舉行祝聖奉獻禮[76]

---

[76] 以上兩幅均為香港聖公會荊冕堂所藏圖片。

2. 建堂籌款捐獻

關於重建的開支，教會方面的籌款目標是 5,000 萬。

> 六年前，在主日崇拜講道時，馬牧師提及重建聖堂的費用。以當年經常聚會的會友 120 人計算，每人就得負擔 40 多萬元。我一家三口，就得負責 120 多萬元。聽起來覺得不大可能……金融風暴之後，家庭收入減少，所住單位不斷貶值，奉獻也就變得不定時了。有次，開牧區議會期間，馬牧師鼓勵我們，5,000 萬的金額看似很大，但我們弟兄姊妹的負資產物業加起來，一定不止此數。好，我們總不能只顧自己的房屋，卻任憑神的殿荒涼。自此，我積極投入籌款事工，與弟兄姊妹組成智囊團，籌劃一連串籌款活動。

梁少儀姊妹憶述。[77] 為籌集資金，荊冕堂成立了建堂籌款委員會，委員會主席為林植宣博士，副主席為盧健明先生和黃肇焯先生，負責開展各類型大大小小的籌款活動。從各活動中，可見教區和牧區內堂、校、社服機構關係之密切。

大型籌款活動方面，首先，1997 年 2 月和 2001 年 2 月，教會舉行了兩次建堂步行籌款，地點同樣是城門水塘，也在李炳中學舉行開步禮。兩次活動總人數約 700 多人，共籌得約 110 萬元。[78] 第二次步行籌款中，參與者羅敬業弟兄是李炳中學的畢業生：

> 當天下午一時半，我就抵達李炳中學——我的母校，甫踏進校門，便遇見筆者的教父，在他的引領下，參觀了母校的教學設施和學校發展近況並馬上投入籌款活動的熱烈氣氛中。[79]

---

77 梁少儀：〈籌款點滴〉，載《聖公會荊冕堂聖堂重建特刊》，52。

78 黃杏萍：〈步行後記〉，載《聖公會荊冕堂聖堂重建特刊》，40–41。

79 羅敬業：〈步行籌款〉，《荊情集——建堂籌款活動》，期 1（香港：聖公會荊冕堂，2001 年 4 月），7。

此外，1999 年 9 月 11 日，荊冕堂在荃灣大會堂演奏廳舉辦日夜兩場的重建籌款演藝晚會。[80] 晚會邀請了鄺廣傑大主教致辭，回顧了荊冕堂過去 34 年的發展，也祝願重建後的荊冕堂，能繼續配合荃灣居民的需要。[81] 而晚會各表演項目，均由牧區內各學校、社區中心和其他牧區的弟兄姊妹義務參演，可見堂、校、社服機構之間合作十分緊密。活動包括由主愛小學學生演出的音樂劇「同一森林」，又有林護長者之家的醒獅表演。[82] 此外，有由牧區聯合詩班、吳克正先生和郁德芬女士的二重唱，聖士提反青年中心福音民歌隊獻唱。[83] 吳永順先生、郭家俊先生和麥中傑先生三位建築師，特別為荊冕堂譜寫歌曲「榮耀的冠冕」，唱出設計新堂的心聲。[84] 演藝晚會最後籌得 48 萬元正。[85]

各式各樣的賣物活動也徐徐展開。1999 年 2 月，教會在李炳中學舉辦了綠化嘉年華，人頭湧湧，活動一共籌得 112 萬元正。[86] 其中一位參與者說道：

> 當天大家紅紅的笑臉，濕透的國產底衫，個個挽着一袋袋的戰利品，還有荷包的鈔票一張張流走，都是我和外子常常說起的開心事，也是我們人生旅程及教會生活的一個重要片段。[87]

---

80 霍耀全：〈重建籌款演藝晚會——祝福這個家．伴我同行〉，載《聖公會荊冕堂聖堂重建特刊》，44；〈荊冕堂重建籌款演藝晚會，九月十一日荃灣會堂舉行〉，《教聲》期 1226（1999 年 9 月 5 日）：1。

81 〈荊冕堂重建籌款演藝晚會，信眾熱烈支持獲美滿成績〉，《教聲》期 1228（1999 年 9 月 19 日）：1。

82 同上；聖公會荊冕堂：〈鳴謝〉，載《聖公會荊冕堂聖堂重建特刊》，55。

83 同上。

84 霍耀全：〈重建籌款演藝晚會〉，44–45。

85 〈籌款活動一覽表〉，載《聖公會荊冕堂聖堂重建特刊》，54。

86 同上。

87 一媽媽：〈一切從這裏開始——綠化嘉年華〉，載《聖公會荊冕堂聖堂重建特刊》，43。

2001 年，教會在西九龍教區舉辦的管家運動嘉年華和在麥理浩夫人中心，設立義賣攤位。[88] 2000 年 11 月至 2001 年 2 月間，每個主日，一班荊冕堂的弟兄姊妹，到港九新界聖公會各堂崇拜，出售一些有荊冕堂特色的紀念品。[89] 黃斌弟兄回想：

> 每一次出外，因為其他堂的教友對我們的支持，熱情的招待，踴躍的奉獻，都令我們覺得非常感動。而每個主日下午，當我們從其他堂回到荊冕，打開奉獻箱，和計算賣物的收入時，又是另一個叫人激動的時候，此刻大家齊分享在賣物期間的情形。這個說某某幹事好人，那個又說某教友買了多少東西等等，七嘴八舌地說起來……[90]

此活動共籌得 16 萬元正。[91] 荊冕堂和各堂的弟兄姊妹，同心為重建一事作工，展現聖公會教區合一的美好圖畫。

重視荊冕堂建堂需要的弟兄姊妹，一一獻上自己微小的一份。當中有剛退休仍負擔子女海外升學開支，仍變賣股票奉獻的，又有小孩子用零用錢奉獻的。[92] 梁少儀姊妹的父親才初信受洗加入荊冕堂，還把她祖母生前留下來的積蓄捐獻出來。[93] 2001 年，建堂工程付款到了高峰期時，教會尚欠流動資金 2,200 萬元。[94] 當時馬牧師「過分樂觀地」大膽提議向友堂借款 1,000 萬元，再額外籌集 1,200 萬元。[95] 怎料：「神蹟就在此時發生了」：

---

88 羅敬業：〈步行籌款隨想〉，載《聖公會荊冕堂聖堂重建特刊》，48。

89 黃斌：〈賣物感想——建堂籌款紀念品〉，《荊情集——建堂籌款活動》，1: 9–10。

90 同上。

91 〈籌款活動一覽表〉，54。

92 馬偉利：〈當我們缺乏的時候……〉，載《聖公會荊冕堂聖堂重建特刊》，38。

93 梁少儀：〈籌款點滴〉，載《聖公會荊冕堂聖堂重建特刊》，52。

94 馬偉利：〈當我們缺乏的時候……〉，39。

95 同上。

上帝感動了高傑德姊妹，她本已於較早前在素未謀面下慨捐230萬圓給本堂。她本想在我們逼切需要下，多捐3萬元。但在為我們禱告中，她感到上帝叫她捐300萬元！在順服主中姊妹辛苦籌集資金，到林植宣博士與我倆夫婦拜訪她時，支票的金額不止此數——是720萬元！她說：『籌款應是我們教友的責任，總不祇要牧師擔心的！』

林博士因高姊妹的慷慨深受感動，也即慷慨捐助200萬元，連同大主教撥捐200萬元及聖保羅堂捐款100萬元的義助，剛好是1,200多萬元。（馬牧師後記：當時還得聖士提反堂捐款50萬，沒有包括在其中）

友堂的借款行動，同樣使人感激。一星期內已有牧區為我們召開了特別會議，通過借款給我們應急！諸聖堂、牧愛堂、青山聖彼得堂、聖多馬堂、基愛堂，皆盡力借款本堂。哈，不多也不少，正好是1,000萬元！[96]

馬牧師一一感嘆，就是這樣，尚欠的巨額款項迎刃而解。每次看似缺乏時，主必預備，使祂的兒女必不至缺乏。

此外，還有其他籌款特備活動。較富趣味的是，同年2月，蘇以葆主教的「剃鬍子籌款」籌得了2萬多元。[97] 可是，這項活動公開提出後隨即引起爭議，有一部分人認為主教的鬍子被剃掉沒有問題，但有些人覺得這樣做，有損主教尊嚴，「主教讓人『玩』太不像樣了」。[98] 經教友投票表決後，支持「留鬍子」的佔了絕大多票數，主教最後因而保留了十多年來「留鬍子」的形象。[99]

---

96 同上。

97 蘇以葆：〈鬍子風波〉，《荊情集——建堂籌款活動》，1: 4–6。

98 同上。

99 同上。

3. 新堂新貌

荊冕堂新聖堂祝聖奉獻禮暨三十七週年堂慶聖餐崇拜於 2002 年 6 月 30 日舉行。[100] 出席者達 800 多人，眾來賓包括鄺廣傑大主教、蘇以葆主教、西九龍教區全體牧師、西九聯合詩班等等。[101] 因來賓和出席者眾多，教堂還須開放四樓副堂讓其他教友一同參與盛事。[102] 奉獻禮儀式中，蘇以葆主教以牧杖叩門，祝聖洗禮盆、讀經台、長椅和聖桌，將新聖堂獻予上帝親自使用。[103]

新堂的設計饒有特色，特別是建築物外圍的落地玻璃，透視內裏一條將地下層連接到二樓聖堂的長樓梯。[104] 這設計原意是讓街上的行人可透過玻璃窗感受到教堂內的莊嚴和歡欣，讓外界與教會連成一體，為教會塑造一個開放的形象。[105] 長樓梯象徵苦路，旁有十四苦路默想圖，冀幫助信徒上樓梯到聖堂時，一步一步預備自己的心靈準備崇拜。[106] 到了長樓梯盡頭，是一扇三米乘三米的彩色大玻璃窗，位元於聖堂內最光亮的地方，代表由黑暗邁向光明。[107] 還有其他不同大小的彩色玻璃窗，窗內的每個圖案也盛載不同的資訊。[108] 大玻璃窗前，有一白雲石洗禮盆，刻有「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字樣。[109] 而聖堂的設計為扇

---

100 李廣平：〈奉獻禮知少少〉，《荊情集——新堂新氣象》期 9（香港：聖公會荊冕堂，2002 年 9 月），3；〈聖公會荊冕堂二零零二年度第二次牧區議會會議紀錄〉，2002 年 2 月 3 日，荊冕堂文件。

101 同上。

102 同上。

103 李廣平：〈奉獻禮知少少〉，3–4。

104 李廣平：〈設計特色——則師專訪〉，載《聖公會荊冕堂聖堂重建特刊》，26。

105 同上。

106 同上。

107 同上，27。

108 同上；見李廣平：〈窗〉，載《聖公會荊冕堂聖堂重建特刊》，28–29。

109 王載明：〈我對新、舊聖堂的感想分享〉，《荊情集——新堂新氣象》，9:17。

型，非一般的方形，又加設一弧形閣樓，令人自然地將注意力落在聖壇上，專注仰望十架。[110] 聖堂內的十架是中空的，讓外間的自然光進入，提醒信徒掏空自己，讓上帝注滿內心。[111]

當弟兄姊妹踏進新堂眼見新人新貌，不禁泛起陣陣懷思之情。王載明姊妹嘆謂：

> 於 6 月 21 日的晚上，參加教區聯合詩班的練習，首次踏足新堂。大門口，看見一位穿著制服的保安員，不期然想念已故的明叔，他在舊堂多年於晚間緊守崗位，他洪亮的聲音令我難以忘懷。事隔兩日，6 月 23 日，返堂守禮拜時，見又有另一位守門保安員，使我想起財叔，他為舊堂忠心地服務了數十年，現已榮休。
>
> 當我進入聖殿不久，突然有一把響亮的聲音呼喚我，同時走到我面前很親切地緊握着我的手。原來這位長者是嚴張金蘭姊妹，她是不能乘坐車的，所以這三年來她沒有和我們一同在麥理浩夫人中心崇拜主。今天她還帶着她的老伴從石圍角村步行到新堂……
>
> 首次走進新堂的洗手間時，想起在 1998 年 10 月 18 日那個主日，筆者正值司琴事工。豈料在崇拜前 15 分鐘卻在洗手間門口不慎失足，令右足踝「拗柴」，極度扭傷，幸好沒有斷筋……搽了藥油後可照常司琴，以及參加當日下午在諸聖堂舉行成立九西〔西九〕教區慶典為詩班員……[112]

舊堂裏的舊人舊事舊情，依然叫人記憶猶新。舊堂新堂的每吋空間，皆成為弟兄姊妹對教會的歸屬感的養份。

---

110 李廣平：〈設計特色〉，27。

111 同上。

112 王載明：〈我對新、舊聖堂的感想分享〉，17–18。



新堂外貌（約 2002 年）



陽光下的新堂長樓梯（約 2002 年）



新堂長樓梯（約 2002 年）



新堂彩色大玻璃窗（約 2002 年）



新堂洗禮盆（約 2002 年）



扇型的聖堂（約 2002 年）[113]

113 以上六幅為創智建築師有限公司所藏圖片。

三・宣教牧養

1997 年 7 月，池嘉邦牧師獲派到荊冕堂出任助理聖品，主要工作為發展青衣傳道區，[114] 至 2004 年成為荊冕堂主任牧師。同年，馬牧師奉調至基督顯現堂和主愛堂兼任兩堂堂主任。[115] 2010 年 3 月，黃健新牧師接任主愛堂主理牧師，成為主愛堂第一位全職牧者，同時兼任荊冕堂助理聖品，而池牧師轉任諸聖堂助理聖品。[116]



荊冕堂歡送池嘉邦牧師（2010 年 2 月 21 日）[117]

2007 年 11 月至 2010 年 2 月，郭志芊牧師原為荊冕堂教友，後成為助理聖品，於 2010 年 3 月為堂主任。[118] 2012 年 6 月起，廖翼顯牧師因「其年紀和時代的轉變」，辭任義務聖品一職。[119] 2015 年 12 月，郭牧師轉至天水圍聖腓力堂任主任牧師，由鄭守定牧師

---

114 見荊冕堂文件：〈聖公會荊冕堂一九九七年度牧區議會特別會議紀錄〉，1997 年 8 月 17 日；〈聖公會荊冕堂特別牧區議會〉，1997 年 8 月 14 日。

115 〈聖品調動〉，載《靈西集——香港聖公會西九龍教區》期 41（2010 年 3 月）：4。

116 同上。

117 香港聖公會荊冕堂所藏圖片。

118 同上。

119 〈聖公會荊冕堂二零一二年度第三次牧區議會會議記錄〉，2012 年 5 月 20 日，荊冕堂文件。

於 2016 年 1 月接任荊冕堂主任牧師。2015 年 1 月 1 日，黃建新牧師正式調任為青山聖彼得堂主任牧師，吳達維牧師則接替黃健新牧師成為主愛堂主理牧師，黃牧師停止兼任荊冕堂助理聖品。[120]

1. 「錐心之痛」……

馬偉利牧師曾憶述，水患、火災、原址重建只是荊冕堂在「硬件」上的損耗毀壞，並不足介懷。在其牧養過程中，最令他感到傷心的，且被他形容為「事奉甚至人生的一大衝擊」，莫過於九十年代大批青年信徒離開教會一事。[121] 原來在 1997 年間，一眾青年信徒因着對信仰不同的理解，最後離開了教會，這是荊冕堂歷史上最受衝擊的一樁「分裂事件」。[122]

當時（1997 年 9 月）派至荊冕堂的池嘉邦會吏指出，年青人對教會有很多誤解，「不能作出修補」，自己也面對事奉上的衝擊。[123] 他所指的問題，源自一位帶領青年的傳道人在聖經解釋上，跟教會並不一致，並質疑聖公會的一些立場。[124] 查該位傳道因接受了靈恩經驗，表達了禱告中的異象，在許多方面跟聖公會的傳統不一致。最後該同工帶領一批約 40 位的核心年青信徒向教會當局呈交信函，表示要離開荊冕堂。受事件影響，出席崇拜的人數也減少，由原來的 110 降至 60 至 70 人。[125] 馬偉利牧師形容，「這是我感受到最難受的事！」「但我相信，信仰是經得起考驗的，留下來的弟

120〈聖公會荊冕堂二零一四年度第五次牧區議會會議記錄〉，2014 年 11 月 16 日，荊冕堂文件。

121〈危難中見祝福，重建中見使命——馬偉利牧師〉，載《香港聖公會荊冕堂金禧紀念特刊》（香港：聖公會荊冕堂，2015），21。

122〈帶領我們走過重建之旅的馬偉利牧師〉，載《荊冕四十載，廣傳基督愛》（香港：聖公會荊冕堂，2005），24。

123〈幹勁十足之池嘉邦牧師〉，載《荊冕四十載，廣傳基督愛》，33。

124〈池嘉邦訪問紀錄〉，金禧編委會、林護中學團契學生訪問及整理，2015 年 6 月 6 日。

125〈馬偉利訪問紀錄〉，金禧編委會、林護中學團契學生訪問及整理。

兄姊妹都齊心合一地努力於各項事工，努力學習，互相建立，教會亦漸漸回復往日的面貌」。[126]

由於大批青年信徒離開，其中不乏是團契導師，馬牧師與師母面對「斷層」，乃親自擔任高中團契導師，希望有高中同學成長後可以接棒。同時，他又積極發展主日學及伉儷團，重新凝聚信徒及維繫感情。[127] 其中一位當時就讀林護中學的少年人，以「大地震」來形容事件。因為很多導師跟隨傳道同工離開，留下來的感覺到自己「像孤兒般缺乏照顧」。幸好馬牧師及師母親自帶領週會，「給我們作榜樣」，他自己亦因而大膽地參與事奉。他憶述，「大地震」的傷口因此慢慢撫平過來，並見到自己在信仰上的成長。[128] 雖然經歷分裂的傷痛，尤幸牧區上下同心，得以重建信徒，崇拜人數也有所增長。[129] 1999 年，傳道部及培育部的主題為「真心互勉，重建主殿」，以「教會是我家，不分你我他」為口號，訊息環繞團結、歸屬感及靈裏互相支持。[130] 期間適逢荊冕堂重建階段，「重建主殿」成為適切的方向。

2. 部門改組

1999 年，為方便行政和善用資源，青年部與少年部合併，組成「青少年部」。[131] 為加強培育及傳道工作的聯繫，培育部與傳道部合

---

126 〈帶領我們走過重建之旅的馬偉利牧師〉，24。

127 〈危難中見祝福，重建中見使命——馬偉利牧師〉，21–22。

128 鄭穎健：〈陶造我生命〉，載《香港聖公會荊冕堂金禧紀念特刊》，94。

129 〈馬偉利訪問紀錄〉，金禧編委會、林護中學團契學生訪問及整理。

130 〈聖公會荊冕堂一九九九年度牧區議會第二次會議紀錄〉，1999 年 2 月 7 日，荊冕堂文件。

131 〈聖公會荊冕堂一九九九年度牧區議會第一次會議紀錄〉，1999 年 12 月 6 日，荊冕堂文件。

併，組成「培育及傳道部」。[132] 因崇拜時，於副堂聚會的兒童比幼兒多，幼兒部改為「兒童事工部」，使服務對象的年齡層更廣。[133] 一年後，培育及傳道部分拆恢復為兩部，另設資訊科技部。[134] 同年，凡在教會內任何牧區具備 15 年當選為牧區議員資歷的教友，可成為特選議員。[135]

2002 年，荊冕堂牧區議會的組織架構由部制轉為科制，共設立 4 科涵蓋牧區內部事務的 4 個主要功能，分別是傳道科、培育科、服務科及行政科。[136] 傳道科由各部代表組成；培育科包括主日學部、婦女部、耆英部、成年部、青少年部和主日學部；服務科包括聯誼部、福利部、探訪部和文字事工小組，也負責管理友情天地及自修室；行政科包括議會書記、司庫、內部稽核、樓宇物業保養及管理、資訊科技、人事，也負責監管牙科醫務所的運作。[137] 科制的設立可加強這 4 科在策劃和商討事務上更有效率，讓「群體牧職」的弟兄姊妹能得到較多支援。[138] 至 2003 年，牧區議會加設青衣傳道發展科及崇拜事工科。[139] 青衣傳道發展科的目標是促進青衣傳道區的宣教牧養，策劃崇拜、主日學、研經班及家禱；崇拜事工科包括兒童部、聖樂部、接待部、聖壇服務部及影音燈光組。[140]

---

132 同上。

133 同上。

134 〈聖公會荊冕堂二零零零年度第一次牧區議會會議紀錄〉，1999 年 12 月 5 日，荊冕堂文件。

135 同上；〈聖公會荊冕堂一九九九年度牧區議會第六次會議紀錄〉，1999 年 10 月 3 日，荊冕堂文件。

136 〈聖公會荊冕堂二零零二年度第一次牧區議會會議紀錄〉，2001 年 12 月 2 日，荊冕堂文件；天涯孤客：〈議會文化〉，《荊情集——認識我們的牧區議會》，期 7（香港：聖公會荊冕堂，2003 年 3 月），11。

137 〈聖公會荊冕堂 2003 年度組織架構表〉，《荊情集——認識我們的牧區議會》，9–10。

138 天涯孤客：〈議會文化〉，11。

139 同上。見荊冕堂文件：〈聖公會荊冕堂二零零三年度第一次牧區議會會議紀錄〉，2002 年 12 月 5 日；〈聖公會荊冕堂 2003 年度組織架構表〉，修訂版，2003 年 1 月 26 日。

140 同上。

2012年，牧區議會再次改組，將牧區各項事工主要分為5個專責小組，包括行政專責小組、禮儀專責小組、培育和宣教專責小組、牧養專責小組、關懷專責小組。[141]

3. 宣教牧養

校園福音事工

自1996年，因學校反應良好，荊冕堂於牧區學校繼續設宗教獎，向各學校捐獻予以鼓勵學生進深認識信仰。[142] 2000年1月，傳道部成立3人小組聯絡在各學校工作的教友，研究學校福音工作和舉辦暑假福音營。[143] 2001年，傳道部計劃為林護中學中五學生舉辦福音營，主題為「生命的意義」。[144] 翌年9月和10月，培育部開展林護中學和小六至中三的新少年團契，加強青年培育計劃。[145] 少

---

141 〈2013年度——聖公會荊冕堂各項事工專責小組〉，2012年12月16日，荊冕堂文件。自2014年起，牧區議會架構的修訂詳見於荊冕堂文件：〈聖公會荊冕堂二零一三年度第四次牧區議會會議記錄〉，2013年9月15日；〈2014年度——聖公會荊冕堂各項事工專責小組〉，2013年9月15日。

142 見荊冕堂文件：〈聖公會荊冕堂一九九六年度牧區議會第二次會議〉，1996年1月20日；〈聖公會荊冕堂二零零三年度第一次牧區議會會議紀錄〉，2002年12月15日；〈聖公會荊冕堂二零零四年度第一次牧區議會會議紀錄〉，2003年12月7日；〈聖公會荊冕堂二零零六年度第一次牧區議會會議紀錄〉，2005年12月4日；〈聖公會荊冕堂二零零七年度第一次牧區議會會議紀錄〉，2006年12月10日；〈聖公會荊冕堂二零零八年度第一次牧區議會會議紀錄〉，2007年12月16日；〈聖公會荊冕堂二零零九年度第一次牧區議會會議紀錄〉，2008年12月7日；〈聖公會荊冕堂二零一零年度第一次牧區議會會議紀錄〉，2010年1月24日；〈聖公會荊冕堂二零一一年度第二次牧區議會會議紀錄〉，2011年2月20日；〈聖公會荊冕堂二零一二年度第二次牧區議會會議紀錄〉，2012年2月19日。

143 〈聖公會荊冕堂二零零零年度第二次牧區議會會議紀錄〉，2000年1月30日，荊冕堂文件。

144 〈聖公會荊冕堂二零零一年度第二次牧區議會會議紀錄〉，2001年2月4日，荊冕堂文件。

145 〈聖公會荊冕堂二零零二年度第四次牧區議會會議紀錄〉，2002年6月2日，荊冕堂文件。

年團契於成立之初有 10 多人參加，由梁竹君傳道跟進。[146] 2003 年，李轉珍主任於仁立小學參與和協助逢星期三的宗教課外活動。[147] 2005 年後，荊冕堂的傳道主任或幹事於牧區內學校亦積極舉辦不同的福音營、學生團契和佈道會等等。[148]

2008 年，梁竹君宣教師致力於校園福音工作，於林護中學團契分享「大使命」信息，鼓勵同學分享個人見證。在仁立紀念小學，她在 2 月舉行佈道會，負責呼召及跟進，並邀請張捷興傳道為講員；為四至六年級的同學舉行午膳時間栽培班，人數約 30 人；也協助該校的基督少年軍每月舉行一次例會。[149] 她又籌備中學福音營，對象為中五、中七及大專同學。[150] 於聖基道兒童院及荊冕堂葵涌幼稚園，她負責每月一次的兒童崇拜，又在士德幼稚園帶領早會，分享「凡事謝恩」的信息。[151] 在葵涌幼稚園，她舉辦家長小組，主題是「九型人格教子心法」。[152] 她以「初信成長八課」栽培決志同學，又以「少青啟發」有系統地栽培其他學生。[153] 2010 年，她於林護中學及仁立紀念小學成立家長團契，每次聚會參加人數達 10 多名。[154] 她在主恩小學、上述的小學和中學，成立了學生團契。[155]

---

146 〈聖公會荊冕堂二零零二年度第六次牧區議會會議紀錄〉，2002 年 10 月 6 日，荊冕堂文件。

147 〈李轉珍傳道 2002 年 12 月至 3 月份工作報告〉，荊冕堂文件。

148 見荊冕堂文件：〈聖公會荊冕堂二零零五年度第四次牧區議會會議紀錄〉，2005 年 6 月 5 日；〈聖公會荊冕堂二零零六年度第六次牧區議會會議紀錄〉，2006 年 10 月 1 日；〈聖公會荊冕堂二零零七年度第二次牧區議會會議紀錄〉，2007 年 2 月 6 日；〈聖公會荊冕堂二零零七年度第五次牧區議會會議紀錄〉，2007 年 8 月 5 日；〈梁竹君宣教師 08 年第二次工作報告〉，2008 年 4 月 6 日。

149 〈梁竹君宣教師工作報告〉，2008 年 12 月 7 日，荊冕堂文件。

150 〈梁竹君宣教師 08 年第二次工作報告〉，2008 年 4 月 6 日，荊冕堂文件。

151 同上。

152 〈梁竹君宣教師工作報告〉，2008 年 12 月 7 日，荊冕堂文件。

153 同上。

154 〈聖公會荊冕堂二零一零年度第一次牧區議會會議紀錄〉，2010 年 1 月 24 日，荊冕堂文件。

她也為中七畢業同學舉辦個人成長計劃及工作坊，訓練他們服侍小學生和進行福音工作。[156] 同年，仁立小學團契的活動，包括參觀荊冕堂，讓學生認識牧區教堂。[157] 2011 年 1 月起，荊冕堂為林護中學中一學生舉辦生命教育課，引導他們認識自我價值、人與上帝的關係、戀愛的價值觀。[158]

2010 年，荊冕堂跟隨教省於第五屆總議會所商討的發展方針，強化堂、校及社服關係，加強學生靈育發展。2010 年 9 月，荊冕堂重整內部架構，調配三位宣教師的工作——李轉珍負責家長、長者及婦女事工；李家賢負責青少年事工；梁竹君負責幼兒、主日學及音樂等事工。[159] 此外，荊冕堂分派同工何秉業弟兄每星期撥出其午膳時間，輪流到主恩小學、仁立小學及仁立紀念小學舉辦學生團契，[160] 或進行生命教育課題活動。[161] 2011 年，教省總議會已成立堂校合作導向小組，而西九龍教區也成立了相關小組，推動堂校合作。[162] 2010 年至 2011 年，荊冕堂為林護中學籌備設立小聖堂及校

---

155 〈聖公會荊冕堂二零一零年度第二次牧區議會會議紀錄〉，2010 年 4 月 11 日，荊冕堂文件。

156 〈聖公會荊冕堂二零一零年度第一次牧區議會會議紀錄〉，2010 年 1 月 24 日，荊冕堂文件。

157 〈宗教活動〉，載《聖公會仁立小學四十周年校慶特刊》（香港：聖公會仁立小學，2010），97。

158 見荊冕堂文件：〈青少年部〉，2011 年 1 月 26 日；〈聖公會荊冕堂二零一一年度第一次牧區議會會議紀錄〉，2010 年 12 月 19 日；〈第三次牧區議會傳道同工報告〉，2011 年 5 月 8 日。

159 〈聖公會荊冕堂二零一一年度第一次牧區議會會議紀錄〉，2010 年 12 月 19 日，荊冕堂文件。

160 2002 年 9 月，仁立小學分拆其上、下午校為兩所全日制學校。上午部留在原校，為「聖公會仁立小學」，下午部遷入葵涌上角街，名為「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見〈校長的話〉，載《聖公會仁立小學四十周年校慶特刊》，31。

161 見荊冕堂文件：〈聖公會荊冕堂二零一零年度第三次牧區議會會議紀錄〉，2010 年 7 月 4 日；〈聖公會荊冕堂 2010 年度第四次牧區議會同工報告〉，2010 年 9 月 12 日。

162 〈聖公會荊冕堂二零一一年度第二次牧區議會會議紀錄〉，2011 年 2 月 20 日，荊冕堂文件。

牧室，由教育專責小組負責跟進。[163] 2012 年，葵涌幼稚園聘請了荊冕堂的蔡杰英姊妹為宗教老師，林護中學也聘任歐陽俊榮弟兄為生命教育幹事，延續荊冕堂在牧區學校的福傳工作。[164]

家長事工

每當幼稚園學生上主日學時，家長便來到家長團契及家長天地組成團契。不同主題的週會，令家長回到荊冕堂不只是接送子女回幼稚園，也讓他們得到屬靈成長的機會，增添對教會歸屬感。[165] 2004 年 5 月至 6 月，李轉珍宣教師舉行了 6 次家長研習班，當中包括參加主日崇拜、學習如何教導子女和分享信仰，也有家長於佈道會決志。[166] 2005 年，家長團契和家長天地每逢月底團契一次，也會舉辦旅行、大型派對、與主日學合班慶祝生日，加深彼此的認識和增加親子活動的機會。[167] 可是，至 2006 年，李玉芝姊妹指出家長天地的聚會內容欠缺信仰內涵，生日會活動多家長參加，但很快流失。[168] 家長團契週會以查經分享為主，每次平均有 20 人出席，反應和學習氣氛良好。[169]

2008 年，家長團契的事工計劃，為加強加新肢體彼此認識和鞏固信仰基礎，展望舊肢體參與事奉；家長天地以早餐時間加強彼此

---

163 見荊冕堂文件：〈聖公會荊冕堂二零一一年度第一次牧區議會會議紀錄〉，2010 年 12 月 19 日；〈聖公會荊冕堂二零一一年度第二次牧區議會會議紀錄〉，2011 年 2 月 20 日。

164 〈聖公會荊冕堂二零一三年度第一次牧區議會會議紀錄〉，2012 年 12 月 16 日，荊冕堂文件。

165 〈家長團契〉，《聖公會荊冕堂四十周年堂慶紀念特刊》，79。

166 〈聖公會荊冕堂二零零四年度第五次牧區議會會議紀錄〉，2004 年 8 月 1 日，荊冕堂文件。

167 同上。

168 〈聖公會荊冕堂二零零六年度第三次牧區議會會議紀錄〉，2006 年 4 月 2 日，荊冕堂文件。

169 〈宣教師李轉珍工作計劃及進展報告〉，2005 年 4 月 3 日，荊冕堂文件。

認識，而以不同的專題講座，如健康保養及教養孩童等，吸引家長帶領小朋友回主日學的同時，參加家長天地，從中把基督信仰帶進家庭生活。[170]

長者事工

為了讓牧區內的社會服務單位使用者能得到靈性培育，荊冕堂也開始提供牧靈服務。聖公會林護老人之家於 1995 年在葵涌安蔭邨落成，秉承教區福利協會「個別關懷，全面照顧」的精神，以多元化的活動滿足院友生理、情緒、社群及靈性上的需要，為長者提供優質的住院照顧服務。[171] 為加強院友、親友和社區的聯繫，院舍採取「綜合」及「社區照顧」的工作模式。院舍積極招募義工團體如學校和教會等，向長者致以慰問，舉辦不同的節目和活動，讓院友和義工建立社區網路，推動社區成員組成互相關懷的社區。[172] 院牧也定期到院舍，照顧院友的靈性發展，同時宣教傳道。[173]

1997 年 7 月，荊冕堂耆老部於林護老人之家成立護愛團契。[174] 團契以「愛」得名，為此表示無論男女老幼均需要「愛」，冀「愛護關懷之義」、「團結契合之情」，把基督的訊息注入每人的心靈內。[175] 護愛團契逢每月第一個週六於院內舉行聖餐崇拜，而每月第三個週六舉行團契聚會。[176] 1998 年聖誕，除了荊冕堂幼稚園探

---

170 〈2008 年家長團契展望、2008 年定長天地展望〉，2008 年 2 月 3 日，荊冕堂文件。

171 〈聖公會林護老人之家成立進程〉，《聖公會林護長者之家》（香港：聖公會林護老人之家，年份不詳），1；〈服務使命及宗旨〉，同上書，2。

172 〈服務模式〉，同上書，5–6。

173 〈服務內容〉，同上書，8。

174 〈聖公會荊冕堂一九九七年牧區議會第五次會議紀錄〉，1997 年 8 月 3 日，荊冕堂文件。

175 黃杏萍：〈靈的突破——愛從上帝而來〉，《護愛傳真》期 3（1999 年 4 月至 6 月）：1。

176 〈聖公會荊冕堂一九九七年牧區議會第五次會議紀錄〉，1997 年 8 月 3 日，荊冕堂文件。

訪李嘉誠老人之家外，青衣幼稚園、荊冕堂的青年部及少年部也探訪林護老人之家。[177] 1999 年，荊冕堂的聖誕聚餐，也邀請林護老人之家和主愛堂的弟兄姊妹一起出席，共享平安歡樂。[178] 2005 年，婦女部帶領 8 位姊妹及 1 位弟兄探訪林護老人之家，長者和探訪員備受激勵，計劃繼續進行 2 次探訪。[179]

2013 年至 2014 年，李轉珍家庭事工主任繼續跟進林護老人之家的長者事工。在林護老人之家，李主任每月定期舉辦主日崇拜、團契、床邊探訪和戶外活動。[180] 義工、同工和牧師，亦定期探訪和施聖餐給院友。[181] 義工每週接送 8 位至 10 位居住於荃葵青區至荔景區，因身體不便未能獨自返堂聚會的教友。[182] 而且，李主任舉行義工培訓計劃讓退休人士參與，學習服侍長者，了解他們的身體、精神和情緒健康。[183] 服侍的內容包括於林護老人之家床邊關懷、成為「長者社區健康大使」、上門探訪等等。[184] 她也組織了福音粵曲班為詩班，讓長者於不同節日和長者安息禮拜時獻唱服侍。[185] 2013 年 10 月 20 日為關懷主日，荊冕堂也邀請了麥理浩夫人中心和林護老人之家的長者和院友參與崇拜。[186] 2013 年至 2014

---

177 〈聖公會荊冕堂馬偉利牧師致弟兄姊姊〉，1998 年 11 月 22 日，荊冕堂文件。

178 〈聖公會荊冕堂一九九九年度牧區議會第六次會議紀錄〉，1999 年 10 月 3 日，荊冕堂文件。

179 〈宣教師李轉珍工作計劃及進展報告〉，2005 年 4 月 3 日，荊冕堂文件。

180 〈長者事工報告〉，2014 年 12 月 31 日，荊冕堂文件。

181 同上。

182 見荊冕堂文件：〈長者事工進度報告〉，2013 年 9 月 1 日；〈長者事工報告〉，2014 年 12 月 31 日。

183 同上。

184 同上。

185 同上。

186 〈聖公會荊冕堂二零一三年度第四次牧區議會會議紀錄〉，2013 年 9 月 15 日，荊冕堂文件。

年，培育課程之一的退休人士義工訓練計劃，亦為長者事工的一部分，目的為服侍牧區內獨居或需要照顧的長者。[187]

2011 年 2 月，廖牧師踏入 80 歲，為他先前成立的「廖翼顯牧師培訓基金」捐出 100 萬元，其中的一半用以成立「廖翼顯牧師敬老行動」，以回應香港長者人口增加的問題，經費用以關心和協助有需要的長者渡過經濟困難。[188]

傳道部

2001 年，傳道部舉行「賭神之神」福音電影晚會，出席人數約 300 多人。[189] 傳道科負責跟進晚會的青年決志者，當中有 4 位初信者接受栽培，並恆常參與團契和崇拜。[190] 同年，荊冕堂舉辦全堂佈道會，傳道科負責開班跟進佈道會的決志者，平均出席人數為 10 人。[191] 2003 年 3 月，傳道科舉行全堂佈道異象分享會，分享傳福音的技巧和實踐，又籌劃福音研經班。[192]

2008 年，傳道部的目標為鼓勵教友參加傳道工作、裝備教友主動佈道、為教友提供實習傳福音的機會。[193] 2008 年，傳道部共舉辦了 3 次專題講座。[194] 3 月，講座內容是對家長傳福音的技巧，講

---

187 〈2014 長者事工義工訓練計劃〉，2014 年 8 月 31 日，荊冕堂文件。

188 〈聖公會荊冕堂二零一零年度第五次牧區議會會議紀錄〉，2010 年 12 月 19 日，荊冕堂文件。

189 〈聖公會荊冕堂二零零二年度牧區議會第六次會議紀錄〉，2002 年 10 月 6 日，荊冕堂文件。

190 〈梁竹君傳道主任 2002 年 9 月 1 日至 2003 年 3 月 1 日工作報告〉，荊冕堂文件。

191 〈李轉珍傳道 2002 年 12 月至 3 月份工作報告〉，荊冕堂文件。

192 同上；〈聖公會荊冕堂二零零三年度第二次牧區議會會議紀錄〉，2003 年 2 月 9 日，荊冕堂文件。

193 〈聖公會荊冕堂傳道部 2008 年度第一次會議會議紀錄〉，2008 年 1 月 5 日，荊冕堂文件。

194 同上。

者是吳少雄牧師，其後探訪林護長者之家實習。[195] 5 月，講座內容是對病人傳福音，講者為徐珍妮牧師和林麗玲院牧，然後到仁濟醫師「午間閒情」實習。[196] 9 月，講座為陪談技巧，於 10 月全堂佈道會實習。[197] 此外，傳道部成立了一個傳福音團隊名為「福音兵團」，隊員為 10 年內的洗禮教友。[198] 其後，傳道部聯同福音兵團到大窩口邨作個人佈道，帶領了兩位街坊決志。[199]

2012 年，傳道部舉辦新葡聚餐和節日探訪，前者讓受洗者的親友能認識信仰，後者可建立人手穩定的傳道探訪團隊，且由牧民中心的朱傲雪姑娘和陳珮琪姑娘聯絡被訪教友和舉行探訪技巧簡報會。[200] 同年舉行的電影佈道會「樂・滿家」及音樂佈道會「家庭信、望、愛之逆境勇士」，以荊冕堂幼稚園的學生家長為佈道對象。[201]

培育部

培育部主要負責策劃全堂教友的屬靈生命栽培，制定全年讀經計劃、禮儀神學一分鐘、全堂祈禱會和栽培班等。[202] 2005 年，因受洗者加入教會者眾，培育部為此舉辦了「茁苗」課程，又舉行「標竿人生」課程，加深初信者對信仰的認識。[203] 2008 年，培育部舉行全堂靜修會，了解靈修默想的意義，又舉行為期 11 課的信仰成長

---

195 同上。

196 同上。

197 同上。

198 同上。

199 〈梁竹君宣教師工作報告〉，2008 年 12 月 7 日，荊冕堂文件。

200 〈聖公會荊冕堂 2012 各部全年報告〉，2012 年 12 月 16 日，荊冕堂文件。

201 同上。

202 〈培育部〉，《聖公會荊冕堂四十周年堂慶紀念特刊》，65。

203 同上。

班，並摘取「以馬忤斯」成長課程的內容，參加者為剛接受洗禮的教友。[204] 而且，培育部協作籌辦為期一年的組長訓練培育計劃，共有 15 名參加者。訓練中有不同專題，包括「禱告的力量」、「個人成長——九型人格」、沙維雅模式（Satir Model）工作坊、「思想更新——我信上帝」、「恩賜的發掘與運用」等。[205] 大部分組長其後已主領信徒成長班及茁苗小組。[206] 其後，荊冕堂繼續以「以馬忤斯」成長課程進行全堂培育。[207]

2011 年，荊冕堂舉辦了一系列不同面向的組長訓練活動，包括：教會歷史（池嘉邦牧師）、基督教思想史（范晉豪牧師）、牧靈探訪（林護老人之家）、演說技巧（林振偉牧師）、帶領研經技巧（香港讀經會）、退修日營及華人基督教史（邢福增教授）。[208] 至 2013 年，培育課程主要包括「以馬忤斯」成長課程、婚姻啟發課程、F.L.Y.青年成長課程、組長訓練及退休人士義工訓練計劃。[209]

探訪部

探訪部鼓勵部員接受訓練，並在醫院擔任探訪義工。[210] 單是 2004 年，出外探訪已超過 220 次。[211] 2008 年，探訪部也恆常探訪各老人院，包括香港聖公會林護長者之家、明愛李嘉誠護理安老院、香

204〈聖公會荊冕堂培育部 2008 年度第三次會議會議紀錄〉，2008 年 3 月 6 日，荊冕堂文件。

205〈梁竹君宣教師工作報告〉，2008 年 12 月 7 日，荊冕堂文件。

206 同上。

207〈聖公會荊冕堂 2012 年度第四次牧區議會同工報告〉，2012 年 9 月 16 日，荊冕堂文件。

208〈聖公會荊冕堂 2010 年度第四次牧區議會同工報告〉，2010 年 9 月 12 日，荊冕堂文件。

209〈2013 年牧區議會培育課程報告〉，2013 年 10 月 30 日，荊冕堂文件。

210〈探訪部〉，《聖公會荊冕堂四十周年堂慶紀念特刊》，73。

211 同上。

港聖公會阮維揚長者之家和福雅護老之家。[212] 2009 年探訪部的目標為探訪所有教友，先以於 2008 年洗禮的教友開始，其後繼續探訪先前屆別洗禮的教友。[213] 而且探訪部也組織各團契互相探訪，加強彼此認識，同時解決義工不足的問題。[214] 2010 年，俞燕萍傳道幹事也繼續組織探訪義工隊。[215] 2012 年至 2013 年，探訪部部長梁兆文弟兄表示教友婉拒探訪部的探訪，令探訪工作出現很大的困難。[216] 有見及此，於 2013 年，同時為鼓勵各團契內部互相關心和探訪，牧區議會決定取消探訪部。[217]

福利部（慈惠部/關愛部）

九十年代初，馬牧師留意到某些教友的財政需要，因此成立福利部以協助教友的急需。例如在 1998 年 2 月，曾幫助處理一位主日學學生的生活開支問題，並替其添設新居用品，及資助學生往返主日學的車費。[218]

2003 年，福利部易名為慈惠部，表示以慈心和愛心支援教友的需要。[219] 同年，慈惠部津貼 19 位小學生及中學生的書薄費，合共$7,900。[220] 2004 年，慈惠部於農曆新年送贈綿衣予長者保暖，

---

212 〈聖公會荊冕堂牧區議會會議各部報告彙集〉，2008 年 4 月 6 日，荊冕堂文件。

213 〈聖公會荊冕堂牧區議會會議各部報告彙集〉，2009 年 3 月 1 日，荊冕堂文件。

214 同上。

215 〈聖公會荊冕堂二零一零年度第三次牧區議會會議紀錄〉，2010 年 7 月 4 日，荊冕堂文件。

216 〈聖公會荊冕堂二零一三年度第一次牧區議會會議紀錄〉，2012 年 12 月 16 日，荊冕堂文件。

217 同上。

218 〈聖公會荊冕堂一九九八年度牧區議會第二次會議紀錄〉，1998 年 2 月 8 日，荊冕堂文件。

219 〈慈惠部〉，《聖公會荊冕堂四十周年堂慶紀念特刊》，70；〈聖公會荊冕堂二零零三年度第二次牧區議會會議紀錄〉，2003 年 2 月 9 日，荊冕堂文件。

220 〈聖公會荊冕堂慈惠部〉，2003 年 8 月 12 日，荊冕堂文件。

也於新學年發放文具津貼給有需要的家庭。[221] 至 2007 年，鄧曼英姊妹表示歷來向教會申請援助者不多，較大筆的款項是醫藥費資助。[222] 其後，慈惠部多作主動關懷工作，尋找未有主動求助的有需要人士，尤其是無依的長者、家境窮困的青年、單親和綜緩家庭、長期病患者（可免息借貸）等。[223] 每年暑假結束前，慈惠部為貧困教友的子女提供文具及書簿津貼等等。[224] 2010 年，因荊冕堂已成立了牧民中心，故此慈惠部可與牧民中心緊密聯絡，互相轉介有需要的教友。[225] 如有其他需要，牧民中心的社工可轉介個案予其他社會福利機構，如聖雅各福群會食物銀行等服務。[226]

2012 年，慈惠部改名為關愛部。雖易名數次，但其助人的宗旨始終如一。[227]

牧養部門

成年部、家庭部及青年部以不同形成的團契和小組，牧養不同年紀和背景的教友。成年部方面，包括常青團（長者）、弟兄團、婦女團、路得團、儷人天地（在職婦女）、青柚團及職場團契（須輪班工作的教友）。家庭部方面，共有家長團契、家長天地、青咖哩夫婦團契、基斯夫婦小組和青蘋果團契。青少年部方面，有青豆團（中學至大專）、青蔥團（大專至職青）、青椒團（職青）及青穗團（職

---

221 見荊冕堂文件：〈聖公會荊冕堂二零零四年度第二次牧區議會會議紀錄〉，2004 年 2 月 1 日；〈聖公會荊冕堂二零零四年度第五次牧區議會會議紀錄〉，2004 年 8 月 1 日。

222 〈聖公會荊冕堂二零零七年度第六次牧區議會會議紀錄〉，2007 年 10 月 7 日，荊冕堂文件。

223 〈聖公會荊冕堂財政管理委員會二零零八年度第一次會議紀錄〉，2007 年 12 月 16 日，荊冕堂文件。

224 〈聖公會荊冕堂慈惠部會議紀錄〉，2010 年 1 月 27 日，荊冕堂文件。

225 同上。

226 同上。

227 鄧曼英、林嘉儀、李玉芝：〈關愛部〉，《香港聖公會荊冕堂金禧紀念特刊》，57。

青）。至 2015 年，青少年部拆分為青年部和少年部，祈盼能訂立更清晰的發展方向。[228]

硬件配備

2013 年 10 月，荊冕堂裝修完畢。五樓的 504 室可讓教友團契聚會，同時也可讓牧民中心和牧師作輔導和面談之用，而六樓的 602 室從普通課室改為富有家庭氣息的房間。[229]

4. 新牧區及新傳道區成立：基督顯現堂及主愛堂

八十年代中後期，葵涌和青衣大規模開發，徙置、搬村及清拆舊區，用作都市拓展之用，猶如六七十年代的荃灣。興建新公路、幹線、高架大橋，各公共工程相繼落成，公私商住大廈崛起，昔日荒山野嶺不再。

> 廿年前，剛遷入青衣居住時只有一道南橋往來葵涌至青衣……交通不大方便……當時樓宇不多，頗有鄉郊風味計有教會興建的信義村、保祿村、沿海近碼頭一帶的寮屋、石屋、木屋等，〔也有〕一所平房式的青衣公立學校……至牙鷹州一帶填海後興建長安、長發等公屋及青泰苑、青雅苑等居屋後，成為現今青衣的市中心。

蘇蘊明姊妹如此形容青衣的變遷。[230]

---

228 彭秋琼：〈青少年部〉，同上書，56。

229 〈聖公會荊冕堂 2013 年第四次牧區議會行政主任報告〉，2013 年 10 月 30 日，荊冕堂文件。

230 蘇蘊明：〈青衣事工分享〉，《荊情集——青衣傳道區》，期 2（香港：聖公會荊冕堂，2001 年 6 月），5。

葵涌和青衣的發展，與荃灣的發展密不可分。八十年代中期，葵青約有 40 多萬居民。[231] 以往葵青居民、社團領袖和區內活躍人士的活動中心偏重於荃灣，加上歷史和地理因素，相比起荃灣，葵青的發展雖急速卻較為不受重視。[232] 正因如此，該區區議會從政府得來的撥款亦較少，有如「二奶命」。[233] 有見於荃灣新市鎮發展急速，已超出了一個區議會的承受能力，[234] 1985 年，政府將荃灣和葵青正式劃分為兩個獨立的行政區和區議會。[235] 合一中心主任羅國權表示，葵青的特色就是屋邨多、學校多，甚具社區發展的潛力。[236] 以往，葵青的發展可說是荃灣工業區的延伸。[237] 葵青區議會「分家」，脫離荃灣區議會，象徵葵青發展的新一頁，嘗試脫離「二奶命」。[238] 同時，政府、地產商及公共運輸機構亦開始投放大量資源發展青衣，預計青衣將容納大量人口。有見及此，荊冕堂決定於青衣和葵涌植堂，又與當地的牧區學校和社會服務中心協作，正好為葵青發展的新階段注入新動力，為居民建立對社區的歸屬感。

---

231 〈葵涌能否擺脱二奶命？〉，《荃灣報》期 92（1984 年 6 月 1 日）：8。

232 同上。

233 同上。

234 〈三十而立，茁壯成長——葵青區議會的由來及發展〉，《葵青區議會 · 30 週年紀念》（香港：葵青區議會，2015），4。

235 同上。現時，荃灣區是指東以和宜合道及德士古道為界，西至青龍頭，北至大帽山的高山地帶，南至海岸線的範圍。而馬灣和大嶼大東北部，亦屬荃灣區內。見荃灣區議會：《荃灣二百年》，4。據《荃灣二百年》，許舒註明荃灣和葵青於 1986 年正式劃分為兩個獨立的行政區，但《葵青區議會 · 30 週年紀念》及《荃灣區議會工作報告 1991–1994》同樣標明為 1985 年。見〈三十而立，茁壯成長〉，4；《荃灣區議會工作報告 1991–1994》（香港：荃灣區議會，1994）。

236 〈葵涌居民新的開始，建立屬於自己的區會〉，《荃灣報》期 92（1984 年 6 月 1 日）：8。

237 六七十年代葵涌和青衣的發展，與荃灣之間的關係，詳見蔡思行：《戰後新界發展史》（香港：中華書局，2016），115–116。

238 參〈葵涌能否擺脱二奶命？〉，《荃灣報》期 92（1984 年 6 月 1 日）：8。

向青衣居民傳道：基督顯現堂

九十年代，荊冕堂和聖公會的社服機構，致力為青衣居民提供服務。1990 年，荊冕堂附設的幼稚園分校，校舍所在的荃灣沙咀道寶石大廈須拆卸重建。為分校數百學生得以繼續於同校升學，幼稚園分校乃於 1992 年遷至青衣偉景花園繼續開辦，奠定了荊冕堂在青衣的教育工作。[239] 聖公會思晃小學位於葵芳邨第三座，其後葵芳邨於 1993 年重建，思晃小學關閉。同年，思晃小學遷往青衣青衣邨，易名為聖公會何澤芸小學，由此開拓聖公會於青衣的宣教和教育事業。[240] 2000 年，何澤芸小學將上下午校分拆為兩所全日制小學，另一所為位於長亨邨的何澤芸小學。[241] 同年 8 月，麥理浩夫人中心在青衣長安邨和青衣邨增設服務據點，服侍居民。[242] 在這十年內，聖公會一步一步在青衣開展教育和社服工作，同時福傳事工也不能怠慢。

1991 年，為配合牧區的傳道發展，荊冕堂準備開發新傳道區，教會決定聘請一傳道主任，也成立異象分享小組，組員包括馬偉利牧師、池嘉邦牧師、鄧曼英、孔繁漢、歐愛蓮、霍耀全、彭艷雲、孔慶雲、黃沛宜及麥慕思。[243] 為發展青衣傳道區，1992 年，青衣幼稚園校方透過家長會，建立校方與家長的關係。[244] 聖誕節時，

---

239 蘇蘊明：〈青衣事工分享〉，《荊情集——青衣傳道區》，2:5；《致聖公會港澳教區常備委員會主席鄺廣傑主教》，1990 年 4 月 11 日，香港聖公會檔案館，西九龍教區，聖公會荊冕堂(CT)(3)；〈西九回顧宣教十年成效〉，《教聲》期 1877（2012 年 2 月 26 日）：3；〈香港聖公會西九龍教區繼續舉辦各項培育工作〉，《教聲》期 1456（2004 年 2 月 1 日）：6。

240 蘇蘊明：〈青衣事工分享〉，《荊情集——青衣傳道區》，期 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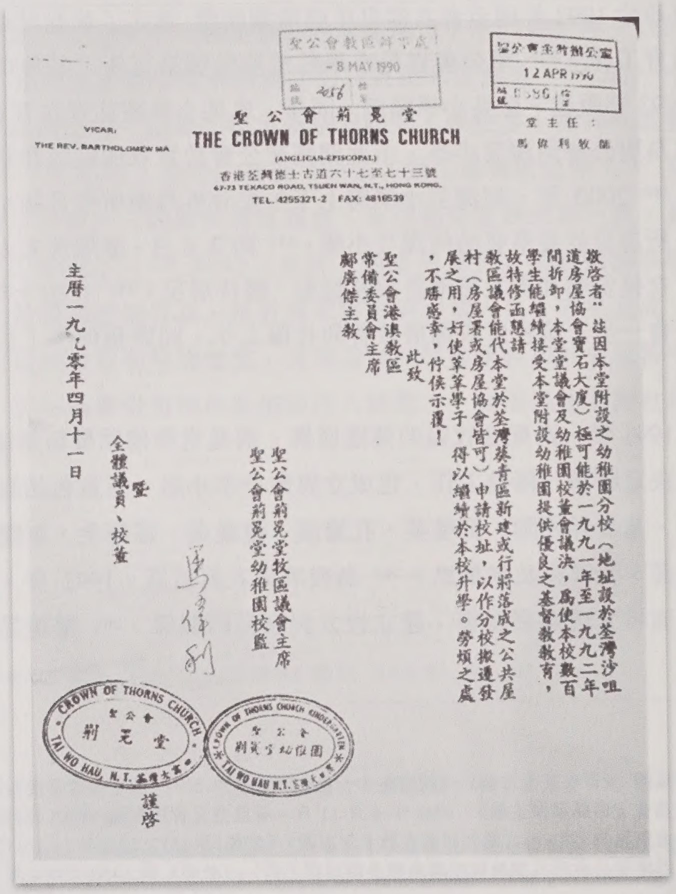
241 同上；〈聖公會何澤芸小學〉，聖公宗（香港）小學監理委員會有限公司網頁，2016 年 8 月 2 日瀏覽，http://www.apsc.org.hk/hochakwan.html。

242 蘇蘊明：〈青衣事工分享〉，5。

243 〈聖公會荊冕堂一九九一年第三次牧區會議紀錄〉，1991 年 4 月 4 日，荊冕堂文件。

244 〈基督顯現堂〉，《教聲》期 1482（2004 年 8 月 1 日）：2；〈荊冕堂傳道部 1993 年度上半年事工報告〉，荊冕堂文件。

荊冕堂也在青衣幼稚園舉辦「萬家平安青衣夜」戶外晚會，吸引數百居民擠滿偉景花園外的空地。[245] 1994 年，青衣幼稚園舉辦暑假傳道事工，荊冕堂成立了青衣幼稚園傳道關注組，研究傳道發展的方向。[246]



聖公會教區辦事處
－8 MAY 1990

聖公會港澳教區辦公室
12 APR 1990

聖公會荊冕堂
THE CROWN OF THORNS CHURCH
(ANGLICAN-EPISCOPAL)
香港荃灣德士古道六十七至七十三號
67-73 TEXACO ROAD, TSUEN WAN, N.T., HONG KONG.
TEL. 4255321-2 FAX: 4816539

VICAR:
THE REV. BARTHOLOMEW MA

堂主任：
馬偉利牧師

敬啓者：茲因本堂附設之幼稚園分校（地址設於荃灣沙咀道房屋協會寶石大廈）極可能於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二年間折卸，本堂堂議會及幼稚園校董會議決，爲使本校數百學生能繼續接受本堂附設幼稚園提供優良之基督教教育，故特修函懇請教區議會能代本堂於荃灣葵青區新建或行將落成之公共屋村（房屋署或房屋協會皆可）申請校址，以作分校搬遷發展之用，好使莘莘學子，得以繼續於本校升學。勞煩之處，不勝感幸，佇候示覆！

此致

聖公會港澳教區
常備委員會主席
鄺廣傑主教

聖公會荊冕堂牧區議會主席
聖公會荊冕堂幼稚園校監
馬偉利
暨
全體議員、校董
謹啓

主曆一九九零年四月十一日

CROWN OF THORNS CHURCH
聖公會
荊冕堂
TAI WO HAU, N.T.

聖公會
荊冕堂幼稚園
TAI WO HAU N.T.

荊冕堂盼教區議會能申請另一校址，
作荊冕堂幼稚園寶石大廈分校搬遷發展之用（1990 年 4 月 11 日）

---

245 〈基督顯現堂〉，2；〈萬家平安青衣夜〉，《荊冕堂堂刊》，1992 年 12 月 13 日，7；〈福傳青衣關顧社區家庭，基督顯現堂升格牧區〉，《教聲》期 2082（2016 年 1 月 31 日）：1。

246 〈聖公會荊冕堂一九九四年度牧區議會第四次會議〉，1994 年 5 月 15 日，荊冕堂文件。

為了選擇一個成立青衣傳道區的最佳時機，在九十年代，馬牧師、池牧師和眾教友討論了不少個年頭。至 2000 年，青衣邨何澤芸小學落成。這小學擁有設備齊全的千禧校舍，位置交通便利，旁邊更是環境優美的市鎮公園，實在是適合成立傳道區的地點。[247] 成立傳道區的事不宜一拖再拖。「真擔心再如此揀擇，終有一天上帝會吩咐大魚把我和池嘉邦牧師吞下，然後吐上青衣！」[248] 馬牧師說。

同年，牧區議會新設青衣傳道區發展小組，[249] 又將 2 月 20 日（主日）定為「青衣傳道主日」。[250] 同時，荊冕堂又向全體教友、青衣幼稚園、何澤芸小學和林護中學發出「青衣傳道區開展問卷調查」，回應者偏向支持在傳道區舉辦家庭關懷及宗教小組活動。[251] 荊冕堂全數教友也支持青衣傳道區的工作，近半數人認為在 9 月開展傳道區工作較為合適。[252] 至 6 月，青衣傳道區籌委會由 9 人組成，當中包括池嘉邦牧師。[253] 另外，牧區議會計劃在何澤芸小學開設自修室，方便牧區內的學生溫習。[254]

荊冕堂十多位有心志於青衣植堂的弟兄姊妹，每兩星期聚首一堂，分享和交流對植堂的意見，又為此祈禱交託上帝。[255] 黃妍旻姊妹分享道：

---

247 〈基督顯現堂〉，2。

248 同上。

249 〈聖公會荊冕堂二零零零年度第一次牧區議會會議紀錄〉，1999 年 12 月 5 日，荊冕堂文件。

250 〈聖公會荊冕堂二零零零年度第二次牧區議會會議紀錄〉，2000 年 1 月 30 日，荊冕堂文件。

251 〈聖公會荊冕堂二零零零年度第三次牧區議會〉，2000 年 4 月 2 日，荊冕堂文件。

252 同上。

253 〈聖公會荊冕堂二零零零年度第四次牧區議會〉，2000 年 6 月 4 日，荊冕堂文件。

254 見荊冕堂文件：〈聖公會荊冕堂二零零零年度第五次牧區議會〉，2000 年 8 月 6 日；〈聖公會荊冕堂二零零零年度第六次牧區議會〉，2000 年 10 月 1 日。

255 同上。

> 回想三年前，數位相交不深的教友（除本人兄嫂外）自願地到青衣何澤芸小學發展傳道區。由於當時我們還沒有定出傳道方向和目標，只為着福音需要，憑着信心一起去摸索。起初，我冀盼由牧師及傳道人帶領我們去發展，教友只不過是跟隨和支持。但事情並非一如所料，在沒有傳道人的情況下，加辛〔上〕兩位牧師的工作，我們這群教友亦要兼顧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事務。我們這群「不打不相識」的教友開始有多些溝通、見面……[256]

而她的丈夫林子安弟兄，亦跟隨與太太一起到青衣植堂。

> 憶起三年前的事奉立志表上，提問是否願意到青衣傳道區作開荒牛，我清楚記起選擇是一個「否」，因為只是一個小人物，不懂開墾，不懂領導，對教會工作不熟悉，對聖經更一知半解，我憑什麼去傳福音？個人亦沒有任何呼召又沒有任何使命感。但隨着婦唱夫隨、我對我女人〔妍旻〕的信任，我仍然不知不覺去了青衣「特區」參加崇拜……

三年植堂的經驗，他認為「更要緊的是這個傳道區教曉我一個真實道理，只要我憑信心，拿出我僅有的五餅二魚，我的小信，我的小作——基督自會成就祂所要作的一切，這定義使你大開眼界，更信靠基督，更讚美主。」[257]

2001 年 1 月 14 日，位於青衣邨何澤芸小學的「聖公會荊冕堂青衣傳道區」正式成立。[258]

---

256 黃妍旻：〈愛的恩賜〉，《荊情集——基督顯現堂》，期 8:9–10。

257 林子安：〈我對青衣無悔〉，《荊情集——基督顯現堂》，期 8:3；林子安弟兄的專訪，見嚴紫華：〈我們的弟兄林子安〉，《荊情集——青衣傳道區》，期 2:17–18。

258 麥偉麟：〈這個嬰兒誕生了——並取名聖公會荊冕堂青衣傳道區〉，《荊情集——青衣傳道區》，期 2:9。

傳道區的主日崇拜時間為上午 11 時 30 分，地點是青衣邨何澤芸小學的小聖堂。[259] 聖堂內的花梨木明式傢俱，也由荊冕堂負責植堂的教友選購。[260] 崇拜時前座留與長者，秉承了荊冕堂的傳統。[261] 首次主日聖餐崇拜於 2001 年 1 月 14 日舉行，由蘇以葆主教祝聖小聖堂和聖桌。[262] 1 月至 6 月半年期間，主日崇拜的平均出席人數為 48 人（不包括兒童），每次也有約 4 位新參加者，而領聖餐平均人數為 23 人。[263] 另外，傳道區亦設有信仰認識班、兒童主日學和福音性研經，而當時兒童主日學出席人數平均有 25 多人。[264] 2002 年 8 月，傳道區每逢第二及第四週週五舉行小組聚會，而逢週五上午 10 時也在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青衣長者中心舉行團契，有 10 多位老人參加。[265] 10 月，荊冕堂牧區議會差遣黃杏萍姑娘到青衣傳道區工作，負責探望長者、關懷教友及教導主日學等。[266]

「上帝既然給聖公會在青衣建立多間學校，宣教的工作自必然由學生及家長入手。」馬牧師說。[267] 2000 年，當何澤芸小學開課後，第一炮的傳道事工為家長團契，平均共有 10 多位家長參與，教人鼓舞。[268] 2001 年暑假，傳道區開設家禱聚會，於每月的第二和

---

259 同上；李玉潔，〈愛在青衣的日子〉，《荊情集——青衣傳道區》，期 2:11。

260 李玉潔：〈愛在青衣的日子〉，11。

261 同上。

262 同上。

263 麥偉麟：〈這個嬰兒誕生了〉，10；〈聖公會荊冕堂二零零一年度第三次牧區議會會議紀錄〉，2001 年 4 月 1 日，荊冕堂文件；青衣傳道區的崇拜人數最高達 60 多人，見馬偉利：〈牧者的話〉，《荊情集——荊冕與我》，期 3:4。

264 蘇蘊明：〈青衣事工分享〉，《荊情集——青衣傳道區》，期 2:5–6；〈聖公會荊冕堂二零零一年度第四次牧區議會會議紀錄〉，2001 年 6 月 3 日，荊冕堂文件。

265 〈聖公會荊冕堂二零零二年度第五次牧區議會會議紀錄〉，2002 年 8 月 4 日，荊冕堂文件。

266 同上。

267 〈西九回顧宣教十年成效〉，3。

268 蘇蘊明：〈青衣事工分享〉，5–6；〈基督顯現堂〉，2。

第四個星期舉行。聚會的地點，初時是青衣荊冕堂幼稚園，後來輾轉來到李玉潔姊妹和其他弟兄姊妹的家中聚會。[269] 當中，有唱詩、代禱、研習神的話語及互相分享的時間。每次聚會約有 10 多人出席。[270] 2003 年，當非典型肺炎爆發之時，「我問大家會否擔心去家禱敘會，大家不約而同的回覆一點也不憂慮！我們還支持香港經濟，一起出外到青衣城某大酒樓吃晚飯。當晚大家除下口罩，大吃一頓，當中給我的啟示。原來彼此一句問候，已勝過疫症。」李玉潔姊妹感慨。[271]

以上對家長的傳道工作是青衣傳道區最早推展的事工，這明顯地有別於其他傳道區的發展歷程。家長團契歸信的團友中，有些更成為了顯現堂首次聖洗禮的新葡。[272]

2003 年，荊冕堂牧區議會青衣傳道發展科成立，科長李銘堃發表傳道區發展區 6 項理念：「回應教友訴求、落實議會決定、配合牧區發展、朝向教省遠象、實踐聖經教導、經歷信仰生命」。[273] 自 2001 年傳道區正式成立至 2003 年，傳道區已有幾位新葡加入教會。[274] 傳道區也加強與幼稚園及牧區學校的聯繫，讓學生、家長和教職員接獲福音，又積極調節主日學和兒童事工的編排，籌備兒童詩班，讓孩童可更投入教會生活，於每月第二及第四主日崇拜獻唱。[275] 兒童詩班於 2003 年定名為「小天使兒童合唱團」。[276]

---

269 李玉潔：〈「家」在青衣開始時〉，《荊情集——基督顯現堂》，期 8（香港：聖公會荊冕堂，2003 年 7 月），4。

270 同上。

271 同上。

272 〈基督顯現堂〉，2。

273 李銘堃：〈青衣傳道科未來大計〉，《荊情集——青衣傳道區》，期 2:5。

274 同上。

275 同上；〈聖公會荊冕堂二零零三年度第二次牧區議會會議紀錄〉，2003 年 2 月 9 日，荊冕堂文件。

276 〈聖公會荊冕堂二零零三年度第三次牧區議會會議紀錄〉，2003 年 4 月 6 日，荊冕堂

每月第四主日飯後由歐愛蓮帶領一家長小組。[277] 青衣傳道發展科於每月第二主日研討事工發展，另外又與校方聯誼會發展家長工作。[278] 2003 年 8 月，青衣區學校及社會服務單位的傳道牧養，全交由青衣傳道區統籌。[279] 同年，主日崇拜平均人數為約 50 人。[280] 2002 至 2003 年度，荊冕堂的增長方針為穩中求進，青衣傳道區的聚會人數增長目標為 60 至 70 人。[281]

2004 年 1 月 1 日，青衣傳道區也正名為聖公會基督顯現堂（The Church of Epiphany），也成為直屬教區的傳道區。[282] 同月 11 日（顯現期第一主日），是青衣傳道區正式成為新傳道區和差遣聖餐崇拜的日子，在青衣邨何澤芸小學舉行。[283] 同時，馬偉利牧師調任至基督顯現堂和主愛堂。2008 年起，青衣幼稚園正式交由基督顯現堂管理。[284] 至 2012 年，基督顯現堂參與主日崇拜的人數，由最初幾十人，增加至每主日超過 200 人。[285]

文件。

277 〈聖公會荊冕堂二零零三年度第二次牧區議會會議紀錄〉，2003 年 2 月 9 日，荊冕堂文件。

278 同上。

279 〈聖公會荊冕堂二零零三年度第五次牧區議會會議紀錄〉，2003 年 8 月 3 日，荊冕堂文件。

280 〈聖公會荊冕堂二零零三年度第二次牧區議會會議紀錄〉，2003 年 2 月 9 日，荊冕堂文件。

281 〈二零零三年度荊冕堂退修會暨計劃營中討論概括〉，2002 年 12 月 7 日，荊冕堂文件。

282 歐愛蓮：〈主的用人〉，《荊情集——基督顯現堂》，期 8:13；〈聖公會荊冕堂二零零三年度第一次牧區議會會議紀錄〉，2002 年 12 月 5 日，荊冕堂文件。

283 〈十年內成立之傳道區〉，《香港聖公會教省成立十周年紀念特刊（1998–2008）》（香港：香港聖公會教省辦事處，2008），73；〈基督顯現堂〉，2。

284 〈聖公會荊冕堂二零零八年度第五次牧區議會會議紀錄〉，2008 年 8 月 3 日，荊冕堂文件。

285 〈西九回顧宣教十年成效〉，3；〈服務青衣積極開拓禾場〉，《教聲》期 1819（2011 年 1 月 16 日）：2。

基督顯現堂的堂徽（圖 1）中的荊棘冠冕，象徵了基督顯現堂的歷史根源來自荊冕堂。[286]



基督顯現堂堂徽[287]

向長者、北葵涌居民傳道：主愛堂

荊冕堂牧區範圍包括荃灣、大窩口、葵涌和青衣，且這些地區的人口亦不斷擴展，荊冕堂服侍對象的人數實在龐大。七、八十年代，教省並沒有仔細規劃葵涌的事工發展，令該區的聖公會學校和社區中心，未能好好互相配搭宣教傳道。[288] 1989 年，當馬牧師成為荊冕堂的主任牧師後，深感荊冕堂牧區之大，難以單憑一堂之力實行全區的宣教牧養工作。[289]

---

286 〈香港聖公會西九龍教區繼續舉辦各項培育工作〉，《教聲》期 1456（2004 年 2 月 1 日）：6。

287 〈堂徽簡介〉，香港聖公會基督顯現堂網頁，2018 年 10 月 22 日瀏覽，http://dwk.hkskh.org/epiphany/aboutus.aspx?id=646。

288 李廣平：〈十年樹木〉，《聖公會主愛堂十周年紀念堂刊——一九九七至二〇〇七》（香港：聖公會主愛堂，2007），3。

289 李廣平：〈整裝待發的主愛堂〉，同上書，5。

其後，林植宣博士作為麥理浩夫人中心管理委員會主席，提出中心身為一個具有基督教背景的機構，應加以推展福音事工。[290] 於是，他與蘇以葆會吏長、馬牧師商量，於中心成立佳音事工部，推動關顧心靈健康，又與荊冕堂合作舉辦了耆樂團契，也借出中心二樓為每週崇拜和教友聚會之用。[291] 當時林護老人之家的長者漸多，同時也希望設立團契，方便行動不便的長者參加聚會，不用舟車勞頓到荊冕堂參加聚會。[292] 因着長者熱切的慕道和福音需要，加上北葵涌並無一所禮拜堂，各個單位包括荊冕堂一致認為須在區內成立一所禮拜堂。[293]

與此同時，麥理浩夫人中心關注中心會員的靈性健康，和教會的福傳問題，便主動倡議成立傳道區。[294] 主愛堂是第一個由社服單位發起的傳道區，也是第一個先有社服單位、後建立教堂的傳道區，這是前所未見的。[295] 而且，中心的佳音服務部甚至比教堂更早成立。[296]

---

290 李廣平：〈十年樹木〉，同上書，3。

291 同上；李廣平：〈整裝待發的主愛堂〉，5；鄭秀蘭：〈由零開始的主愛堂〉，《聖公會主愛堂十周年紀念堂刊》，9；〈基督顯現堂〉，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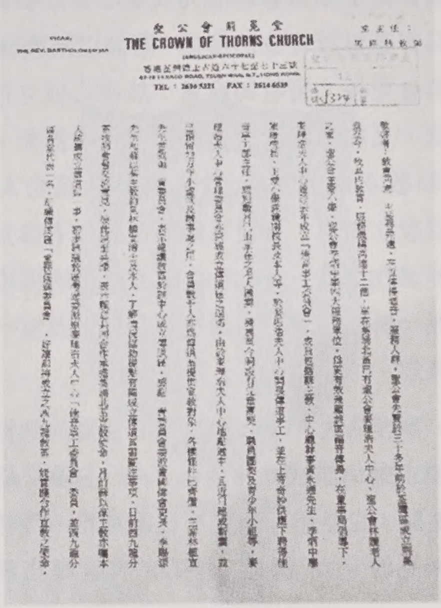
292 李廣平：〈整裝待發的主愛堂〉，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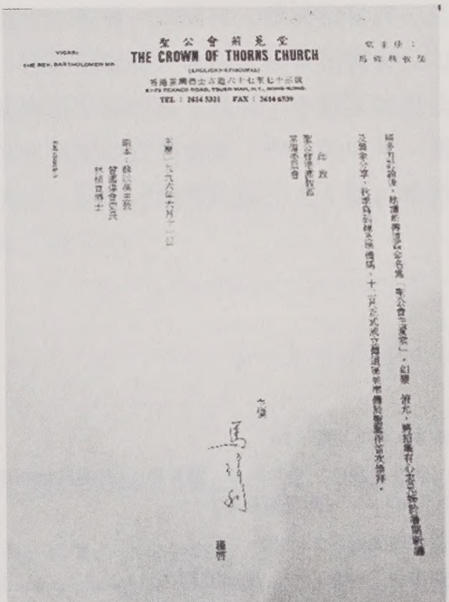
293 鄭秀蘭：〈由零開始的主愛堂〉，9；〈基督顯現堂〉，2。

294 〈由社服單位倡議建立主愛堂〉，《教聲》期 1484（2004 年 8 月 15 日）：2。

295 〈教堂社服合作的最佳示範〉，《教聲》期 1484（2004 年 8 月 15 日）：2。

296 同上。





馬偉利牧師去信港澳教區常備委員會，建議在麥理浩夫人中心成立新傳道區

蘇以葆會吏長和馬牧師，正式聯合荊冕堂、聖多馬堂、諸聖堂等教堂，抽調人手開展各事工。[297] 主愛小學的鍾鏡南校長和李炳中學的陳璟校長，多年來成為主愛堂堂務促進委員會的會員。[298] 吳煜明弟兄，是麥理浩夫人中心的員工和中華基督教會全完堂的教友。[299] 他看到主愛堂人手短缺，便回應神的呼召，加入中心的佳音事工委員會和主愛堂事奉。[300] 另外，梁鑑洪弟兄本是佳音服務部的負責人，後來更成為主愛堂的傳道幹事。[301]

1993 年，荊冕堂的牧者和資深教友也負責外展耆老傳道事工，包括麥理浩夫人中心的耆樂團契，和長發安老院的恩光團契。[302] 荊冕堂的黃沛宜弟兄，更是第一位以荊冕堂牧區議員的身分到主愛堂事奉，其後還成為了義務牧養助理。同年，中心決定擴建裝修，於原址側建一座新大廈，新廈 4 樓將設有小聖堂，主日作崇拜聚會之用，平日作家庭服務中心。[303] 牧區議會通過撥款 20 萬支持裝修小聖堂，日後小聖堂可方便荊冕堂於牧區宣教傳道。[304] 而且，林植宣博士最後也捐出了 20 多萬作為建堂費用。[305]

及至 1996 年，麥理浩夫人中心的佳音事工委員會預備成立傳道區，並向教區申請於中心設立崇拜，呼籲荊冕堂有心志的教友參與。[306]

---

297 李廣平：〈整裝待發的主愛堂〉，5。

298 李廣平：〈十年樹木〉，3。

299 鄭秀蘭：〈主內盡其職，成全主聖工〉，《聖公會主愛堂十周年紀念堂刊》，10。

300 同上。

301 〈教堂社服合作的最佳示範〉，《教聲》期 1484（2004 年 8 月 15 日）：2。

302 〈荊冕堂傳道部 1993 年度上半年事工報告〉，荊冕堂文件。

303 〈聖公會荊冕堂一九九三年度牧區議會第六次會議〉，1993 年 9 月 12 日，荊冕堂文件。

304 同上。

305 〈由社服單位倡議建立主愛堂〉，《教聲》期 1484（2004 年 8 月 15 日）：2。

306 〈聖公會荊冕堂一九九六年度牧區議會第四次會議〉，1996 年 5 月 19 日，荊冕堂文件。



舊堂拆卸前，馬偉利牧師和同工合照（1999 年 7 月）[307]

馬牧師同時是基督顯現堂和主愛堂的主理聖品，而池牧師負責協助。[308] 牧民主任蘇國良負責傳道、關懷和牧養工作，而佳音部幹事張捷興則負責前線佈道宣教工作。[309]

1996 年 12 月，主愛堂正式成立，牧養的範圍主要是北葵涌區，包括梨木樹、石籬、安蔭、九華徑、荔景和麗瑤等等。[310] 中心的 10 多個服務單位也是主愛堂的傳道接觸點。[311] 同月，主愛堂在中心舉行了首次崇拜，邀請蘇以葆主教證道，林護老人之家的長者們就成為了主愛堂的第一批教友。[312] 崇拜的參加者中，長者佔六七

307 香港聖公會荊冕堂所藏圖片。

308 〈青少年培育工作迅速發展〉，《教聲》期 1484（2004 年 8 月 15 日）：2；李廣平：〈十年樹木〉，3。

309 〈青少年培育工作迅速發展〉，5。

310 〈主愛堂〉，《教聲》期 1484（2004 年 8 月 15 日）：2。

311 同上。

312 李廣平：〈整裝待發的主愛堂〉，5；〈在主愛裏的 10 年…〉，《聖公會主愛堂十周年紀念堂刊》，29。

成。[313] 至 2001 年，主愛堂成立了青少年團契，在暑假舉辦籃球福音事工，吸引兒童和青年參加。[314] 主愛堂青年教友和青年培育工作因此亦迅速增長和發展。至 2015 年，主愛堂的牧養部門包括主日學（幼稚級、初小級、高小級、家長、長者）、少年團、高少青團及耆樂團契。[315]

説起建堂的種種困難，主愛堂開堂之初只有十多人，而堂委也是由其他友堂調配過來。因此開堂後面對的首要問題，就是事奉人手常常短缺。[316] 另一為場地問題。因舉行崇拜和聚會的場地是經由中心借來的，故每次聚會時須「朝行晚拆」重新設置場地，每逢中心有活動時又須遷移至中心的其他地方，猶如遊牧民族。[317] 沒有固定的場地，也難以讓教友建立對教會的歸屬感，傳道果效也大打折扣。[318]

2006 年，主愛堂遷至葵涌石蔭主愛小學的新聖堂，主愛堂才有固定的地方聚會，「令教友有落地生根的感覺」。[319] 鄰近民居和學校禾場，也大有發展空間。該年亦是主愛堂成立十周年的大日子。2006 年 11 月 19 日，為遷堂後主愛堂的首個崇拜，更邀請了主愛小學的學生獻唱。[320] 當天主愛小學師生與主愛堂教友一起參與崇拜，參與崇拜的人數約有二百多人，場面熱鬧。[321]

---

313 〈主愛堂〉，5。

314 同上。

315《香港聖公會主愛堂堂刊》，2015 年 1 月 31 日，3。

316 李廣平：〈整裝待發的主愛堂〉，6；鍾鏡南：〈十年恩典〉，《聖公會主愛堂十周年紀念堂刊》，7。

317 李廣平：〈整裝待發的主愛堂〉，6；鄭秀蘭：〈主內盡其職，成全主聖工〉，10；〈缺乏中仍緊握使命〉，《教聲》期 1484（2004 年 8 月 15 日）：2。

318 同上。

319 同上。

320 〈十周年慶祝活動〉，《聖公會主愛堂十周年紀念堂刊》，36。

321 同上。

財政困難也是主愛堂需要面對的問題。因主愛堂服事的北葵涌區，居民多來自低下階層，加上教友以長者和學生為主，傳道區的收入和收到的奉獻金額有限。[322] 可是，聖品和幹事都認為，教友對奉獻的觀念清晰，就像奉獻兩個小錢的婦人一樣——「將最好的、能夠負擔的獻給主，這份心意最叫人感動」。[323]



四十周年堂慶，全體聖品人、詩班及會眾合照留念（2005）[324]

四．堂慶活動

1. 四十周年

2005 年，是荊冕堂經歷水災、火災、盜竊及重建「四災」後的堂慶。2005 年 6 月 26 日，荊冕堂舉行了堂慶感恩崇拜，當晚亦有感恩晚宴暨懷舊晚會，邀請赴會者穿著 60 年代的服飾出席。[325] 7 月 22 日，是荊冕堂開放日暨嘉年華會，有攤位遊戲、宗教書籍展覽、親子美勞製作、福音電影播放及音樂欣賞等活動。[326] 7 月 30 日有福

322 〈缺乏中仍緊握使命〉，5。

323 同上。

324 香港聖公會荊冕堂所藏圖片。

325 霍耀全：〈四十周年堂慶籌委會主席謝辭〉，《聖公會荊冕堂四十周年堂慶紀念特刊》，118。

326 同上。

音佈道晚會「家家有本要唸的經」，講員為盧龍光牧師，藉堂慶的機會廣傳福音，加強牧區和坊眾之間的聯繫。[327]

2. 五十周年金禧

2015 年是荊冕堂五十周年金禧的大日子。2015 年 6 月 28 日，荊冕堂舉行了金禧啟動禮，愛筵後婦女部、福音粵曲組、幼兒詩班、基斯小組、青少年部、青咖哩團和弟兄團契均有精彩表演。[328] 聚會中也播放由年青人製作的「社區剪影」短片，向教友展示牧區與社區的密切關係。[329]

同年 11 月 22 日，荊冕堂舉行金禧感恩崇拜及晚宴。崇拜由鄺保羅大主教主禮，陳謳明主教講道，曾在荊冕堂事奉的聖品擔任聖餐襄禮，林護中學管弦樂小組參與演奏。[330] 是次崇拜共有 450 人出席。[331] 陳主教的講道以「荊冕的啟示」為題，指出因着基督為世人受苦，羅馬兵丁給耶穌戴上「荊冕」，今天的基督徒從「荊冕」中，就可具體地領悟耶穌就是那「至羞、至殘、至痛至苦、至難的『君王』」。[332] 那至高無上的「君王」，同時，也是卑微受苦的「僕人」。[333] 耶穌基督君王的身分，也啟發了不少革命者，感動無數人關懷社會、熱愛窮人，又感召人廢除奴隸制度，使人擁有人權、民主、自由的理想。[334] 因此，他勉勵荊冕堂教友為神的國度獻上自己，獻上「荊冕」精神——屈辱就是榮耀，卑微乃是大能

327 同上。

328 〈金禧慶祝活動回顧〉，《荊情集——金禧慶祝活動回顧！》，期 18（香港：聖公會荊冕堂，2016 年 7 月），5。

329 同上。

330 〈荊冕堂服務荃灣五十載邁向新里程〉，《教聲》期 2074（2015 年 12 月 7 日）：1。

331 〈金禧慶祝活動回顧〉，6。

332 〈荊冕堂服務荃灣五十載邁向新里程〉，1。

333 同上。

334 同上。

——這一種看似完全矛盾的「反合」特質。[335] 此外，陳主教感謝一眾先後在荊冕堂事奉的聖品，如此勾勒每位牧者對荊冕堂的貢獻與服事：

> 在崇拜一身兼數職，連司琴都包辦的首任堂主任鄺廣傑榮休大主教；在經濟困難中仍推動幼兒教育及夜校發展，對貧苦學童加以關心援助的梁熾靈牧師；以「奮鬥不顧創傷，勞苦不求休息」為事奉寫照的廖翼顯牧師；在靈性上培育，建立荊冕團隊精神的鮑彼得牧師；使教堂與社區服務連成一體的林彼得牧師，當日更專程由美國回港參加堂慶崇拜；親自督師令荊冕堂確立「三頭馬車」協作傳統的蘇以葆主教；與教堂一同經歷火災、水災、教堂重建、發展新傳道區的馬偉利牧師；秉承荊冕精神，愛護各階層人士和動物的池嘉邦牧師；謙卑服侍及牧養的黃健新牧師；還有在牧區事奉 7 年多，由助理聖品至出任堂主任的郭志芊牧師等等。[336]

當天的晚宴在荃灣悅來酒店舉行，筵開 52 席。[337] 教友在晚宴中，也為歷任牧者預備不同有趣的禮物表示謝意，記念他們對教會的付出。[338] 11 月，荊冕堂也出版了金禧紀念特刊，訪問歷任牧者於荊冕堂的事奉歷程和現況。除了教友外，特刊也派發給牧區內的學校及社會服務單位。[339]

金禧活動還有於 2016 年 2 月 10 日為牧區家庭事工籌款的步行籌款，和由 2015 年 12 月至 2016 年 6 月舉辦的牧區學校便服日，分

---

335 同上。

336 同上。

337 〈金禧慶祝活動回顧〉，6。

338 〈荊冕堂服務荃灣五十載邁向新里程〉，1。

339 〈金禧慶祝活動回顧〉，7。

別籌得 20 萬元及 12 萬元。[340] 及至 2016 年 7 月 3 日，金禧活動行閉幕禮，由陳主教主持，並設愛筵同樂。[341]

五・小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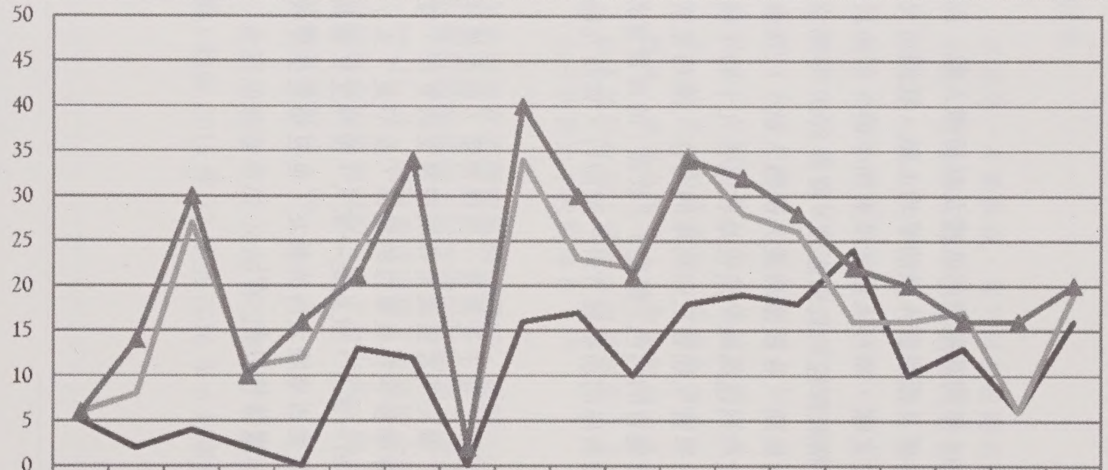
表七整理了 1997 年至 2015 年間荊冕堂的洗禮及堅信禮人數，而表八是同一時期參與主日崇拜及領聖餐人數的平均人數。我們可見，經歷一批信徒離開的分裂之痛，崇拜人數一度有所下降，但由於牧區齊心應對，事件並沒有構成深遠的負面影響。隨着 2002 年新堂落成，荊冕堂再進入新的增長期，在孩童和成人洗禮人數，以及參加主日崇拜和領聖餐的人數均到達高峰。這也是牧區在九十和千禧年代銳意經營傳道和培育的果實。加強三頭馬車的合作，讓荊冕堂在學校和社會服務中心擔當靈育的角色，體現了「牧區」的真實意義。荊冕堂的工作，與教省和教區的新發展方針一致前行。如西九龍教區陳謳明主教強調：

> 一個「牧區」、「傳道區」並不是單指一間禮拜堂，而是禮拜堂所座落的整個地區！關心所在區域是每間禮拜堂的責任，禮拜堂所在區域的聖公會學校和社服單位的關係，並不是「主」和「客」，而是禮拜堂的一部分，彼此是一家人，禮拜堂牧養關懷的對象，不單是禮拜堂四堵牆之內的教友，也包括這些學校和社服單位的持分者、服務使用者。[342]

340 同上，7–8。

341 同上，8。

342 〈西九龍教區議會會議探討堂校社服協作路向〉，《教聲》期 2019（2014 年 11 月 16 日）：1。見〈西九龍教區教育路上與主同行異象分享〉，《教聲》期 2003（2014 年 7 月 27 日）：3。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孩童洗禮	5	2	4	2	0	13	12	0	16	17	10	18	19	18	24	10	13	6	16
成人洗禮	6	8	27	11	12	24	34	2	34	23	22	35	28	26	16	16	17	6	19
堅信禮	6	14	30	10	16	21	34	2	40	30	21	34	32	28	22	20	16	16	20

表七：荆冕堂洗禮及堅信禮人數（1997–2015）

	主日崇拜(人)	增長率(%)	領聖餐(人)	增長率(%)
1997	124	+2.82%	94	+6.78%
1998	119	–4.11%	86	–8.28%
1999	133	+11.07%	86	–0.05%
2000	131	–0.78%	93	+7.89%
2001	125	–4.99%	81	–12.34%
2002	162	+29.68%	97	+19.06%
2003	170	+5.09%	115	+18.91%
2004	200	+17.56%	143	+23.63%
2005	218	+9.18%	155	+8.93%
2006	227	+3.85%	166	+6.56%
2007	255	+12.44%	191	+15.36%
2008	271	+6.18%	215	+12.62%
2009	285	+5.38%	217	+0.84%
2010	289	+1.29%	222	+2.51%
2011	277	–4.15%	217	–2.29%
2012	261	–5.94%	209	–3.85%
2013	237	–9.15%	193	–7.38%
2014	216	–8.62%	182	–5.83%
2015	216	+0.02%	185	+1.37%

表八：荆冕堂出席主日崇拜及領聖餐平均人數（1997–2015）[343]

「福傳」是要傳布天國的道理、基督的價值（Value of Christ），與世界價值（Value of the World）作對比，感染、影響和轉化世界。教會的增長是福傳的結果，但「增長」卻絕對不是福傳的目的！[344]

343 見荊冕堂文件：〈聖公會荊冕堂教友名冊 1–630〉;〈聖公會荊冕堂教友總名冊 S.K.H. Crown of Thorns' Church Parishioners General Record〉;〈聖公會荊冕堂堅振禮紀錄冊 S.K.H. Crown of Thorns' Church Confirmation Record〉。

344 〈西九教區議會集思福傳策略〉,《教聲》期 1916（2012 年 11 月 25 日）：1。

因每個牧區和傳道區所座落的社區的特點不同，其三頭馬車宣教工作的經驗也是獨特的。[345] 牧區牧者也不能「一本通書睇到老」，唯有在教堂、學校和社服單位用心播種，等待上帝工作。[346]

基督顯現堂和主愛堂這兩個傳道區的發展也各有特色。基督顯現堂一直與學校保持緊密關係，彼此分享同一異象、同一使命。馬牧師認為，在學校發展傳道區是可行的，因每年學校有新生入讀和畢業，學生和家長的到來川流不息。[347] 學生來自青衣不同的屋苑，而聖公會在青衣也有不同的教育和社服據點，學生和服務使用者均遍佈青衣。這大大有利於推展福傳事工。[348] 主愛堂的成立，更是史無前例，由社服單位提出的。主愛堂張捷興傳道幹事表示，主愛堂和麥理浩夫人中心合作無間，一同舉辦耆樂團契、課餘托管、音樂治療、婦女和青少年工作等。[349] 主愛堂也負責協助中心的兩所幼稚園舉行聖經班。[350] 而且，每一年主愛堂都與中心一同舉行佈道會，每次也得到區內中心、學校和其他教會支持。[351] 不少原先只預算約有百多人出席的佈道會，最後竟有四五百人出席，有時候甚至有逾千人！[352] 雖然主愛堂與中心的佳音服務部行政上是獨立個體，但事工上是合而為一的。[353]

相對於全港的情況，從 1992 年至 2002 年，香港各宗派教會參加崇拜的人數有下降趨勢。[354] 然而，西九龍教區這十年間的主日

345〈西九龍教區教育路上與主同行異象分享〉，3。

346〈堂校社服配搭宣教見證信仰〉，《教聲》期 1883（2012 年 4 月 8 日）：3。

347〈基督顯現堂〉，2。

348 同上。

349〈主愛堂〉，2。

350 同上。

351 同上。

352 同上。

353 同上。

354〈西九回顧宣教十年成效〉，3。

崇拜人數反增加一倍，也有 4 個傳道區及 3 個傳道點，可見教區的宣教工作漸見成效。[355]

355 同上。

第六章

跨越千禧的全人關顧

（2000–2015）

一·跨越千禧的教育與社會服務

1. 廿一世紀的香港社會

在教省於 2000 年推出的跨越千禧五年計劃內，首先提及教省在廿一世紀所面對的挑戰。

社會問題激化方面，教省認為香港社會問題日趨複雜，當中以賭博、歧視、虐待、自殺、家庭破裂和老弱者缺乏照顧等問題更為普遍。[1] 社會分化、貧富懸殊等現象亦越見嚴重。綜緩家庭、新移民家庭及老弱者等弱勢社群，在社會中備受歧視和壓逼。[2] 科技發

1〈社會問題激化的挑戰〉，《邁進千禧，榮主牧民——香港聖公會廿一世紀遠象：五年計劃諮詢文件》（香港：香港聖公會，1999），9。

2 同上。

展方面，電腦互聯網高速發展，大大改變了人類生活的習慣和溝通模式。[3] 受科技充斥的社會令人的生活和工作技能容易變得過時，增添人生活上的恐懼。[4] 人際關係亦以科技而建立，個人容易變得與群體疏離和自我中心，減弱人際溝通能力。[5] 人際關係方面，香港於廿一世紀的經濟模式為知識型社會，發展趨向都市化，人的價值觀充滿着功利主義，人情淡薄。[6] 夫妻及家庭成員之間的信任與和諧備受考驗，家庭糾紛亦影響子女的成長，繼而直接影響他們的性格塑造。[7] 世俗化及價值真空方面，香港社會日趨世俗化——金錢掛帥、濫交及性觀念開放、傳媒渲染色情，價值觀模糊。[8] 青年因而缺乏清晰的標準作成長的指引，以致容易被世俗同化，隨波逐流。[9] 人心虛空方面，人們表面上風光、物質充裕，背後卻埋藏不少空虛孤單，得不到解脫。[10]

以上各個層面的時代挑戰，教省認為是教會回應上主的契機，讓教會成為港人得安慰之所，使富足的懂得關心他人，受傷的得醫治。[11]

2. 聖公會的全人關懷、多元化的教育與社會服務

教省的跨越千禧五年計劃，確立了教會的使命要點。除了確立以傳道、教育和社會服務服侍有需要人士外，其中一個要點「社會服務，

---

[3]〈高科技與資訊的挑戰〉，《邁進千禧，榮主牧民》，9–10。

[4] 同上，10。

[5] 同上。

[6]〈人際關係疏離的挑戰〉，同上書，10。

[7] 同上。

[8]〈世俗化及價值真空的挑戰〉，同上書，10–11。

[9] 同上，11。

[10]〈人心虛空的挑戰〉，同上書，11。

[11]〈充滿挑戰的時代徵兆〉，同上書，11。

全面照顧」——教省將積極推動創新的社會服務，確保所提供的服務，能建立一個互相關懷的社區。[12]

至 2010 年 6 月，第五屆教省總議會通過《香港聖公會教育政策文件》，闡述教省的辦學理念和對屬校牧養福傳的方針。文件表明教會的教育使命，是「推展基督教全人教育的價值觀」，過程中與教職員、學生及其家人分享福音。[13] 為實現使命，其中一項政策為加強堂校連繫，每個牧區應承擔牧區學校的福傳事工，視學校為牧區的重要部分，計劃福傳事工和社會服務時應盡量配合學校。[14] 而且，學校應與牧區主任和牧區議會協作，推廣宗教教育，為教職員和學生提供牧民照顧。[15] 另外，學校應設駐校校牧，推動校內的屬靈事工。[16] 各教區亦應促進各牧區與學校的關係，鼓勵牧區主動承擔校牧的工作。[17] 同年，西九龍教區亦成立「教育專責小組」，主動配合在學校推動宣教牧養。[18]

2013 年 6 月，第六屆教省總議會通過《香港聖公會社會服務政策文件》，是教省有史以來第一份相關的政策文件。[19] 文件指出於九十年代，教會已發展多元化的社會服務，包括幼兒、青年、家庭、長者及社區事工。[20] 千禧年代，教省繼續加設復康服務，營運長者住宅單位，提供基層醫療服務，推動社區創新。[21] 香港回歸後在政

---

12 〈社會服務，全面照顧〉，同上書，49。

13《香港聖公會教育政策文件》，2010 年 6 月，1。

14 同上，3。

15 同上。

16 同上。

17 同上。

18〈加強堂校連繫〉，《教聲》期 1811（2010 年 11 月 21 日）：1。

19〈教省社服單位全力落實《社會服務政策文件》〉，《教聲》期 2070（2015 年 11 月 8 日）：1。

20《香港聖公會社會服務政策文件》，2013 年 6 月，1。

21 同上。

治、經濟及社會等方面發生很大的變化，聖公會社會服務應進一步本土化，整合身、心、社、靈為重的服務模式，回應社會的需要。[22] 此外，文件確立聖公會社會服務的神學觀，指出社會服務體現基督道成肉身的精神。[23] 社會服務除了服侍有需要的人，還要是天國工程的一部分，配合教會的宣講和牧民，於社會推動復和。[24] 牧民工作是以「全人關顧」為核心，因上帝創造的人是整全的。[25] 為實踐這項「天國工程」，教省提出「共負一軛」的方針，社會服務單位應視自己為牧區的一分子。[26] 教省將強化牧區功能，以牧區教堂為中心，牧區內的堂、校和社會服務單位應組織網絡關係，發揮聖公會「我們雖眾，仍屬一體」的精神。[27] 另外，服務單位應提供機會，鼓勵聖公會教友、老師和學生，參與義務工作和其他社會服務，讓「三頭馬車」可組成互相支援的愛心網絡，也另可適時地設立同工團契和舉辦各類型的福音事工。[28]

二・牧區的教育工作與學生牧養

1. 香港幼兒教育課程改革回顧

早於八十年代，社會福利署雖鼎力資助不少教會、社團和教育人士開辦幼稚園和托兒所，但幼兒教育仍未全面普及，而且幼兒教育老師（下稱幼師）培訓十分不足，質素參差。[29] 為配合政府在 1981

22 同上，5。

23 同上，3。

24 同上。

25 同上，4。

26 同上，5。

27 同上。

28 同上，6。

29 陸趙鈞鴻：〈幼兒教育在香港的重要〉，5；馮潔皓：〈二十一世紀的香港幼兒教育課程改革——回顧與前瞻〉，《教育學報》（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4），100。

年所頒布的《小學教育及學前服務白皮書》，亦有見於幼師培訓不足的問題，政府於 1984 年首次制訂第一本官方課程指引《幼稚園課程指引》，主要指導教育機構和老師如何設計課程。[30]

隨着世界整體教育的新發展，以及香港在政治、經濟和社會各方面的轉變，政府於 1987 年、1993 年及 1996 年，也曾推出新課程指引，涵蓋兒童發展特徵。至 2000 年，政府推行教育改革，推出《終身學習・全人發展——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議》，認為教育可「幫助每個人發展潛能、建構知識及提升個人素質；它〔教育〕賦予每個人掌握前途和開拓未來的能力」。[31] 教育改革的目標，是希望：

> 讓每個人在德、智、體、群、美各方面都有全面而具個性的發展，能夠一生不斷自學、思考、探索、創新和應變，具充分的自信和合群的精神，願意為社會的繁榮、進步、自由和民主不斷努力，為國家和世界的前途作出貢獻。[32]

2006 年，配合 6 年前的教育改革，課程發展議會編訂了新的《學前教育課程指引》，根據兒童發展心理學，加入零歲至六歲兒童發展特徵的資料，肯定兒童是學習的主體，而教師的角色是推動者和鼓勵者，協助兒童學習和成長。[33] 而且，指引提倡以兒童為本的原則——在認識和尊重幼兒的大前提下，家庭、學校和社會須作適切的配合，才能使幼兒發揮潛能，健康成長，終身喜愛學習。[34]

---

30 馮潔皓：〈二十一世紀的香港幼兒教育課程改革〉，95–96，100。

31 教育統籌委員會：《終身學習・全人發展——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議》（香港：教育統籌委員會，2000），i。見教育統籌委員會網頁，2016 年 8 月 11 日，http://www.e-c.edu.hk/tc/reform/rf1.html。

32 教育統籌委員會：《終身學習・全人發展》，4。

33 教育統籌委員會：《學前教育課程指引》（香港：教育統籌委員會，2006），6。

34 同上，7–8。

2. 聖公會荊冕堂士德幼稚園

2002 年，荊冕堂新堂落成，當時由張翠華女士擔任校長，幼稚園服務繼續展開。得蒙荊冕堂牙科醫務所高傑德醫生對幼稚園教育的支持，為紀念其先夫 Sadick，幼稚園改名為士德幼稚園。[35]「士德」二字取自"Sadick"的譯音，而且「士」意為讀書人，「德」為「德行」，寄寓幼兒都能成為有德行有智慧的人。[36] 幼稚園教學樓設於荊冕堂的一樓及三樓，空間之大在同區少見。[37]

為了強化關係，荊冕堂的主任牧師會擔任幼稚園的當然校董會主席及校董，而校董會由荊冕堂資深教友組成，幼稚園校牧亦由教會牧者出任。麥理浩夫人中心主辦的荊冕堂牧民中心的輔導員，也出任駐校輔導員一職，負責幼稚園家長與學生的心靈關顧。所有幼稚園教師均擁有幼兒教育證書或以上的專業資格。[38] 2015 年，超過一半的教師持有學士或碩士學位。[39] 師生比例約 1 比 10。[40]

幼稚園的班級編制，分上午班及下午班，上午班的上課時間為上午 9 時至中午 12 時，下午班的為下午 1 時至 4 時。[41] 上午班及

35〈學校簡介〉，聖公會荊冕堂士德幼稚園網頁，2016 年 8 月 11 日，http://skhcotkg.edu.hk/sd/?page_id=16。2001 月 12 月，經牧區議會同意，幼稚園正式名為「聖公會荊冕堂士德幼稚園」，見〈聖公會荊冕堂二零零二年度第一次牧區議會會議紀錄〉，2002 年 12 月 2 日，荊冕堂文件。

36 同上。

37 胡鳳意：〈聖公會荊冕堂士德幼稚園英韓語普通話班一應俱全〉，《信報》，2016 年 2 月 25 日，C9。

38〈師資〉，聖公會荊冕堂士德幼稚園網頁，2016 年 8 月 11 日，http://skhcotkg.edu.hk/sd/?page_id=82。

39 同上。

40〈聖公會荊冕堂士德幼稚園培養孩子才德兼備〉，《Baby-mo 好媽咪》期 96（2016 年 2 月）：123。

41〈班級編制〉，聖公會荊冕堂士德幼稚園網頁，2016 年 8 月 11 日，http://skhcotkg.edu.hk/sd/?page_id=32。

下午班中，再細分為幼班、低班及高班。幼、低、高班各開 2 班，每班約 30 人。[42]

除了課室外，學校的設施還有戶外遊戲場、室內體能場、跳舞室、植林宣教園及士德藝術長廊等。[43] 藝術長廊誕生的源由，來自學校參加了由教育局舉辦的「內地與香港教師交流及協作計劃」，以美術活動提升幼兒的美藝興趣和能力。[44] 為了展示他們的藝術作品，讓各家長和幼兒可欣賞和感受美，學校設立了這長廊，展覽學生的作品。[45]

教學理念及課程

幼稚園的教學模式以幼兒為本，推行「設計活動」教學，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和興趣，配合他們的整體發展需要。[46] 而且，透過師生互動、自主而多元化的學習環境，讓幼兒從中建構知識，感受到主基督的愛，實踐幼稚園「樂於學習、善於溝通、勇於承擔、敢於創新」的教育目標。[47] 因學校以活動教學為主，故不會購買外間的教科書。梁金歡校長認為，幼稚園基本上不應為科目分界線，在同一主題下，可安排不同活動進行綜合教學。[48] 以「開設薄餅店」為例子，她說：「在玩的過程中，他們會數數字，例如做薄餅可以配以 5 款餡料，就學到 5 的概念；而美藝科目中，又可要求學生搓薄餅。

---

42 同上。

43 〈學校設施〉，聖公會莿冕堂士德幼稚園網頁，2016 年 8 月 11 日，http://skhcotkg.edu.hk/sd/?page_id=80。

44 王丹：〈家長如何欣賞和評價幼兒的美術作品〉，《聖公會莿冕堂士德幼稚園家長通訊》期 2（2013 年 5 月）：1。

45 同上。

46 〈課程簡介〉，聖公會莿冕堂士德幼稚園網頁，2016 年 8 月 11 日，http://skhcotkg.edu.hk/sd/?page_id=78。

47 同上。

48 胡鳳意：〈聖公會莿冕堂士德幼稚園英韓語普通話班一應俱全〉，C9。

所有科目的知識混合在活動內，不會割裂開來。」[49] 這種教學法，也能讓孩子真實接觸相關題材，從體驗中學習，並非紙上談兵。[50] 久而久之，孩子在活動中與同學和老師交流，便能學習如何清晰地說出自己的想法，練習口語表達能力。[51] 幼稚園本着耶穌基督的愛教育孩子，親切關心孩子的需要，細心留意當中的學習差異，有需要時提供適切支援。[52]

課程方面，不同的課題裏，老師為各級各班設計不同的活動、參觀及體驗，讓學生學習各範疇的知識，營造一種輕鬆、愉快的學習氛圍。自 2009 年，學生參與林林總總的體驗活動，包括參觀消防局、歷史博物館、科學館、智樂醫院遊戲工作坊、香港公園溫室、挪亞方舟公園和葛量洪滅火輪等。[53] 多年來，學生都有機會參觀交通安全公園，學習道路安全；又會參觀陽光笑容小樂園和參與漁農自然護理處講座，在活動中學習清潔牙齒和愛護自然生態。[54] 此外，他們也參加 2009 年的教省成立十週年嘉年華，並在 2014 年和 2016 年到訪仁立小學，盡顯堂校一家。[55]

除了活動學習外，幼稚園亦重視語文教育，尤其是英語和普通話。2015 年，校內有 3 名英語老師和 2 名普通話教師，讓學生每天

---

49 同上。

50 〈聖公會荊冕堂士德幼稚園培養孩子才德兼備〉，120–121。

51 同上。

52 同上，122。

53 見以下十篇〈活動剪影〉，《聖公會荊冕堂士德幼稚園家長通訊》期 2（2009 年 7 月）：4；期 3（2010 年 7 月）：4；期 3（2012 年 7 月）：4；期 1（2013 年 12 月）：4；期 2（2014 年 4 月）：4；期 2（2015 年 4 月）：4；期 2（2016 年 3 月）：4；期 3（2016 年 7 月）：4。

54 見以下兩篇〈活動剪影〉，《聖公會荊冕堂士德幼稚園家長通訊》期 1（2009 年 12 月）：4；期 2（2014 年 4 月）：4。

55 見以下兩篇〈活動剪影〉，《聖公會荊冕堂士德幼稚園家長通訊》期 2（2009 年 7 月）：4；期 3（2014 年 7 月）：4。

都可以學習這些語言。[56] 教師把語文教育滲入不同的學習和唱遊活動內，避免學生以死記硬背的方式學習語文。[57]

重視家校合作

與家長聯繫方面，幼稚園特別重視家校合作，認為由家庭、學校及孩子組成的家校合作是一個三角形，少了任何一角也不完整。[58] 2009年，幼稚園設立了家長義工，協助學校推行各事工和活動，如圖書借閱服務等。[59]「日子久了，家長會幫忙帶隊外出，也會向小朋友發問，甚至教他們去觀察，家長也是我們的老師。」梁校長說。[60] 孩子在獲取知識的過程中，學校負責「教授」，而家長則負責「輔助」。[61] 孩子與同學一起上課時互相學習，回家後再與家長分享，孩子的學習生活就這樣環環相扣。[62] 家長與孩子共同學習，家長當中也能明白孩子的強弱，與孩子保持溝通。[63] 如果家長沒有參與，小朋友的學習就不夠全面、被切割開來。[64]

此外，學校也會舉辦聯校家長專題講座、新生家長會、家長接見日及家長小組等，讓家長瞭解幼稚園的教學及子女的學習情況。[65] 為促進家長與子女的關係，讓家長參與子女的學習生活，學校不時舉行一系列的親子活動，如親子農耕體驗日、親子旅行、新生親子

---

56 〈聖公會荊冕堂士德幼稚園培養孩子才德兼備〉，121。

57 同上。

58 胡鳳意：〈聖公會荊冕堂士德幼稚園英韓語普通話班一應俱全〉，C9。

59 何淑美：〈校長的話——回顧與前瞻〉，《聖公會荊冕堂士德幼稚園家長通訊》期2（2009年7月）：1。

60 胡鳳意：〈聖公會荊冕堂士德幼稚園英韓語普通話班一應俱全〉，C9。

61 同上。

62 同上。

63 同上。

64 同上。

65 何淑美：〈校長的話——回顧與前瞻〉，1。

遊戲日、親子運動同樂日、親子團年飯及賣旗活動等。此外，五官八感工作坊及九型人格工作坊，也令家長能進一步瞭解子女的個性和情緒。[66] 以上活動均得到家長的熱烈支持與參與。[67]

幼稚園又出版《家長通訊》，希望藉此成為學校和家長之間的溝通橋樑。[68] 校方不時鼓勵家長全面地孩子關顧，多進行親子活動，與孩子共渡快樂時光。兼任幼稚園校董會主席和校監的荊冕堂堂主任、梁校長、牧民中心駐校社工朱傲雪姑娘等，也不時在《家長通訊》撰文，鼓勵家長多注意孩子的情緒健康，培養他們的自理能力，學習獨立自主。[69]

靈育與德育

幼稚園十分著重學生的靈育發展，亦將靈育與德育合一。[70] 幼稚園認為宗教故事中，隱藏了很多德育的元素，如和平、希望、信實及恩慈等。[71] 學校每天設有早上或中午祈禱、宗教課程和各項宗教活動，讓幼兒自小認識主耶穌基督的愛。[72] 有時候，孩子需要在全校同學面前祈禱，求寬恕或感恩，讓孩子有機會學懂承認過錯。[73] 而

---

66 同上。

67 同上。

68 〈家長心聲——徵稿〉，《聖公會荊冕堂士德幼稚園家長通訊》期 1（2009 年 12 月）：3。

69 郭志芊：〈編輯的話——健康與和諧〉，《聖公會荊冕堂士德幼稚園家長通訊》期 2（2010 年 4 月）：1；郭志芊：〈牧師分享——如何幫助孩子建立正確物質擁有之態度〉，《聖公會荊冕堂士德幼稚園家長通訊》期 2（2011 年 5 月）：1；朱傲雪：〈編輯的話——健康生活〉，《聖公會荊冕堂士德幼稚園家長通訊》期 2（2012 年 4 月）：1；朱傲雪：〈培養幼兒自理能力，作個有責任感的好孩子〉，《聖公會荊冕堂士德幼稚園家長通訊》期 1（2012 年 12 月）：1；梁金歡：〈健康情緒好管家〉，《聖公會荊冕堂士德幼稚園家長通訊》期 3（2013 年 7 月）：1。

70 〈聖公會荊冕堂士德幼稚園培養孩子才德兼備〉，121。

71 同上，122。

72 何淑美：〈校長的話——回顧與前瞻〉，1；見〈活動剪影〉，《聖公會荊冕堂士德幼稚園家長通訊》期 3（2014 年 7 月）：4。

73 〈聖公會荊冕堂士德幼稚園培養孩子才德兼備〉，122。

德育也融入活動教學中。例如有一段時間社會熱烈討論虐貓議題，孩子因同情小動物而情緒受到影響。[74] 老師抓緊時機，讓他們設計相關活動，如派發宣傳單張，與身邊人分享保護動物的訊息。[75]

學生也參與荊冕堂的崇拜和其他活動，不時在教堂的主日崇拜獻詩，讓家長及學生有更多機會接觸和體驗信仰。[76] 2009 年，學童參與報佳音，向長者分享聖誕的訊息。2011 年，他們也參與荊冕堂的聖誕感恩崇拜，演出「耶穌誕生的故事」。同年，幼稚園舉行畢業禮，學生在遊藝節目中演出，主題為「我們是天父的好管家」，從中認識上帝對人們的委託。[77] 2015 年，學生、家長及教職員也積極參加「聖公會荊冕堂慈善步行籌款 2015」。[78]

社區及牧區聯繫

幼稚園積極參與牧區小學及社會服務中心的活動，在牧區以堂校社服合一彰顯上主的愛。2014 年，老師在「我們的社區」課堂主題中，帶領低級班幼兒對社區表達關懷和認識不同的社區設施。[79] 校牧李轉珍傳道亦分享荊冕堂和牧民中心的關社活動，鼓勵家長效法德蘭修女和主耶穌，為有需要的人奉上無私的愛與關懷。[80] 扶助弱勢，「不一定要做什麼偉大的事，而是用心做好每一件小事。」[81] 同年，恩慈班參觀了大窩口社區中心及長者中心，認識中心的設施和服

---

74 同上。

75 同上。

76 〈活動剪影〉，《聖公會荊冕堂士德幼稚園家長通訊》期 1（2014 年 12 月）：4；〈活動剪影〉，《聖公會荊冕堂士德幼稚園家長通訊》期 3（2014 年 7 月）：4；〈校外活動〉，《聖公會荊冕堂士德幼稚園家長通訊》期 2（2016 年 3 月）：3。

77 〈活動剪影〉，《聖公會荊冕堂士德幼稚園家長通訊》期 3（2011 年 7 月）：4。

78 〈校外活動〉，《聖公會荊冕堂士德幼稚園家長通訊》期 2（2016 年 3 月）：3。

79 〈編輯的話〉，《聖公會荊冕堂士德幼稚園家長通訊》期 2（2014 年 4 月）：2。

80 同上。

81 同上。

務，瞭解社區中有需要的人，又探望社區中心的長者表達關愛。[82] 良善班走訪社區內的商店和公共機構，認識在內工作的人是為市民服務的，並向他們介紹自己，送上心意卡表示感謝。[83]

2014 年至 2015 年，學校鼓勵家長與學生參與親子義務工作。麥理浩夫人中心家庭活動及資源中心主任彭安瑜姑娘在《家長通訊》中指出，子女的心理情緒健康與社交發展，是不可忽視的發展範疇。[84] 她認為現今的孩子被身邊人過份保護，容易令他們誤以為別人的關心是「理所當然」的。[85] 學習付出和體會別人的需要，能讓孩子明白別人付出背後的愛與關顧。[86] 中級班的孩童與家長分別參加了不同的義工活動。信心班的陳柏麟家長參加了賣旗籌款後寫道：

> 那天十分寒冷，下着毛毛雨，柏麟和弟弟被媽媽不停地催促起床。終於起床了，吃過早餐，換好衣服，便到家樓下準備賣旗去……柏麟和弟弟穿得像兩個小雪人，站在一旁，最初不敢向路人賣旗，過了一會，柏麟如路邊小販般的叫起來:「有人要買旗嗎？有沒有人想幫我買旗呀？」媽媽心想，雖然這個不是最有禮貌的賣旗方法，但起碼小孩也作嘗試，是值得讚揚的。之後有不少善心人士來買旗，公公、小弟弟和印度叔叔等……[87]

溫柔班鄧煦澄家長，參與深水埗欽洲街橋底派飯活動，希望讓女兒學懂感恩和關心社會中有需要的人。

---

82 同上。

83 同上。

84 彭安瑜：〈互助互愛〉，《聖公會荊冕堂士德幼稚園家長通訊》期 2（2015 年 4 月）：1。

85 同上。

86 同上。

87 陳柏麟家長：〈親子義務工作經驗分享〉，同上通訊，2。

> 自暑假起，我們一家擔任了「關懷社區大使」參與義工派飯活動。煦澄初參加時，可能因天氣炎熱，加上天橋底聚集了很多人，她感到悶熱和不耐煩，還嚷着要回家⋯⋯最近聖誕假，我們又再來當義工，煦澄已很熟悉自己的崗位，每次都小心翼翼地用雙手把飯盒送給老人家，並說上一句「主耶穌愛你！」我們相信透過這行動讓煦澄學懂感恩和關心別人外，更希望一班老人家能認識神的愛。[88]

如彭姑娘所說，家長不應輕看以上小孩子所經歷的點點滴滴，因這些都能為孩子建立對人的信任，確立自我肯定。[89] 與孩子一起接觸社會，家長可與孩子從生活點滴中找尋意義，體驗如何與社群共存，脫離個人利益。[90]

幼稚園也與社區和牧區團體組織、學校及幼教團體，保持良好的協作支援網絡。[91] 幼稚園不時安排學生參觀牧區所屬的小學校舍，參與各小學所辦的運動會，又合辦活動和比賽，讓學生迎接小一的生活。[92] 2014 及 2015 年，幼稚園參與仁立小學校運會及主恩小學校運會的友校（幼稚園組）接力賽、主愛小學（梨木樹）舉辦的親子競技賽和幼稚園數學比賽，又在仁立小學聖誕嘉年華表演唱歌和舞蹈。[93] 幼兒也參與葵涌區的林護長者之家 19 周年和 20 周年院慶，表演舞蹈為長者帶來歡樂。[94]

---

88 鄧煦澄家長：〈親子義務工作經驗分享〉，同上通訊，2。

89 彭安瑜：〈互助互愛〉，同上通訊，1。

90 同上。

91 何淑美：〈校長的話——回顧與前瞻〉，1。

92 同上。

93 〈活動剪影〉，《聖公會荊冕堂士德幼稚園家長通訊》期 2（2014 年 4 月）：4；〈校外活動〉，《聖公會荊冕堂士德幼稚園家長通訊》期 1（2014 年 12 月）：3；〈校外活動〉，《聖公會荊冕堂士德幼稚園家長通訊》期 2（2016 年 3 月）：3。

94 同上；〈校外活動〉，《聖公會荊冕堂士德幼稚園家長通訊》期 1（2014 年 12 月）：3。

3. 聖公會荊冕堂葵涌幼稚園

八、九十年代，葵涌區幼兒教育服務供應不足。據麥理浩夫人中心於 1988 年發表的一項研究調查，區內婦女勞工流失率約有七成半，其中一項主要原因為照顧兒女。[95] 中心發言人林盧偉玲表示，工廠僱主雖願意投資「工廠幼兒服務」，但態度不積極。[96] 如區內團體主動提供幼兒托管和教育服務，可讓雙職父母安心投入工作，解決勞工短缺的問題。[97]

荊冕堂因需遷拆重建，當時教育署建校組邀請荊冕堂幼稚園在葵涌邨開辦幼稚園。[98] 結果，1998 年，聖公會荊冕堂葵涌幼稚園正式成立，是荊冕堂屬下另一所非牟利學前教育機構。[99] 荊冕堂的主任牧師，亦是幼稚園的當然校監。[100] 葵涌幼稚園與士德幼稚園一樣，配合教育局《學前教育課程指引》以「兒童為本」的精神，按照兒童的發展需要，為各級擬訂課程內容。[101] 辦學宗旨是遵從聖公會辦學的理念，[102] 為幼兒在德、智、體、群、美、靈六大學習範疇，提供多元化的活動學習經驗，以基督的愛教育，啟發他們的潛能。[103] 葵涌幼稚園的班級編制，為上午班和下午班各有三班，全日班兩班。[104]

95〈婦女婚後外出工作，幼兒服務需要甚殷〉，《葵青星報》期 234（1988 年 11 月 22 日）：8。

96 同上。

97 同上。

98 聖公會荊冕堂葵涌幼稚園網頁，2016 年 11 月 2 日，http://skhcotkg.edu.hk/kc/?page_id=13。

99 同上。

100〈校長的話〉，《聖公會荊冕堂葵涌幼稚園家長通訊》期 1（2015 年 1 月）：1。

101 聖公會荊冕堂葵涌幼稚園網頁，2016 年 11 月 2 日，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quality-assurance-framework/qr/qr-report/SKHCTC_KC.pdf。

102〈校長的話〉，《聖公會荊冕堂葵涌幼稚園家長通訊》期 1（2015 年 1 月）：1。

103 聖公會荊冕堂葵涌幼稚園網頁，2016 年 11 月 2 日，

葵涌幼稚園同樣強調牧區內堂校合作、家校合作和社區參與。為關切兒童和家長的需要，了解兒童的家庭狀況，幼稚園管理層和校牧進行家訪，向家長提供管教建議。[105] 2014 年，為了讓孩子透過詩歌和舞蹈認識和宣揚基督的愛，幼稚園還成立了「葵涌小綿羊」敬拜隊。[106]「葵涌小綿羊」也曾在由幼稚園主辦和林護紀念中學協辦的聖誕親子同樂日，及荊冕環保主日崇拜中獻詩。[107] 除了上宗教課認識信仰外，兒童亦參與不同的社區活動，如防止虐待兒童會和聖公會聖基道兒童院的親子賣旗、在聖公會林護長者之家表演話劇、探訪聖公會李嘉誠護理安老院等等。[108] 而且，荊冕堂牧民中心，亦為葵涌幼稚園的學生和家長提供全方位的輔導服務，為兒童和家長舉辦生命教育的主題活動，以提升他們有關個人成長的知識。[109] 牧區三頭馬車的協作，在此可謂充分體現了。

三・荊冕堂的社會服務

1. 服侍社區鄰舍——聖公會荊冕堂牧民中心

1985 年以後，不少社區中心仿效社會福利署的工作方針，邁向社區照顧的方向發展，工作方向以有共同問題或需要的人士為主，例如

---

http://skhcotkg.edu.hk/kc/?page_id=13。

104 聖公會荊冕堂葵涌幼稚園網頁，2016 年 11 月 2 日，http://skhcotkg.edu.hk/kc/?page_id=29。

105 聖公會荊冕堂葵涌幼稚園網頁，2016 年 11 月 2 日，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quality-assurance-framework/qr/qr-report/SKHCTC_KC.pdf。

106 〈葵涌小綿羊〉，《聖公會荊冕堂葵涌幼稚園家長通訊》期 1（2014 年 2 月）：6。

107 同上；〈活動相片〉，《聖公會荊冕堂葵涌幼稚園家長通訊》期 1（2015 年 1 月）：3。

108 〈社區參與〉，《聖公會荊冕堂葵涌幼稚園家長通訊》期 2（2014 年 7 月）；6；〈關懷社區〉，《聖公會荊冕堂葵涌幼稚園家長通訊》期 2（2003 年 3 月）：2；〈歡欣生活滿校園〉，《聖公會荊冕堂葵涌幼稚園家長通訊》期 1（2002 年 3 月）：4。

109 〈校長的話〉，《聖公會荊冕堂葵涌幼稚園家長通訊》期 4（2010 年 3 月）：1；〈牧民中心服務〉，《聖公會荊冕堂葵涌幼稚園家長通訊》期 2（2012 年 7 月）：7。

婦女、新移民、單親家庭、獨居老人、長期病患者及因失業而需要再培訓的人士等。[110] 九十年代，社會福利署更鼓勵社區中心提供以家庭為本的福利服務。

2009 年 3 月，牧區議會中，池嘉邦牧師分享鄺廣傑大主教的講道。[111] 當中池牧師提及在金融海嘯看見不少教友的需要，希望各牧區、社會服務單位及學校，能為牧區的有需要人士服務。[112] 池牧師建議開辦一間家庭資源服務中心，為有需要的教友、荊冕堂屬下幼稚園的學生家長，提供教育、牧靈、輔導或轉介服務，而牧區議會最後通過提案。[113] 其後，荊冕堂牧民中心於 9 月正式啟用。[114] 中心啟用後，隨即成立管理委員會，成員包括池牧師、郭志芊牧師、梁竹君宣教師、李轉珍宣教師、牧民中心朱傲雪社工、士德幼稚園和葵涌幼稚園的校長、校監龐得餘牧師、何敏茵姊妹及鄺國林弟兄。[115] 2010 年 7 月，因牧民中心的工作已展開，郭志芊牧師認為部分被委任的牧區議會議員、幼稚園校長、中心同工，應定期聯繫，共同商討中心的發展方向，加強三頭馬車領袖和機構之間的協作。[116] 自 2010 年，荊冕堂每年的牧區議會議員互選，共選出 3 位議員為牧民中心管理委員會會議代表。2013 年至 2014 年，聖公會荊冕堂牧民中心及傑德牙科醫務所，成為麥理浩夫人中心屬下的

---

110 梁祖斌：〈社區中心所肩負使命的轉變〉，18–19。

111 〈聖公會荊冕堂二零零九年度第二次牧區議會會議紀錄〉，2009 年 3 月 1 日，荊冕堂文件。

112 同上。

113 同上。

114 〈聖公會荊冕堂二零零九年度第三次牧區議會會議紀錄〉，2009 年 6 月 7 日，荊冕堂文件。同年，除了牧民中心外，荊冕堂更為聖雅各福群會的食物援助計劃，提供地方成為其中一個申請及食物分發站。見〈西九龍社區——重視身心靈需要〉，《教聲》期 1752（2009 年 10 月 4 日）：5。

115 〈聖公會荊冕堂二零零九年度第四次牧區議會會議紀錄〉，2009 年 9 月 6 日，荊冕堂文件。

116 〈聖公會荊冕堂二零一零年度第三次牧區議會會議紀錄〉，2010 年 7 月 4 日，荊冕堂文件。

服務單位。[117] 荊冕堂的主任牧師亦同時擔任麥理浩夫人中心的佳音事工委員會的委員。[118]

牧民中心的工作，體現以社區為本、家庭為基礎的「三頭馬車」網絡，提供全方位的堂、校、社服伙伴合作的關懷服務。[119] 中心的服務包括牧民中心事工、學校事工、兒童及青少年事工、長者事工和家庭事工。

為配合荊冕堂及其屬下的士德幼稚園和葵涌幼稚園學生和家庭的需要，中心舉辦了不同主題的小組活動，促進兒童和家長的心靈健康，也提供情緒支援和個案輔導服務。[120] 因荊冕堂家長天地設有講座系列，中心於 2009 和 2010 年為其子女舉行「情緒放大鏡」小組，讓他們學習認識和表達自己的情緒，又為家長舉辦兒童心理與培育講座，幫助他們從兒童心理發展理論了解子女的個性發展。[121] 2009 年，中心為葵涌幼稚園的學生舉辦成長系列活動，以「我的獨立時代」和「解難小英雄」專題活動來引發兒童照顧自己的動機。[122] 另外，因不少葵涌幼稚園的家長學歷較低，英語程度參差，中心故開辦「家長英語班」以提升他們的英語水平，加強教導孩子英語的信心。[123]

除了兒童和家長外，中心還推展中學生和青年工作。2011 年，中心和荊冕堂同工到林護中學舉行一系列的生命教育工作

---

117 〈服務單位總覽〉，《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 2013–14 年報》，13–15。

118 〈附屬委員會〉，同上書，11。

119 〈「聖公會荊冕堂牧民中心」延續與深化「三頭馬車」網絡式全方位輔導服務〉，同上書，36；〈聖公會荊冕堂牧民中心事工委員會會議紀錄〉，2014 年 3 月 17 日，荊冕堂文件。

120 〈「聖公會荊冕堂牧民中心」延續與深化「三頭馬車」網絡式全方位輔導服務〉，36。

121 見荊冕堂文件：〈2009 年 11 月份月報〉，2009 年 11 月；〈2010 年 6 月份月報〉，2010 年 6 月。

122 〈2009 年 11 月份月報〉，2009 年 11 月，荊冕堂文件。

123 〈2010 年 7 月份月報〉，2010 年 7 月，荊冕堂文件。

坊。[124] 2013 年，中心推行「荊冕青年培育計劃」，組織荊冕堂的青年大專生服務和支援有特別需要的社群，藉此加強青年的自信和培養其正面的生活態度。[125] 自 2014 年 9 月，因應現今青年自我建立的需要及青年自殺率持續上升，牧民中心與麥理浩夫人中心合辦「For your Life at Youth（F.L.Y.）少年獎勵計劃」。[126] F.L.Y.的服務對象為牧區學校的小六至中一學生和荊冕堂教友子弟，參加者透過生活知識科、社會服務科和社會環境科的積分活動，認識自己，發揮潛能。[127] 而計劃亦邀得荊冕堂的教友為義工，與參加者分享他們的人生經驗和價值觀。[128]



郭志芊牧師與荊冕堂青少年人合影（2014）[129]

---

124 〈第十次會議——牧民中心活動報告〉，2010 年 11 月 16 日，荊冕堂文件。

125 〈「聖公會荊冕堂牧民中心」延續與深化「三頭馬車」網絡式全方位輔導服務〉，36。

126 〈For your Life at Youth: F.L.Y. Adolescent Program：（一）理念〉，2014 年 2 月 15 日，荊冕堂文件。

127 〈「聖公會荊冕堂牧民中心」延續與深化「三頭馬車」網絡式全方位輔導服務〉，36；見荊冕堂文件：〈For your Life at Youth：F.L.Y. Adolescent Program：（六）計劃內容〉，2014 年 2 月 15 日；〈F.L.Y.少年成長計劃〉，2014 年 9 月 1 日。

128 〈For your Life at Youth: F.L.Y. Adolescent Program：（五）堂、校、社服協作〉，2014 年 2 月 15 日，荊冕堂文件。

129 香港聖公會荊冕堂所藏圖片。

中心自2012年起開展的「暖暖心弦」關愛長者事工計劃，透過區內學校、醫院、護老服務單位及荊冕堂長者服務幹事黃杏萍的協作，提高長者參與社區活動的動機，推廣對長者身心靈整全健康的關注。[130] 此計劃也令社區人士更了解長者的心理情緒需要，達致社區共融。[131] 內容包括探訪、講座、主題活動、節日關懷、情報輔導、健康關顧、長者運動小組、退休人士義工小組及街展等。[132] 此外，中心也將長者工作向各學校推廣，[133] 例如在2012年與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社工合作，邀請學生成為義工關心長者，一同歡渡母親節。[134] 同工又以家訪和電話關心荊冕堂長者部、麥理浩夫人中心長者部及支援離院長者的同事的轉介個案。[135]

2. 服侍病患傷殘

聖公會荊冕堂傑德牙科醫務所

荊冕堂重建後，2003年6月22日舉行堂慶，因高傑德醫生捐獻而冠名的傑德牙科醫務所亦於同日重新開幕。[136] 牙醫服務的定位，是為大眾提供中等價、高質素的服務，而收費也較同區為低。[137] 2006年，

---

130 〈「暖暖心弦」關愛長者事工計劃〉，《麥絡》期43（2013年4月）：5。

131 同上。

132 同上；〈聖公會荊冕堂牧民中心——2012年7–9月長者服務活動概覽（開會文件）〉，2012年10月12日，荊冕堂文件。

133 〈2012–2013年度聖公會荊冕堂及牧民中心長者服務會議紀錄〉，2012年5月4日，荊冕堂文件。

134 〈聖公會荊冕堂牧民中心——2012年4–6月長者服務活動概覽（開會文件）〉，2012年7月10日，荊冕堂文件。

135 〈聖公會荊冕堂牧民中心駐堂及幼稚園輔導服務第十八次會議紀錄〉，2013年1月8日，荊冕堂文件。

136 〈聖公會荊冕堂二零零三年度第三次牧區議會會議紀錄〉，2003年4月6日，荊冕堂文件。

137 〈聖公會荊冕堂二零零四年度第五次牧區議會會議紀錄〉，2004年8月1日，荊冕堂文件。

平均每月有160至200人次到診,四分之一為長者。[138] 同年9月至12月,醫務所舉辦敬老牙齒保健計劃,共300多人參加。[139] 2007年3月,醫務所舉行敬老牙齒健康日。[140] 2009年,醫務所聘請一位牙齒衛生員,於大窩口社區的不同地方,推廣牙齒健康教育,又設牙齒健康資訊站,對象為幼兒、小學生及中學生。牙齒衛生員也到荃灣及葵青區的長者服務單位,舉辦保健講座及活動。[141] 2013年至2014年,醫務所成為麥理浩夫人中心屬下的服務單位,繼續服侍牧區。[142]

院牧事工

香港院牧事工的發展,可追溯至具有基督教背景的醫院。1950年,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開設院牧服務,李妙卿傳道為第一位全職院牧。[143] 其後,香港浸信會醫院(1963)、播道醫院(1976)、基督教聯合醫院(1977)、靈實醫院(1977)亦設駐院牧師,關顧病人及病人家屬。[144] 院牧服務在發展上的突破,應説到於1984年,葛量洪醫院為首間公立醫院開展院牧服務。[145] 從此,院牧服務打破了只在基督教圈子服侍的圍牆,為全港的公共和私立醫院提供服務。[146] 1985年至1986年,教牧輔導關懷協會設立「臨床牧關教育」

---

138 〈聖公會荊冕堂傑德牙科醫務所管理委員會2007年度第一次會議〉,2007年1月30日,荊冕堂文件。

139 同上。

140 同上。

141 〈牙科管理委員會報告〉,〈聖公會荊冕堂牧區議會會議各部報告彙集〉,2009年6月7日,荊冕堂文件。

142 〈附屬委員會〉,《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2013–14年報》,11。

143 〈不斷成長〉,《院牧服務廿載情紀念特刊,1984–2004》(香港:院牧服務廿載情籌備委員會,2004),18。

144 同上。

145 同上。

146 〈林錦濤致尊敬的長執會主席〉,香港醫院院牧事工會有限公司,1998年11月25日,荊冕堂文件。

（Clinical Pastoral Education），培養更多院牧人材。[147] 1989 年，香港醫院院牧事工聯會（下稱聯會）成立，旨在推動及支援全港醫院的院牧服務發展，結合地區教會和醫院的資源，實踐「全人醫治」。[148] 九十年代，院牧服務迅速擴展，踏入豐收期。[149]

自葛量洪醫院設第一個公立醫院院牧室，由 1984 年至 1998 年 14 年間，已有 44 間公私立醫院設有院牧服務，院牧同工們已近百人。[150] 仁濟醫院（下稱仁濟）和瑪嘉烈醫院暨葵涌醫院（下稱瑪葵）皆設於荃灣和葵青區，與荊冕堂一樣為市民和社區提供服務。

為支持地區院牧事工的發展，荊冕堂自 1994 年起，每年於牧區議會選出仁濟和瑪葵院牧教堂代表，擔任教堂與院牧部之間的橋樑，也代表教堂出席醫院的院牧事工會議。[151] 1995 年，荊冕堂的年度策略及事工，除了開辦信仰專題講座，也舉行了仁濟醫院床邊佈道訓練，向青年人和有心志事奉的教友提供傳福音的訓練和實踐。[152] 1998 年起，荊冕堂每月捐助仁濟醫院院牧部和瑪嘉烈醫院暨葵涌醫院院牧部，一同與聯會承擔院牧事工的異象和需要。[153] 2004 年 11 月，池嘉邦牧師、李轉珍宣教師、黃沛宜弟兄和鄺國林弟兄，參加了香港醫院院牧事工聯會舉辦的「院牧服務廿載情」周年紀念活動，荊冕堂參與了仁濟和瑪葵院牧事工服務 10 年以上，故獲大會刊名嘉許以表彰

---

147 〈因恩向榮〉，《院牧服務廿載情紀念特刊，1984–2004》，13。

148 同上。

149 同上，14。

150 〈林錦濤致尊敬的長執會主席〉，香港醫院院牧事工會有限公司，1998 年 11 月 25 日，荊冕堂文件。

151 見荊冕堂文件：〈聖公會荊冕堂一九九四年度牧區議會首次會議紀錄〉，1994 年 12 月 5 日；〈聖公會荊冕堂各職位職責範圍釐訂〉，1997 年 12 月；〈聖公會荊冕堂各職位職責範圍釐訂〉，1999 年 11 月。

152 〈聖公會荊冕堂一九九五年度牧區議會第二次會議〉，1995 年 1 月 15 日，荊冕堂文件。

153 〈聖公會荊冕堂一九九九年度牧區議會第一次會議紀錄〉，1998 年 12 月 6 日，荊冕堂文件。

其貢獻。[154] 2008 年 5 月，荊冕堂 11 位弟兄姊妹主持仁濟醫院院牧「午間閒情」病人福音聚會，李轉珍宣教師也在當中分享信息。

四・小結

面對廿一世紀香港社會的新挑戰，教省積極調整其社會服務和教育的發展方針，確立堂、校、社服三頭馬車福傳、培育、牧養的使命。2010 年，教省的教育政策文件表明應推展基督教全人教育的價值觀，加強堂校連繫，鼓勵牧區承擔牧區學校的福傳事工，視學校為牧區的重要部分。2013 年，教省總議會通過其有史以來第一份與社會工作相關的政策文件——《香港聖公會社會服務政策文件》，提出「共負一軛」的方針，社會服務單位應視自己為牧區的一分子；教省亦將強化牧區功能，以牧區座堂為中心，牧區內的堂、校和社會服務單位應組織網絡關係，互相支援，齊心協力面對社會的新挑戰。

荊冕堂的教育工作和社會服務，實踐了教省的新發展方針。士德幼稚園及葵涌幼稚園，以創新的方式辦學，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和興趣，又致力推動牧區內堂校合作、家校合作和社區參與。牧民中心的服務，為有需要的教友、荊冕堂屬下幼稚園的學生家長，提供牧靈、輔導或轉介服務，提供了全方位的堂、校、社服伙伴合作的關懷服務。傑德牙科醫務所及院牧事工，醫治病患者的身心靈，達致「全人關顧」。繼往開來，荊冕堂承接前人的工作，在千禧年代開啟其教育及社會工作的新一頁，繼續積極服侍牧區內的鄰舍，提供多元化的服務。

---

154 〈聖公會荊冕堂二零零五年度第一次牧區議會會議紀錄〉，2004 年 12 月 5 日，荊冕堂文件。

結語

荊冕榮光

荊冕堂是香港聖公會於荃灣地區建立的第一個牧區，其發展見證了荃灣從鄉郊蛻變為衛星城市的變遷。隨着時代發展，新型屋苑及大型商場紛紛落成，與舊式樓宇及工廈並存，在在呈現這個經歷新舊交替的社區面貌。座落於此的荊冕堂牧區，如何忠於上主所託，在急劇變化的世代中，見證基督的榮光？

1964 年 6 月 21 日，鍾仁立法政牧師為荊冕堂主持奠基禮，奠基石上刻有「榮耀荊冕，萬王之王」八字。1970 年，在荊冕堂成立五周年堂慶時，鍾仁立更特別撰寫了〈教會今日的重大使命〉一文，指出香港在急劇發展的同時，也要面對社會各種存在的「罪惡」。因此，他說：

> 今日我們教會在香港負有很重大的責任，我們基督徒對香港的社會是有很重要的工作的。我們要改造香港的社會。今日香港的社會是向我們挑戰，我們有沒有準備應戰呢？教會必須要對罪惡戰爭。

他深信，教會必須有「上帝的道」。基督徒也要努力追求真理及上帝的國。「基督徒要改造世界，不是被世界來腐化我們。我們要記住耶穌的教訓：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物質）都要加給你們了。」[1]

同樣，白約翰會督在 1970 年為慶祝五周年的荊冕堂撰寫賀文，再次期許荊冕堂同人不要忘記那位迎向十字架，並甘心受苦的基督：

> 主耶穌遭受鞭打與帶至十架前之時，似非屬王者，然吾人深知耶穌昔日今日均為我等之王，十架乃勝利之表記，而非失敗。

他指出「世俗仍殘酷如故，如何於生活中表現主耶穌之同情友誼及其恕人愛人之力量，實為我等在荃灣區任務之一部」。[2]

重溫昔日教會先賢的訓勉時，仍然鏗鏘有力，擲地有聲，彷彿在向廿一世紀的當下言說與叮嚀……

時光荏苒，荊冕堂牧區也隨着時代的演進而與時俱進。昔日在工業新區服事基層的牧區，歷經變革，已經成為結合堂校及社會服務、提供多元化服務的關顧全人牧區。十多年前建立的聖堂，不僅是建築物的重建，更是使命的更新。而在這一切「新」的人與事背後，如何建立教會——基督的身體——這個既古老又真實的使命，仍然是荊冕堂牧區需要不斷迎向的挑戰。

何明華會督將新成立的聖堂命名為「荊冕堂」，並引用了《普天頌讚》的〈主戴榮光歌〉——「以前曾戴荊棘的頭，現今已戴榮光；大能大力得勝君王，頭上冠冕輝煌」。[3] 半個世紀的荊冕故事，

---

[1] 鍾立仁：〈教會今日的重大使命〉，《聖公會荊冕堂五周年堂慶特刊，1970》（香港：聖公會荊冕堂，1970），11。

[2] 白約翰：〈致荊冕堂〉，同上書，4。

[3] "Dedication of Crown of Thorns," 1965, Diocese of West Kowloon, Crown of Thorns' Church (CT)(1), Bishop's House Archives, Hong Kong. 〈主戴榮光歌〉，《普天頌讚》（香港：基督教文藝，2008），201。

雖然充滿不同的考驗，但卻仍見證着上主的恩慈與保守，藉着荊冕堂牧區，建立信徒，祝福社區。

面對廿一世紀香港社會急速變化，如何持守香港聖公會的宣教使命，藉傳道牧養、學校教育及社會服務見證福音，須仰賴每一位「荊冕人」步履基督腳縱，本其虛己捨己精神，進入社區，持定真理，謙卑服事，拓展上帝國度，顯出荊冕榮光。

後記一

奮力完成此書初稿之時，是兩三年前我在香港科技大學學生宿舍追趕中美關係課和粵語語言學課論文「死線」的日子。當堂史文稿每一章陸續完成，進行各種修訂工作，即將出版，心裏總覺得不可思議，難以置信。

這一份難以置信，也許是與自己的人生經歷有關。時至今天，我無法估計修讀史科對我人生的影響。從中學一年級直至現在，十五年來無間斷讀歷史。這是一個怎樣的十五年呢？當中，牽涉到自己年少時一個深思熟慮的決定——選擇在大學主修歷史。這是因為我深信治史者就像一個仁醫，唯有先了解病人的病歷、發病原因和情況（過去），才懂得根治眼前的病症；香港這個城市與病重的患者無異，不疏理它的過去，便無法為腳下的土地尋找一個更美好的未來。在大學求學時期，我有幸地成為嶺南大學的學生，在充滿人文精神與批判思考的環境成長；我又有幸地認識了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大專部，刺激我思考信仰與學科如何整合，做一個有大學教育程度的基督徒大學生，為自己的生命負責任；我再次有幸地為

報讀哲學碩士的事宜，認識了邢福增老師，最後參與了這項堂史研究計劃。

當我在荊冕堂內搜集和整理史料時，結識了不少荊冕堂的弟兄姊妹和幹事。與他們傾談之間，教我深刻的一條問題是：「我們這一所『小教會』人數不多，規模不大，我們的歷史值得如此仔細研究嗎？」毋庸置疑，荊冕堂的創立與發展，回應了戰後荃灣社會的需要。五、六十年代，荃灣成為附屬於九龍市區的工業區，也是香港的紡織業中心、新界第一個工業衛星城市；荊冕堂旁邊的大窩口邨，是政府所興建的徙置大廈之一，其居民和附近的工友成了牧區起初服侍的對象。這就是荊冕堂創堂的源起。至今荃灣已轉型為住宅新市鎮，荊冕堂繼續為牧區提供多元化的服務，體現聖公會堂、校、社服三頭馬車福傳、培育、牧養的使命，樹下了佳美典範。

關於這份文稿的書寫，我特意將香港的城市發展、荃灣社區發展和牧區發展連結起來，強調三者之間的歷史脈絡和互動關係。唯有將牧區的歷史處境化，才能寫下荊冕堂五十年來歷史上那獨一無二的一頁。除此之外，這份研究突出了牧區發展與相關人物（包括牧師、會友、同工幹事）之情，藉此帶出歷史研究除了描述史實外，亦有展示人情的一面；同時希望這種書寫方法，能讓讀者彷彿置身其中，聆聽前輩先賢服事牧區的一點一滴，拉近讀者與歷史紀錄之間的距離。

由衷感謝聖公會荊冕堂及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賜予我這個極為寶貴的學習機會，更新我的靈命。書寫教會歷史的同時，我深深地受到聖公會先賢的屬靈眼光所觸動。今天的香港物質生活越見豐盛，科技更為發達，但政治、社會問題叢生，年青一代對香港的未來感到絕望，看不見亮光。香港進入了一片漫長的黑夜。1965年荊冕堂建堂奉獻禮中，何明華會督的一席話，對五十年後今天的基督徒而言，有如當頭棒喝，且毫不過時。他解釋荊冕堂的命名是從〈主戴榮光歌〉而來，以及此歌背後的故事：

> 一百年前，編寫此詩、深愛此詩的基督徒，是富裕的中產階層人士。他們活在勞動階級的供應中，同時活在對貧窮問題的完全無知中。他們頗為不知曉自己其實是多麼的自私自利。難怪當他們想起基督時，認為基督跟他們一樣，活在安舒的天堂裏，可與混沌的世界中抽離並毫不相干。但我們清楚事情不是這樣的——我們明白「荊冕的頭」就是那「尊貴的冠冕」。上主除了那「荊冕的頭」外，並無其他冠冕。道成肉身的人子的寶座，就是在那被釘的十架上的，除此之外，並無其他寶座。如果你想為世上的痛苦、傷害和苦難尋找一個答案，荊棘冠冕就是我的回答。[1]

又如白約翰會督在主教陞座講辭中所言：

> 我想我們的救藥，不是在向他們〔群眾〕大聲疾呼，而是……設法到民間去，以表彰基督的愛，及實踐非役於人，乃役於人的寶訓……〔香港的〕自由的持繼，卻有待於人與人，人與社會，與工業，與教育的正確關係……香港目前所需要的不單祗是美麗的外表而已，然而在一個城市內，那裏是要有眾人的公義，自由與生活的尊嚴的。[2]

願香港年青一輩的基督徒，積極尋索我們的使命，承擔起十架的重量，讓眾人看得見那一絲看似遙不可及的曙光，重拾對生活的熱情和盼望。

再次衷心感謝邢福增老師的悉心教導，讓我這個新手能有份書寫香港教會的歷史，這是我畢生的榮幸。邢老師的言教身教、治學的勤奮、對基督教史研究的委身和熱情，皆是晚輩學習的榜樣。

---

1 "Dedication of Crown of Thorns," 1965, Diocese of West Kowloon, Crown of Thorns' Church (CT)(1), Bishop's House Archives, Hong Kong.

2〈會督文告〉，《港澳教聲》期 220（1972 年 1 月 31 日）：1。

本書得以完成，由衷感謝下列機構、人士在此項研究計劃提供協助：荊冕堂的堂主任鄭守定牧師及牧區議會議員，支持堂史項目的出版和修訂事宜；感謝香港聖公會檔案館主任魏克利牧師（Philip L. Wickeri）以及行政助理練秀芬女士、香港政府檔案處職員，准許我前往查檔和提供各樣的協助；感謝一眾口述歷史訪問受訪者，包括梁熾靈牧師、廖翼顯牧師、鄧曼英女士、黃沛宜先生，願意接受我的訪問，為這份研究提供了寶貴的史料，補充文字資料未能呈現的一角；荊冕堂前任幹事畢月華女士及李轉珍女士的熱情招待、荊冕堂年青人的活潑，令我在荊冕堂爬梳史料時，感到樂趣無窮；感謝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同工曾嘉穎女士、編輯吳秀麗女士、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的李廣平女士、馮嘉麗女士、鄧長祐先生、邵倩文女士、張沁茹小姐，為此研究提供了適切的幫助，陪伴我渡過了做學術的時光，也聆聽我人生中的各樣掙扎。

願一切的榮耀歸予那掌管歷史的上主。

鍾卓芝

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前研究助理

2018 年 11 月 6 日

後記二

這是筆者有幸參與研究及撰寫有關香港聖公會的第二本堂史。

過去對聖公會在香港的傳播及發展，主要是為教授香港基督教史而作的預備。在 2010 年出版了《天國龍城——香港聖公會聖三一堂史（1890–2009）》後，始對香港聖公會的歷史發展有更多認識。沒想到，後來又有機會參與聖公會莿冕堂史，今天《莿晃榮光——香港聖公會莿冕堂五十周年堂史（1965–2015）》付梓在即，實在有説不出的興奮及感恩。

與具百年歷史的聖三一座堂不同，莿冕堂是聖公會因應戰後香港社會需要而建立的牧區，並於 2015 年慶祝金禧堂慶。難得的是，莿冕堂牧者及信徒領袖十分重視堂史，並成立了金禧堂史編輯小組，不僅搜集及整理資料，也進行了好些口述歷史訪談。因此，當郭志芊牧師（時任堂主任）接洽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並委託本社撰寫堂史時，誠然已經為我們鋪奠了重要的基礎。

戰後香港社會面對着各種問題，至六十年代中葉，隨着新市鎮的開發，工業化步伐急速，教育、社會救濟及福利服務事業的發展，在在説明香港社會已從難民社會中經歷蜕變。誠然，香港社會的發

展也潛伏着各種深層社會矛盾，1966年的暴動正是根源於此。沒想到，受到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影響，香港旋即面對另一次規模更大，影響更深遠的六七暴動。查兩次暴動前後，香港教會積極反省及探索使命，不論在宣教牧養、青年事工、學校教育、勞工與宣教、社會福利等方面，均作出更大的承擔及參與。毋庸置疑，香港聖公會在這方面，也留下了重要足跡。而荊冕堂的創立與發展，也未嘗不是這段歷史的一個縮影。今天，許多人關心香港教會如何面對各種考驗與挑戰，筆者深信，我們並沒有簡便快捷的答案。不過，如果有更多教會願意重視歷史，並投放資源在這方面，肯定能讓我們更能了解昔日走過的路，從而對今天的教會現況有更全面的認識。

在此，衷心感謝聖公會荊冕堂對歷史的重視，並將堂史的撰寫工作交托予本社。郭牧師接受教區調派，鄭守定牧師接任堂主任後，對堂史的定稿及出版，也作出極大的支持。同時，荊冕堂金禧堂史編輯小組一群忠心的弟兄姊妹，對堂史的撰寫也提供了許多寶貴的意見，在在説明他們對荊冕堂的關愛。能夠參與其中，筆者除了認識到上主如何藉着荊冕堂服事荃灣社區外，更深深被一群熱愛及委身教會的信徒所感動。

感謝堂史項目的研究助理鍾卓芝姊妹，從資料搜集及整理、口述歷史訪談，到撰寫初稿，為堂史作出了極重要的貢獻。卓芝具有扎實的史學訓練，也是一位對信仰委身的年青信徒，在此祝願她學有所成，藉其在歷史研究方面的恩賜，更好地服事上主。

本書能夠順利完成，有賴下列機構人士的多方協助：陳衍昌法政牧師義務為我們擔任審稿，使本書用詞能更準確地表達聖公宗的傳統。香港聖公會檔案館主任魏克利牧師（Philip L. Wickeri）及行政助理練秀芬女士，對研究資料提供了重要的幫助，並授權本書使用一些相片。此外，香港聖公會鄺保羅大主教、陳樞明主教、郭志丕主教、鄭守定牧師惠賜序言，更令本書生色不少。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編輯（也是荊冕堂會友）李廣平女士、基督教中國

宗教文化研究社同工曾嘉穎女士、編輯吳秀麗女士，也在多方面作出重要的協助。

面對當下及未來的挑戰，盼望有更多教會與信徒，能承擔起歷史整理的工作。植根本土，香港教會及香港基督徒需要書寫屬於自己的歷史。

願上主得着一切榮耀。

邢福增

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社長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

2018 年 10 月 24 日

附錄一

香港聖公會荊冕堂大事回顧*

1964 年 4 月	開設青年工人宿舍（1966 年關閉）
1964 年 6 月	鍾仁立法政牧師為荊冕堂奠基
1965 年	聖堂落成，2 月 21 日舉行首次主日崇拜
1965 年 6 月	開辦童膳中心（1974 年關閉）
1965 年 12 月	少年部成立
1966 年 1 月	舉行第一屆按手禮，由何明華會督主持和講道
1966 年	開辦荊冕堂幼稚園
1966 年 10 月	開辦托兒所（1975 年 12 月停辦）
1967 年 9 月	開辦荊冕堂英文專修學校（1972 年 4 月停辦）
1970 年 2 月	開辦裁剪班（1972 年結束）
1970 年 6 月	五周年堂慶，白約翰會督於感恩崇拜講道，張榮嶽會吏長施聖餐

* 由香港聖公會荊冕堂編輯小組撰寫，鍾卓芝修訂。

1971 年 6 月	六周年堂慶，白會督主持堅信禮
1971 年 10 月	加入基督教聯會成為會員堂
1971 年 12 月	牧區成立；舉行第一屆牧區議會選舉
1972 年 1 月	接辦聖公會聖尼哥拉幼稚園
1972 年 4 月	七周年堂慶
1973 年 8 月	與中華基督教會全完堂、衛理公會亞斯理堂、救世軍大窩口隊、基督教信義會天恩堂及羅馬天主教會葛達二聖堂聯合推行「荃灣大窩口、葵涌社區發展計劃」，其後此計劃於 1980 年正名為荃灣合一社會服務中心（1997 年停辦）
1985 年 12 月	荊冕堂牙科醫務所開幕（2003 年更名為「傑德牙科醫務所」）
1987 年 4 月	成立荊冕堂區務促進中心
1990 年	二十五周年銀禧堂慶
1992 年	幼稚園分校遷至青衣辦學
1992 年 10 月	幼稚園課室發生火警，波及聖堂
1993 年	與麥理浩夫人中心合作建立耆樂團契；與長發安老院合作建立恩光團契；青蔥團成立，9 月 11 日舉行首次聚會；青樺團成立，9 月 19 日舉行首次聚會
1994 年	自此每年於牧區議會選出仁濟、瑪葵院牧堂會代表，推廣院牧工作
1996 年	麥理浩夫人中心佳音事工委員會預備成立新傳道區，並向教區申請於中心設立崇拜；荊冕堂及其他牧區合作在主愛傳道區開展各項事工；開始在牧區學校設宗教獎
1996 年 12 月	主愛堂成立，同月舉行首次崇拜

1997 年	成年部成立；某傳道聯同約 40 位核心年青信徒離開荊冕堂
1997 年 7 月	耆老部於林護長者之家成立護愛團契
1998 年	荊冕堂葵涌幼稚園成立
1999 年	青年部及少年部合併為青少年部（其後於 2015 年各自分拆）；幼兒部易名為兒童事工部
1999 年 7 月	於舊堂重建前夕舉行感恩崇拜，舊堂隨即清拆，其後借用麥理浩夫人中心林護堂舉行崇拜
2000 年	牧區議會新設青衣傳道區發展小組，其後於 2003 年成立青衣傳道發展科
2000 年 6 月	三十五周年堂慶；舉行新堂奠基禮，由鄺廣傑大主教及蘇以葆主教奠基
2001 年 1 月	聖公會荊冕堂青衣傳道區成立，蘇以葆主教祝聖聖公會青衣邨何澤芸小學小聖堂作崇拜之用，於 1 月 14 日舉行首次聖餐崇拜
2002 年 6 月	新堂落成，舉行祝聖奉獻禮；幼稚園重新提供服務，易名為荊冕堂士德幼稚園
2003 年	福利部易名為慈惠部，其後於 2012 年改為關愛部
2003 年 6 月	因高傑德醫生捐獻而冠名的荊冕堂傑德牙科醫務所於聖堂重建後重新開幕
2004 年 1 月	青衣傳道區正名為聖公會基督顯現堂，成為直屬教區的傳道區
2004 年 4 月	小學團契成立
2005 年	本堂傳道主任及幹事開始於牧區學校，積極舉辦福音營、學生團契、佈道會等等福音活動
2005 年 6 月	四十周年堂慶
2006 年	主愛堂遷至葵涌石蔭主愛小學；主愛堂成立十周年

2008 年	家長團契和家長天地成立
2008 年 8 月	青衣幼稚園分校正式交由基督顯現堂管理
2009 年 1 月	青咖哩團契成立
2009 年 4 月	儷人天地成立
2009 年 8 月	Vision 敬拜隊成立
2009 年 9 月	牧民中心成立
2010 年	設立兒童崇拜
2010 年 6 月	開辦成人主日學
2010 年 9 月	開設青少年主日學
2012 年 1 月	職場團契成立
2013 年 10 月	基斯夫婦小組成立
2013–2014 年	牧民中心及傑德牙科醫務所成為麥理浩夫人中心屬下的服務單位
2015 年 11 月	五十周年金禧堂慶

附錄二

1965年何明華會督於建堂奉獻禮上之講辭*

DEDICATION OF CROWN OF THORNS CHURCH

Monday, 12th April, 1965

This is a very happy day for us. So many dreams are now realised.

It is nearly 8 years ago since I first approached the District Office about a site for a Church adjoining the then proposed Resettlement Estate of Tai Wo Hau. We are especially happy to have the District Officer with us. For our first thank you is to the Government for their help and interest in what we are doing. Then our grateful thanks go to the Oxford Committee for Famine Relief 7 years ago at the Oxford Rotary Club. I was bombarded with questions about Hong Kong. One question was what is your greatest need? I said "Food for the children of those whose wages are too low to feed their children properly". The result of that answer was a gift of

* "Dedication of Crown of Thorns Church," April 12, 1965, Diocese of West Kowloon, Crown of Thorns' Church (CT)(1), Bishop's House Archives, Hong Kong.

£1,250 from the Oxford Committee for Famine Relief for a Children's Meals Centre on the ground floor of this Church.

We are most grateful to them. We hope that soon more than 2,000 children from schools of all kinds round about will come here for a good meal on all School Days.

Then our Sister Church in U.S.A. paid the $90,000 which the site cost us and interest free loan they gave us last year has helped us to pay for the Church part of the Building.

Then we must especially thank the architect, the contractor and the Building Committee for this lovely building they have made for us, and the Headmistress and staff and pupils of Chu Yan School for having already provided the nucleus of a worshipping congregation.

-2-

We might have called this Church "Bethlehem Church". For Bethlehem (the name of Christ's birth place) means "House of Bread". This Church will be a House of Bread for children downstairs and for grown-ups—upstairs. When we kneel later to receive the Broken Bread, the words spoken on Our Lord's behalf will be "Preserve thy body and soul". Upstairs and downstairs then this Church will be a "House of Bread", where God may feed the bodies and the souls of his people is Tai Wo Hau.

We might have called the Church—"The Church of the Three Crosses". You will see three crosses are over the entrance. The three crosses are to remind us that Our Lord was in fact crucified on all the three crosses of Calvary. For there has never been a crucifixion or an execution but Jesus Our Lord, the Eternal Heart of God has suffered and died with the condemned men.

There has never been a cruel or a painful death, but Our Lord has not shared it. "Are not two sparrows sold for one farthing and not one of them shall fall to the ground without your Father". (St. Matthew 10:29). How much more, then, when any son of man suffers or grieves or dies will not He who is <u>the</u> Son of Man suffer and die in His heart with him, as the Lord died between the two thieves on Calvary. Perhaps you are thinking what about the impenitent thief? How could Our Lord enter his heart when it

was set so hard against God? This is a great mystery but St. Paul tells us that it was “while we were yet sinners Christ died for us” (Romans 5:8).

But we have not called this Church “Bethlehem Church”. We have not called it “The Church of the Three Crosses”. We have called it “The Church of the Crown of Thorns”.

-3-

The architect has made a lovely design of the Crown of Thorns, based on the design in the new Coventry Cathedral in England. We are joined gratefully to that Cathedral, centred like us in a vast industrial area, by their gift to us of £250.

One of our hymns begins with these words:

The head that once was crowned with thorns
    Is crowned with glory now:
A royal diadem adorns
    The mighty Victor’s brow. (HUP 138)

The Christians of 100 years ago who wrote and loved that hymn were prosperous middle class people living on the labours of other men in complete ignorance of what poverty meant. They were quite unaware of how selfish they were.

No wonder then they thought of Christ, like themselves, reigning in the comfort of heaven, lifted as they were out of the turmoil of the world. But we know better, we know that the Crown of Thorns is “the royal diadem”. God has no other Crown than the Crown of Thorns. God has no other throne than the Cross on which the Incarnate Son was crucified.

For indeed God would be mocking men if the 30 short years of Christ’s visible life was all that God had done to share the life of His Creation. If this was all God had done, we would have had to say “man’s heart is better than God’s heart” which would really mean there is no God, only human goodness rising like the pure white lotus out of the dark slime of human cruelty and waste and death.

In old Chinese tradition the bridgegroom [bridegroom] would draw the veil from the bride's face, seeing for the first time the woman who was to share his life, after death lie at his side.

-4-

The life and death and resurrection of Jesus is in fact God himself drawing aside the veil and revealing His face to men. But in God's case it is more than the face, but His very heart that is revealed. And we see His heart full of such wondrous love and mercy and forgiveness to men that it passes our understanding. A Chinese bride might say silently in her heart as her husband looks upon her face for the first time "Lo, I am with you always even unto the end of the world". (St. Matthew 28:20). But in the life and death of Jesus, God says more than that to His creation. He says "I have always been with you. There has never been a time when the world has not been in my heart. If you seek an answer to the world's suffering and pain and misery the Crown of Thorns is my answer. The pain, the sin, the wanton cruelty of life is man's rebellion but see they have woven the thorns of their rebellion into a crown for their Maker. Pilate for all his cowardice and weakness has truly written the word King above it.

So might God speak to us. For it is our faith that the Crown of Thorns shows how God rules the world and always has and always will rule the world by taking all men's sins and over-coming it by His mercy and His forgiveness.

In the centre of the Crown of Thorns we have set the Bread and the Wine of the Holy Communion. Tonight we shall hear once more Our Lord's words "This is my Body given for you"—"This is my Blood shed for you"—"Do this to remind you of what I am, to remind you that I am with you always, to remind you that I share your life and over-come in you and for you the Devil's power by the might of my suffering "Love".

引用書目

一、檔案

1. 香港聖公會檔案館檔案

"Budget for the Children Meals Centre for the Period from August 1, 1965 to July 31, 1966." March 31, 1965, Diocese of West Kowloon, Crown of Thorns' Church (CT)(3).

"Crown of Thorns Church—Tsun Wan." June 15, 1965, Diocese of West Kowloon, Crown of Thorns' Church (CT)(1).

"Crown of Thorns Hostel Receipts and Expenditure for the Year Ending." March 31, 1965, Diocese of West Kowloon, Crown of Thorns' Church (CT)(1).

"D. C. C. Luddington to R. O. Hall." November 1, 1963, Diocese of West Kowloon, Crown of Thorns' Church (CT)(1).

"D. H. A. Moore to R. O. Hall." November 1, 1963, Diocese of West Kowloon, Crown of Thorns' Church (CT)(1).

"Dedication of Crown of Thorns." 1965, Diocese of West Kowloon, Crown of Thorns' Church (CT)(1).

"Gilbert Baker's letter to Miss Sersale." March 11, 1977, Diocese of West Kowloon, Crown of Thorns' Church (CT)(3).

"Minutes of the 31st meeting of the Council of The Children's Meals Society." September 6, 1965, Children's Meal—Minutes (C20).

"Minutes of the First Meeting of the Crown of Thorns Church Provisional Committee." February 6, 1965, Diocese of West Kowloon, Crown of Thorns' Church (CT) (1).

"Mrs. B. Cheung's letter to Bishop Baker." March 16, 1977, Diocese of West Kowloon, Crown of Thorns' Church (CT) (3).

"P. L. Lam's letter to Bishop Baker." May 30, 1977, Diocese of West Kowloon, Crown of Thorns' Church (CT) (3).

"Peter Kwong's letter to the Rt. Revd. R. O. Hall." September 9, 1965, Diocese of West Kowloon, Crown of Thorns' Church (CT) (1).

"Peter Pau's letter to Bishop." March 7, 1977, Diocese of West Kowloon, Crown of Thorns' Church (CT) (3).

"Peter Pau's letter to the Rt. Rev. G. Baker." November 8, 1976, Diocese of West Kowloon, Crown of Thorns' Church (CT) (3).

"Phoebe Tsui's letter to Hong Kong Housing Society." January 19, 1977, Diocese of West Kowloon, Crown of Thorns' Church (CT) (3).

"R. O. Hall to Tang Po Chun, M. R. Whattam, S. K. Loong, James Estes, James Lowcock, Luke Lu, and Ip Lai." February 10, 1965, Diocese of West Kowloon, Crown of Thorns' Church (CT) (1).

"R. O. Hall to the Commissioner for Resettlement." August 28, 1959, Diocese of West Kowloon, Crown of Thorns' Church (CT) (1).

"R. O. Hall's letter to the Revd. J. D. Swanson." December 9, 1965, Diocese of West Kowloon, Crown of Thorns' Church (CT) (1).

"Raymond Lau to the Church Body of the Chinese Anglican Church in Hong Kong." March 26, 1994, Diocese of West Kowloon, Crown of Thorns' Church (CT) (4).

"Reference minutes No.5(b) of 28th Meeting of the Council." February 19, 1965, Children's Meal—Minutes (C20).

"Rev. Louis Tsui to Ng Chun Man." August 18, 1982, Diocese of West Kowloon, Crown of Thorns' Church (CT) (3).

〈致聖公會港澳教區常備委員會主席鄺廣傑主教暨談判代表團全體代表〉，1982 年 6 月 14 日。西九龍教區，聖公會荊冕堂(CT) (3)。

〈致鄺廣傑主教〉。1982 年 1 月 18 日。西九龍教區，聖公會荊冕堂(CT) (3)。

《致聖公會港澳教區常備委員會主席鄺廣傑主教》。1990 年 4 月 11 日。西九龍教區，聖公會荊冕堂(CT) (3)。

《聖公會港澳教區教區議會議程》。1964，1966，1969，1972，1973，1975，1977，1979，1981。

2. 香港聖公會荊冕堂文件

〈2008 年家長團契展望、2008 年定長天地展望〉。2008 年 2 月 3 日。

〈2009 年 11 月份月報〉。2009 年 11 月。

〈2010 年 6 月份月報〉。2010 年 6 月。

〈2010 年 7 月份月報〉。2010 年 7 月。

〈2012–2013 年度聖公會荊冕堂及牧民中心長者服務會議紀錄〉。2012 年 5 月 4 日。
〈2013 年牧區議會培育課程報告〉。2013 年 10 月 30 日。
〈2013 年度——聖公會荊冕堂各項事工專責小組〉。2012 年 12 月 16 日。
〈2014 年度——聖公會荊冕堂各項事工專責小組〉。2013 年 9 月 15 日。
〈2014 長者事工義工訓練計劃〉。2014 年 8 月 31 日。
〈F.L.Y.少年成長計劃〉。2014 年 9 月 1 日。
〈For your Life at Youth: F.L.Y. Adolescent Program：（一）理念〉。2014 年 2 月 15 日。
〈For your Life at Youth: F.L.Y. Adolescent Program：（五）堂、校、社服協作〉。2014 年 2 月 15 日。
〈For your Life at Youth：F.L.Y. Adolescent Program：（六）計劃內容〉。2014 年 2 月 15 日。
〈二零零三年度荊冕堂退修會暨計劃營中討論概括〉。2002 年 12 月 7 日。
〈李轉珍傳道 2002 年 12 月至 3 月份工作報告〉。
〈林錦濤致尊敬的長執會主席〉。香港醫院院牧事工會有限公司，1998 年 11 月 25 日。
〈長者事工報告〉。2014 年 12 月 31 日。
〈長者事工進度報告〉。2013 年 9 月 1 日。
〈青少年部〉。2011 年 1 月 26 日。
〈宣教師李轉珍工作計劃及進展報告〉。2005 年 4 月 3 日。
〈梁竹君宣教師 08 年第二次工作報告〉。2008 年 4 月 6 日。
〈梁竹君宣教師工作報告〉。2008 年 12 月 7 日，。
〈梁竹君傳道主任 2002 年 9 月 1 日至 2003 年 3 月 1 日工作報告〉。
〈第十次會議——牧民中心活動報告〉。2010 年 11 月 16 日。
〈聖公會荊冕堂各職位職責範圍釐訂〉。1997 年 12 月，1999 年 11 月。
〈聖公會荊冕堂牧民中心——2012 年 4–6 月長者服務活動概覽（開會文件）〉。2012 年 7 月 10 日。
〈聖公會荊冕堂牧民中心——2012 年 7–9 月長者服務活動概覽（開會文件）〉。2012 年 10 月 12 日。
〈聖公會荊冕堂牧民中心事工委員會會議紀錄〉。2014 年 3 月 17 日。
〈聖公會荊冕堂牧民中心駐堂及幼稚園輔導服務第十八次會議紀錄〉。2013 年 1 月 8 日。
〈聖公會荊冕堂特別牧區議會〉。1997 年 8 月 14 日。
〈聖公會荊冕堂馬偉利牧師致弟兄姊姊〉。1998 年 11 月 22 日。
〈聖公會荊冕堂傑德牙科醫務所管理委員會 2007 年度第一次會議〉。2007 年 1 月 30 日。
〈聖公會荊冕堂福利基金〉。1993 年 1 月 10 日。
《聖公會西九龍教區憲章及規例》。1998 年 11 月 1 日。
《聖公會荊冕堂牧區議會會議各部報告彙集》。2008，2009。

《聖公會荊冕堂牧區議會會議記錄》。1984–2014。

《聖公會荊冕堂財政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2007。

《聖公會荊冕堂培育部會議會議紀錄》。2008。

《聖公會荊冕堂堅振禮紀錄冊 S.K.H. Crown of Thorns' Church Confirmation Record》。1999。

《聖公會荊冕堂教友名冊 1–630》。1965。

《聖公會荊冕堂教友總名冊 S.K.H. Crown of Thorns' Church Parishioners General Record》。1998。

《聖公會荊冕堂傳道部會議會議紀錄》。1993，2008。

《聖公會荊冕堂慈惠部會議會議紀錄》。2003，2010。

3. 口述歷史

〈池嘉邦訪問紀錄〉。香港聖公會荊冕堂金禧紀念特刊編輯委員會、聖公會林護中學團契學生訪問及整理，2015 年 6 月 6 日。

〈馬偉利訪問紀錄〉。香港聖公會荊冕堂金禧紀念特刊編輯委員會、聖公會林護中學團契學生訪問及整理，2015 年 7 月 6 日。

〈梁婉玲訪問紀錄〉。香港聖公會荊冕堂金禧紀念特刊編輯委員會整理。

〈梁熾靈牧師訪問紀錄〉。香港聖公會荊冕堂金禧紀念特刊編輯委員會、聖公會林護中學團契學生訪問及整理，2015 年 4 月 25 日。

〈梁熾靈牧師訪問紀錄〉。鍾卓芝整理，2018 年 7 月 8 日。

〈黃沛宜訪問紀錄〉。鍾卓芝整理。

〈廖翼顯牧師訪問紀錄〉。鍾卓芝整理，2016 年 7 月 8 日。

〈鄺廣傑主教訪問紀錄〉。香港聖公會荊冕堂金禧紀念特刊編輯委員會、聖公會林護中學團契學生訪問及整理，2015 年 5 月 2 日。

二、香港聖公會荊冕堂出版刊物

《Baby-mo 好媽咪》期 96（2016 年 2 月）。

《心窗》卷 2 期 6（1972 年 7 月）。

《香港聖公會荊冕堂金禧紀念特刊》。2015。

《荊冕四十載，廣傳基督愛》。2005。

《荊冕堂堂刊》。1992–1993。

《荊情集》。2001–2004，2016。

《聖公會荊冕堂七周年堂慶暨牧區成立，1972》。1972。

《聖公會荊冕堂士德幼稚園家長通訊》。2009, 2010–2015。

《聖公會荊冕堂五周年堂慶特刊，1970》。1970。

《聖公會荊冕堂四十周年堂慶紀念特刊》。2005。

《聖公會荊冕堂堂慶特刊》。1988。

《聖公會荊冕堂聖堂重建特刊》。2002。

《聖公會荊冕堂葵涌幼稚園家長通訊》。2002, 2009–2016。

《聖公會荊冕堂銀禧堂慶特刊，1965–1990》。1990。

三、期刊與連續性出版刊物

"Portrait of a Parish Crown of Thorns," *Diocesan Echo* 17 (October 1968): 1.

Lam, David. "The New Territories Story." *The China Mail*, February 3, 1960, 6.

Stumpf, L. "A Changing Philosophy." *LWF Hong Kong Quarterly Report* (Hong Kong: LWF/DWS, 1968), 1968:1, 1.

Stumpf, L. and Carl F. Nielsen. "Facing a Dilemma." *LWF/DWS Bi-Annual Report January-June 1970* (Hong Kong: LWF/DWS, 1970), 1.

〈「聖公會應繼續辦學嗎？」（上）〉。《教聲》期 1438（2003 年 9 月 28 日）：3。

〈「關懷的教會」計劃〉。《教聲》期 1617（2007 年 3 月 4 日）：2。

〈83 年教區大事回顧〉。《港澳教聲》期 408（1984 年 1 月 1 日）：1。

〈九十年代重點工作宣教為主〉。《教聲》期 745（1990 年 6 月 17 日）：1。

〈工友團契秋令會〉。《港澳教聲》期 312（1979 年 9 月 30 日）：4。

〈工友團契聚會〉。《港澳教聲》期 278（1976 年 11 月 30 日）：2。

〈工友團契聚會〉。《港澳教聲》期 282（1977 年 3 月 31 日）：1。

〈日供童膳萬餘份，荊冕堂福蔭學生〉。《華僑日報》，1965 年 11 月 27 日，13。

〈主恩小學〉。《港澳教聲》期 272（1976 年 5 月 30 日）：3。

〈主教在基督教哀悼大會，呼籲停上血腥暴行，傳福音奠民主基礎〉。《教聲》期 692（1989 年 6 月 11 日）：1。

〈主愛中華禁食祈禱會〉。《教聲》期 690（1989 年 5 月 28 日）：1。

〈主愛堂〉。《教聲》期 1484（2004 年 8 月 15 日）：2。

〈加強堂校連繫〉。《教聲》期 1811（2010 年 11 月 21 日）：1。

〈由社服單位倡議建立主愛堂〉。《教聲》期 1484（2004 年 8 月 15 日）：2。

〈白約翰會督陞座講辭〉。《港澳教聲》期 159（1966 年 12 月 31 日）：2。

〈立法局三讀通過教省條例草案完成立法程式〉。《教聲》期 1013（1995 年 8 月 6 日）：1。

〈各項團契事工〉。《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 2013–14 年報》，61。香港：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2014。

〈西九回顧宣教十年成效〉。《教聲》期 1877（2012 年 2 月 26 日）：3。

〈西九教區議會集思福傳策略〉。《教聲》期 1916（2012 年 11 月 25 日）：1。

〈西九龍社區——重視身心靈需要〉。《教聲》期 1752（2009 年 10 月 4 日）：5。

〈西九龍教區教育路上與主同行異象分享〉。《教聲》期 2003（2014 年 7 月 27 日）：3。

〈西九龍教區議會會議探討堂校社服協作路向〉。《教聲》期 2019（2014 年 11 月 16 日）：1。
〈吸取安居計劃經驗，大窩口邨重建順利〉。《華僑日報》，1978 年 5 月 29 日，18。
〈我們務要傳道〉。《教聲》期 717（1989 年 12 月 3 日）：1。
〈村民多大陸新移民，學歷低收入不理想〉。《荃灣報》期 91（1984 年 6 月 1 日）：5。
〈沉痛哀悼〉。《教聲》期 692（1989 年 6 月 11 日）：1。
〈明華學院秋季課程簡介〉。《港澳教聲》期 311（1979 年 8 月 26 日）：4。
〈服務青衣積極開拓禾場〉。《教聲》期 1819（2011 年 1 月 16 日）：2。
〈秉乘傳統及配合及發展，教區派立分區會吏長〉。《教聲》期 666（1988 年 12 月 11 日）：1。
〈青少年培育工作迅速發展〉。《教聲》期 1484（2004 年 8 月 15 日）：2。
〈前瞻一九七十年〉。《港澳教聲》期 195（1969 年 12 月 25 日）：1。
〈勇敢前行，愛主事主〉。《教聲》期 1181（1998 年 10 月 25 日）：6。
〈宣教服務弘主道，同步邁向新世紀〉。《教聲》期 1181（1998 年 10 月 25 日）：3–4。
〈要將大主教的使命和職份做好〉。《教聲》期 1614（2007 年 2 月 11 日）：1。
〈香港島區第二任主教陞座禮崇拜〉。《教聲》期 1610（2007 年 1 月 14 日）：1。
〈香港聖公會廿一世紀遠象——五年計劃諮詢文件〉。《教聲》期 1225（1999 年 8 月 29 日）：2。
〈香港聖公會西九龍教區繼續舉辦各項培育工作〉。《教聲》期 1456（2004 年 2 月 1 日）：6。
〈香港聖公會面對的挑戰〉。《教聲》期 1386（2002 年 9 月 29 日）：8。
〈香港聖公會管業委員會對教育修訂條例發表意見〉。《教聲》期 1472（2004 年 5 月 23 日）：1。
〈荃灣大窩口荊冕堂〉。《港澳教聲》期 150（1965 年 3 月 31 日）：3。
〈荃灣主恩小學畢業典禮誌盛〉。《港澳教聲》期 170（1967 年 11 月 25 日）：2。
〈荃灣荊冕堂〉。《港澳教聲》期 166（1967 年 7 月 25 日）：3。
〈荃灣荊冕堂已祝聖啟用〉。《港澳教聲》期 141（1965 年 5 月 31 日）：1。
〈荃灣荊冕堂舉行奠基禮〉。《港澳教聲》期 130（1964 年 6 月 30 日）：3。
〈荊冕堂失火了……〉。《教聲》期 868（1992 年 10 月 25 日）：4。
〈荊冕堂幼稚園招生〉。《港澳教聲》期 213（1971 年 6 月 30 日）：5。
〈荊冕堂成立牧區，選出第一屆牧區議員〉。《教聲》期 220（1972 年 1 月 31 日）：4。
〈荊冕堂服務荃灣五十載邁向新里程〉。《教聲》期 2074（2015 年 12 月 7 日）：1。
〈荊冕堂重建聖堂奠基，重建後將服務荃葵青區居民〉。《基督教週報》期 1875（2000 年 7 月 30 日）。
〈荊冕堂重建籌款演藝晚會，九月十一日荃灣會堂舉行〉。《教聲》期 1226（1999 年 9 月 5 日）：1。
〈荊冕堂重建籌款演藝晚會，信眾熱烈支持獲美滿成績〉。《教聲》期 1228（1999 年 9 月 19 日）：1。

〈荊冕堂耆老部主辦大埔敬老大行動〉。《教聲》期 864（1992 年 9 月 27 日）：6。
〈荊冕堂簡介〉。《港澳教聲》期 270（1976 年 3 月 28 日）：3。
〈馬偉利牧師談及現狀及遠象〉。《教聲》期 870（1992 年 11 月 8 日）：5。
〈基督教工業委員會〉。《港澳教聲》期 250（1974 年 7 月 31 日）：1。
〈基督顯現堂〉。《教聲》期 1482（2004 年 8 月 1 日）：2。
〈堂校社服配搭宣教見證信仰〉。《教聲》期 1883（2012 年 4 月 8 日）：3。
〈婦女婚後外出工作，幼兒服務需要甚殷〉。《葵青星報》期 234（1988 年 11 月 22 日）：8。
〈從合一到解散合一〉。《時代論壇》期 498（1997 年 3 月）。
〈從教育的失敗談聖公會學校〉。《教聲》期 497（1985 年 9 月 15 日）：6。
〈悼鮑彼得牧師〉。《教聲》期 2023（2014 年 12 月 14 日）：4。
〈探討教會與社會服務的關係〉。《教聲》期 1464（2004 年 3 月 28 日）：1。
〈教省成立十周年，實踐遠象，宏揚福音傳愛心〉。《教聲》期 1704（2008 年 11 月 2 日）：1。
〈教省委員會諮詢牧區檔（一）〉。《教聲》期 896（1993 年 5 月 9 日）：4。
〈教省社服單位全力落實《社會服務政策文件》〉。《教聲》期 2070（2015 年 11 月 8 日）：1。
〈教省重視學校宗教教育，總議會將重點討論辦學策略〉。《教聲》期 1769（2010 年 1 月 31 日）：6。
〈教區工業委員會暑假將舉辦多項活動〉。《港澳教聲》期 273（1976 年 6 月 27 日）：1。
〈教區特別議會已順利選出分區主教〉。《教聲》期 1021（1995 年 10 月 1 日）：1。
〈教區特別議會月底舉行——五年計劃意見書為討論重點〉。《港澳教聲》期 282（1977 年 3 月 31 日）：1。
〈教區發展動向〉。《教聲》期 646（1988 年 7 月 24 日）：1。
〈教區福利協會會員機構簡介〉。《港澳教聲》期 237（1973 年 6 月 30 日）：2。
〈教區擴展募捐出發，白會督訓詞——感謝與服務〉。《港澳教聲》期 283（1977 年 4 月 30 日）：1。
〈教堂社服合作的最佳示範〉。《教聲》期 1484（2004 年 8 月 15 日）：2。
〈教會對香港發展承先啟後的貢獻——我們當走的路〉。《教聲》期 1646（2007 年 9 月 23 日）：6。
〈教會端賴整體教友積極事奉，信徒要主動尋找教會的使命〉。《教聲》期 732（1990 年 3 月 18 日）：1。
〈第一所聖殿的建成〉。《教聲》期 1717（2009 年 2 月 1 日）：3。
〈第三十六屆教區議會，將以教會增長為主題〉。《教聲》期 399（1982 年 10 月 30 日）：1。
〈第四十屆教區議會已順利完成〉。《教聲》期 926（1993 年 12 月 5 日）：1。
〈陳謳明法政牧師膺第二任主教〉。《教聲》期 1843（2011 年 7 月 3 日）：1。
〈麥理浩夫人中心歷史簡介〉。《教聲》期 319（1980 年 4 月 6 日）：4。

〈港府正式通知基督教協進會，通過教會及牧師住宅用地新政策〉。《基督教週報》期 889（1981 年 9 月 6 日）。
〈港澳教區有廿六個牧區〉。《教聲》期 1061（1996 年 7 月 7 日）：1。
〈會督文告〉。《港澳教聲》期 220（1972 年 1 月 31 日）：1。
〈義務聖品廖翼顯牧師的話〉。《教聲》期 870（1992 年 11 月 8 日）：5。
〈義務聖品廖翼顯牧師的話〉。《教聲》期 879（1992 年 11 月 8 日）：5。
〈聖公會小學周年聚餐會鄺廣傑大主教致訓辭〉。《教聲》期 1583（2006 年 7 月 9 日）：1。
〈聖公會小學特色是提供優良宗教教育〉。《教聲》期 1621（2007 年 4 月 1 日）：1。
〈聖公會工友成立團契〉。《港澳教聲》期 281（1977 年 2 月 28 日）：2。
〈聖公會工友團契週年報告〉。《港澳教聲》期 304（1979 年 1 月 28 日）：4。
〈聖公會工友團契週年報告〉。《港澳教聲》期 318（1980 年 3 月 2 日）：4。
〈聖公會工友團契端午節戶外福音營〉。《港澳教聲》期 284（1977 年 5 月 31 日）：2。
〈聖公會工友團契舉辦工友郊遊日〉。《港澳教聲》期 289（1978 年 7 月 30 日）：4。
〈聖公會工友團契舉辦工友勞工法例班〉。《港澳教聲》期 288（1977 年 9 月 30 日）：4。
〈聖公會工友團契舉辦專題性座談會〉。《港澳教聲》期 290（1977 年 11 月 30 日）：4。
〈聖公會之港澳教區之教傳道區〉。《教聲》期 1062（1996 年 7 月 14 日）：6。
〈聖公會安老服務之起源〉。《教聲》期 873（1992 年 11 月 29 日）：6。
〈聖公會牧師教友發表正義聲明〉。《教聲》期 690（1989 年 5 月 28 日）：1。
〈聖公會荃灣荊冕堂後天舉行奠基典禮〉。《工商日報》，1964 年 6 月 19 日，5。
〈聖公會荊冕堂後天舉行奠基典禮〉。《華僑日報》，1964 年 6 月 19 日，5。
〈聖公會荊冕堂舉行新堂奠基〉。《華僑日報》，1964 年 6 月 22 日，10。
〈聖巴拿巴堂開堂簡史〉。《港澳教聲》期 146（1965 年 3 月 28 日）：2。
〈聖尼哥拉幼兒學校扎根大窩口五十年〉。《教聲》期 2096（2016 年 5 月 8 日）：6。
〈聖保羅堂（二）青年部為荊冕堂籌欵達港幣二千餘元〉。《港澳教聲》期 172（1968 年 1 月 25 日）：3。
〈聖保羅堂青年部為荊冕堂演劇籌款〉。《港澳教聲》期 166（1967 年 7 月 25 日）：2。
〈聖保羅堂青年部為荊冕堂演劇籌款〉。《港澳教聲》期 170（1967 年 11 月 25 日）：2。
〈聖保羅堂青年部演出「天倫夢迴」〉。《華僑日報》，1967 年 12 月 17 日，12。
〈葵涌居民新的開始，建立屬於自己的區會〉。《荃灣報》期 92（1984 年 6 月 1 日）：8。
〈葵涌能否擺脱二奶命？〉。《荃灣報》期 92（1984 年 6 月 1 日）：8。
〈葵涌崇真堂徙置新址〉。《基督教週報》期 3（1964 年 9 月 30 日）：4。
〈廖翼顯牧師返港，派長葵涌主愛小學，將兼助荃灣荊冕堂〉。《港澳教聲》期 179（1968 年 8 月 25 日）：1。
〈福利協會同工進修會重視傳福音與社會服務〉。《教聲》期 449（1984 年 10 月 14 日）：1。

〈福傳青衣關顧社區家庭，基督顯現堂升格牧區〉。《教聲》期 2082（2016 年 1 月 31 日）：1。

〈踏入一百二十六週年——教區進行釐定五年工作方針〉。《港澳教聲》期 268（1976 年 1 月 31 日）：1。

〈禮拜堂鳴鐘一分鐘，追悼學運犧牲同胞〉。《教聲》期 692（1989 年 6 月 11 日）：1。

〈鄺主教主持分區主教祝聖禮講道〉。《教聲》期 1031（1995 年 12 月 10 日）：1。

〈鄺主教在九龍東教友交流會致詞〉。《教聲》期 712（1990 年 3 月 18 日）：1。

〈鄺保羅大主教當選後致辭〉。《教聲》期 1614（1995 年 2 月 11 日）：1。

〈鄺廣傑主教自上週一起呈辭基本法諮委及草委〉。《教聲》期 690（1989 年 5 月 28 日）：1。

何輝維。〈七十年代本港社會福利發展之回顧〉。《社聯季刊》期 74（1980 年秋）：4–7。

余妙雲 。〈從貧說起——何明華會督〉。《基督教週報》期 2633（2015 年 2 月 8 日）。

李廣。〈缺乏中仍緊握使命〉。《教聲》期 1484（2004 年 8 月 15 日）：2。

周永新。〈志願機構的角色與貢獻〉。《社聯季刊》期 100（1987 年春）：20–22。

施同福。〈香港社會的現況和問題〉。《社聯季刊》期 13（1965 年春）：8。

胡鳳意。〈聖公會荊冕堂士德幼稚園英韓語普通話班一應俱全〉。《信報》，2016 年 2 月 25 日，C9。

張奧偉。〈童膳會簡介〉。《社聯季刊》期 21（1967 年春）：11–12。

陳慎慶。〈香港基督教社會福利事業的發展〉。《中國神學研究所期刊》期 25（1998 年 7 月）：71–72。

陸趙鈞鴻。〈幼兒教育在香港的重要〉。《社聯季刊》期 30（1969 年秋）：5。

華元博（Paul R. Webb）。〈海外基金來源之目前與未來趨勢〉。《社聯季刊》期 45（1973 年夏）：23。

馮潔皓。〈二十一世紀的香港幼兒教育課程改革——回顧與前瞻〉。《教育學報》，100。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4。

黃杏萍。〈靈的突破——愛從上帝而來〉。《護愛傳真》期 3（1999 年 4 月至 6 月）：1。

詹德隆。〈「移民問題籠罩香港——不自由、毋寧走？」〉。《信報財經月刊》期 136（1988 年 7 月）：14–15。

劉惠靈。〈教區社會福利服務回顧與前瞻〉。《教聲》期 463（1985 年 1 月 20 日）：3。

歐陽衛強。〈我所認識的聖公會工友團契〉。《港澳教聲》期 284（1977 年 5 月 31 日）：4。

______。〈從工作中去見證基督的福音〉。《港澳教聲》期 288（1978 年 3 月 26 日）：4；

盧秉信。〈居住環境與人口問題〉。《社聯季刊》期 53（1975 年夏）：4。

簡陸景衛。〈戰後香港的托兒所工作〉。《社聯季刊》期 30（1969 年秋）：7。

鄺廣傑。〈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教聲》期 823（1991 年 12 月 15 日）：1。

龐德明。〈港澳教區發展委員會五年計劃書（續）〉，廖翼顯譯。《港澳教聲》期 202（1970 年 7 月 31 日）：6；《港澳教聲》期 204（1970 年 9 月 30 日）：6；《港澳教聲》期 205（1970 年 10 月 31 日）：6；《港澳教聲》期 206（1970 年 11 月 30 日）：6。

______。〈港澳教區發展委員會五年計劃書〉，廖翼顯譯。《港澳教聲》期 201（1970 年 6 月 30 日）：6。

四、專書與單篇文章

"A Problem of People." In *Hong Kong Annual Report 1956*, 2.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1957.

Chan, Ming K. "The Politics of Hong Kong's Imperfect Transition." In *The Challenge of Hong Kong's Reintegration with China*, ed. Ming K. Chan, 1–30.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7.

Chan-Yeung, Moira M. W. *The Practical Prophet: Bishop Ronald O. Hall of Hong Kong and His Legacie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5.

Church of England. Diocese of Hong Kong and Macao. *The Diocese of Hong Kong and Macao 1849–1974: A Brief History and the 1974 List of Churches,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Social Welfare Centres*. Hong Kong: Diocese of Hong Kong and Macao, 1974.

Cressy, Earl H. and Loren E. Noren. *Urban Church Growth in Hong Kong 1955–1958, Second Hong Kong Study*. Hong Kong: The Author, 1960.

Cressy, Earl H. *City Churches in Hong Kong: With a Supplementary Survey of All Churches in the Colony*. Hong Kong: The Author, 1956.

Hayes, James. *Friends and Teachers: Hong Kong and Its People, 1953–1987*.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6.

Hong Kong Annual Report 1947.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1948.

Hong Kong Annual Report 1958.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1959.

Loh, Christine. *Underground Fron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9.

Noren, Loren E. *Urban Church Growth in Hong Kong, 1958–1962, Third Hong Kong Study*. Hong Kong: The Author, 1964.

Salaff, Janet W. *Working Daughters of Hong Kong: Filial Piety or Power in the Famil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Sit, Victor F. S. "Hong Kong's New Towns Programme and Its Regional Implications." In *Hong Kong: Dilemmas of Growth*, ed. Leung Chi-keung, J. W. Cushman, and Wang Gungwu, 397–417.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80.

Tang, Kwong-leung. *Colonial State and Social Policy: Social Welfare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1842–1997*.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8.

Tsang, Steve A *Modern Histor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Webb, Paul R. "Voluntary Social Welfare Services."《廿五年來之香港（1951–1976）——崇基學院廿五周年校慶紀念學術講座演講錄》，頁數不詳。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1977。

Wigglesworth, J. M. "The Development of New Towns." In *Asian Urbanization: A Hong Kong Case Book*, ed. D. J. Dwyer, 48–69.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1.

〈「暖暖心弦」關愛長者事工計劃〉。《麥絡》期 43（2013 年 4 月）：5。

〈「聖公會荊冕堂牧民中心」延續與深化「三頭馬車」網絡式全方位輔導服務〉。《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 2013–14 年報》，36。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2014。

〈一九七〇至一九八五年大事紀要〉。《庭碩》，16。香港：聖公會林護中學，1986。

〈十年內成立之傳道區〉。《香港聖公會教省成立十周年紀念特刊（1998–2008）》，73。香港：香港聖公會教省辦事處，2008。

〈十周年慶祝活動〉。《聖公會主愛堂十周年紀念堂刊——一九九七至二〇〇七》，36。香港：聖公會主愛堂，2007。

〈三十而立，茁壯成長——葵青區議會的由來及發展〉。《葵青區議會 30 週年紀念》，4。香港：葵青區議會，2015。

〈不斷成長〉。《院牧服務廿載情紀念特刊，1984–2004》，18。香港：院牧服務廿載情籌備委員會，2004。

〈主教話〉。《靈西集——香港聖公會西九龍教區》期 43（2010 年 12 月）：1。

〈主戴榮光歌〉。《普天頌讚》，201。香港：基督教文藝，2008。

〈全完堂百年歷史年表〉。《中華基督教會全完堂百週年紀念特刊，1905–2005》，12。香港：中華基督教會全完堂，2005。

〈因恩向榮〉。《院牧服務廿載情紀念特刊，1984–2004》，13。

〈在主愛裏的 10 年…〉。《聖公會主愛堂十周年紀念堂刊》，29。

〈宗教、德育及公民教育〉。《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第十九屆畢業典禮》。香港：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1991。

〈宗教〉。《庭碩》，44。

〈宗教活動〉。《聖公會仁立小學四十周年校慶特刊》，97。香港：聖公會仁立小學，2010。

〈服務內容〉。《聖公會林護長者之家》，8。香港：聖公會林護老人之家，年份不詳。

〈服務使命及宗旨〉。《聖公會林護長者之家》，2。

〈服務單位總覽〉。《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 2013–14 年報》，13–15。

〈服務模式〉。《聖公會林護長者之家》，5–6。

〈附屬委員會〉。《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 2013–14 年報》，11。

〈校長的話〉。《聖公會仁立小學四十周年校慶特刊》，31。

〈區議會選區〉。《荃灣區議會工作報告 1985–1988》，64。香港：荃灣區議會，1988。

〈通告——蘇主教榮休後安排〉。《靈西集——香港聖公會西九龍教區》期 46（2012 年 2 月）：1。

〈程序表〉。《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第十九屆畢業典禮》。香港：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1991。

〈程序表〉。《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第十六屆畢業典禮》。香港：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1988。

〈聖公會林護老人之家成立進程〉。《聖公會林護長者之家》，1。

〈聖品調動〉。《靈西集——香港聖公會西九龍教區》期 41（2010 年 3 月）：4。

〈福音月〉。《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第十六屆畢業典禮》。香港：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1988。

《香港社會福利工作之目標與政策》。修正本。香港：政府印務局，1965。

《香港聖公會廿一世紀遠象五年計劃政策文件——邁進千禧，榮主牧民》。香港：香港聖公會，2000。

《香港聖公會主愛堂堂刊》。2015 年 1 月 31 日，3。

《香港聖公會社會服務政策文件》。2013 年 6 月。

《香港聖公會教育政策文件》。2010 年 6 月。

《荃灣區議會工作報告 1991–1994》。香港：荃灣區議會，1994。

《聖公會主恩小學三十五周年紀念特刊，1961–1996》。香港：聖公會主恩小學，1996。

《聖公會主恩學校——創校五週年紀念專刊，1961–1966》。香港：聖公會主恩學校，1966。

《聖公會港澳教區一百三十五周年紀念特刊》。香港：聖公會一三五周年慶典中央籌備委員會，1984。

《邁進千禧，榮主牧民——香港聖公會廿一世紀遠象：五年計劃諮詢文件》。香港：香港聖公會，1999。

何佩然。《地換山移——香港海港及土地發展一百六十年》。香港：商務印書館，2004。

余恩明。〈合一見證的殞落——地區教會合辦社會服務的個案研究〉。神道學碩士論文，香港中文大學，2006。

吳青。《何明華與中國關係之研究，1922–1966》。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7。

呂大樂。《山上之城——香港紅十字會的故事，1950–2000》。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00。

______。《唔該埋單—— 一個社會學家的香港筆記》。香港：閒人行，1997。

呂大樂、王志錚。《香港中產階級處境觀察》。香港：三聯書店，2003。

李廣平。〈十年樹木〉。《聖公會主愛堂十周年紀念堂刊》，3。

______。〈整裝待發的主愛堂〉。《聖公會主愛堂十周年紀念堂刊》，5。

邢福增。《香港基督教史研究導論》。香港：建道神學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4。

______。《願祢的國降臨——戰後香港「基督教新村」的個案研究》。香港：建道神學院，2002。

周永新。《香港社會福利發展與政策》。香港：大學生出版印務，1980。

宗教教育中心。《步武基督——香港聖公會的社會服務，1849–2013》。香港：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2014。

林湘雲。〈一起走過的日子——共沐主恩〉。《聖公會主恩小學金禧紀念特刊》，27。香港：聖公會主恩小學，2012。

邱東。《新界風物與民情》。香港：三聯書店，1992。

胡志偉、劉梓濠編。《2014 香港教會普查簡報》。香港：香港教會更新運動，2015。

香港政府。《一九六六年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報告書》。香港：政府印務局，1967。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編。《合一承擔牧萬民——九十年代香港教會使命諮詢會議》。香港：香港基督教協進會，1990。

______編。《廿一世紀教會牧養與挑戰——九九香港教會普查報告及回應》。香港：香港教會更新運動，2002。

徐珍妮。《回應九七——基督徒群體的見證》。香港：香港基督徒學會，199。

荃灣區議會編。《荃灣二百年——歷史文化今昔》。香港：荃灣區議會，1991。

張家偉。《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2。

教育統籌委員會。《學前教育課程指引》。香港：教育統籌委員會，2006。

梁家麟。《少數派與少數主義——中港教會評論集（二）》。香港：建道神學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2。

梁祖斌。〈社區中心所肩負使命的轉變〉。《社耕拾穗——社區中心的過去、現在、未來》，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社耕拾穗」編輯小組編，16–18。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1995。

許舒（James Hayes）。《滄海桑田話荃灣》，嘉熙語文翻譯中心譯。香港：滄海桑田話荃灣出版委員會，1999。

郭諾：〈校史簡報〉。《聖公會主恩小學二十周年校慶特刊，1961–1981》，封面內頁。

陳月娥。〈跨越九七的實踐方向〉。《尋索基層組織路》，238。

陳昕等編。《香港全紀錄》，卷 2。香港：中華書局，1998。

陳翠兒、蔡宏興編。《空間之旅——香港建築百年》。香港：三聯書店，2005。

陸漢思。〈何以六教會建立荃灣合一社會服務中心？〉，李美賢譯。《尋索基層組織路》，235。香港：荃灣合一社會服務中心，1994。

曾國華。〈何明華會督（1895–1975）對香港之社會及教育之貢獻〉。碩士論文，香港大學，1993。

程翔。《香港六七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8。

黃沛宜。〈宗教〉。《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銀禧校慶特刊》，70。香港：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1996。

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社耕拾穗」編輯小組。〈序〉。《社耕拾穗》，3–13。

葛亮洪（Alexander Grantham）。《九龍及荃灣暴動報告書》。香港：政府印務局，1956。

劉潤和。《新界簡史》。香港：三聯書店，1999。

編輯部。〈貧困待援的戰後香港〉。《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四十周年紀念特刊，1947–1987》，16。香港：香港社會服務聯會，1987。

蔡思行。《戰後新界發展史》。香港：中華書局，2016。

蔡寶瓊統籌。《晚晚 6 點半——七十年代上夜校的女工》。香港：進一步多媒體，1998。

鄭秀蘭。〈主內盡其職，成全主聖工〉。《聖公會主愛堂十周年紀念堂刊》，10。

______。〈由零開始的主愛堂〉。《聖公會主愛堂十周年紀念堂刊》，9。

薛求理。《城境——香港建築，1946–2011》。香港：商務印書館，2014。
鍾鏡南。〈十年恩典〉。《聖公會主愛堂十周年紀念堂刊》，7。
關恆生。〈從香港社區中心歷史發展看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的成長〉。《社耕拾穗》，7–8。
饒玖才。《香港的地方與地方歷史（下冊）——新界》。香港：天地圖書，1992。

五、網上資料

"History of Oxfam International."樂施會官方網頁，https://www.oxfam.org/en/countries/history-oxfam-international。
〈二零一六年年中人口數字〉。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府統計處網頁，2016 年 8 月 11 日，https://www.censtatd.gov.hk/press_release/pressReleaseDetail.jsp?charsetID=2&pressRID=3867。
〈人心思離，移民外地數字攀升〉。《東方日報》，2018 年 10 月 1 日，https://hk.news.yahoo.com/人心思離-移民外地數字攀升-024148201.html。
〈右派工會及香港紡織業發展（一）〉。香港記憶計劃口述歷史訪談網頁，2016 年 11 月 2 日，http://www.hkmemory.hk/collections/postwar_industries/all_items/audio/201308/t20130827_64411_cht.html?f=classinfo&cp=%E7%B4%A1%E7%B9%94%E6%A5%AD&ep=Textiles&path=/collections/postwar_industries/all_items/8916/9062/9071/index_cht.html。
〈右派工會及香港紡織業發展（一）〉。香港記憶計劃口述歷史訪談網頁，2016 年 7 月 8 日，http://www.hkmemory.hk/collections/oral_hist ory/All_Items_OH/oha_24/records/index_cht.html#p45256。
〈師資〉。聖公會荊冕堂士德幼稚園網頁，2016 年 8 月 11 日，http://skhcotkg.edu.hk/sd/?page_id=82。
〈班級編制〉。聖公會荊冕堂士德幼稚園網頁，2016 年 8 月 11 日，http://skhcotkg.edu.hk/sd/?page_id=32。
〈班級編制〉。聖公會荊冕堂葵涌幼稚園網頁，2016 年 11 月 2 日，http://skhcotkg.edu.hk/kc/?page_id=29。
〈堂史〉。香港聖公會聖十架堂網頁，2016 年 6 月 22 日，http://church.skhcalvary.hk/Home/about-us/history。
〈堂徽簡介〉。香港聖公會基督顯現堂網頁，2018 年 10 月 22 日瀏覽，http://dwk.hkskh.org/epiphany/aboutus.aspx?id=646。
〈教區歷史〉。香港聖公會西九龍教區網頁，2016 年 10 月 13 日瀏覽，http://dwk.hkskh.org/aboutus.aspx?id=107&lang=2。
〈港人移民加國 10 年增 88%，多青年專業人才，二次回流，加國受益，香港面臨人才流失〉。《明報》，2018 年 8 月 19 日，http://www.mingpaocanada.com/tor/htm/News/20180819/taa1_r.htm。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聖公宗（香港）小學監理委員會有限公司網頁，2016 年 8 月 2 日瀏覽，http://www.apsc.org.hk/hochakwan.html。

〈課程簡介〉。聖公會荊冕堂士德幼稚園網頁，2016 年 8 月 11 日，http://skhcotkg.edu.hk/sd/?page_id=78。

〈質素評核報告——聖公會荊冕堂葵涌幼稚園〉。聖公會荊冕堂葵涌幼稚園網頁，2016 年 11 月 2 日，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eprimay-kindergarten/quality-assurance-framework/qr/qr-report/SKHCTC_KC.pdf。

〈學校設施〉。聖公會荊冕堂士德幼稚園網頁，2016 年 8 月 11 日，http://skhcotkg.edu.hk/sd/?page_id=80。

〈學校簡介〉。聖公會荊冕堂士德幼稚園網頁，2016 年 8 月 11 日，http://skhcotkg.edu.hk/sd/?page_id=16。2001 月 12 月。

〈學校簡介〉。聖公會荊冕堂葵涌幼稚園網頁，2016 年 11 月 2 日，http://skhcotkg.edu.hk/kc/?page_id=13。

教育統籌委員會。《終身學習‧全人發展——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議》。香港：教育統籌委員會，2000。教育統籌委員會網頁，2016 年 8 月 11 日，http://www.e-c.edu.hk/tc/reform/rf1.html。

聖公會荊冕堂編輯小組

鄭守定牧師

區惠珍老師

黃沛宜弟兄

鄭耀忠弟兄

梁明進弟兄

曹婉清姊妹

陳穎雯姊妹

何敏茵姊妹

李廣平姊妹

香港聖公會荊冕堂

新界荃灣德士古道 67 號

電話 (852) 2614 5321

傳真 (852) 2614 6539

網址 http://dwk.hkskh.org/thorns/

電子郵箱 office@skhthorns.org

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

期刊

Ching Feng: A Journal on Christianity & Chinese Religion & Culture

景風叢書

Double-Edged Sword: Christianity & 20th Century Chinese Fiction / Lewis Stewart ROBINSON

謝扶雅百齡詩文集 / 謝扶雅

Struggling for Survival: The Experience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China, 1949–1970 / CHAN Kim-kwong

尋真求全——中國神學與政教處境初探 / 葉菁華

承受與持守——中國大地的福音火炬 / 鄧肇明

開放與委身——田立克的神學與宗教對話 / 賴品超

十字蓮花——基督教與中國歷史文化論集 / 梁元生

反帝．愛國．屬靈人——倪柝聲與基督徒聚會處研究 / 邢福增

中國，開門！——馬禮遜及相關人物研究 / 蘇精

上帝的人馬——十九世紀在華傳教士的作為 / 蘇精

十年踽踽——汪維藩文集（1997–2007） / 汪維藩

Ethical Reorientation for Christianity in China: The Individual, Community, and Society / Manhong Melissa LIN

廿載滄茫——汪維藩文集（1979–1998） / 汪維藩

經典的轉生——晚清《天路歷程》漢譯研究 / 黎子鵬

香港教會系列

汪彼得牧師在香港工作之初探 / 潘玉娟

福利與信仰——香港教會推行「慈惠」之果效研究報告 / 龔立人、陳澤群

一個華南客家教會的研究——從巴色會到香港崇真會 / 湯泳詩

「社會良心」抑「搞事份子」——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歷史之研究 / 湯泳詩

天國．龍城——香港聖公會聖三一堂史（1890–2009） / 邢福增、劉紹麟

萬代要稱妳有福——香港聖公會聖馬利亞堂史（1912–2012） / 魏克利、陳睿文

中國基督教史研究叢書

大時代的宗教信仰——吳耀宗與二十世紀中國基督教 / 邢福增 主編

神天宣慶——圖說中國基督宗教藝術史 / 顧衛民、李廣平 編著

紅旗下的十字架——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共對基督教、天主教的政策演變及其影響（1949–1955） / 劉建平

更夫志，赤子心——汪維藩思想與事工之研究 / 姚西伊、宋軍 主編

既雕且琢，復歸於璞——張充仁的藝術生涯 / 陳耀王

變局中的抉擇——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歷史的終結（1949–1951） / 宋軍

資料叢刊

中國新方志中的基督宗教資料索引（1980–1998） / 陳劍光、龐君華

其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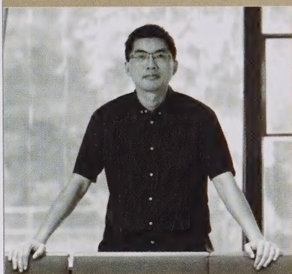
Karl Ludvig Reichelt: Missionary, Scholar & Pilgrim / Eric J. SHARPE

如欲閱讀以上刊物之內容簡介或本社通訊，請瀏覽 www.csccrc.org

邢福增，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教授、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社長、中國基督教史學會會長（2012–13, 2016–17）。

近年研究專注於當代中國基督教發展、中國政教關係及香港基督教歷史。近著包括：《世界不配有的人》（2015）、《中國乎？本土兮！身分認同的十字架》（2016）、《被擄的記憶：選民+遺民》（2017）及《變局下的徘徊：從戰後到九七後香港教會社關史論》(2018)。

曾獲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模範教學獎」（2010）。



這是發生於荃灣德士古道荊冕堂的故事。荊冕堂是香港聖公會於荃灣地區建立的第一個牧區，其發展見證了荃灣從鄉郊蛻變為衛星城市的變遷。隨着時代演進，新型屋苑及大型商場紛紛落成，與舊式樓宇及工廈並存，呈現出經歷新舊交替的社區面貌。昔日在工業新區服事基層市民的荊冕堂牧區與時俱進，歷經變革，現已建立為結合堂校及社會服務、關顧全人、提供多元化服務的牧區。十多年前建立的聖堂，不僅是建築物的重建，更是使命的更新。在這一切「新」的人與事背後，如何建立教會——基督的身體——這個既古老又真實的使命，仍然是荊冕堂需要不斷迎向的挑戰。

宗文社
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
CHRISTIAN STUDY CENTRE ON CHINESE RELIGION & CULTURE

ISBN 978-962-7706-38-0
9 789627 706380